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英〕约翰·霍布森 著
孙建党 译　　于向东　王　琛 校

山東畫報出版社

世界历史需要重写，而我们正处于这项工作的初级阶段，本书为此在学术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霍布森的论点证据充分，值得认真思考。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的作者）

本书研究深入，涉及范围广，积极回应了欧洲中心论观点，并证明有众多的非欧洲人民对现代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堪称是作者曾祖父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的经典著作《帝国主义》的后续之作。

——马丁·伯纳尔（《黑色雅典娜》的作者）

约翰·霍布森的描写极具雄心，从字面和寓意上都力求重绘世界历史版图。借助于一系列经济与文化史学的既有成就，他对这一千年的世界史提出了一个新的“宏观叙述”，这也许是对“东方对西方崛起有所贡献”的最好概括。他认为，西方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阿拉伯人和中国人知识的采纳，对非洲劳工的奴役和对亚洲经济体非对称贸易协定的实施。作为对欧洲胜利的反驳，本书实乃其曾祖父之《帝国主义》的回应。

——尼尔·弗格森（《帝国》的作者）

证据表明，对于西方20年的崛起，亚洲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霍布森博士用扣人心弦的笔调和富有挑战性的构想，将这些碎片拼在了一起。他的宏伟构想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视角。

——埃里克·琼斯（《欧洲奇迹和循环增长》的作者）

这是一本重要的比较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著作，既言简意赅地反驳了欧洲中心论，又收集了欧洲和亚洲历史方面令人信服的证据。霍布森认为，所谓的使欧洲主宰世界的许多发明实际上是从亚洲（通常是由中国）扩散到欧洲的，亚洲（中国）直到19世纪仍然和欧洲一样发达。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两卷本）的作者〕

本书富有洞察力和独创性，不亚于其他任何一种描写现代世界历史的文本。霍布森博士突破了学术界对东西方关系原有的认识，对西方文明既定的设想进行了校正，追溯了东方对西方的蒙恩。这是一种罕见的智力再现——一部非凡和发人深省的著作。

——萨西·瑟罗（《伟大的印度小说》作者）

ISBN 978-7-80713-850-1
9 787807 138501 >
定价：30.80元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英〕约翰·霍布森 著

孙建党 译　　于向东　王　琛 校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英）约翰·霍布森著；孙建党译.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80713-850-1

Ⅰ.西… Ⅱ.①霍…②孙… Ⅲ.文化史－研究－西方国家 Ⅳ.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2886 号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号 15-2006-045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By John M. Hobs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本书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傅光中 郭珊珊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10.5 印张 1 幅图 21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献给间接影响我的曾祖父，

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

您那见解独到的著作深深影响了我的世界观，

谢谢您啊！

您著述的独特光芒将永不稍减。

献给直接影响我的亲爱的塞西莉亚和我的家人，

伊万杰琳、迈克尔、盖布里埃拉，

你们那充满爱意和深情的一举一动浸透到了，

我对世界的认识、感知和理解之中。

感谢你们所有的人！

你们那灿烂的曙光温暖着我的每一天。

前言和致谢

可能有读者担心“这会是另一本典型的关于西方崛起的著作”，为使他们放心，我要声明本著作并非如此。与几乎所有关于该主题的著作不同，本书没有按照标准的欧洲和种族中心论的框架来重述大家所熟知的主题。与以往的叙述不同，笔者提出了一种理论，从而使东方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因此，尽管我的目的在某些方面与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①]《千年纪》有所区别，但我同样乐于给读者带来惊喜。我集中于叙述许多东方的发明、人文和地理，它们使西方的崛起成为可能，而所有这些在传统的叙述中都被忽视了。如果允许，我愿意借用《千年纪》序言中的词句来表达一种意思，即本书谈什么和不谈什么。

在本书中，读者将看不到任何关于授职权之争、三十年战争抑或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内容。尽管书中讨论过意大利商人群体，但他们一直是作为东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中更为广泛的创新发展的模仿者而出现的。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更多的是承始于伊斯兰中东地区和北非[②]，而非托斯

①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历史与地理学教授，《千年纪》是其1995年作品。——译者

②我使用“中东”而非“西亚”一词，只是因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前者更易于识别。还值得注意的是，我在谈到中国人的名字时使用的是威妥玛注音（Wade-Giles），而不是拼音法，也是因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前者比后者更易于识别。

卡纳[1]。达·芬奇、菲奇诺（Marsilio Ficino）[2]、哥白尼在沙蒂尔（ibn al-Shatir）、花拉子密（al-Khwarizmi）（780—847）以及纳西尔·艾德丁·图西（Nasir al-Din al-Tusi）[3]的类似成就面前居于下风，瓦斯科·达·伽马在亚洲的杰出成就下相形见绌。本书仅仅提到的是伊丽莎白一世、奥利弗·克伦威尔、维多利亚女王。对于路易十四和腓特烈大帝等重要人物的出现，则请予谅解。在本书所讨论的大部分时期里，马德里、里斯本、伦敦、威尼斯相对于巴格达、开罗、广州和卡利卡特来说都只是落后的郊区小镇。鉴于英国的工业化只是更早的中国先进发明向外传播的最后阶段，伦敦博览会就显得有些狂妄自大。本书探讨的国家主导的军事工业化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过程，指的不是在英国，而是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同样重要的是，本书没有去探讨德国的“后发工业化”，而是引导读者来讨论德川时代日本的工业“先发”。总之，读者将了解到更多有关东方——尤其是伊斯兰中东地区、北非、印度、东南亚、日本以及最重要的中国的历史，这样也可了解关于西方及其起源的新知识。

因此，对于那些希望以欧洲视角来详尽阐述西方发展的读者来说，无疑将会感到失望。然而，我的本意并非是让这些读者失望，而是引导他们去了解被忽视的东方如何促进近代西方崛起的故事。某种意义上，我更为关心的是，本书的具体论据是否足以让读者信服，而较少关注它们是否新奇、有趣，以及是否有所创见。我更感兴趣的是本书所提出的重要论题而非其提供的具体答案。这样，我能够打消那些读者潜在的疑虑，即这的确不是另外一本典型的关于西方崛起的著作。因此，我希望那些正在阅读的

---

①托斯卡纳位于意大利中西部。中世纪的托斯卡纳地区，各个城市都是独立的。在不断的征战中，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佛罗伦萨逐渐成为众多城市中最强大的一个，被认为是文艺复兴发端的地方，涌现出了以乔托、米开朗基罗、达·芬奇、但丁和拉斐尔为代表的一批杰出艺术家。——译者

②菲奇诺（1433—149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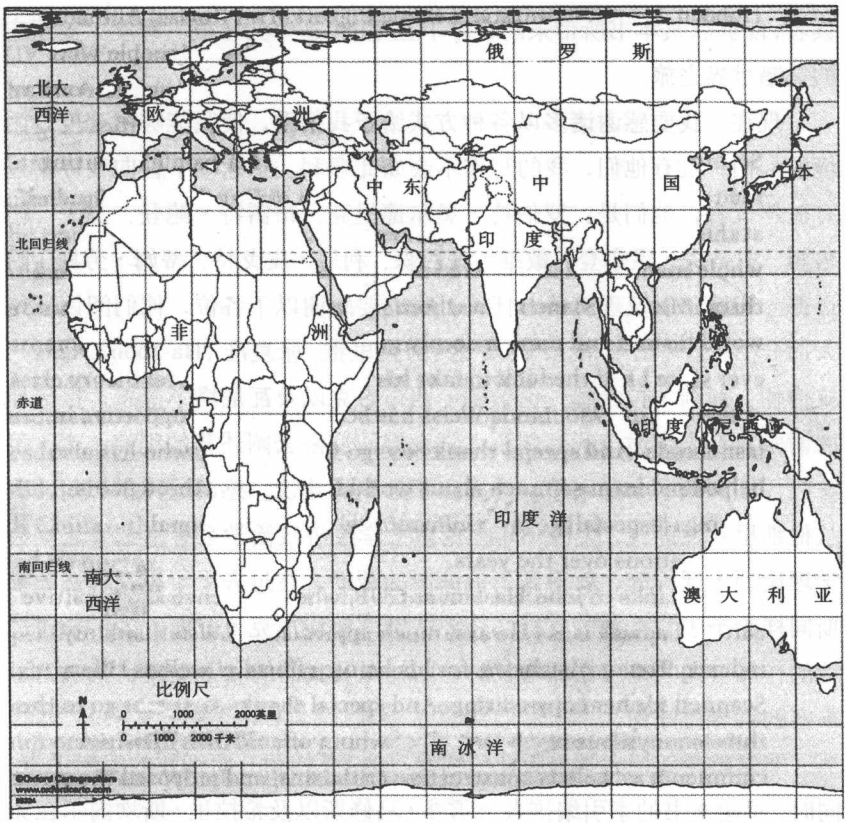
③沙蒂尔是14世纪叙利亚天文学家。花拉子密（约780—约850），阿拉伯数学家，他使用印度数字（即阿拉伯数字），使数学运算发生了革命，是代数学的先驱。纳西尔·艾德丁·图西（1201—1274），阿拉伯百科全书式学者，著有天文、三角、几何等多方面的著作。——译者

读者，能够欣赏本书所带来的有悖于直觉的，迄今为止很大程度上被遗忘的黑暗世界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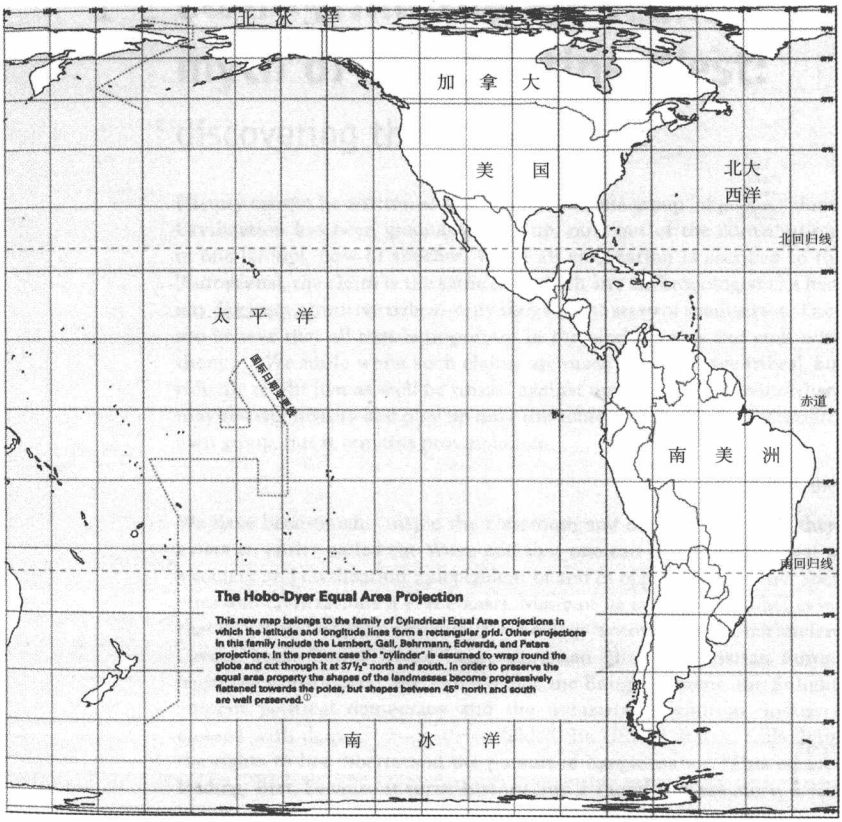
现在，我要感谢诸多以各种方式给予我帮助，使我能够顺利度过困境的人们，没有他们，我的写作不会如此顺利。感谢以下曾向我提出过有益建议者，他们是：罗伯特·奥尔德里克、布雷特·鲍登、杰夫·格鲁姆、史蒂夫·霍布登、戴维·马西森、利恩·皮戈特、蒂姆·劳斯、阿迈德·施博尔以及理查德·怀特。我也要感谢以下各位，他们阅读了绝大部分书稿，并给予指正：阿美达·阿查里雅、张夏准（Ha-Joon Chang）、拉梅什、莉莉·拉希姆、伦纳德·西布鲁克以及瓦尼塔·塞思，更倍加感谢张夏准先生邀请我到剑桥大学发展研究院去阐述我的观点。本·蒂普顿仔细阅读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独到的建议。感谢迈克尔·曼，我从他那里获益匪浅，从1986年在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系有幸选修其社会学理论硕士课程起，就得到了他慷慨的帮助。在过去十年里，林达·维斯同样给予了我无数的支持。还要特别感谢埃里克·琼斯，多年来通过他的作品（尤其是《循环增长》一书）以及我们的私下交流，我学到了丰富的世界史知识。

非常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约翰·哈斯莱姆耐心而细致的编辑工作。同时，感谢本书的索引编排者特雷弗·马修斯以及希拉里·斯坎内尔在文字编辑工作上付出的巨大努力。还要特别感谢三位没有署名的评论人，他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批评，我已采纳其建议全力进行了修改。尤其感谢他们使我能写出一本好书，无疑也是我比较满意的一本。当然，还要附上一句：本书的所有错误由我个人负责。

最后，我要向我的未婚妻塞西莉亚·托马斯表达我的爱意和感激，在我过去三年所经历的最为动荡不定的生活变化过程中，她给予我引导，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牺牲，是我的精神支柱。她仁慈的牺牲、体贴和富有同情心的力量，代表了这个动乱多难星球上最美好的一切，给予了我光明和温暖。这里再次强调一下：所有的错误概由我负责。



地图　奥博－戴尔等积投影图



①奥博－戴尔等积投影图。这张新地图属于圆柱等积投影系列，在这种投影图中，经纬度呈矩形网格线。该系列的其他投影还有兰勃特投影、贝尔曼投影、高尔投影、爱德华兹投影以及彼德斯投影。在这个投影图上，该“圆柱”假定卷绕着地球，在南北纬37.5°线穿过地球。为了保持这种等积特性，各大陆地的形状朝向南北极方向逐渐平面化，但在南北纬45°之间，各大陆地的形状则得到完好保持。

目 录

图表 1
前言和致谢 1
地图 奥博－戴尔世界投影图 4

第 1 章 反驳纯粹西方的欧洲中心论神话：发现东方化的西方 1

第一部分 作为“先发地区”的东方：东方通过东方全球化发现并主导世界，公元 500 — 1800 年

第 2 章 伊斯兰和非洲开创者：在亚非大发现年代构建世界和全球经济的桥梁，公元 500 — 1500 年 27

第 3 章 中国开创者：第一次工业奇迹和中国孤立主义的神话，约公元 1000 — 1800 年 46

第 4 章 东方保持优势：东方专制主义与印度、东南亚和日本孤立主义的双重神话，公元 1400 — 1800 年 67

第二部分　落后的西方：东方全球化和基督教国家的建立，公元500—1498年

第5章　基督教国家的建立和欧洲封建制度的东方起源，约公元500—1000年　89

第6章　意大利开创者的神话，公元1000—1492年　104

第7章　瓦斯科·达·伽马时代的神话，公元1498—约1800年　121

第三部分　作为“后发地区”的西方与后发优势：东方全球化与西欧作为先进西方的重塑，公元1492—1850年

第8章　1492年神话和发现美洲的不可能性：亚非对西方后来居上的贡献,公元1492—约1700年　145

第9章　英国工业化的中国起源：英国是擅长模仿的“后发国家”，公元1700—1846年　170

第10章　塑造欧洲种族主义身份和创造世界，公元1700—1850年：作为一种道德天职的帝国文明使命　196

第11章　英国工业化的黑暗面和放任主义的神话：战争、种族帝国主义与工业化的亚非起源　217

第四部分　结语：东方化的西方与西方的欧洲中心神话

第12章　理性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和东西方大分裂的双重　251

神话，公元1500—1900年

第13章 东方化西方的兴起：身份／动力、全球结构与偶然性 260

参考书目 282

译后记 314

图 表

1.1 “西方与东方”的东方主义和父权制诠释 8

1.2 马克斯·韦伯关于“东方”和“西方”的东方主义观：理性大分裂 15

10.1 英国帝国主义理论：文明等级表和种族主义世界的建立 201

11.1 英国政府的实际支出（费用以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表示） 220

11.2 欧洲主要国家在其工业化时期的（实际）国防费用负担比较 221

11.3 部分欧洲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平均关税税率 222

12.1 西方主要国家政治公民权的起始年份 257

13.1 西方身份的塑造及影响 272

13.2 重大世界历史事件的两种观点，约公元500—1900年 277

第1章

反驳纯粹西方的欧洲中心论神话：发现东方化的西方

历史不能被写成仅仅是属于某一群人的历史。文明是逐渐建立起来的，时而是由于这一部分人的贡献，时而则是由于另外一部分人的贡献。当所有文明都被归因于欧洲人时，这就如同某位人类学家某一天在原始部落里听到的那样——他们只是讲述自己的事情。他们过于相信世界上所有重要的一切都与他们共始终……当原始部落做出如此声明时，我们会感到好笑，但是这种嘲笑反过来或许同样适用于我们自己……狭隘主义可能改写历史，而仅仅大肆宣扬自己族群成就的历史学家，同样是狭隘主义者。

鲁思·本尼迪克特[①]

在课堂内外我们都学到，世界上存在着一个称作西方的实体，并且有人把这个西方看作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和文明，而与其他社会和文明（例如东方）截然不同。我们许多人甚至根深蒂固地认为，西方世界有一个按照古希腊产生了罗马，罗马产生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这样的顺序自主

①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诗人（1887—1948），著有《菊与刀》等。——译者

> 产生的文明谱系图。工业连同民主以及后来产生的美国，都体现了生存权、自由权和对幸福的追求……这是在误导，首先，因为它把历史变成了一部道德成功史，变成了一场由各个西方竞跑者向下一个接替者传递自由火炬的接力赛。历史就这样被改造成了一个关于美德传承以及品德高尚者（例如西方）如何战胜落后族群（也就是东方）的传说。
>
> 埃里克·沃尔夫[①]

我们大多数人都很自然地假设东方和西方一直是独立的不同实体。我们也通常认为，“自主的”或者“纯粹的”西方独自开创了缔造近代世界的使命，至少这是我们多数人在中学，要么就是在大学所学到的。我们一般认为，由于其独创性的科学理性、理性的躁动以及民主或开明的特性，大约在1492年时，“纯粹的”西方已经站在了世界之巅（考虑到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从那时起，传统的看法就已形成——欧洲人向外扩张征服东方和中东，同时设计了资本主义的轨道，整个世界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就能够摆脱贫困和悲惨的处境而进入近代化的光明。因此，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把世界历史的发展史与西方的崛起和胜利混为一谈，似乎是自然或不言而喻的事情。这种传统观点可以被称作“欧洲中心论”。因为其核心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西方完全应该占据世界历史发展舞台的中心。但的确如此吗？

本书的基本主张是：这种常见但却富有欺骗性的欧洲中心论，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错误的，至少可以说，东西方从公元500年开始就通过全球化一直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经过类比，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②]认

①著名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1923—1999)，生于维也纳，后移居美国。在其最重要的著作《欧洲和无历史之人》中，他尖锐地批判了西方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将“非西方人民”视为“没有历史的人民”的西方中心论思想，强调必须在世界整体的视野中来研究各社会及文化之间的关系。——译者

②当代美国学者，康奈尔大学教授。在多卷本著作《黑色雅典娜》中，他对18世纪以来的欧美学术传统做了批判性反思，认为在作为西方文明之源的希腊文明的形成期间，非洲文明是其重要源头，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欧洲学者杜撰出来的“欧洲中心论”神话。——译者

为古希腊文明显然是源于古埃及。[1] 同样，本书认为东方（公元500年至1800年之间比西方更先进）在促进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试图用“东方起源的西方”来代替“自主和纯粹的西方”的概念。东方通过两个主要步骤促进了西方的崛起：传播／吸收和掠夺。首先，东方在公元500年后缔造了一种全球经济和全球联系网，这些更为先进的东方“资源组合”（resource portfolios）（如东方的思想、制度和技术），通过我称之为东方全球化的途径传播到西方，然后被其吸收。其次，1492年后的西方帝国主义导致欧洲人攫取了东方各种经济资源，从而使西方的崛起成为可能。简言之，西方并非是在没有东方帮助的情况下自主地开拓自身的发展，因为如果没有东方的贡献，西方的崛起无法想象。那么，本书的任务就是追溯导致西方（我称之为东方化的西方）崛起的诸多东方贡献。

本书阐述了欧洲中心主义和反欧洲中心主义之间的争论。近年来，少部分学者宣称西方兴起的标准理论——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自由主义和韦伯主义(Weberianism)等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2] 他们都认为，纯粹的西方是靠自己与生俱来的优越禀赋和特性创造了现在的成就，这种观点假定欧洲是基于一种刚性的内在逻辑自主地发展。因此，这种理论认为，近代世界的兴起可以被描述为西方的兴起和胜利。重要的是，欧洲中心论已经获得了新的生机，或者是焕发了新的活力，尤其是1998年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①《国富国穷》[3] 的出版，显然是蹈循了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的《西方的胜利》[4] 一书。兰德斯的著作对近来一些反欧洲中心论的分析发起了猛烈的贬损和抨击，这种分析是睿智和独到的，尤其值得阅读。兰德斯最重要的贡献是，他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自由主义和韦伯主义之间旧的争论，转变为新的“欧洲中心论与反欧洲中心论”的争论。对于我来说，这似乎正是值得探究的问题所在。由于旧的争论可以说无需争辩，现在所有这些方法论似乎都只是关于

①当代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其《国富国穷》是当代西方中心论的代表作品。——译者

同一欧洲中心主题的细小变异（见下部分内容）。本书加入了这种新的争论，并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各主流观点提出了质疑，同时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观点。

然而，本书中使用的“欧洲中心论与反欧洲中心论”的框架过于简化，它本身就算不上一个论题。假如不能确定两种密切相关的思想之间存在着二元对立，那主要是因为——可以这么说——并不存在一种合乎逻辑的“欧洲中心论”范式。事实上，那种假设大多数学者都在努力捍卫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必胜的观点是错误的，尽管一些人赞同欧洲中心论（例如兰德斯和罗伯茨），但很多人并非如此。不过，我认为欧洲中心论融合了西方兴起论的所有主流观点，即使这种看法大多体现在个别学者身上（见以下内容）。因此，通过批判欧洲中心论的诸多观点来阐述我的看法，是理所当然的。

本书的主要论点是反驳欧洲中心论最基本的假设之一，即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东方一直是被动的旁观者，是牺牲品，或是西方权力的承受者，因而东方从世界发展史中被边缘化也是合理的。尽管本书在许多方面都与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的名著《千年纪》不同，但我赞成其观点：

> 从世界历史意义上来说，边缘地区有时需要比中心地区更多的关注。本书的部分使命就在于恢复那些被遗忘的，包括那些常常被当作边缘而忽略的地区，作为低等的被边缘化的民族，以及那些被贬为小角色的诸多个体（的历史面貌）。[5]

或者从更狭隘的意义上来说，就像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①] 在其著作《世界历史中的非洲》前言中所述那样：

---

①美国著名民权领袖、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1868—1963），20世纪泛非运动著名领导人。——译者

> （人们）不断致力于通过从世界历史上忽略非洲的做法来使黑人奴隶合理化，所以今天几乎普遍认为，撇开黑人的历史也是真实的……因此，我试图在本书中提醒读者……非洲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无论过去还是现在。[6]

同样，我在本书中的主要观点是，欧洲中心论对东方动因的否定，以及在阐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东方的忽略，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得到的不仅是一种严重扭曲的西方兴起论，而且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除了知道东方在西方世界历史主流中是一个被动角色或守旧的落后地区外，知之甚少。

东方的边缘化导致了一种高度的缄默，因为它掩盖了三个重要的事实。首先，东方在约公元500年后开拓了其自身的重大经济发展；其次，东方在公元500年后积极创造并维持着全球经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东方通过开创和向欧洲传播许多先进的“资源组合”（如技术、制度和思想），对西方的崛起做出了积极和重要的贡献。因此，我们需要恢复东方经济活力以及东方在西方崛起过程中所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是一个东方资源的被动接受者，因为欧洲人在塑造其自身命运的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尤其是通过构建一种不断变化的共同特性，这反过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洲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方向）。总之，两种相互联系的观点——一方面是东方的作用和对先进的东方“资源组合”通过东方全球化的吸收，另一方面是欧洲的动力／身份以及对东方资源的攫取，这两者的融合就构成了东方化西方的兴起这一不为人知的历史发现。

在这一背景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通常关于东方无关紧要和欧洲优越的看法，通过墨卡托[①]世界地图（Mercator world map）得到了确定。这种地图从世界地图集，到学校的墙壁上，再到航班售票代办处和会议室

---

①荷兰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1512—1594），发明绘制地图的圆标形投影法，首先使用atlas一词。——译者

随处可见。重要的是，南半球陆地的实际面积，几乎是北半球陆地面积的两倍。可是在墨卡托世界地图上，北半球的陆地面积占地图的2/3，南半球的陆地面积仅占1/3。这样，尽管斯堪的纳维亚只有印度面积的1/3大小，但在地图上却被赋予了同样大小的面积。此外，在墨卡托的地图上，格陵兰岛的面积几乎是中国的两倍，尽管后者的面积几乎是前者的四倍。为了纠正其所视为欧洲种族主义特权的现象，阿诺·彼得斯(Arno Peters)于1974年制作了彼得斯投影(或者称为彼得斯-高尔投影)(the Peters-Gall projection)，这种投影法试图将世界各国按照它们的实际地表面积进行展示。在这种投影里，南半球赫然显得更大，而欧洲却大大缩小。尽管这份世界地图并不尽善完美，但其内容摆脱了在墨卡托地图上隐含的欧洲中心论的扭曲。毫无疑问，当彼得斯投影第一次出现时，欧洲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如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①]所言，“西方人坚持一种令他们如此自命不凡的世界投影图（墨卡托），是可以理解的”。[7]

实际上，本书与彼得斯力求修正我们对世界地图的理解相同，试图通过发现东方对于西方的相对重要性，来纠正我们对世界历史的理解。更为明确的是，在本章的开头我已经提供了一种该投影图的变体（“奥博-戴尔”），但是鉴于中国在西方崛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对该投影图进行了重新设定，以便使中国处于中心位置。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和欧洲现在分别占据了远东北和远西北这些被忽略的边缘地区。尽管非洲也占据着远西地区，但其面积的增大，纠正了其在欧洲中心模式中被贬低了的边缘地位。

本章分两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简要追溯了18、19世纪欧洲中心论的创立过程，然后阐述了关于西方崛起的重要原因，这一理论的基础在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可以明确地找到。第二部分则简要展开论述了我的两个论点，作为对欧洲中心论主流观点的修正。

---

①当代美国学者，其《伊斯兰历程》一书强调地理的重要性和波斯人、土耳其人、印度人对伊斯兰兴起的贡献。——译者

构建西方崛起主流理论的欧洲中心或东方主义基础

欧洲身份的形成和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的发明

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①]创造了著名的“东方主义”一词，尽管公正地讲，包括维克托·基尔南（Victor Kiernan）、马歇尔·霍奇森和布赖恩·特纳（Bryan Turner）[②]在内的许多其他学者，已经沿着这一方向进行了探索。[8] 东方主义或欧洲中心论（在本书中我交替使用它们）是一种世界观，它声称西方比东方有着固有的优越性。更确切的说，东方主义塑造了一种永恒的优越的西方形象（“自我”），这是相对于虚构的“他者”——对落后和低等的东方的消极界定。正如在第10章中阐释的那样，这种截然对立的基本概念，18世纪和19世纪时就在欧洲人的想象中凸显出来。那么，通过什么特定的范畴西方人开始把“自我”想象成优越于东方的“他者”呢？

在1700至1850年之间，欧洲人按照想象或者说是迫使世界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西方和东方（或是“西方世界和其他”）。在这一新的观念中，西方被想象成优越于东方，这种虚构的贬低东方的观念，被作为理性的西方观念的对立面确立下来。确切地说，西方被想象成天然具有独一无二的美德：理性、勤勉、高效、节俭、具有牺牲精神、自由、民主、诚实、成熟、先进、富有独创性、积极向上、独立自主、进步和充满活力。然后，东方就成为与西方相对的“他者”：非理性、武断、懒惰、低效、放纵、糜乱、专制、腐败、不成熟、落后、缺乏独创性、消极、具有依赖性和停滞不变。也就是说，西方被赋予的一系列先进的特性，在

---

①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1935—2003），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生于耶路撒冷。其名著《东方主义》认为，19世纪西方国家眼中的东方世界完全是凭空杜撰，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人民和文化有一种强烈的偏见，这为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提供了借口。萨义德的另一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则从西方文学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西方文化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译者

②维克托·基尔南，当代英国学者，著有《人类的主人：欧洲帝国时期对其他文化的态度》等。布赖恩·特纳，当代英国学者。——译者

东方则不存在。

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想象的过程确定了西方一直是优越的观念（这种设想被追溯到了古希腊时代）。因为据称从一开始西方就充满了发展的活力，拥有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以及合理的制度，这必然也会产生理性的个体，欣欣向荣的生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充满光明和激情的资本主义近代性能够实现必然的突破。通过类比，东方被盖上永久不变的低等烙印。东方被说成是容忍专制观念和不合理的制度，这就意味着在黑暗的深渊中，理性个体一产生就遭到了集体主义的残忍扼杀，由此使得经济停滞和奴役成为其永恒的命运。这种观点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和东方彼得·潘（Peter Pan）[①]理论的基础，制造出一种“充满活力的西方”与“停滞不变的东方”的永久印象。（见表 1.1）

这些二元对立的特性，实际上与构成父权式的阴阳结构特性如出一辙，也就是说，近代西方类似于结构中的男性，东方类似于想象的女性。

表 1.1 “西方与东方”的东方主义和父权制诠释

充满活力的西方	停滞不变的东方
善于创新、有独创性、积极向上	缺乏创新、愚昧、消极
理性	非理性
科学	迷信、固守传统
纪律严谨、有秩序、克己自制、理智、睿智	懒惰、混乱／无秩序、肆意、非理智、情绪化
思想活跃	肢体发达、诡谲、妩媚
家长般的、自主、运转机制良好	稚嫩、依赖性、运转机制不良
自由、民主、宽容、诚实	奴役、专制、褊狭、腐败
文明	未开化／野蛮
道德和经济进步	道德退化和经济停滞

①彼得·潘是由英国小说家及剧作家詹姆斯·巴利（1860—1937）所创造的小说角色，也是同名改编的舞台剧、儿童故事以及其他衍生作品的主角。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拒绝长大的小男孩，带领一群孤儿在永无岛（Never Land）的各种冒险经历。——译者

这并非巧合，因为在公元1700年后的历史时期中，西方身份被塑造成父权式和强大有力，而东方却被设想为柔弱无助的女性。这就导致了东方学家所描述的亚洲是“在消极地等待着波拿巴”，因为只有他能够将亚洲从被奴役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行动后来被称为“白人的负担”）。这一理论十分重要，它将东方标上了诡谲、妩媚和诱惑的而首先是消极的印记（如缺乏开创自身发展的主动性），这就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侵略和统治创造了巧妙的内在合法逻辑。

但这并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和征服东方的一种合乎情理的理念，因为通过描述或想象把东方作为西方的消极对立面，仅仅是唯有西方有能力自主开拓发展这一论点的一小步。的确，欧洲科技革命的结果，形成了世界历史上“积极的”欧洲主体和“消极的”东方客体。此外，欧洲历史被刻写成一种发展的时间直线，而东方历史则被想象成停滞不前的循环。尤其是在欧洲中心论中，这一分裂意味着一种“智力上的种族隔离制度”，因为优越的西方被永久性地与低等的东方隔离开来。或者用鲁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①]的话来说更贴切，就是“噢，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远合不到一起”，这的确十分重要，它使得西方毋须承认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东方所给予的积极影响，因此也意味着西方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创造了其自身的发展，完全无需东方的帮助。而且，对于宣称世界史从一开始就只是开拓进取和获得巨大成功的西方历史来说，这只是小小的一步。这样，纯粹西方的神话诞生了：即通过其自身卓越的创造性、理性和社会民主特性，欧洲人开创了其自身的发展，完全没有东方的帮助，因此近代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和重大发展是必然的。

社会科学大多完全出现于19世纪，那时对西方身份的重新想象也达到了顶峰，这并非是一种巧合，因为到那时欧洲人已经从智力上把整个世界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部分。但从19世纪到现在，正统的西方社会学家不但没有批评这种东方主义和东西方根本分裂的观点，反而接受并将这种两

①英国作家、诗人（1865—1936），生于印度孟买。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生活在欧洲殖民盛期，其部分作品带有浓厚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译者

极分裂视为不言而喻的真理，而且还写进其西方崛起论和资本主义近代化起源的理论中。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广泛意义上，正如埃里克·沃尔夫所指出的（本章开头所引用）[9]，在主流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隐含的（尽管偶尔也比较明晰）必胜主义的目的论，所有人类历史都不可避免地、渐进地通向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性的终点。这样，传统的世界史叙述认为，人类历史肇始于古希腊，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农业革命中得以发展，之后一直延伸到千年之交意大利主导的商业崛起。这一过程继续发展，直到中世纪鼎盛之时欧洲在文艺复兴中重新发现了完美的希腊思想，当时伴随着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民主精神的兴起，从而将欧洲推向工业化和近代资本主义。

翻开任何一本关于近代世界兴起的传统书籍，西方常常被描绘成主流文明，并赋予一种创造精神的品质（这在两本名著的题目上得到体现）。[10] 尽管东方社会有时也被提及，但它们显然被置于主流历史之外。通常的情形是，即使谈到了东方，也是单独讨论。因此，人们能够仅仅集中于西方部分而了解主要历史，这样东方社会基本上就以一种旁白或者不相关的脚注出现。但是这一旁白很重要，不是因为它很少谈论到东方，而是因为它仅仅描述东方阻碍其自身发展的落后的内在特性。这再次为西方优越以及为什么“西方胜利”是不争的事实，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

这里有两个要点需要解释。第一，这一叙述是假设西方从一开始就是优越的；第二，西方胜利和崛起的历史，是在撇开东方或“非西方”的情况下叙述的。欧洲一方面被看作是自主或是自我创造的，另一方面被看作是理性或民主的，从而完成了自我突破性的发展，这就是我谈到的欧洲中心论内在的刚性逻辑。这两种观点，巩固了欧洲中心论对被设想成“圣母玛利亚童贞生子”的“欧洲奇迹”的解释。因此，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的起源与西方的崛起合二为一，对近代资本主义和文明兴起的描述就是西方历史。当鲁思·本尼迪克特将世界历史中“我们的”这一概念描述为“狭隘守旧”时，[11] 她已经对这种观点有了明确看法，或如杜波依斯所言：

> 长期以来，现代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欧洲历史涵盖了基本的文明史，仅有个别无足轻重的例外；白种人（欧洲人）的发展一直是沿着一条符合人的理性、常态的道路通往最高级的人类文明。[12]

然而，亟待弄清的是，东方主义理论是如何在主流西方崛起论中形成的。其他一些反欧洲中心论者，已经解析了一系列现代著名学者学说中自相矛盾之处，[13] 因此，我将集中揭示马克思和韦伯的东方学经典理论，因为后来大多数理论都源于马克思，尤其是韦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东方主义基础

考虑到卡尔·马克思是西方资本主义最为猛烈的抨击者，有人可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合东方主义模式。但事实上，马克思先入为主地把西方视为世界历史发展中的积极角色，而把东方贬低为某种消极的角色。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的理论呈现出欧洲中心世界史的所有特征。怎会如此呢？

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认为西方是独特的，是一种发展的历史，而这在东方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他明确地表示东方没有（发展的）历史，这在许多小册子和报刊文章中也都谈到过。例如，中国是一种“陈腐的准文明……生活单调而乏味”。[14] 因此，中国获得发展、解放或拯救的唯一希望，在于鸦片战争和英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将“打开落后的”中国国门，为其注入资本主义世界贸易的活力。[15] 同样，印度也被如此描述过。[16] 这类言辞在《共产党宣言》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共产党宣言》这样写道：西方资产阶级，

> 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7]

马克思对东方的摈弃，不只是局限于其诸多报纸文章（1848年至1862年间不少于74篇）和各种小册子中，而且还被运用到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关键的是他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在这一概念中，“私有财产”和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即历史进步的发展动力，很大程度上不存在。正如他在《资本论》中所阐释的，在亚洲，“直接生产者……直接从属于一个作为其地主监督他们的国家……（因此）并不存在土地私有权”，[18] 并且经济中用于再投资的剩余价值被消耗掉了，而没有用于生产，这“为解开亚细亚社会停滞不变的奥秘提供了钥匙”。[19] 简言之，私有财产和阶级斗争某种程度上没有出现，因为生产力归专制国家所有。这样，这种土地公有制就被赋予了停滞不前的特征，因为地租是“由残酷的专制政府，常常通过残暴的手段，从生产者身上以税收形式榨取而来”。[20]

这一状况与欧洲形成了根本的差别。在欧洲，国家不是高居社会之上，而是植根于占支配地位的经济阶层，并与之合作。相应地，由于不能通过高税收来榨取剩余价值，国家就允许出现一定的空间，资本家能够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积累剩余价值（如利润）用于再投资。因此，经济发展被理解为西方独一无二的专利。这样，我们从马克思对东方和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得到的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在后来卡尔·维特福格尔[①]的新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可以找到这些著名的观点）。[21] 实际上，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观念，是在一边是专制国家的扼制力，另一边是村社集体生产的压制作用之间摇摆的。但无论哪一因素是关键性的，都不影响其持久不变的信念：即东方没有进步的自我发展的希望，因而只能等待英国资本帝国主义的拯救。

同样重要的是，马克思的整个历史理论如实地复制了东方主义或者欧洲中心主义的目的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

①亦译为魏特夫，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善治东方历史，尤以治中国史见长。此人早年曾加入德国共产党，后移居美国，在麦卡锡时期攻击并告发自己的学术同行和朋友欧文·拉铁摩尔和费正清等人，人品颇劣。——译者

性的起源，一直追溯到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时代（并且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明确摒除了古埃及的重要性）。[22] 然后，他叙述了我们所熟悉的欧洲中心的线性或内在的发展史，一直持续到欧洲封建主义和欧洲资本主义时期，然后是到达共产主义终点之前的社会主义时期。[23] 这样，西方人从初始就没有经历“原始的集体主义”，在经过四个发展的历史阶段后，最终将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使自己和亚洲人获得解放。对于马克思来说，和西方资产阶级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选民”一样，西方无产阶级是人类的“选民”。马克思对黑格尔方法论的颠倒，产生了一种发展的或者直线的历史，其中（西方）种族通过每个短暂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缓慢走向自由。

在东方，这种发展的直线是不可能存在的，在那里专制政治制度的增长——扼制“循环”和落后的农业生产制度停滞不前。这一方法论整体隐含着对东方动力的否定。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自在阶级”（代表惰性和消极）与“自为阶级”（代表追求解放的积极倾向）之间差异的讨论，似乎把东方视作一种“自在阶级”，而根本不可能变成“自为存在”。相比之下，西方则从一开始就是“自为存在”。此外，黑格尔对马克思作品的影响，导致了这种“进步的西方和倒退的东方”二元论的产生，似乎并非巧合，而恰恰是因为对于黑格尔来说，西方的优越特性是进步的自由，而东方的劣等特性则是落后的停滞的专制。[24] 简而言之，对于马克思来说，西方是历史发展成功的承载者，而东方是消极的接受者。

总之，把马克思的理论称作“涂上红色的东方主义”[25] 似乎是恰当的。然而，这并非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因为它无疑仍然是有益的，仍然蕴含着真知灼见，但作为一种整体框架，它却保持着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观点①。

①西方18、19世纪对东方世界的欧洲帝国主义式的带有偏见的理解，是在“西方”的知识、制度和政治经济政策中，一种将“东方”假设并建构为异质的、分裂的和“他者化”的思维，甚至将东方视为西方的对立面。对东方主义批评最有力者莫过于爱德华·萨义德。——译者

韦伯主义的欧洲中心论基础

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作品中，东方主义观点尤为明显。韦伯的所有观点都是基于尖锐的东方主义问题：是什么导致西方必然地走上了现代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东方注定会经济落后？韦伯的东方主义观点，可以在其最初提出问题，以及他随后为回答这些问题所展开的分析方法中找到。韦伯的观点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其独特而显著的“理性”和“可预料性”，这些优点只有在西方才能找到。在这一点上，正如兰德尔·科林斯（Randall Collins）[①]所言：

> 韦伯观点的逻辑首先是描述了这些特性，然后指出了直到最近几个世纪西方特性的障碍，这些障碍因素差不多存在于所有世界历史社会中，最后，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指出了导致（西方）这种特性产生的社会条件。[26]

鉴于韦伯是有选择地或是将一系列进步的特点归为西方的特性，这是纯粹的东方主义逻辑。他同时坚持认为东方不存在这些特性，这些特性因一系列虚构出来的障碍而未能得到发展。也就是说，他没有客观地选择导致西方崛起的关键因素。事实上，他对西方崛起的归因，与他所假设的对一系列导致东方必然失败的障碍因素的归因一样（这一观点是我在本书中通篇阐述的）。其分析模式中的东方主义特征，在其对东西方的描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见表 1.2）

表 1.1 和表 1.2 之间的鲜明对比，使得我们确信韦伯完美地将欧洲中心论的范畴转移到其核心的社会科学概念中。这样，西方幸运地拥有一套独一无二的自由放任增长的合理制度，这一放任增长的因素由于西方独有而东方缺乏而引人注目。[27] 在这里，东方和西方按照各自存在的非理性和理性制度而进行的划分，与彼得·潘的东方理论形成了高度共鸣。位于

---

①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译者

表1.2　马克斯·韦伯关于“东方”和“西方”的东方主义观：理性大分裂

西方世界（现代性）	东方世界（传统）
理性的（公共）法	特别的（私）法
复式记账法	不合理的记账法
自由和独立的城市	政治或行政管理的大本营
独立的城市资产阶级	受国家控制的商人
理性—法律（和民主的）国家	世袭的（东方专制）国家
理性科学	神秘主义
新教伦理和理性个体的出现	压抑的宗教和集体的支配
西方的基本制度结构	**东方的基本制度结构**
所有组织和机构之间社会力量均衡（例如多国体系或多种权力主体的文明）的分散独立的文明	组织和机构之间社会力量不均衡（例如单一国家体系或帝国统治）的统一的文明
公私领域的分离（合理的制度）	公私领域的结合（不合理的制度）

图表下方的最后两类内容尤其值得注意。首先，韦伯对两种文明的差异进行了总结，即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表现出公私领域根本分离的特征，而在传统社会中（像东方）则不存在这种分离。关键是，只有当出现这样一种分离时才能产生普遍接受的理性——现代性的主题，这可以说影响着各个方面——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

东西方世界之间第二个根本的不同特征在于后者存在一种“社会均衡”，而前者不存在。新韦伯主义者从韦伯那里得到了启示，他们的分析常常把“多权力主体文明”或欧洲多国体系，与东方世界的单一国家体系或“帝国统治”区别开来。[28] 并且，像某些马克思世界体系理论家以及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一样，[29] 他们强调国家间的战争在西方崛起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按照释义”，这在东方单一国家的帝国是不存在的）。在这里，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变得十分关键。只有西方世界拥有一种社会力量和制度的不稳定平衡，没有哪一方能够占据主导地位。[30] 欧洲

的世俗统治者不能够用一种专制的模式进行统治。他们承诺给予公民社会的个体以“权力和自由”，最初是授予那些贵族们，后来是给予资产阶级。到1500年时，统治者在面临国家之间持续不断的、日益昂贵的军事竞争时，他们希望促进资本主义以增加财政税收。相比之下，在东方，“单一国家体系”占支配地位导致了帝国的统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军事竞争而缓解了国家需要扶持社会发展的压力。这样，与西方统治者在约1500年之前授予贵族们的采邑（世袭土地权）形成对比的是，东方的贵族们被专制的或世袭国家推行的薪俸制所扼制（这种权利阻碍了这一阶级权力的巩固）。此外，东方资产阶级受到专制的或世袭国家彻头彻尾的压制，被局限于“统治者阵营”内，与据称只有在西方才能发现的“自由城市”正好相反。再者，欧洲统治者还使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的权力保持平衡，这与东方的世俗权威高于教会（东方是政教合一的）刚好相反。最后，西方人具有一种“理性的冷静”和具有改造作用的“驾驭世界的准则”，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新教主义观念的作用，而与此同时东方人则为倒退的宗教所窒息，并由此形成了长期的宿命论和对世界的被动顺从。因此，资本主义的崛起在西方是一种必然，而在东方则是不可能的。

总之，尽管韦伯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在内容上不同，但二者都是在一个东方主义框架下进行阐述的。这里明显的联系在于核心部分，二者都一方面认为西方不存在东方专制主义，而另一方面又将其归因于欧洲内在的逻辑。因此，就像前文指出的那样，当透过一种反欧洲中心论的透镜来观察时，所谓截然不同的新观点显然只是与东方主义论调相似的微妙变化。

或许，马克斯·韦伯所塑造的欧洲中心模式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它影响到几乎所有关于西方崛起的欧洲中心论论述，即使像詹姆斯·布劳特（James Blaut）[①]指出的，许多学者认为自己既非韦伯主义者，亦非

①当代美国学者(1927—2000)，著有《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史观》等。——译者

东方主义者。[31] 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所有主流学者在开始他们的分析时，都会提出正常的韦伯主义问题：为什么只有西方能够率先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而与之相反东方却注定陷于贫困之中？当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时，一个东方主义的故事就自然产生了，因为这一问题引导探究者（常常是无意地）把西方的崛起和东方的停滞归结为一种必然性。怎会如此呢？通过运用二元的“东西方分裂”的东方主义概念，西方学者得到了必然的答案：只有西方才具有独创性和进步的特性来取得突破——这种特性被认为是东方从一开始就不具备的。以这种方式假定后，问题未经论证就提出了：与倒退的、专制的、其最终命运是停滞和被奴役的东方相反，具有独创性、进步和自由的西方是如何发展到资本主义现代状态的？这样在历史性的探究之前，答案就已经确定了基本的因果关系范畴。

但是，可能有人会回答，先是指出目前先进的西方和落后的东方这种状况，然后再研究过去以“揭示”导致这种结果的因素是合乎情理的。问题在于往回推论时，对落后的东方的理解会产生一个微妙而错误的偏移：即在“揭示”扼制东方发展的不同障碍因素时，欧洲中心主义的结论是把其归因于东方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不发展的刚性规律”。最重要的是，欧洲中心主义只是通过西方最终飞跃到现代资本主义的透镜来评判东方，所以东方所取得的任何技术进步或经济的发展，都被视为微不足道而抹杀。相反，通过把今天西方的优越当作事实，然后经由历史回推，探究者必然把西方归结为具有一种永久不变的“内在发展的刚性规律”。按照本书的中心论点，这种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关于西方的崛起不存在什么必然性，确切地说，西方远非如欧洲中心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富有独创性或确实是进步的。如果没有更先进的东方在公元500年至1800年期间的帮助，西方无论如何难以率先进入现代化。

因此，我们西方的许多想法是不科学和不客观的，而是倾向于从一种抱有偏见的片面的视角来予以定位，这必然会妨碍研究者洞悉全貌。这类似于布劳特所称作的“欧洲中心的单线发展史”。[32] 那么，当我们通过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全面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时，会看到些什么呢？

欧洲中心主义的错觉：发现东方化的西方

重要的是，指出我们主流理论中的欧洲中心论和隐含的欧洲必胜的偏见，并非必然使其产生错误。事实上，自称欧洲中心论的学者戴维·兰德斯最近指出，欧洲中心主义有着非常充分的理由，因为是西方而非东方获得了胜利，只有欧洲人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现代化飞跃的开拓。因此，兰德斯将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论述蔑称为“政治上正确的善良学说”，或是“欧洲恐惧症”，或是简单地说成是“糟糕的历史认识”。[33] 但是我的核心论点是，欧洲中心论的阐述是值得怀疑的，这并非因为它在政治上不正确，而是因为它确实与所发生的历史事实不符合，但是，戴维·兰德斯在其著作中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如其所言：

> 第三种流派（将包含在本书内）则认为，“西方—其他”（西方—东方）的二分法是根本错误的。在世界历史的洪流中，其他国家早期曾取得重大成就，欧洲不过是一位后来者和免费搭车者罢了。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历史记载表明，近千年来，欧洲（西方）一直是发展和现代化的首要推动者。还存在一个道德问题，有些人会认为，欧洲中心论对于我们是不好的，对于世界来说更是不好，应予避免。这些人是该这样做。但对我来说，相对于善心而言，我更钟爱事实。我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34]

但是，就我所参考的历史记载表明，在过去数千年的大多数时期，东方才是世界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保守的学者们都无一例外地把过去近千年来主导全球力量的优势划给了西方。但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大国只是由于一种欧洲中心的观点才似乎成了优势的一方，东方国家从一开始就没有被选择。就像在本书中所展示的一样，对于那些重要的亚洲大国（参见第2—4章和第7章）来说，所有所谓“主导性的西方大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居于下风。只是到这一时期几近结束时（1840），欧洲国家才最终

超过了中国。

然而，兰德斯仍然声称，即使所有这些都是真的，事实也仍是只有欧洲人才能跨越到资本主义现代化。或者就像林恩·怀特（Lynn White）[①]指出的那样："有件事情是如此肯定，以至于用语言来描述它都似乎有些愚蠢：即现代技术和现代科学都明显属于西方世界。"[35] 但是，如我前面所述，西方只是跨越了通向现代化的终点线，因为西方通过传播和掠夺更先进的东方资源组合和资源而从中受益。我论述的成功必须是建立在所收集的实践经验的证据基础上，而不是因为它仅仅是"善心"，那么，有哪些实践检验的事实可以支持我的反欧洲中心论的论点呢？在转向（西方）通过欧洲帝国主义掠夺东方的资源之前，让我们首先转向（西方是如何）通过东方的全球化来传播和吸收东方的资源组合的。

一个显著的的例子就是我所称作的"瓦斯科·达·伽马神话"（见第7章）。在西方，我们常常引以自豪的是，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第一个绕过了好望角，并且远航到达了东印度（the East Indies）[②]，他第一次与那时还处于孤立和原始状态的印度种族（Indian race）建立了联系。但是，早在此前的20至50年间，伊斯兰航海家艾哈迈迪·伊本－马吉德（Ahmad ibn-Majid）就已绕过好望角，航行到了非洲西海岸，并经由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此外，萨珊王朝的波斯人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就已经远航到了印度和中国，埃塞俄比亚人以及后来的穆斯林(之后约650年)也有过类似的航行。爪哇人、印度人和中国人都在达·伽马之前数十年，而不是数世纪，远航到了好望角。不应忘记的是，达·伽马之所以能够成功航行到印度，是因为他有一个不知名的古吉拉特穆斯林领航员的引导。同样令人郁闷的是，所有使达·伽马的航行能够进行的航船以及航海技术和技巧，实际上都是由中国或者是伊斯兰中东国家发明的（当然经过了进一步改进）。这些技术都是经由伊斯兰世界桥梁而向全球传

①美国历史学家、环境伦理学家（1907—1987），著有《我们环境危机的历史根源》等。——译者

②旧时西方使用的一个含糊和不确切的名称，一般指印度、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等。——译者

播，然后被欧洲人所吸收（见第3章和第6—8章）。我们再强调一点,即大炮和火药是由中国发明并且也是这样传播出去的,那么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表明葡萄牙人所宣称的真正属于其自己的东西。最后,就像本书所指出的那样，印度人并非是原始的野蛮人。事实上,他们要比其葡萄牙“发现者”（这实际上是个不恰当的词）先进得多，因为在达·伽马宣称发现它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印度已经长期与亚洲、东非大部分国家保持着直接的贸易联系，并与欧洲保持着间接的贸易联系（见第2—4章）。

需要指出的是,更广泛地说,东方的资源组合在欧洲每个重要的转折点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导致公元600年后欧洲中世纪农业革命能够发生的大多数重要技术，似乎都来自于东方（见第5章和第6章）。在公元1000年之后，促使西方商业、生产、金融、军事和航海革命以及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的主要技术、思想和制度，都是首先在东方形成和发展，然后才被欧洲所吸收（见第6—8章）。在1700年后，刺激英国农业和工业革命的主要技术和科技思想都是从中国传播去的（见第9章）。此外，中国的思想还帮助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事实上，从公元500年开始，东方和西方就已经通过一个统一的全球网络联结在一起,我们需要摈弃那种将东西方两个实体视为完全分离和对立的欧洲中心论假设。

同样重要的是，我的每一个论点都会提出一系列的反证，这些措施（通常是无意地）使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保留下来。这样，当欧洲中心论的作者承认某一思想或技术起源于东方时,他们常常会借助于被称为一种特定的“东方主义条款”的东西。这样的条款摒除了任何东方成就的重要性,由此将我们带回到东方主义的状态中。这一过程很少是刻意发生的,因为大多数学者不会努力去捍卫一种露骨的欧洲中心论世界观。更为经常的是,他们运用东方主义条款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理论观点(例如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韦伯主义者等等)，而非欧洲中心主义本身。但无论有意或无意,其结果仍然保持着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因为这些方法本质上都是东方主义的。

有两个关于如何利用这些条款的例子将足以说明我的观点。对于我在第3章所提出的中国在宋朝时期（11世纪）就完成了一种工业奇迹，欧洲

中心论历史学家常常会援引“中国条款”（或是布劳特所称的“中国准则”）来予以回复。[36] 这一条款通过坚持认为它仅是一场“不成功的革命”，之后中国经济回到了它相对停滞的正常状态，摒除了它的重要性。这样，这些理论家就可以保持他们的观点，即英国工业革命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英国条款”）。其次，为了回应那种认为中东通过向欧洲传播有独创性的思想和主题，从而使西方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能够发生的观点，“伊斯兰条款”随即被引用。这就否认了东方的资源输入，理由是这些知识事实上纯粹是希腊的成就，穆斯林并没有增加任何知识财富，他们所做的只是将希腊所创造的成就奉还给了欧洲人。然后这就与“希腊条款”重合了，从而确定了古希腊乃是现代文明（例如西方文明）的根源。仅仅从这两个例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许多东方主义条款交叠在一起，提供了一种逻辑一致的“东方主义主题”。这样，为使我的论据尽可能地富有说服力，我——或者其他任何试图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人——有责任来反驳和拆解相互联结的东方主义条款或公式的各个环节。这一任务揭示了本书要叙述的主要内容，冗长的叙述过程就到此为止。

东方促进西方崛起的第二个主要途径，是通过欧洲帝国对东方资源（土地、劳动力和市场）的掠夺。这里我要着重强调西方动力或身份的作用。所有主要的反欧洲中心论学者都试图完全忽略西方的力量，他们断定如果把它包括进来，将会陷入强调欧洲例外论或独特性的欧洲中心论困境。但是如果抹除了欧洲动因，我们就要冒几个方面的危险。首先，我们会冒将欧洲的成就描述成真正奇迹的危险。[37] 其次，由于我的主要观点包括了东方对西方突破性发展的积极贡献，这样我就要冒陷入东方优越而西方被贬低的西方主义的危险，最终这和东方主义一样都是不正确的。第三，否定欧洲的能动性会使我们陷入一种结构功能主义的困境，使人类的力量开始被作为一种物质结构“被动承受者”的个别观念所取代。这实际上将人类想象成历史变革的附属物或负担的承受者，而非历史变革的创造性的主导者。

我提出的关于欧洲动力的概念，也与当前反欧洲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作品的纯唯物主义方法论不同，因为它是以身份概念为基础的，这相

应属于一种社会结构现象。鉴于欧洲身份一直是在一种全球背景下形成的，这就与我论点的第一个方面联系起来。这样，我就会注意到，欧洲身份在不断变化的全球背景下被塑造和被重塑的不同阶段，始终与西方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然而，正如我在最后一章所阐明的那样，这决不是说物质要素不重要，事实上它们是我全部论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我要指出身份只是能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我所理解的能动性始于我们思考或想象的方式这一前提，我们自身和我们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我们行为的方式。那么，欧洲人是如何塑造了一种帝国身份，这反过来又是如何促使西方在后来阶段实现崛起的呢？

在中世纪早期，欧洲人开始把自己界定为消极地对抗伊斯兰教（见第5章），这对基督教国家的建立至关重要，从而也使在大约公元后第一个千年晚期产生的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得以巩固，也正是这一身份才导致了十字军东征。随后，欧洲的基督教身份又导致了由瓦斯科·达·伽马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领导的所谓的“航海大发现”——或者是我所称之为“第二波”的中世纪十字军东征（见第7—8章）。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后，不同的基督教观念使他们认为美洲土著和非洲黑人一样都是劣等种族。这也使得在欧洲人看来，对美洲土著和非洲人的超额剥削、压迫以及对美洲金银的掠夺是合法的，而这在多方面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发展（见第8章）。然后，在18世纪，欧洲身份的重塑就产生了我所提到的“隐性种族主义”，进而导致了帝国“文明使命”的道德必然性观念的形成（见第10章）。东方被想象成落后、消极和幼稚的，而相反，西方则被假设为先进、富有创造性和成熟的，这对于促进欧洲人开始步入帝国主义至关重要。因为欧洲的精英们真诚地相信，他们是在通过帝国主义使东方世界文明化（即使他们的许多行为违背了这一高尚的想法）。反之，是欧洲人通过帝国主义对非欧洲地区资源的侵夺，确保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进行（见第11章）。

总体上，这使我能够重新引入欧洲身份，作为我关于西方崛起的反欧洲中心论阐述的一部分。诸如布劳特这样的学者可能会指责我这方面的论点，这主要因为它似乎又退回到了强调欧洲例外论的欧洲中心论观点中，但它却是构成我论述的关键部分。因此，它对于理解我的整个解释框架至

关重要：欧洲身份被看作一种必要的、虽然没有充分说明的可变因素。因为如果没有东方物质和思想资源通过东方全球化进行的传播，欧洲人表现出再怎么多的贪欲和攫取也难以“突破终点线”。这也必然意味着，如果我们要给西方崛起准备一个满意的解释，唯物主义因素就必须与身份的作用一起考虑进去。

总之，当我们揭示出欧洲中心论所掩盖的更大画卷时，其被视为自主、创新和道德上进步的西方文明的原初面貌，似乎更像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①]笔下在观众面前遁形的格雷画像。因此，我的任务就是揭示出这一隐藏的图景，同时恢复东方的历史原貌。我试图削弱西方必胜的欧洲中心观念，这种观念或隐讳或明确地居于西方崛起主流理论的核心位置。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然能够发现“东方化西方”的起源。基于这些经验主义的因素（前面所讨论过的），我们在使用兰德斯和其他学者所持的西方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的言辞时，应该避免陷入欧洲中心论，那样我们才能提供一种关于西方崛起的令人满意的阐述。

最后一点值得一提，我显然是为自己布置了一项棘手的任务，它要求对过去1500年的世界历史进行修正。一本书显然不可能叙述详尽，尽管值得去做，但我的工作必须更加周密谨慎。我的主要目标是描绘出另外一种历史画卷，并为弱化欧洲中心论提供诸多证据。换言之，我认为评价本书的成功、读者是否信服，不在于我的论述之繁琐，而要看我的主张是否打动他们，即需要对欧洲中心论者有关西方崛起和成功的观点进行反驳。

①英国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倡导者（1854—1900），著名的作家、诗人、剧作家，1891年发表第一部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译者

第一部分

作为“先发地区”的东方：东方通过东方全球化发现并主导世界，公元500—1800年

第2章

伊斯兰和非洲开创者：在亚非大发现年代构建世界和全球经济的桥梁，公元500—1500年

如果一个人作为智者，希望使自己了解到地球上发生过什么，他就必须首先把目光转向东方，那里是所有艺术的发源地，西方从那里获得了一切。

伏尔泰

至少从19世纪开始，西方学者就试图找出把欧亚非文明地带看作由独特社会历史构成的方法……（其中）留给欧洲的一种合适的结果就是……欧洲的历史不需要和其他人类的历史结合在一起，而是以欧洲自身的历史存在着……（但在）公元500年后，在技术领域，尤其是在军事甚至财政制度领域取得了不断进步；商业领域的扩张，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已经完全进入了欧亚非文明地带……（因为）地区间的相互作用——由于伊斯兰世界，或者蒙古人的，或者是科学和艺术的借鉴（等等）——是如此频繁，并涉及到了……中国以及……西欧，（这必定意味着）这些技术领域的发展彼此之间是不能完全脱离的。

马歇尔·霍奇森

欧洲中心论者所提供的公元1500年之前的标准世界画卷，包括两个

核心特征：其一，世界陷入所谓的停滞的“传统”；其二，世界分裂成孤立的被“非理性的”专制国家所统治（主要在东方）的落后的地区文明。因此，在公元1500年前，把世界看作是全球互相依存的任何想法都是难以想象的。反过来，欧洲中心论者推定只有到了1500年，随着欧洲作为先进文明的出现，欧洲的大发现时代开始了。而这反过来导致了那些造成各主要文明之间隔离的障碍被打破，从而为出现于19世纪并在1945年后发展成熟的西方全球化时代铺平了道路。

首先，这种熟悉的欧洲中心论描述是一个神话，因为一种摧毁文明孤立主义的全球经济早在6世纪亚非大发现时代就开始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所谓开创性的欧洲人进入了这种很大程度上由中东阿拉伯人、波斯人和非洲人所主导的，早已存在的全球经济网络中（见第4、6、7章）。此外，正如本章以及后面两章所阐明的，东方在公元1500年前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这同时也宣告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是错误的。我还要指出，在公元1800年前，“全球经济力量的主导优势”属于各个东方社会。根据迈克尔·曼（Michiael Mann）[①]的说法，全球经济力量的一般模式有两种：粗放型和集约型。[1] 在经济领域，粗放型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将其经济触角投向外部世界的能力，而集约型涉及到一国国内高度的生产能力。对这些我们需要准确地区分，因为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时期会突出表现为这两种全球力量模式的一种或两种。例如，约公元650至1000年之间，伊斯兰中东、北非地区有着最高水平的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然而到约公元1100年时，集约型经济的主导优势已经传给了中国（并一直保留到了19世纪——见第3章）。不过，中东和北非保持了其粗放型经济力量的主导优势，直到大约15世纪时才被中国所取代，即使到了18世纪它们仍然保持着相当高水平的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力量。这种情景在19世纪时被欧洲中心主义精英们有意识地进行了再虚构，从而才有了先是威尼斯，之后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它们被描述成公元1000年之后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

①当代英国政治学家。——译者

总之，本章的目的是探索历史的原始面貌（也即被欧洲中心论抹除之前曾经存在的）。然而，尽管我用了三章内容来探讨东方的诸多经济成就，但它们只能提供一个粗略的梗概。对此，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①]深有同感地提醒我们：

> 亚洲的发展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简化为一种相同的范畴，这一范畴是在欧洲进化规则被确立后而存留下来的……它只不过是在我们自己无知的黑暗中，所有的异族形态都被赋予同样的色彩。[2]

因此，我尽可能把东方分解为其主要的组成部分，不会用同一种方式去对它们进行阐述。因此，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在本章以及后面两章中，把论述的重点放在伊斯兰中东、北非、中国、日本、印度和东南亚。

本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揭示了公元500年后中东穆斯林和北非在缔造一种全球经济过程中所发挥的开创作用，并追溯了全球权力的主导力量。第二部分追溯了伊斯兰粗放型经济力量的扩张及其向埃及的转移，同时也勾勒出公元1000年至1500年之间全球经济的轮廓。

全球经济的东方起源：亚非的大发现年代（公元500年后）

公元500年后东方全球化的创建

全球化至少早在6世纪就已开始的观点，必定与欧洲中心论者所坚持的论调相对立。欧洲中心论者认为，全球化只是在公元1500年后随着所谓的欧洲大发现时代的到来才出现的。具体地说，这里有六条欧洲中心论者反驳全球化在公元1500年前就已开始的论据。[3] 第一，假定主要的地区文明是彼此孤立的；第二，这一观点本身也源于这样的假设，考虑到东方专制统治者试图扼杀所有的贸易和税收利润的缺乏，由于政治成本太高以至于禁止全球贸易；第三，数量庞大的全球贸易不可能在公元1500前

①英国著名左翼思想家。——译者

就存在，因为当时还缺乏资本主义制度（例如信贷、钱庄、银行和合同法等）；第四，全球层次上的大规模贸易不太可能，因为运输技术还很原始。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根本不存在任何全球贸易，这种贸易数量不大，因为它仅仅局限于世界上很小一部分人口（约占10%）消费的奢侈品；第五，在这一意义上，由于1500年前全球流通过于缓慢，故不会产生什么重要影响；第六，即使存在着全球贸易的过程，它们也不会壮大到足以对世界上许多社会产生巨大的变革性影响。

在本章（以及第3—9章）详尽阐述之前，我先提出自己的六个反命题作为开始。第一，在公元500年后，波斯人、阿拉伯人、非洲人、爪哇人、犹太人、印度人和中国人创造并维持着一种全球经济，直到约公元1800年，世界上各主要文明一直是相互联系着的（因此有了东方全球化的说法）；第二，各地区的统治者提供了一种安定的环境，并保持较低的过境运输税，以促进全球贸易；第三，公元500年后，为加强全球贸易，一整套十分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被确立并付诸实施（这些将在第6章中详述）。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①]指出：

> 距离若按时间来测量的话，那么按周和月来计算最合适，但它要花费数年来跨越整个全球循环。然而，货物被转运了，确定了价格，汇率达成了一致，缔结了契约，信贷——不管资金或货物位于什么地方——得到了提供，伙伴关系形成了，并且，很明显，记录得到了保存，协议得到了履行。[4]

第四，尽管运输技术显然远不及今天这么先进，但它们能够满足全球贸易的进行。此外，欧洲中心论所假设的，全球贸易仅仅影响到约10%的世界人口，因而没有产生什么重要影响的论断——首先受到了查尔斯·蒂

①当代阿拉伯裔美国学者，其《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间的世界体系》一书认为，现代世界经济并非发端于沃勒斯坦所认定的1450年，而是植根于13世纪的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与当前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它于14世纪初时臻于极盛，涵盖了从西北欧到中国的广阔地区。——译者

利（Charles Tilly）[①]的质疑。他将全球联系阐释为有着这样一种重要结果："网络中一个地区的权力拥有者的行为……显然……影响到了网络中其他地区至少一个重要的少数群体（十分之一）的福利。"[5] 另外有人认为，奢侈品贸易对整个世界上国家和社会的再生产都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影响。[6] 那么，无论如何，大多数全球贸易实际上进行的是以大众为基础的消费品贸易，其影响大大超过了10%的世界人口（这一点我在各章中都多次重申）。

第五，尽管全球传播的速度常常十分缓慢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但全球流动仍然对许多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变革性影响。这直接导致了我的第六个论点：全球经济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维持的贸易类型或数量，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现成的传输渠道，由此使东方更加先进的"资源组合"（如思想、制度和技术）传播到了西方。这些全球性流动最终导致了世界上大多数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实际上，通过展示最佳的（亦即东方的）"资源组合"是如何通过东方全球化而向外扩散传导，这种扩散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巩固了西方崛起的基础（见第5—9章），这就是本书力图阐明的主旨。

最后，我的论点可能会遭到反驳，因为并非全球所有地区都是完全相互联系的。但是，那种认为整个世界在我们能够宣布它是全球性之前就必须是密切联系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即使是在近代时期。阿布－卢格霍德指出：

> 所有地区都是平等地相互联系着，无论其发挥的作用是中心的或是边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一个世界体系是全球性的。即使在今天，比历史上以往更具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也是被分为许多重要的次区域或者亚体系，如北大西洋体系……环太平洋……中国等等，对于其自身来说仍然是一个体系。[7]

当然，全球化是一个以时间为媒介的动态现象，其"范围"随时间变

①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1929—2008）。——译者

化而变化是不容置疑的事实。1800年至2000年之间的现代全球化，在某些重要方面与其东方先驱有着很大区别。但是就商品、资源、货币、资本、制度、思想、技术和人口跨地区的大量流动，以致它们影响并引领全球范围内大部分社会变革的程度而言，全球化可以说是在公元1500年之前就存在的（实际上之后也一直存在）。即使如此，罗伯特·霍尔顿（Robert Holton）[①]坚持认为：

> 一部全球历史不需要采用单一的发展模式，比如理性的胜利或西方文明的胜利，也不能采用包含一种不容变更的单一的同质发展模式……至少要求我们能够描述一种单一的全球联系脉络，即存在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实质性的相互联系，导致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换和相互依存。[8]

显然，与我的解释相比，霍尔顿的说法更为简约。

我把公元500年作为东方全球化开始的大概时期。正如威廉·麦克尼尔（Willian McNeill）[②]所解释的那样，尽管一些全球联系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甚至更早），但到了约公元500年时，几乎所有隔断地区间联系的裂隙都已经得到了填补。[9] 在公元300年至500年间骆驼运输的复兴尤为重要。骆驼被证明是比牛或马更有价值的“运输工具”，它们每天的运输路程远了两倍，更为廉价，更易于组织，并且不需要道路，这意味着能够相对容易地穿越中亚漫长的陆路通道。这一发展是如此重要，麦克尼尔最近对此进行了描述：

> 与1500年后欧洲海员们更好地了解了海上航道类似，阿拉伯半岛和中亚的绿洲、沙漠，北部的大草原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些地区都受到了强有力的影响……并且与已经建立的文明生活中心——主要是与中东和中国——开始了远比以前更为密切的联系。结果，在

①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社会学教授，1998年出版《全球化和民族国家》。——译者

②当代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其笔下的世界历史，是中东、印度、中国、欧洲的历史及其之间的联系。——译者

约公元500年至1000年之间，一个强大的……世界体系（形成了）。[10]

但是，重大的发展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世界性帝国的出现，它们能确保极其重要的和平环境，使陆上以及海路贸易繁荣起来。[11]中国唐朝（618—907）、中东的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661—1258）、伊斯兰帝国以及北非的法蒂玛王朝（909—1171）的崛起，都对广泛的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菲利普·柯廷（Philip Curtin）①所指出的："阿拔斯王朝和唐朝政权的同时存在，使得远程贸易的商人能够相对较易地穿越整个亚洲和北非的旅程。[12]尽管杰克·古迪（Jack Goody）、安德烈·温克（Andre Wink）和奈杰尔·哈里斯（Nigel Harris）②认为，全球联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甚至更早，但他们一致认为，全球贸易的大规模扩张发生在公元600年后的时期。[13]总之，正如麦克尼尔指出的，阿拉伯世界和中国（以及南亚）的繁荣、商业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风箱煽起了一种新兴的全球经济的火焰。[1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③的著名论点——即伊斯兰的入侵打破了东欧和西欧的统一（拜占庭帝国），只是到了千年之初当贸易恢复后，情况才需要反过来：

> 法兰克人和阿拉伯世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加洛林王朝的复兴、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兴旺，以及汉萨同盟的发展，都是在与穆斯林东方的接触中得到了增强而非受到阻碍……似乎确定无疑的是，贸易在8世纪晚期和9世纪（在欧洲）的许多地方振兴了……因此，历史学家现在提出经济上的"中世纪早期欧洲的穆斯林化"，以此来反驳皮雷纳。[15]

这样，随着公元751年加洛林帝国在西欧的诞生以及8、9世纪意大

①当代美国历史学家，著有《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等。——译者

②杰克·古迪，英国历史学家，著有《西方中的东方》。安德烈·温克，美国历史学家，著有《印度——伊斯兰世界的形成》。奈杰尔·哈里斯，当代英国经济学家。——译者

③当代比利时经济史学家，著有《中世纪的城市》。——译者

利各商业城邦国家的出现，全球贸易体系扩展到了欧洲，从而把欧亚大陆两端联结成一个连续的、相互联系的世界帝国网路。因此，全球化并非20世纪的独特现象，或者仅是20世纪的重要产物。它不仅仅开始于欧洲的“黑暗时代”，而且其根本意义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东方全球化即使不是中世纪和现代西方之母，也是其助产士。

东方全球化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伊斯兰中东和北非。北非的穆斯林（和黑人）以及中东的穆斯林是真正的全球资本主义先驱，他们帮助织就了一种规模宏大的重要的全球经济，一直扩展到了整个欧亚非大陆，以及从西欧到东方的中国和朝鲜，非洲以及南部的波利尼西亚（可能还有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海上航线。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伊斯兰全球开拓者：伊斯兰粗放型和集约型力量的兴起

中东阿拉伯穆斯林依赖于较早的萨珊波斯的成就，这可以追溯到公元3到4世纪。[16] 公元610年以后，在穆罕默德的“启示”下，中东开始崛起为全球性强权。在此之前，中东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并屡受波斯、叙利亚以及拜占庭、埃及的殖民征服。穆罕默德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通过伊斯兰教的力量实现了统一。伊斯兰教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贸易和理性资本主义行为的热衷。应该强调的是，这就直接与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相悖，后者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落后的宗教，它阻碍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可能性，更毋宁说理性的资本主义行为。但有一点显然是被有意或无意地遗忘了，即穆罕默德本人就曾是一个商人。他在二十岁时娶了一个富有的古莱西（Qurayshi）女子（古莱西已通过沙漠商业贸易以及银行业务富裕起来）为妻。有趣的是：

> 古莱西的部落麦加人——以一种韦伯称之为理性的方式——通过贸易和有息贷款使其资本增值。穆斯林帝国的商人完全符合韦伯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行为的（理性）标准。他们抓住任何一个获利的机会，并根据货币形式计算其支出、兑现以及利润。

从《古兰经》中可以找到伊斯兰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某些联系，提及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马可西米·罗迪逊（Maxime Rodinson）[①]根据其详细的研究，坚信《古兰经》"不仅认为一个人决不能忘记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认为把宗教实践和物质生活结合起来是正当的，他们甚至在朝圣期间进行贸易，直至以'真主恩赐'名义维护商业利润"。伊斯兰教认为，商人们能够比那些仅仅从事体力劳动者更有效地组织朝圣。事实上，《古兰经》指出：

> 如果你通过做那些允许做的事而获益，那么你的行为就是"圣战"……如果这种行为是为了你的家庭和家人，这就是一种施舍（即一种虔诚的仁慈行为）；而且从贸易中合法获得1个德拉克马（古希腊的银币名）比通过其他方式获得10个德拉克马更有价值。[17]

并且穆罕默德说过，"贫穷近乎一种叛教"，

> 这意味着上帝真正的仆从应该是富有的，或至少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位于露营城（camp-town）库法（kufa）最大的清真寺中的诸多货币兑换铺，能够说明在伊斯兰教中商业和宗教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冲突。[18]

同样有意义的是，《古兰经》确定了投资的重要性。尽管我们通常认为伊斯兰教教法（沙里亚，Sharia，伊斯兰教的神圣法典）是专制主义和经济落后的根源，但事实上它的产生是作为阻止统治者或哈里发滥用权力的一种手段，而且它为合同法提供了明确的条款。毫无疑问，伊斯兰商人成为《古兰经》的强大支持者，有着合理的原因。再者，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穆斯林世界比中世纪的欧洲有着更大的个人自由。政府是在"平等的契约责任"的基础上被确定的。按照霍奇森的说法，这些相关的

①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社会学家、东方学家（1915—2004）。——译者

理性概念比传统的礼俗社会(Gemeinschaft)观念更为接近现代的法理社会（Gesellschaft）观念。[19]

从根本上说，伊斯兰世界的比较优势在于其“粗放型”的力量。伊斯兰世界能够征服广袤的横向空间，并以其能力充分实现了向全球广大地区扩张及传播资本主义。伊斯兰世界的中心麦加，也成了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之一。7世纪后，伊斯兰教的势力迅速扩张，以致地中海实际上成了穆斯林世界的一个内湖，“西欧”成了亚非全球经济中的一隅之地。伊斯兰世界对欧洲的发展尤其具有强大的影响（第5—8章），不过，决不仅仅是通过信仰伊斯兰教的西班牙。最重要的是，伊斯兰世界不啻于构建了世界的桥梁，从而使许多东方的“资源组合”以及贸易在公元650年至1800年之间传播到了西方。穆斯林所建造的城镇和房屋的增加，是伊斯兰世界粗放型力量的典型例证。伊斯兰教禁止建造高的多层房屋，因为趋近真主被认为是无礼的。通常对于穆斯林来说，占领垂直空间是应该受到道德谴责的。因此，最虔诚的标志就是在真主的眼中使自己变得卑微——面对真主的高贵，使自己屈身并俯首于地。同样，我们在《一千零一夜》中可以看到，显示对君主的尊敬就要匍匐在君主面前。简言之，圣战所宣扬的观念就是穆斯林应该通过宗教和贸易征服横向的或广袤的空间，而非垂直空间。因此，城镇很快就在整个中东出现并且迅速形成全球经济网络的主要支柱。

这种密集的城市贸易网络的景像，与传统欧洲中心论将伊斯兰世界视为游牧部落聚集于荒漠的观点相悖。马歇尔·霍奇森指出，伊斯兰教并非“荒漠中的一神教”，它诞生于贝都因人（Bedouins）①对浩瀚无垠的天空和大地奇观的敬畏……伊斯兰教源于一种传统悠久的城市宗教，它与任何传统的变体一样是以城市为导向的。[20] 马可西米·罗迪逊在这里强调了普遍的观点：

> 穆斯林世界中商业联系的密度，形成了一种规模空前的世界市

①阿拉伯人的一支。亦译“贝督因人”。分布在西亚和北非广阔的沙漠和荒原地带。“贝都因”为阿拉伯语译音，意为“荒原上的游牧民”。——译者

> 场。交换的发展使得工业和农业的区域专业化成为可能……穆斯林世界不仅熟悉资本主义的部门分类，而且这些部门显然在（近代时期）之前的历史上是最广泛且高度发达的。[21]

伊斯兰教通过宗教或商业的影响（常常两者同时），不仅向西扩张到欧洲，而且向东一直传播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向南传到了非洲。其经济影响盛极一时，以至于有学者恰当地指出，“我们必须接受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阿拉伯人）是那些遥远国度的商业开创者，并且或许如杰拉尔德·蒂贝茨（Gerald Tibbets）所言，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贸易中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22] 无疑，到9世纪时——正如不同时期的文献所证实的——伊斯兰商人开辟了一条从中国到地中海横贯大陆的连绵不绝的远距离贸易路线。[23]

中东的倭马亚王朝（661—750）、阿拔斯王朝（750—1258）以及北非的法蒂玛王朝尤其重要，它们致力于联结古代印度洋和地中海之间各条著名的远距离贸易干线，包括红海和波斯湾路线。阿拔斯的首都巴格达与波斯湾路线相连，然后呈扇形展开，通过印度洋向南中国海和中国东海延伸。同时期的阿尔－叶耳古比（al-ya'qubi）[①]（875）将巴格达描述为“通往世界的码头”，而阿尔－曼苏尔(al-Mansur)[②]则宣布，“我们和中国之间畅通无阻，海洋能让我们应有尽有”。[24] 其他的伊斯兰港口也同样重要，尤其是波斯湾的撒那威（siraf）（位于伊朗南边的设拉子海岸），是中国和东南亚货物的主要终点站。红海路线（由埃及所控制）也特别重要（见下一部分）。除海上航线外，最著名的可能就是通往中国的陆上路线，商队沿着这条陆路经过伊朗城市大不里士、哈马丹和尼沙普尔，到达河中地区(Transoxiana)[③]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后到达中国或者印度。马可·波罗〔欧洲的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对此印象尤其深刻——犹如

---

①阿拉伯地理学家，公元891年完成的《国家》一书，详细介绍了各地区城镇与国家的名称、城镇之间的距离、地形地貌、水资源以及百姓、统治者和税赋的情况。——译者

②拔斯王朝的奠基者（707—775），以营建巴格达这座城市闻名。——译者

③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译者

其本人就是伊本·白图泰一般：

> 大不里士的居民依靠贸易和工业生活……城市的位置是如此便利，成为来自印度和巴格达、摩苏尔、霍尔木兹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商品的市场，很多拉丁商人来到这里，采购从外国进口的商品。这里也是一个宝石市场，种类琳琅满目。这是一个旅行商获利丰厚的城市。[25]

穆斯林们对与非洲许多地区（不仅仅是北非）的贸易尤其依赖。这种状况包括很多原因：第一，埃及人控制着一条连接远东和西方的重要商路（见下一部分）；第二，非洲市场可能成为伊斯兰对外贸易最有利可图的一个分支。尽管欧洲中心主义不承认1500年之前非洲与国际贸易体系的联系，但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贸易并非数量不大、距离不远。同样重要的是，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Aksumite）王国引以自豪的是，黑人商人甚至在穆斯林到来之前就控制了与印度之间的大规模贸易。[26] 此外，阿布－卢格霍德对全球经济的精彩描述让人难以理解，因为它遗漏了东南非。[27] 但是，东南海岸的海上贸易甚至在穆斯林们到来之前就很重要了，向东远至波利尼西亚的定期贸易说明了其范围的广泛。而且，印度尼西亚人早在公元2—4世纪就已经向东非移民。伊斯兰的货船沿着东非海岸，一直向南到达莫桑比克的苏费拉赫（Sufalah）和甘巴鲁（Qanbalu）（马达加斯加岛）。许多地方都出产黄金，包括埃塞俄比亚和津巴布韦，而基尔瓦(Kilwa)(位于今坦桑尼亚南部）是主要的贸易中心。[28] 著名的伊斯兰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把基尔瓦描述成在他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多次旅行中所见过的“最美丽和建筑最好的城市之一”。[29] 非洲人进口饰珠、货贝、铜和铜制品、谷物、水果和葡萄干、小麦以及后来的丝织品（这些几乎都是大众消费品，而非奢侈品）。与非洲东海岸港口保持最为紧密商业联系的，是印度、亚丁、苏哈尔和撒那威，并且这种远距离贸易也刺激了贸易深入到非洲腹地。[30]

另外，认为西非在商业上与东海岸是孤立的，直到1492年后才被欧

洲人“唤醒”的观点是错误的。[31] 事实上，在穆斯林到来之前更早的时候，西非的货物集聚地如斯基玛萨（Sijilmassa）（在摩洛哥）和奥代戈哈斯特（Awdaghast）都扩大了，北部和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东西海岸就开始相互联系。[32] 然而，在伊斯兰力量到来之前，非洲内部的贸易往来就已畅通无阻（如上所述），因为其已经拥有非常全面的生产方式，如黄金开采、制铜业和冶铁业。[33] 有趣的是，考古学家塞斯（Sayce）①将铁的生产中心美罗那(Meroe)(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末的库什王国的首都）描述为“中非的伯明翰”。而且，苏费拉赫（在穆斯林到来之前）拥有最大最好的铁矿，其生产的铁还部分出口到了印度。[34]

值得注意的是，犹太商人以及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Srivijaya）王国也对全球贸易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后者在所谓的“远东”作为全球贸易的一个中心，与中东或北非在西方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正如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②所指出的：

> 中国南方与锡兰和印度的贸易联系增长十分迅速，以致地处苏门答腊东南部巨港的室利佛逝王国建立了岛屿帝国，它在7世纪至13世纪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控制了通过东南亚水域的商业。[35]

大多数学者认为，唐朝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复兴很大程度推动了室利佛逝的兴起。[36] 这是中东、印度和中国之间贸易集散的一个重要汇合点。[37] 有趣的是，著名的中国旅行家义净（I-Ching）③计算出公元671年他在此处停留的六个月里，大约有三十五条船从波斯开来。犹太人（或“Rhadanite商人”）同样重要。[38] 同时代的伊本·胡拉德赫比（Ibn Khurradhbih）以及“基尼扎”（Geniza）文献（在开罗）都对他们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描述。[39] “Rhadanite”一词似乎来源于波斯语“rha dam”

---

①英国考古学家。——译者

②当代美国历史学家。——译者

③唐代著名僧人、旅行家、佛经翻译家（635—713），游学印度十三载，历三十余国，带回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以译经传世。——译者

(意指“那些熟悉航线者”)。尤其是这些商人在伊斯兰世界——在巴格达直到约10世纪——后来在公元969年后埃及法蒂玛王朝的开罗贸易和财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在约公元650年至1000年间，全球集约型经济的主导力量是伊斯兰中东和北非。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①]认为阿拔斯哈里发是第一个实现人均经济增长（据称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主题）的地区。[40] 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②]这样描述了公元800年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活动：

> “资本主义”并非一个年代错误的词。从伊斯兰世界联系的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投机商们在不受约束地进行贸易投机。一位阿拉伯作家哈里里（Hariri）以商人的语气表示：“我想把波斯的藏红花卖到中国，听说在那里可以售出高价，然后把中国的瓷器运到希腊，把希腊的锦缎运往印度，把印度的铁制品运到阿勒颇[③]，把阿勒颇的玻璃运到也门，再将也门的条纹布料运到波斯。”在巴士拉，商人们之间达成了一种我们今天称之为清算制度的协定。[41]

在这里，伊斯兰世界一系列集约型生产革新和技术或思想的进步非常重要。如第6章所述，斜挂大三角帆的发明及进一步的发展，使得远洋航海，尤其是在印度洋的航行得以实现。同样，星盘的发展与伊斯兰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的许多突破密切相关（见第7、8章）。造纸业始于公元751年之后。纺织业尤其重要：叙利亚和伊拉克以他们的丝织品生产而闻名，而埃及在亚麻制品和羊毛织品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穆斯林们也使用色彩各异的染料。欧洲语言中引进了许多阿拉伯（和波斯）习语，这也说明了伊

①澳大利亚史学家，著有《欧洲的奇迹：欧亚历史中的环境、经济及地缘政治》等。——译者

②法国年鉴学派著名史学家（1902—1985），其《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及《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在国际上享盛誉。——译者

③叙利亚西北部城市。——译者

斯兰世界的影响。化学药品，尤其是碱（alkali）（来自阿拉伯语中的“al-kali”，“ashes”）被广泛使用为媒染剂，可以使染料不褪色。藏红花（Saffron）来自阿拉伯语中的“zafaran”。“damask”（锦缎）一词源于大马士革（Damascus），“muslin”（平纹细布）源于城市摩苏尔（Mosul），“organdy”（蝉翼纱）来自中亚城市乌尔根奇（Urgench）。“mohair”（马海毛）源自阿拉伯语中的“mukhayyir”（意思是最好的），“taffeta”（塔夫绸）则源自“taftan”（波斯语动词，“拧，绕线”）。[42]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在铁制品生产方面比欧洲更具优势，而在钢铁品生产上直到18世纪都占据优势。此外，伊斯兰世界的生产还扩展到了炼糖、建筑、家具制造、玻璃、制革业、陶器以及宝石加工等领域。[43] 有意义的是，埃及的蔗糖生产是一项全球性的重要产业，并且提炼出来的糖（“sukkar”）出口到世界大部分地区。伊斯兰世界还通过水车和风车产生动力，并应用于工业生产。值得注意的还有，中东和北非在科学知识和军事技术方面很长时间对于欧洲都具有比较优势（见第8章）。同样重要的是，一整套资本主义制度（关于合伙契约、合同法、银行业、信贷及其他诸多制度）创立起来，伊斯兰世界的生产、投资和商业，以及全球贸易都建立在这些制度之上（见第6章）。总之，正如埃里克·琼斯恰当的总结，“阿拔斯王朝技术和经济发达的事实……表明伊斯兰的历史决非静止不变的”。[44]

全球粗放型力量和全球经济的轮廓，约公元1000—1517年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在其权威著作《欧洲霸权之前》中，对公元1000年后全球经济的轮廓有清晰地描述。她列举了与八个地区亚体系相联系的三条主要商路，下面我将依次进行探讨。

北线和蒙古帝国：“来自地狱的仁慈部落”？

13世纪蒙古帝国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东方的全球化。这一帝国将东方和西方连结成一个密切相联的贸易空间。的确，12世纪时，塞尔柱突厥人向西推进，并控制了几乎包括整个伊拉克和肥沃新月地带在内的广袤

领土，但是成吉思汗和蒙古人成功地征服了欧亚大陆的许多地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来看，成吉思汗没有选择去征服落后的欧洲，只是占领了其东部（主要是基辅罗斯），并把注意力转向富庶的战利品中国。到13世纪后半叶，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都处在蒙古人的控制之下。重要的是，这一相对统一的区域性帝国——“蒙古人治下的和平”（Pax Mongolica）——提供了一个和平安定的地区，使资本主义在区域内得以繁荣发展。这一方面使覆盖了中国和欧洲之间5000英里范围的远距离或全球贸易得以进行，另一方面使先进的东方思想和技术传到了西方（以及其他地方）。[45] 制度约束和政治成本降低了，同样重要的原因是蒙古人显示出对穿越帝国的众多商人的接纳。事实上，同时期著名的马可·波罗、弗兰西斯科·彼加洛梯（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①都把丝绸之路描述为“昼夜都非常安全”。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欧洲中心主义认为，蒙古人或鞑靼人（欧洲人这样称呼他们）从根本上说对经济活动发展是破坏性的、极为不利的。阿布－卢格霍德解释到：

> 蒙古人最初被看作与生活于亚洲未知世界的其他异族一样，是被虚构出来的。由于对“鞑靼”一词的误解（这一名称只是用于指后来加入蒙古联盟的一个部落），蒙古人被等同于鞑靼人，也就是说，他们来自圣经中的冥府或地狱。同时，很难看出他们在基督教对穆斯林的圣战中如何被指望成为一个潜在的同盟。（不过）或许那些来自歌革（Gog）和玛各（Magog）（灾难的预言者）（判定其起源的另一种无力尝试）国度的人，可以被动员参加他们对穆斯林的战争。[46]

同时期的编年史学家马修·帕里斯（Mattew Paris）把1240年蒙古或“鞑靼的入侵”描述为：“一个令人憎恶的撒旦国度，也就是无以数计的鞑靼军队，从其群山环绕的家园逃脱出来，突破了高加索坚硬的岩石，像魔

①意大利佛罗伦萨商人。——译者

鬼一样不断涌出。”[47] 他甚至把“鞑靼人”描述成噬食人肉、脑袋和身体不成比例的族类。对于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这似乎是完全正常的，因为这很容易满足他们对东方民族的奇异想象，诸如布勒米人（Blemmyae）（脸长在胸上的人），独脚人（Sciopods）（仅有一条腿，并用大脚遮阳的人），食人族（Anthropophagi）（头长在肩膀之下），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塞诺色法人（Cinocephali）（狗头人身的人）。[48]

欧洲人对蒙古人的认知——更不用说及其他东方民族——源于大量荒诞的说法。首先，鞑靼部落实际上已被成吉思汗所灭。其次，蒙古人对落后的西方“红头发的野蛮人”毫无兴趣。再者，除了运送东方的货物，蒙古帝国还间接地为欧洲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它构成了一个传输带，由此使一些先进的东方资源组合传播到了西方（将在后面几章所述）。不过，到14世纪中叶时，这一有着强大影响的贸易带萎缩了。帖木儿汗从撒马尔罕向外征战，推动了“蒙古人治下的和平”的瓦解，欧洲的黑死病有着同样的破坏作用。但这并不表明东方主导的全球经济的结束，而是贸易越来越多地通过中线尤其是南线进行。

中线：中东伊斯兰粗放型力量的保持

按照阿布-卢格霍德的说法，中线始于地中海沿岸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穿过狭窄的沙漠地带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到达巴格达，最后分为陆路和海上航线。陆路是继续穿越波斯到达河中地区，然后或者向东南到达印度北部，或者往东到达撒马尔罕，最后穿越沙漠到达中国。海路是沿着底格里斯河从巴格达经由巴士拉，到达波斯湾，然后通过贸易王国阿曼、撒那威、霍尔木兹或卡伊斯（Qais）（波斯湾和印度洋连接点的保护者）。尽管这条路线在6世纪后变得特别重要，但在公元750年后巴格达成为穆斯林世界主要的贸易中心时，它才开始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但是当巴格达在1258年遭到蒙古人的劫掠时，这条路线暂时衰落了。不过，随着后来波斯统治了伊拉克，海湾路线复兴了。这条中线非常重要，还因为它确保了十字军诸王国（Crusader Kingdoms）和从遥远的东方带来货物的穆斯林商人之间“深度共存”的贸易关系。

十字军在中东的主要港口阿克里（Acre）直至1291年一直为威尼斯人掌控，威尼斯人在那里驱走了比萨和热那亚竞争对手。然而，尽管威尼斯人主导着欧洲贸易体系，但他们一直平等地加入了由中东穆斯林尤其是北非所控制的全球贸易体系。当1261年君士坦丁堡陷入拜占庭手中时，热那亚人才受到威尼斯人的欢迎，从而迫使后者集中于经营中线和南线。但那之后，随着阿克里在1291年的陷落，威尼斯人除了依赖由埃及人控制的南线外，别无选择。

南线：欧洲对埃及贸易霸权的依赖，公元1291—1517年

这条路线将亚历山大港、开罗、红海和阿拉伯海，然后是印度洋以及其他海洋都联系了起来。13世纪后，埃及成为通向东方的主要门户。正如阿布－卢格霍德所称的，“谁控制了通向亚洲的海上航线，谁就能够确立正处于衰退中的欧洲贸易的规则。从13世纪直到16世纪，这个国家就是埃及”。[49] 事实上，在1291年至1517年之间，经由海路到达东方的全部贸易中约80%是由埃及人控制的。但是当巴格达沦陷时，“Al-Qahirah”——后来被欧洲称为开罗——成了伊斯兰世界的首府和全球贸易的枢纽中心（尽管后一过程在10世纪的法蒂玛王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欧洲中心论者强调，欧洲与东方的国际贸易在1291年后（随着阿克里的失陷）就停止了，因为埃及以基督教欧洲为代价控制了红海通往东方的贸易。大概正是这种情况，促使了葡萄牙维瓦尔第兄弟在1291年绕过好望角寻找通往印度的更靠南的路线。但是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的确，1291年阿克里的陷落，促使教皇尼古拉四世（Nicholas IV）颁布了许多禁止同“异教徒”贸易的禁令。但实际上威尼斯人设法避开了这些禁令，并在1355年和1361年同苏丹签订了新的条约。直到1517年，由于埃及在全球经济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威尼斯得以生存下来。此外，威尼斯和热那亚并不是全球贸易的“开创者”，而是适应者，它们将自己融入了亚非主导的全球经济的缝隙中，并且很大程度上根据中东穆斯林，尤其是埃及人制定的条款进行贸易。特别是，欧洲商人在通过埃及时受到了阻碍，当他们到达亚历山大港时，他们遇到的是登船监督卸货的海关官

员。基督教徒尤其需要一种特别的许可证或签证，并且要付高出其穆斯林同行多得多的关税。之后，欧洲人退回到由自己的法律管理的特区。但是，他们不允许离开亚历山大港特区，开始完全依赖于埃及商人和政府官员。不过，威尼斯人和其他欧洲人还是接受了这种制度，因为在这里他们能够获得大量产自东方的货物。事实上，威尼斯只有经过北非实现与东方的贸易才有可能获得财富。

最后，要着重指出的是，威尼斯和热那亚之所以能维持他们对亚非主导的全球经济的权威，只是因为一种运气（而非由于其经济实力）。由蒙古人和十字军对埃及造成的地缘政治挑战，导致了埃及社会的军事重组。埃及马木留克类型的军事组织是依靠奴隶组建的，而这些奴隶不能从穆斯林中征募，因此威尼斯和热那亚如果能向埃及提供非穆斯林奴隶，就被允许与埃及保持贸易关系。1261年后，热那亚人在提供非穆斯林的切尔克斯（Circassian）[①]奴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奴隶是他们从克里米亚运过来的。但随后在14世纪，一系列地缘政治的变化减少了埃及人对非穆斯林奴隶的需求，这就决定了热那亚人奴隶贸易的命运，因为埃及人不再需要他们的供应了。不过，威尼斯与埃及之间的特权关系保持下来——但这只是由于埃及人的善意。

本章一方面总结了对东方主导的全球经济轮廓的描述，另一方面概述了西亚和北非超越欧洲的贸易霸权。但还要强调的是，即使在1517年后，伊斯兰世界仍然保持着对欧洲的贸易霸权。因为伊斯兰粗放型经济力量的接力棒从埃及传到了奥斯曼帝国，后者保持了其在印度洋上对葡萄牙人的控制（见第7章）。此外，其他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力量中心——印度莫卧儿王朝和东南亚仍然强大到足以抵抗和支配欧洲贸易商，直到1800年左右（第4章和第7章）。然而，尽管伊斯兰粗放型力量令人瞩目，以及事实上在第二个千年期间的大部分时期，中东仍然是世界联系的桥梁，但是全球集约型的主导力量并没有在公元1000年后转移到意大利，或在1500年后转移到葡萄牙，而是在公元1100年时转移到了中国，并在中国一直保持到19世纪。

①西亚一民族，现主要分布在土耳其、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多桑蒙古史》称之为“薛尔客速部”。——译者

第3章

中国开创者：第一次工业奇迹和中国孤立主义的神话，约公元1000—1800年

当马可·波罗到东方游历并介绍其所见所闻时，尽管把事实与虚构混淆，但无论如何都讲述了某种事实，而西方人并不相信他。中世纪晚期，他的游记被看作虚构的故事……西方人对东方奇迹的真实性似乎难以置信。

雅克·勒戈夫（Jacques Le Goff）①

欧洲的……历史学家尚未认识到，公元1000年后中世纪欧洲文明的兴起，与世界体系的（生产）中心从中东向东转移到中国是一致的。鉴于过去的中世纪史学家首先关注的是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民族史——完全追溯了19世纪后期英法帝国囊括全球大部分地区的人类整体历史，这种认识毫不奇怪。这就需要一种灵活的想象力去认识中国的卓越地位。

威廉·麦克尼尔

到公元1100年，全球集约型经济的主导力量已经转移到了中国，并一直保持到19世纪。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力量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并在

①法国著名史学家，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译者

15世纪后开始占据支配地位(尽管伊斯兰中东仍是全球经济的一个关键地区)。所有这些都与欧洲中心论的叙述相反。我分两个部分来对欧洲中心论通常关于中国特征的描述进行评论。第一部分揭示了中国所经历的我称之为"第一次工业奇迹",很多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相联系的特征在1100年时的中国就已出现了。然后在第二部分指出欧洲中心论通常忽略了宋朝的成就：即中国的东方专制政权扼杀了宋朝工业发展的萌芽，以至于使经济急转直下。这也导致了所谓的中国在1434年后——当政府禁止对外贸易并退回到朝贡体系时——从世界体系中退出了。这里，我提出一种不同的观点：1434年后的历史时期中，即使不存在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那也肯定存在一种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全球经济。在第4章和第7章中，我提出了更为详尽的论据来证明中国的主导地位这一事实。

第一次工业奇迹：11世纪的中国宋朝

正如第9章所述，经济史学家通常认为，工业化的起源或秘诀可以在18世纪的英国找到。但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工业大师是中国，而不是英国。中国"工业奇迹"的发生有1500多年历史，并在宋朝大变革时期达到了顶峰——这比英国进入工业化阶段早了约600年。中国的工业奇迹在某些细节上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它是1100年至1800年之间全球集约型经济力量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正是宋朝中国许多技术和思想上的重大成就的传播，才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的兴起（见第6—9章）。

钢铁革命：公元前600年至公元1100年

中国的铁钢奇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第一块铸铁实物始于公元前513年，到公元前2世纪时钢的生产开始了。[1] 不过，即使缺乏详尽的数据，公元800年至1100年之间工业的惊人增长也似乎是不容置疑的。罗伯特·哈特韦尔（Robert Hartwell）①在其很有影响的一篇论文中

①美国历史学家（1932—1996），亦译为郝若贝，长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译者

估计，在公元806至1078年之间，中国的人均铁产量增长了六倍。[2] 就年生产总量来说，中国在公元806年生产了1.35万吨的铁，到1064年时生产了约9.04万吨，1078年差不多有12.5万吨。有两个对比是非常明显的：第一，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大概到1700年时才大量生产铁，甚至直到1788年时，英国的铁产量仅有7.6万吨。第二，1080年时，宋朝四川铁的价格比率（按铁与稻米的价格比来计算）是177：100，陕西是135：100，这说明铁的价格非常低。同样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省份的情形并非常态，因为铁在中国的东北部价格更低。但引人注目的数字统计是，直到1700年时，英国才达到了类似的160：100的价格比率，这可能比11世纪中国东北部市场上铁的价格高出约1/3。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公元977年时，中国铁的价格比率高达632：100，这表明仅仅在100年的时间里铁的价格几乎下降了4倍。而英国花费了从1600到1822年共200多年的时间，才实现了相应水平的价格下降。不过，李约瑟认为哈特韦尔所统计的铁产量数据对于那个时期来说有点高了（这一点我在下文还要阐述）。即使如此，也不能由于数量差额较大而否定这样的结论：中国宋朝在铁的产量上出现了巨大增长，如果不是“革命性”的话，这种增长率英国人在约7个世纪后才能与之相媲美。

欧洲中心论者常常忽视这些成就，他们认为中国对铁的使用只是局限于武器和装饰艺术，而不是用于工具和生产方面。但事实上，铁被用于制造日常用品和工具，正像我们在工业革命中所期望的那样。这包括刀、斧子、凿子、钻子、锤子和木槌、犁、铲和锹、手推车轮轴、车轮、马靴、烹饪器具、水壶、钟、吊桥上的链子、装有铁甲的门和岸望塔、桥梁、印刷用的边框和活字。这些仅是那时出售的铁制品中很小一部分。哈特韦尔还增列了锯、铰链、锁、炉子、灯、钉子、针、别针、煮器、铙钹和鼓槌。唐纳德·瓦格纳（Donald Wagner）①更为概括地总结到，“铸铁器具的大量生产极为重要……‘前工业社会’的铁器制造商积聚了巨大的财富”，他认为这一进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3]

①当代丹麦历史学家，生于加拿大。——译者

同样令人注目的是生产技术的发明。中国人生产出各种类型的铁制工具，用铸铁锻造铲和犁铧（以及大炮），同时生产熟铁用于制造刀具（比如刀和剑）。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欧洲人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使用了熟铁。“事实上，中国人似乎……直接生产了铸铁，而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经过长时间的锻造的中间冶炼阶段。”[4] 铸铁性能要优越得多，因为它有更好的强度。也正是因为中国能够生产更为廉价的铸铁，才使得工业革命的影响广泛扩散到全国各地。

这样，所有这些因为铸铁生产冶炼技术的突破而成为可能。在这里鼓风炉和活塞式风箱的使用尤为重要（尽管这些已经被掌握使用约有1400年了）。风箱连续输送保持高温（975℃）所需要的气流，这些在公元前4世纪已被使用，并早在公元31年就使用了水力驱动。此外，中国人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在生产钢（从铸铁发展而来），而欧洲只是到了近代时期才生产了钢。尤为重要的是，在公元5世纪时，中国的钢是通过一种将熟铁和铸铁混合在一起的“熔炼过程”而生产出来的。

另一个显著的创新是11世纪时用焦炭取代了木炭（因为木材的供应不足），这非常有意义，因为欧洲中心论坚持认为，这是由几个世纪后的英国人首先实现的。但英国和中国一样，在这两个国家使用焦炭都是为了解决森林采伐的问题。纺织业成就令人瞩目，是宋朝奇迹的另一个特点，而这常常被归功于18世纪的英国。中国的丝绸工业早在公元前14世纪就开始了，可以考证的是，纺织业领域最先进的工业技术革新是生产麻织品和丝绸的水力纺纱机的广泛采用（参见第6章和第9章）。所有这些铁／钢和纺织业方面的成就十分显著，但它们只是广泛工业领域中的冰山一角，因为这种生产需要一系列基础设施作为支撑。

运输和能源革命

欧洲的水车先是用来碾制谷物，1025年前后在德国南部首次被用于铁的生产，而在中国情况则恰恰相反。早在公元31年，中国就发明了水车来推动鼓风炉风箱。更有意义的是，在水力风箱中活塞杆和传动带的使用与蒸汽机的原理极为相似（详见第9章）。此外，运河和水闸也是重要

的革新（后者发明于公元984年）。[5] 沿着运河运输的煤、铁和钢能够运送到国家的南部，这对于中国工业奇迹来说至关重要，部分原因是由于它意味着对这些资源的庞大内部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大概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就已经开采了石油和天然气，应用于燃料、烹饪和照明等领域。[6] 实际上，在10世纪前后家庭使用的耐用石棉灯大量生产的事实，就说明了这次革新的广泛性。[7]

税收、纸张、印刷和商业化经济的兴起

宋朝一项非常重要的革新就是以货币为基础的税收体系的创立。尽管9世纪左右发明了用于信贷的纸币（“飞钱”），但到10世纪初它演变成了一种作为交换媒介的“真正”纸币。到1161年时，国家一年就发行了一千万张纸币。重要的是，这些具有开创性的发明后来被欧洲人所模仿，但在英国的广泛使用却晚至1797年。[8] 货币税收而不是实物税收的需求日益增多，使得货币税收从749年的4%迅速增长到了11世纪中叶的52%。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它迫使农民们参与到市场活动中。市场交换一直渗透到了社会的最低层，以至于甚至最穷的人除了为市场进行生产外别无选择。正如麦克尼尔指出的，“市场交换的激增——当地的、地区的以及跨区域的——使得生产总量极大地增加了，因为后来亚当·斯密分析的令人信服的所有专业化优势都已开始实行”，[9] 并且他还继续引用了14世纪一位作家的话：

> 现在，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十户人家，那里就有一个市场……在适当的季节，人们用他们拥有的东西去交换他们所没有的，他们依据对方所表现出的迫切性或迟疑，做出判断来提高或降低价格，从而最终赚取少量的利润。这当然也是世界上常用的一种形式。[10]

与欧洲中心论将中国政府描述成东方专制国家形成对比的是，埃里克·琼斯告诉我们：

> 政府放弃了其以劳役和实物税收方式分配和再分配土地的职能，而代之以货币税收。这种不干预的政策促进了私人土地市场的发育……国家既不能撤销那些它发现在社会上不受欢迎的经济交换，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它使皇帝和官员们不能榨取各种交易收入。政府或"食俸者"都不能从所有的收益中课税……这样做将会摧毁人们提供这种交易品的动机。[11]

王国斌（R. Bin Wong）[①]也注意到，中国政府"认为低税收可以给人民带来兴旺，并且因为百姓的兴旺对于维持一个强大的政权至关重要，所以税率非常低"。[12] 实际上，由中央政府强制征收的税收负担是非常低的——可能占国民收入的6%左右。[13] 尽管欧洲中心论者把中国经济描述成一种自给自足的农本体系，但事实上宋朝的商业不仅高度发达，而且国家的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于商业部门。同样重要的是，对商人的征税也比农村生产者要低很多。[14] 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也非常有意义，很多报告都证实了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时不受政府的约束。[15]

宋朝高度商业化的有力证明就是城镇和大城市的崛起。斯波义信(Yoshinobu Shiba)[②]指出，由于可得到的宋朝时期的数据资料很不均衡，所以对城市人口规模的估计十分困难。估计鄞县的城市人口比例约为13%，涉县是7%，丹徒县高达37%。即使如此，城市化在中国不仅比欧洲更明显，而且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几个最大的城市。例如，杭州的人口约在150万至500万之间（因估计存在差异）。[16]

货币经济发展与其他的关键创新密切相关：印刷术和造纸业（它们的起源在第6和第8章述及）。值得注意的是，纸币印刷的广泛使用，是中国给马可·波罗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之一。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纸被巧妙地用于各种用途，特别是在盔甲（一种不生锈的坚固产品）、墙纸、服装、

---

①华裔美国历史学家，著有《转变中国：历史变化和欧洲经验之局限》等。——译者

②日本经济史学家，著有《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译者

卫生纸、风筝、棉纸以及其他很多方面。对书籍的大量需求也刺激了中国的造纸业。在京都开封以及后来在杭州的太学院从事着大规模的出版印刷。不过，书的制作和销售并不局限于政府——它们也由私人经营。

农业或“绿色”革命

中国在公元6世纪时就差不多拥有了英国在18、19世纪农业革命相关的所有成就（第9章有更详细的论述）。[17] 正如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①所指出的：

> 说中国处于今天美国、西欧的地位，而欧洲处于（今天）摩洛哥的地位一点也不夸张。18世纪前欧洲原始的、惨淡的农业，与公元前4世纪以后先进的中国农业是简直没有可比性的。[18]

事实上，就连一个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宋朝时期中国农业的优势，“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直到20世纪才达到12世纪时中国的水平”。[19] 中国农民比他们的欧洲同行享有更高的收益率。此外，中国的农业在接下来的七个多世纪里仍然让人敬佩（参见下一部分）。[20] 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政府开始推行的著名的“青苗法”。政府激励农民投资农业，并以十分优惠的利息率提供贷款。“或许它的成功主要在于，农民们意识到了新技术带来的好处，愿意去接受实验并提高其自身的能动性。”[21]

航海革命

弗朗西斯·培根在其名著《新工具》（1620）中指出，三项最重要的世界发明就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令人注目的是，这些都是中国人的发明（见下文以及第6章）。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中国人在公元1000年左右发现了磁针指向的北方与真正的北方并不相同。之后，到15世纪时，这一认识使得那时最精确的地图得以绘制出来。

---

①当代英国学者，著有《中国的天才》一书。——译者

或许中国航海革命最引人瞩目的方面是船舶的发展，这包括它们的规模和数量。直到1588年，最大的英国船排水量仅为400吨，这与早得多的载重量超过3000吨的中国帆船相比，就相形见绌了（见第7章）。而且，这种大型的中国平底帆船，具有很多创造性的特点——包括方形船体、船尾方向舵、纵帆和防水隔舱——所有这些后来都被欧洲人所吸收（参见第6章和第9章）。尤其是船的数量——大船和小船——不仅是中国航海革命的证明，而且也是中国商业经济特征的证明。在8世纪时，大约有2000条船只在长江上航行，它们运载的货物总量约相当于1000年后英国商船运载货物数量的1/3。据马可·波罗估计，仅在长江下游就有1.5万条船只。到17世纪时，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ez Semedo）曾统计，在1小时内有不少于300条船驶向长江上游！[22] 最后，邓刚揭示了在北宋时期约有1.2万条粮食运输船，在清朝时增加到了2万条以上，在18世纪后期约有13万条私人运输船只。[23] 总之，坦普尔得出的结论似乎是恰当的：

> 或许可以确切地说，中国人在历史上是最伟大的航海者，因为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他们拥有远比世界其他地区先进的船只和航海技术，比较的结果是让人窘迫的。当西方最终赶上他们的时候，也仅仅是以一种或另外的方式改良了他们的发明。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在能想象到的每个方面，欧洲人使用的船只与中国相比都相形见绌（甚至晚至1800年）。[24]

第一次军事革命：中国，约公元850—1290年

正如将在第8章所述，欧洲中心主义对欧洲人的军事天赋大加赞美，据称他们发起了第一次重大的“军事革命”（1550—1660），重大的技术突破是在火药、枪和大炮上。但所有这些首先都是中国在850年至1290年间“第一次军事革命”时发明的。欧洲中心论者拒绝这一观点最常见的理由之一就是，中国人只是把火药用于烟火，没有应用于军事（即东方主义的“中国条款”）。有趣的是，在史诗电影《马可·波罗历险记》

中，我们了解到马可·波罗介绍的第一个中国发明是“意大利面条”，第二个就是炸药。据称马可·波罗问起后者：“这只是用来做玩具么？”中国人答道：“是的，用来做烟火爆竹。”然后马可·波罗建议道，“这可以成为一种很有用的战争武器”，对此中国人回答到，“不，那样太可怕了，那是致命的”。这段对话恰恰引出了一种最常见的欧洲中心论的神话：尽管是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却被更有创造力的欧洲人将其应用于战争。

尽管中国人在850年左右就发明了火药，[25] 但到10世纪初它才应用于投掷火弩，到969年才用于火箭，到1231年被用于炸雷与火铳（采取用铁管制成的发射器的形式）。[26] 到14世纪时被用来制作地雷和水雷。中国人甚至还发明了能够同时发送320枚带火箭头的箭矢发射装置——这被尼达姆描述为一种“相当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广泛使用的中世纪的火箭筒”。[27] 有趣的是，中国人在14世纪还发明了一种带有翅膀和尾翼的火箭弹，按照尼达姆的说法，“这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臭名远扬的V-1飞弹极为类似”。[28] 火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0世纪中叶的“火矛”，1259年左右发明了发射铁弹头的第一支铳，并且在不晚于1275年时使用了金属枪管。[29] 大约1288年时，一种被称作震天雷（eruptor）的粗制大炮被发明出来（这比欧洲第一门大炮早了约38年），[30] 而且还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中国的发明传播到了欧洲（见第8章）。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军事革命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它的海军。宋朝海军可能拥有多达2.05万条船只。[31] 这支中国舰队能够摧毁任何一支欧洲军队，甚至很可能是整个欧洲联合海军力量。重要的是，舰船的武器系统在不断地升级。在1129年时用投石器来抛掷火药弹并成为标准装置，1203年时一些船装备了铁甲。中国的军舰有着长期的发展传统。例如，在6世纪末，“五帆”战舰有高达100英尺的五层甲板，并可以搭载约800人。它还装备了“撞击杆臂”（striking arms）或“钻孔铁器”（holing irons）——一种固定在高层甲板上、顶端装有锐利铁钉的50英尺柱杆，它就像巨大的锤子，向下猛烈撞击以击毁敌人的船只。并且早在公元3世纪，中国就有流动的“方形浮动堡垒”，面积不下36万平方英尺，拥有高塔，可以容纳2000人以上。[32] 总之，坦普尔再次做出了恰当的结论：“在西

方的近代时期之前，中国人……是规模庞大的武器制造者。”[33]

对中国的初步结论

最后，我们来重新评价欧洲中心论的一个核心论点——只有西欧人才开辟了“机械时代的前景”。弗雷德里克·莱恩（Frederic lane）①的话很有代表性：

> 不需要解释什么……当远东的艺术家们沉醉于绘画花草虫鱼以及骏马时，列奥纳多·达·芬奇和弗朗西斯科·迪·乔治·马丁尼（Fracesco di Giorgio Martini）②则痴迷于机械。欧洲的哲学家们将宇宙看作一个巨大的钟表结构，将人体视为一种系统，并将上帝看作杰出的“钟表制造者”。[34]

但是鉴于中国非凡的机械发明，这一观点难以成立。实际上——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表明的——在所述及的大部分时期里，欧洲人独立发明的东西少而又少。在18世纪前，他们真正的发明只有阿基米德螺旋线、曲轴或凸轮轴以及酒精蒸馏法。[35] 尽管在接下来的700年里，欧洲人展现出吸收中国诸多技术发明的非凡能力，但这种吸收倾向与“创造性”的机械时代前景并非一回事。如果说有人展示了这样一种前景，那一定是中国人，而非欧洲人。

欧洲中心主义最普遍的回应是否认宋朝的经济成就，认为其不过是一场“夭折的革命”，经济的进步很快就被东方专制国家的冰山所摧毁，并沉没得无影无踪。[36] 且不说事实上，这种否认并不能解释宋朝时期创造的显著成就，而且中国的经济在1279年后并没有倒退，或消失不见，其巨大的活力使得中国直到19世纪都居于或者非常接近全球经济的中心。

---

①美国当代史学家，著有《海上王国威尼斯》。——译者

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师。——译者

中国孤立主义和经济停滞的神话：出类拔萃的中国，公元1434—1800年

由于在第二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贸易规模是如此之大，各种反欧洲中心论将1800年前的全球经济描述成是“以中国为中心”。[37] 实际上，中国的确是世界上的主导力量，它被视为“最高领袖”（primus inter pares）。在东方全球化下，世界经济力量的分布是“多中心的”，中国、印度、中东和北非、东南亚以及日本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然而，根据“中国条款”中包含的两个主要论点，大多数学者否认了15世纪后中国的成功。首先，如上文所谈到的，即使他们承认宋朝时期的重大发展，但也以其为一场“夭折的革命”而予以否认。其次，明朝在1434年宣布的一项关于对外贸易的帝国禁令，使得中国重塑世界的机会之窗迅即砰然关闭。而且这样做是由于中国经济在衰退，因而使当权者从国际贸易中退出。他们指出，中国的国际贸易被落后的朝贡体系所取代，这种体系与全球经济完全孤立开来。基于这两个原因，欧洲中心主义否认了中国在1280年，尤其是1434年后成为全球贸易中心的可能性，而代之以中国沦入了孤立主义。

这种所谓的退出，导致了两个与欧洲相关的世界史最重要的观点。第一，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据称其在东方造成了一种力量真空，从而在1500年后由优秀的欧洲人热切地予以填补了。用戴维·兰德斯的话来说：

> 放弃（在郑和领导下）庞大的航海计划，是实行闭关政策、从海洋冒险和诱惑后退的组成部分。这种人为的内向性，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样做恰值最糟糕的时机：面对新兴的欧洲强权，中国不但自行解除了武装，而且自我满足和顽固，对欧洲人带来的经验和新事物不屑一顾。[38]

第二，这个禁令意味着中国开始切断与国际贸易主流的联系（据称是

在1500年后开始脱离的），之后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失去了活力。再引用兰德斯的话："中国选择了孤立主义，天朝帝国又呼噜呼噜沉睡了数百年，对外面的变化无动于衷，不受影响，保持圆满、完整，似乎安静而和谐。然而，世界越过了它。"[39] 这样，退却说明了中国的大倒退，而同时使欧洲在1500年后实现了大飞跃。显然，这一论点存在着大量的问题。与一般的欧洲中心论描述不同，我提出了四点反论，下面将依次论及。

中国退出的神话：1434年后中国国际贸易的连续性

关于中国退出的通常描述，首先错在西方历史学家过于从字面上理解官方禁令和中国的朝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禁令的字面理解在于误解的问题。中国政府试图维持儒家（即孤立主义）的理想，从而导致了官方文件被曲解。此外，落后的帝国朝贡体系的存在——这种体系被推测是建立在强制和政府管理的朝贡形式，而非商业贸易的基础上，错误地肯定了中国的退出。但是，传统的解释误解了朝贡制度和政府禁令的实质。

这里，第一个反论就是朝贡体系也是一种贸易体系。正如罗津斯基（Rodzinski）所指出的，朝贡体系：

> 实际上常常只是相当可观的对外贸易的一种外在形式。大多情况下，外国商人，尤其是那些中亚的商人，把自己扮作来自子乌虚有国度的虚假贡使，目的只是为了进行贸易。[40]

而且，随着中国朝贡关系的扩张，东方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也在扩大，这甚至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也不时得到了承认。[41] 我们还可以补充大量的事实。[42] 朝贡制度更多是出于自愿而非强迫，这是因为贡奉微不足道的贡品进入中国市场，是这些所谓的藩属获得财富的一种途径。我们还能怎么解释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不断请求作为藩属加入朝贡体系这个事实呢？另外，藩属之间常常为纳贡而彼此竞争——这也是为了接近有利可图的中国经济。各国统治者，包括满剌加苏丹、渟泥君主、科罗曼德尔的注辇国王以及马拉巴麻啰拔王子，都渴望遣使纳贡，以获得中国

的保护，反对其某些邻敌。正如安东尼·里德（Anthony Reid）[①]所指出，一些国家，如爪哇、暹罗和满剌加，如此坚持履行朝贡使命，以至于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满。[43] 有证据表明朝贡体系带有自愿的成分，当藩属被剥夺了朝贡身份时，常常会导致他们做出强烈反应。例如，16世纪末日本侵犯朝鲜（明朝的一个藩属），就是为了迫使中国恢复朝贡关系，甚至威胁如果遭到拒绝就入侵中国！亚洲商人们常常还使用另外一种策略，伪造国书，假扮贡使，以微不足道的“贡品”来换取商业贸易。[44] 这一点广为人知，甚至偶尔也得到了明朝官方的许可。

有三个主要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官方禁令并不真实。第一，正如上文述及，朝贡体系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体系。第二，中国很多私商通过各种方法避开官方禁令进行贸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洲中心论把葡萄牙的特许状描述成欧洲占据优势的标志，这忽略了一点，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持有特许状意味着他们能够扮作葡萄牙人，从而避开明王朝的禁令。此外，很多华人贸易都与日本人勾结在一起（实际上是中国人的海盗行为），并且非常兴旺。但最常见的绕开政府禁令的方法，是广东的贸易行为。菲利普·柯廷这样解释道：

> 所有超过官方贡品的货物靠岸后，被贴上“贡品船压舱物”的标签，直到允许从北京销售……外国船只离开时，它必须带上压舱物以保证航行安全，因此就在返航中用中国商品作为压舱物。用这种方式，带有“压舱物”（即贸易商品）的船在往返时都捎带货物，这要比朝贡本身重要得多。[45]

岛国琉球的统治者非常有创意，鼓励福建的中国私商前往定居，以便能够同中国进行获利丰厚的贸易。作为回报，他所做的就是偶尔派遣恭顺的朝贡使团到中国。这是中国私商喜欢采用的更普遍的策略的一部分，他们迁居异乡，再把商品出口回中国。在16世纪上半叶，中国商人遍布具

①当代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善治东南亚史。——译者

有商业战略地位的南中国海各个地区，从印度支那、马来亚、暹罗以及苏门答腊、帝汶岛到菲律宾的整个弧形岛屿圈。直到19世纪，他们都主导着这一贸易网络，而且，他们还向西、向东扩展贸易，并与中国福建联系起来。[46] 同样重要的是，还存在着猖獗的走私贸易。由于政府官员常常与走私者勾结在一起，政府的禁令显然无法切实执行。事实上，16世纪60年代走私贸易如此猖獗，以至于明朝政府最终做出让步，使走私的主要港口（月港）合法化。

朝廷禁令并不真实的第三个理由是，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私人贸易都被禁止。在三个主要港口——澳门、福建漳州以及苏州，大部分私人贸易都得到官方的认可，后来，清朝时期是通过厦门、宁波和上海进行。唐纳德·拉奇（Donald Lach）和埃德温·范·克雷（Edwin Van Kley）①指出：

> 早期西方的观察家，如门多萨留下的印象是，福建商人在地方官员的默许下，从事着非法的对外贸易。（但）17世纪的学者——马特利夫（Matlief）首先认识到来自漳州的商人从事帝国境外的贸易，是得到官方许可的。[47]

许多学者指出了中国与东南亚贸易联系的重要性。[48]特别是马尼拉，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因为中国从那里获得了大量的白银（通过西班牙人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事实上，仅在1570年至1642年间，平均每年有25艘中国船只到了马尼拉。[49] 这种联系不仅在官方禁令颁布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仍然非常重要，而且在18世纪末还得到了加强。[50] 但关键在于，世界上大部分白银都被中国吸收，从而证明中国经济不仅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而且活力十足，产生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因此，对此值得做进一步的简要分析。

世界上的白银被吸引到中国有四个主要原因。第一，到15世纪中叶时，贸易结算以白银为通货。第二，中国的经济实力导致了内部对白银

①当代美国历史学家，与他人合著多卷本著作《欧洲形成中的亚洲》。——译者

的强大需求。第三，中国的出口大大超过进口。第四，中国白银的价格相对于黄金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的金／银比率是1:6，而欧洲是1:14）。[51] 亚当·斯密也承认："中国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富裕得多，贵金属的价格也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高得多。"[52] 中国经济如此重要，它形成了一个吸引世界白银流入的无底洞。令人吃惊的是，到17世纪40年代，中国国库每年收入的白银约达75万千克。中国的富裕程度可以通过事实来估计，"即使上海一个'穷'布匹商也拥有约5吨白银资本，而最富裕的家庭则有几百吨白银资本"。[53]

不过，"吸引"一词存在误导倾向，因为它给人的印象是，世界上的白银流入中国后就不再出现。事实上，中国白银的价格相对于黄金非常高，而其他地方这种相对价格则非常低，这就产生了一个全球性的套利体系。[54] 正如弗林（Flynn）和吉拉尔德兹（Giraldez）[①]解释的：

> 这种复本位制比率的巨大差异，意味着从理论上，在阿姆斯特丹可以用1盎司黄金买到11盎司的白银，将这些白银运到中国，11盎司白银换得约2盎司的黄金。这2盎司的黄金再带回欧洲，换成22盎司的白银，这些白银再运到中国，它的价值就再次翻番。[55]

这种全球套利体系使得白银不断流入中国，然后换成黄金。随后这些黄金主要出口到欧洲，又换成白银，然后再把白银运回中国换成黄金。我把这称为"全球白银的循环过程"："全球"是因为它呈现为一种连续的环形方式，白银从美洲穿越欧亚大陆流入中国，然后向西流回欧洲。这就是为什么"吸收"一词是不准确的。显然，中国人不是贮藏者（如第4章所述）。有趣的是，即使在17世纪40年代后，当套利利润削减时，由于对中国产品的持续强大需求，白银仍大量流入中国。这同时驳斥了欧洲中心论的"中国条款"说——即宋朝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停滞"了。此外，正如弗林和吉拉尔德兹所言，事实上，15世纪中叶中国经济以白银为通

①当代美国历史学家，以治太平洋地区历史见长。——译者

货，大大增加了欧洲人的财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①]公正地指出，“如果中国……没有这样一种动态经济（使其能够建立在白银货币基础上）……在三个世纪里以难以置信的数量吸收新大陆开采的白银，这些银矿在几十年内可能就会无利可图”。[56]

总之，显而易见，无论有没有官方许可，中国商人都在继续进行其利润丰厚的贸易。因此，许多欧洲中心论者极易受官方说辞的误导。谢和耐（Jacques Gernet）[②]恰当地总结道：“在官方规章与贸易的实际状况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官方）强加的贸易限制可能会导致我们做出假设，即在海洋贸易如火如荼的时代，中国却陷入了孤立。”[57] 但是，如果中国政府的确对这种广泛的非法民间贸易体系置若罔闻，这就避开了一个直接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一再公开声称禁令有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要剖析欧洲中心论另一个普遍的误解。

中国禁止国际贸易的神话：中国身份的政治学

现在谈我的第二个反论。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强调，官方对外贸的禁止是中国经济衰退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样，即使这一时期中国还存在任何帝国的荣耀，其经济的衰退也造成了其退出或陷入孤立。但是根据上述中国贸易继续发展的证据，禁令显然只是一种神话。这里我主张保持禁令的神话，以再现中国政府（与中国特性相联系）的合法性。因为事实上，朝贡体系更像是一种变相的商业体系，禁令的神话是通过政治选择来维持的，而非来自经济制约。

在明朝洪熙帝的统治下，中国恢复了其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强化了与世界的隔绝。明王朝早期走向了世界（以郑和远航为标志），尽管它对开创帝国政策毫无兴趣。但在洪熙帝继位（1424）后，他开始恢复治国理念中的儒家礼仪规范。1434年，明王朝正式宣布中止国际贸易。但是，如果数量庞大的贸易继续存在的话，那么为什么一个封闭王国与外部世

①当代美国史学家，善治中国经济史。——译者
②当代法国史学家，以治中国史见长。——译者

界的联系仅仅是建立在虚幻的宗藩朝贡体系上呢？朝贡制度是中国政府维持其国内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了藩属使节的叩拜礼仪。叩拜是皇帝作为受命于天的重要象征。这样，要保持王朝对内权威的合法性，就必须维持朝贡体系的神话。[58] 因此，朝贡制度的政治意义，在于皇帝必须向其臣民表明，他拥有“蛮夷”世界（即朝贡体系）的忠诚，尽管实际上朝贡体系对于藩属和中国商人也意味着是有利可图的贸易。

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①恰当地描述了这种构建合法性和贸易欺骗的帝国游戏，这里详细引用了他的话：

> 中国当权者乐于被蒙骗。如果大臣揭穿了那些“藩属”的本质，皇帝的威望（即合法性）将会受挫；而且一旦商人……将商品带到了都城，朝廷无疑会去挑选。结果，带着伪造国书的假冒使节们有规律地往返于中国朝廷。商人和大臣们串通一气，已是公开的秘密……按照（同时期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话来说，“中国人自己（他们决非对欺骗一无所知）欺骗了他们的皇帝，曲意奉承，似乎真的全世界都在向天朝纳贡，然而相反，事实上是中国在向那些藩属奉献贡赋”。如果说里奇有什么错误的话，那就是他认为皇帝自己没有参与到游戏之中。[59]

的确，这是一个所谓的藩属非常乐于参与的欺骗游戏，王国斌的话颇有道理：“这些外国政府通常也允许中国人这么说（中国的至高无上），而他们自己未必接受这一看法。”[60]因为显然他们是为了贸易利益而参与这一游戏的。

因此，很明显，并非经济的衰退，而是维持合法性的需要——与中国身份有关的——促使统治者自称禁令生效了。然而，有悖常论的是，中国的退出还有一种意义，因为他们不是从全球经济中退出，而是不愿参加不

①美国著名史学家（1934—1984），善治中亚史、蒙古史和满清史。——译者

久将控制伊比利亚诸邦的帝国权力政治游戏。李露晔（Louise Levathes）[①]指出：

> 在（15世纪早期）……中国的势力范围已经遍及整个印度洋。半个世界在中国的控制之下，因为拥有这样一支强大的海军，如果中国愿意的话，另一半也很容易成为囊中之物。在欧洲大探险和大扩张时代之前的一百年，中国可以成为最大的殖民国家，但中国没有这么做。[61]

事实上，如果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倡导一种囊括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帝国使命。为什么他们没有这样做？现在很明显，这不是实力不足的因素，他们选择放弃帝国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独特的身份。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同样指出：

> 中国的“天定命运”从没有发生，它放弃了一度似乎由其掌控的世界优势……中国的宽容仍是世界历史上集体缄默的最不寻常的事例。[62]

总之，这种不切实的禁令唯一的问题是，欧洲中心论者太容易被误导，认为它是有效的，同时误解了它的社会功能。反过来，这种误解就产生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上最大的错误推断：中国人从全球经济的退出，造成了1500年后优越的欧洲人涌入填补的真空。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真空（见第7章）。

中国经济衰退的神话：卓越杰出的中国，公元1100—1800/1840年

1100年后中国集约型经济力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怎么看待欧洲中心论否认宋朝的工业革命，认为它是一场“夭折

①当代美国女作家，著有郑和传记《当中国称霸海上》。——译者

的革命”呢？对于欧洲中心论者来说，宋朝以后中国经济的枯竭，主要是由于东方专制主义统治的重新加强，经济的脆弱和产量的下降迫使中国开始禁止贸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观点常常受到罗伯特·哈特韦尔所统计的铁与钢的数据的影响，这些数据表明，在1279年后中国的产量急剧萎缩了。布罗代尔颇有代表性地阐述了这种标准的欧洲中心论观点：

> 反常的是，中国在遥遥领先后，冶金业在13世纪后就停滞不前了。中国的冶金和锻造工匠满足于重复旧有的工艺，不再取得任何进步。焦炭冶炼虽然已经发明，却并无发展。这一切很难弄清，更别说解释。[63]

欧洲中心论忽略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国际贸易仍然充满了活力（如上文所述），国内贸易也如此。[64] 第二个问题是，哈特韦尔的估计是不确切的，不是因为他们略微夸大了宋朝的成就，而主要是因为他们低估了后来中国的钢铁生产水平。彭慕兰指出，与以往的看法相反，中国的铁产量在1420年复兴了。[65] 到20世纪初，方兴（Fang Xing，音译）估计生产了17万吨的“自然铁”（native iron）（与1078年的12.5万吨相比较）。[66] 此外，葛平德（Peter Golas）[①]推断中国的铁产量大概在18世纪时达到了顶峰。[67] 他同时指出，中国煤的生产在19世纪居于很高的水平，其中一些煤矿与在欧洲发现的煤矿同样大，煤广泛应用于经济活动中。而且，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广东铁的产出建立在资本主义模式的基础上。[68] 因此，宋朝的工业奇迹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孤立事件。中国的经济不仅仍然活力十足，而且对于世界上很多地区——特别是欧洲的发展前景，有着重要的影响（见第6—9章）。那么，还有哪些证据可以揭示1280年后中国集约型经济力量的较高水平呢？

中国高度集约型经济的一个标志是其高产量的农业。到16世纪，欧

①当代美国学者，善治中国古代科技史。——译者

洲经济已经从黑死病中恢复过来，但是，从14世纪末至1600年间，中国的农业产量不仅增加了60%，而且还超过了欧洲任何地方所达到的增长率。此外，中国的大多剩余农产品都出口了，这并非落后的农本经济——而是高度的商业化经济，并且依赖于国际贸易。[69] 总之，很多学者都详尽描述了18世纪中国农业发展的动人图景。[70] 谢和耐甚至冠之以“繁荣的时代”，并推断那时中国的农业仍领先于欧洲。[71]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在1700年至18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也以惊人的速度在上升，这个增长率是英国在工业化后才达到。这意味着农业产量和粮食人均产量的巨大增长，而这必定是以极大的技术潜力为前提的。[72] 琼斯也认为，在宋朝之后的年代里，以资代劳仍然在中国存续。[73]

中国高度集约型的经济，也反映在其令人注目的生产和商业领域。首先，世界各地的白银源源不断涌入中国（如前文所述，这为中国优越的生产能力提供了重要证据）。其次，中国存在着一套重要的民间资本基础结构。[74] 尤其是，私营银行超过了公共银行。山西形成了私人银行业的重要中心，到19世纪初，八家最大的银行在中国各地拥有三十多个分号。随着商人力量的大大增长，中国在商业和工业领域的投资超过了农业。第三，棉布的生产规模很大，这就需要大量的原棉。到18世纪末，中国从印度进口的棉花比英国从美洲进口还多。第四章将对此做出补充：中国的人均收入约与1750年的英国相当；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1850年的英国一样高；直到1860年，中国占世界生产的份额都高于英国。因此，甚至很多欧洲中心论的中国学者先入为主地把中国经济增长，与1839年后西方侵入的影响联系起来，而没有认识到早在英国到来之前，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

最后，如第9章所述，这里我所提出的思想直到18世纪才为欧洲人所认识。1780年后，欧洲人才修正了这种看法，这可能是欧洲人在最后一个千年所提出的更为虚幻的社会结构。中国一度被描述成“先进文明的样板和模式”，之后又成了“永远停滞的堕落民族”。不幸的是，世界史中的欧洲中心论学者（包括西方人和中国人）错误地选择了中国内在“停滞论”，[75]他们应该倾向于认为中国在第二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充

满活力的先进文明。

我的最后一个反论是，在1839年之前，中国不仅能够控制那些官方允许进入中国市场的欧洲人，而且能够在军事上击溃任何被拒绝的欧洲挑战者。由于在第7章中会详细探讨这些，此处不再赘述。总之，在1434年后，中国既没有从全球经济中退出，经济也没有枯竭，这个结论似乎是公允的。鉴于此，兰德斯所称的“中国选择了孤立主义”，而外部世界超越了它（如前面所引），证明是另一种欧洲中心论神话。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印度、东南亚和日本。

第4章

东方保持优势：东方专制主义与印度、东南亚和日本孤立主义的双重神话，公元1400—1800年

赤道地区不存在文明的假设背离了自古以来的传统。真主洞悉一切。

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①]

欧洲中心论的核心论点之一就是，到约1500年时，欧洲已经处于世界的主导地位。它同时也认为，1400至1800年之间世界的领导力量，毫无例外都是欧洲。但本章要指出的是，1800年之前世界经济的主要角色决不是欧洲，它只是在落后了差不多15世纪后，于19世纪才最终赶上来。欧洲中心论者假定，东方长期的历史性经济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源于专制主义的盛行以及与国际贸易的隔绝抑制了东方经济。证明这些假设的错误，有助于加强下述第一部分的论点：直到19世纪，东方一直保持着对西方的优势。然后，第二部分揭示了这样的神话，即作为欧洲中心边缘且处于孤立状态的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受到一种东方专制政权的阻滞——以印度为例。第三部分对日本做了同样的阐述，我特别强调，日本在英国工

①阿拉伯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1332—1406），著有《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古今历史大纲》《历史绪论》等。——译者

业化之前就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因而日本是一个“先发国家”，而非“后发国家”。

东方超越西方，公元 1200 — 1800 年

有什么证据（定量或者定性）来证明直到 19 世纪东方在经济上都比欧洲先进呢？尽管大量权威的统计数据未能整理出来，但我们仍要深入探讨。很多欧洲中心论者用这些数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我们先从国家收入的数据资料开始，根据保罗·拜罗克（Paul Bairoch）[①]的说法，后来的第三世界（东方）的收入是西方在 1750 年的 220%，比 1830 年时高 124%，比 1860 年时高 35%。西方的收入主要涉及欧洲、美国、俄罗斯和日本，而东方的收入涉及到亚非（一种对西方抱有偏见的说法）。西方的收入迟至 1870 年超过东方的水平。[1]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②]的看法，1820 年中国的 GDP 占了世界 GDP 总量的 29%，相当于整个欧洲的总量。[2] 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东方的人口要比西方多得多，欧洲中心论者倾向于把目光集中在人均收入数据方面。安格斯·麦迪森和戴维·兰德斯认为，1750 年时西方对东方的比率为 2:1。[3] 然而，拜罗克以 1960 年的美元为基数，估计出 1750 年时东方的人均收入几乎与西欧相等，中国与居于领导地位的欧洲经济不分伯仲。[4]

那么，我们如何在这些不同的估计和迥然相左的结论中做出正确判断呢？麦迪森明确指出：

> 如果拜罗克所言正确，那么（现在）第三世界的落后或许可以更多地解释为受到了殖民剥削，而欧洲的优势则较少归因于其科学天

①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其著作《经济学与世界史：神话和悖论》，力批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标举的“自由贸易”，认为“在历史上，自由贸易属于例外，而贸易保护主义才是常规”。——译者

②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以经济历史数据考证与分析见长，著有《世界经济千年史》。——译者

赋，长达数世纪的漫长积累，以及组织和财政制度的优越性。[5]

重要的是，麦迪森承认，如果我们使用由一种最精确的数据类推出另一种数据的方法回推到1750年，就能确定拜罗克的数据。[6] 在其1993年出版的著作中，拜罗克认为由麦迪森推导出的一组最新数据，在折合为1960年的美元时，可以估计出1830年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人均收入是121美元。这非常重要，拜罗克总结道：

> 考虑到1750年左右印度的水平至少比1830年左右高出三分之一，而那时（1750年）中国要比印度富裕，拉丁美洲比亚洲"富裕"，非洲较为"贫穷"，那么后来的第三世界原来的收入水平约在170至190美元之间，这似乎是个非常保守的估计。换句话说，这一数据非常接近，或者至少与我1981年时的估计相似。[7]

总之，即使迟至1750年，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东西方就人均收入来看基本上是相等的。但这些结论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1800年之后，西欧的人均收入赶到了前面。

就所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份额来说，是怎样的比较状况呢？这里我依据的是1982年拜罗克给出的数据（据我所知这是目前唯一的数据）。[8] 根据拜罗克的说法，1750年西方的贡献约占23%，而东方（包括日本）占了约77%。即使晚至1830年时，东方的制造业产量仍是西方的两倍，只是到1850年时后者才超越了前者。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涉及到领导国家的相对地位。到1750年为止，中国的领导地位显而易见，它占据世界制造业产量的33%（超过了现在经济复苏后美国的地位）。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所占的相对份额几乎比当时的西方高出50%——这与1953年处于顶峰时期的美国相对于欧洲加上日本和加拿大所占的份额大致相同，只是到1830年时，西方超过了中国。那么中国和英国的关系如何呢？到1750年时，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的比重是英国的1600%，1800年时这一比率是670%，1830年是215%。晚至1860年时，英国才最终和中国并驾齐

驱。同样重要的是，1750年时印度所占的份额也高于整个欧洲，1830年时印度比英国高85%。

那么我们如何来总结这种状况呢？如果我们参照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那么西方是到1870年超过东方。如果我们参照人均收入数据，那么似乎可以断定西方是在1800年之后才赶到了前面。然而，人均收入不一定表示具有强大的全球经济力量，今天的瑞士和新加坡人均收入非常高，但没有人根据这一点就认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是重要的全球经济大国。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份额的显著领导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似乎可以认为，东方对西方的优势至少延续至1800年。

这里还有各种非常有用的定性方法，包括有关预期寿命和卡路里摄入量的数据。彭慕兰在收集了大量相关数据后指出，直到1800年，亚洲即使不比欧洲优越，至少也不比欧洲差（虽然他主要集中于日本和中国）。[9] 有意义的是，最近的研究表明，与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相反，奥斯曼土耳其在19世纪前的生活水平和实际工资率并不比欧洲低。[10] 而且，中国在公共卫生和清洁水供应方面也比欧洲先进得多。李中清（James Z. Lee）和王丰（Wang Feng）[①]认为，在约1800年之前，中国的生活水平与西方是相当的。[11] 苏珊·汉利（Susan Hanley）[②]指出，即使到1850年时，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也比英国人要高。她还指出，普通日本人的饮食比普通英国人要健康得多。[12]

这表明，东方在全球经济贸易中显然占据优势地位。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这一时期欧洲与东方主要国家陷入了长期的贸易逆差——这一先例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因为欧洲对亚洲产品的需求非常旺盛，而亚洲对欧洲产品的需求则非常低迷，欧洲就出口金银来弥补这一差额（这是欧洲落后的一个显著标志）。更有力的证据是，欧洲人自己甚至不能生产金银，而是从非洲和美洲进行掠夺。或者就如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①华裔美国学者，合作出版《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与中国现实》。——译者
②美国学者，日本史专家，著有《前近代化日本面面观》等。——译者

Gunder Frank）[①]所言：

> 在世界经济结构中，有四个主要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前两个地区靠生产出口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赤字，非洲出口黄金和奴隶。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三个地区都生产世界经济中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第四个贸易逆差地区，即欧洲，本身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以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13]

这里我还要反驳两种主要的欧洲中心论观点。第一，欧洲中心论者常常宣称，亚洲人不买欧洲的商品是因为亚洲的消费嗜好还不太成熟。但是，欧洲的商品在质量和价格上都是非常糟糕的（这就是为什么亚洲人只接受白银和黄金）。[14] 还有，我们好像忽视了欧洲并不是唯一与东方主要国家保持贸易赤字的地区（这表明问题不能单纯归结为东方所谓“不成熟”的消费模式）。

第二种同样普遍的欧洲中心论观点宣称亚洲人之所以偏爱金银，是由于其所谓的存储倾向。[15] 但这种存储理论有三个主要缺陷。首先，它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假设之上，那就是亚洲的经济还没有货币化。可以肯定，到16、17世纪时，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经济已经货币化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亚洲国家倾向于货币税收，而不是“以物代税”，这种方式把很多农民都吸入到了商业经济中。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如果亚洲人仅仅是在储存金银，那么我们如何解释亚洲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而参与全球套利交易的事实？事实上，白银被吸入到中国和印度后，被兑换成黄金，然后出口到欧洲，在那里又被兑换成白银（前一章已述及）。所以它不是被用于贮藏，而是选择一种合理的和趋利的形式。第三，贵金属的进口，为许多亚洲国家经济的商业化提供了一种重要动力。换言之，金银并没有因为

---

①德裔加拿大学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学派的代表人物（1929—2005），著有《白银资本》等。——译者

贮藏而退出流通，相反则是被用于促进生产和流通。[16] 基于这些原因，很明显，欧洲为弥补贸易赤字而进行的金银出口，是其自身生产的脆弱和亚洲经济相对强大的一种体现。

总之，大量的事实表明，就所有重要经济指标来看，东方至少到19世纪初都居于西方的前列。现在我开始对东方国家分别解析，对其中若干主要国家的集约经济能力和粗放经济能力进行考察。前一章已经讨论了中国，现在开始探讨印度、东南亚和日本。然后会在第7章简要述及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

印度孤立主义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双重神话

欧洲中心主义把印度描述成一个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案例——一个野蛮、贪婪的利维坦——榨取经济资源，经济停滞落后，孤立于国际贸易主流之外。[17] 本章提出了八个反驳论点，它们揭示了在英国帝国主义到来之前，印度的经济是富有活力、引人注目的。

非限制增长的印度国家：八个反欧洲中心论观点

首先，莫卧儿帝国压制了所有经济活动的假设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个帝国顶多是对资本主义兴趣不大，但常常是予以宽容，有时也极力促进它。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莫卧儿帝国向古吉拉特商人提供积极的帮助。尽管王室的船只直到17世纪初都非常重要，但在之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古吉拉特商人设法说服统治者撤走王室舰队，允许他们拥有自己提供船只进行贸易的自主权，特别是来自苏拉特的贸易（这一过程完成于17世纪中叶）。由帝国对古吉拉特商人的相应保护，似乎成为以苏拉特为基地的印度航运业大规模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增长约在600%至1000%之间。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马拉塔统治者希瓦吉（Shivaji）的看法：

> 商人为王国添彩，是君主的荣耀，他们是王国繁荣的动力。各种稀缺的商品涌入王国，王国从而富裕起来。在王国财政困窘时期，无

论何种必需的借款都能得到满足。基于这一原因，我们应该保持对商人的尊重，应该在资本市场上对大商人予以支持。[18]

事实上，正是这种态度在17世纪吸引了古吉拉特人迁移到马哈拉施特拉。更普遍的是，从事远距离贸易的班贾拉斯人享有很高的声望。格罗弗（Grover）①指出：

为了王国的利益，各个地区的柴明达尔被要求保证班贾拉斯人在他们各自的管辖领地内自由通行。由于班贾拉斯人保持着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商品供应……他们在社会上很受尊重。当商队到达一个村庄时……它会受到异常热情的接待。当地的柴明达尔首领……常常会由于班贾拉斯人安全抵达他们的领地而向其头领献上尊贵的礼袍。[19]

另外，根据其最新的研究，穆扎法尔·阿拉姆（Muzafar Alam）②指出，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常常对印度商人予以保护。例如，从莫卧儿统治者、波斯君主和乌兹别克可汗之间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促进和平以维持获利丰厚的贸易，把这些地区联系了起来。[20] 正如范·桑滕（Van Santen）所指出的那样，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种出口促进政策以吸引贵金属流入印度。[21] 毫不奇怪，印度商人常常把统治者视为其同盟。

第二个问题是，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夸大了莫卧儿帝国的集权和力量。中央政府实际上把权力和管理移交给了地方政权，并乐于授权（或容忍）诸多地方政权来负责贸易。鉴于港口和地方政权采取了诸多措施来促进资本主义和商业，这实际上就动摇了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这种管理上的松弛，也动摇了欧洲中心论关于贸易和价格由中央政权管理的说法。虽然莫卧儿政权也试图通过自己的权力来影响一些地区的贸易，然而私营

①印度历史学家（1923—2001）。——译者
②当代印度历史学家。——译者

> 船主乐于让其船只无拘无束，自由停靠，任何个人或组织都没有垄断航线。偶尔也有人试图对一些特定商品进行垄断，但遭到反对，无果而终。[22]

总之，由于体系过大和莫卧儿政权并不足够强大，它没有能够建立一种指令性经济和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贸易垄断制度。

第三个问题是，如果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是正确的，我们就难以在印度经济中发现重要的信贷记录。但我们发现印度有发展良好而且广泛的金融制度。例如，艾哈迈达巴德商人发明了各种支付方式和清偿债务的文书。值得注意的是，印度金融市场上的利率与16、17世纪的英国大致相当或者略低（月息在0.5%至1%之间浮动）。[23] 而且，地方上的银钱兑换商提供的贷款年利息实际上很低——农村地区在1%至5%之间，城市在1%至6%之间。再者，银钱兑换商为保证贸易所承担的贷款利率也很低，这表明商路是相对安全的。最后，银钱兑换商还以较高的利息从事银行存款、贷款业务（主要是对商人）——一种明显的现代银行特征。如果这些资本家生活在一个忧惧“贪婪”的国度，他们将不可能从事这种金融活动。

第四，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东方专制主义国家，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许多商人极其富裕这样的事实呢？一个17世纪的商人，阿卜杜勒·加富尔（Abdul Ghafur），经营的贸易规模很大，足足相当于整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规模！据称他拥有约20艘300至800吨不等的船只。另一个商人，维尔吉·瓦拉（Virji Vora），拥有一个价值800万卢比的大庄园，他个人还涉足不同行业的规模庞大的贸易，以至于他甚至声称能够控制荷兰东印度公司。[24] 另外，很多苏拉特商人都非常富裕，其中一些人在17世纪中叶拥有500至600万卢比资产。重要的是，这种富有不仅仅局限于苏拉特商人。历史学家阿欣·达斯·古普塔（Ashin Das Gupta）[①]总结道：

---

①印度历史学家（1932—1998），善治印度及印度洋商业历史。——译者

> 很大程度上，在一些对印度了解不多的西方游历者（欧洲中心论者）的想象中，印度商人的形象就是，对莫卧儿王朝战战兢兢，由于政府的贪婪而不能积累和保持财富。实际上，在海洋贸易时代印度商人自由积累了庞大的财富。[25]

第五，如果莫卧儿政权对贸易采取了“全面控制”，那么，我们如何解释其对外贸易的关税和地方通行税都很低的事实呢？如果土地税和商业税非常沉重，那么我们如何来解释会有那么多极其富有的商人团体（他们并没有受到国家的恩惠）的出现？

第六，欧洲中心论者宣称，印度东方专制主义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在英国帝国主义到来之前，印度的商业不足为道。[26] 而且，诸如莫兰德（Moreland）①这样的欧洲中心论学者，把印度贸易描述为仅是欧洲经济主流的一种附属或末节。这里有两个相关的具体观点：其一，印度存在的小规模贸易仅限于奢侈品，因而不具有广泛性；[27] 其二，印度从事贸易的主要是数量不多的“小商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只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下面我们就分别进行分析。

欧洲中心论坚持印度贸易规模不大的一个原因是，假想印度的奢侈纺织品只是卖给了王室和富人们。但这种假想首先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东方主义思维。尽管在孟加拉、古吉拉特和科罗曼德尔这些地方生产奢侈纺织品，但印度生产的纺织品大多数是针对大众市场，欧洲中心论者忽视了印度的纺织品大多是粗制品，仅仅适合于贫穷的消费者。同样有意义的是，这些大众市场扩展的范围远且广泛，向东延伸到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向西一直到达霍尔木兹和亚丁。因此，这一市场并非微不足道。事实上，中东大多数地区贫穷的消费团体为印度粗布提供了极大的需求。[28] 这些大众消费品也包括诸如大米、豆类、小麦和油类等日用品的形式，通过印度洋贸易，其范围遥远，而且数量和规模巨大。

---

①美国历史学家（1868—1938），以治印度史见长。——译者

欧洲中心论对印度贸易只是“小贩”经营的传统印象也是虚构的。事实上，有许多经营规模庞大的商人定期奔走于印度经济内部和外部进行贸易。这里重要的是远距离贸易商和城市商人。他们当然不是小贩，因为他们常常雇佣小贩。伊斯兰古吉拉特商人是最大的远距离贸易商，他们在庞大的印度洋商业网络中的作用极为显著。[29] 而且如前所述，他们中很多人变得极其富有。城市商人分为两类——掮客和银行家或货币兑换商。这些城市商人具有与生俱来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思维。一如哈比卜(Irfan Habib)①所言：

> 一心一意地提升增值的能力是班亚斯人(Banyas)传统价值观的核心……在这一观念中，加尔文教派的两个美德，即节俭和宗教虔诚精神结合了起来。班亚斯人小心克制对财富的炫耀，不会随便铺张浪费，除了为他们的女人购买珠宝（这是一种储蓄方式）。[30]

尤其是城市商人，他们能够操作超大规模的资本，不仅是向印度海外贸易，而且也是向欧洲公司，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资金的关键角色。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为远距离贸易提供比英国人更高的资金保障。事实上，“欧洲的船只比较小而且缺少资本化，17世纪初英国人平均投入一艘船的资本约为20万卢比，而一些到红海进行贸易的古吉拉特船只价值至少是这一数额的5倍”。[31] 尽管有很多印度小商人，但事实上他们（英国人也是）如果没有众多印度大商人的帮助，就难以从事贸易。

然而，欧洲中心主义可能会认为这些印度大商人只不过是“买办”，附属于高等级的欧洲贸易商。事实上，印度的城市商人更像是“高级合伙人”。[32] 他们并非出身卑微，由英国人赐予财富和权力。他们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就非常富有。而且首先，正是他们的资本为英国人的贸易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直到1800年时英国人都是“低级合伙人”。

同样重要的是，印度孤立于国际贸易的说法显然是不恰当的。1500

①印度历史学家，治印度经济史。——译者

年之后，在奥斯曼帝国和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贸易角色的同时，印度商人越来越起到一种补充作用，尤其是在重要的印度洋贸易体系中。印度更倾向于出口而非进口，对欧洲产生了大量的贸易盈余。[33]毫不奇怪，大量的白银从欧洲流入了印度。这只是（不正确的）欧洲中心论假设欧洲贸易成为“主流”的重要因素。再者，认为印度经济是基于原始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也是错误的。最近的研究表明，“典型的”印度村庄与印度内部富有活力的商业中心，以及全球经济都有着重要的联系。[34] 同样重要的还有城市商人进行的印度国内贸易的规模，每年约在8.21亿公吨英里，其巨大的规模用1882年的标准衡量，相当于铁路运输的25亿公吨英里。[35]

最后，大概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最明确的问题就是，印度经济呈现出令人瞩目的集约型生产力水平。众所周知，英国工业革命的两大主要产业部门就是棉纺和钢铁。这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如不是19世纪，那至少是18世纪，印度在这两大产业方面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印度以其生产的伍兹钢（Wootz steel）[①]而闻名，并出口到波斯，为那里生产著名的大马士革钢（Damascus steel）提供了基础。鼓风炉在莫卧儿王朝时期很常见，到18世纪末差不多有一万座。而且印度钢铁不仅比谢菲尔德（Sheffield）生产的钢铁质量更好，而且更廉价。甚至在英国工业化刚刚开始时，欧洲钢铁同印度钢铁之间的差距虽然缩短了，但仍然很明显（参见第9章）。印度还是世界上一流的棉纺织生产国，它的丝织品生产几乎同样非常出众。仅仅卡辛巴剎尔（Kasimbazar）地区每年提供的丝织品总量就达到220万磅。布罗代尔总结道：

> 事实上，整个印度都生产丝和棉花，向全世界输送数量惊人的纺织品，从日用品到奢侈品，甚至连欧洲、美洲都在大量使用印度纺织品……毫无疑问，直到英国工业革命，印度的棉纺织工业无论在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上，还是出口规模上，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36]

①印度自古以来在小坩埚中冶炼的刀具用钢。——译者

印度的影响从其语言上也反映出来："chintz"（印花棉布）、"calicoe"（印花衣服）、"dungaree"（粗棉布）、"khaki"（卡其布）、"pyjama"（宽松裤）、"sash"（细薄棉布）以及"shawl"（披肩），这些都是印度语的词汇。[37]

总之，直到18世纪末印度都比主要的欧洲国家具有更加集约和粗放的经济力量，这就揭示了印度的东方专制主义和孤立主义只是一种神话，欧洲时代的曙光尚未到来。

东南亚是一个附属物吗？

在西方的主流历史篇章中，欧洲中心论把东南亚缩小为马六甲海峡，然后又把马六甲缩小为一种"附录"，或是不起眼的脚注。这原因部分是由于马六甲仅仅被当作欧洲和中国之间所谓"主流贸易"的一个转运点或中转站，部分是由于马六甲在1511年后受葡萄牙人的统治，1641年后又处于荷兰人的统治下。这就模糊了这一地区卷入贸易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初的事实，[38] 同样也模糊了7世纪至13世纪之间，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朝在全球经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如第2章所谈到的）。仅仅追溯马六甲在1511年之后的相关历史是不正确的，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早在一个世纪前中国的郑和远航，刺激了马六甲和东南亚的贸易。[39] 随后马六甲取代了爪哇，成为印度尼西亚贸易的重要中心，把其贸易联系扩张到了印度的古吉拉特、塔哈布尔、孟加拉以及科罗曼德尔，还有中国和琉球，并远至波斯、奥斯曼帝国和地中海沿岸。最后，把马六甲描述成一个欧洲"前哨基地"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如第7章所详细叙述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完全不能垄断东南亚的贸易。

欧洲中心论对东南亚贸易的忽视，像其对印度贸易的否认一样，主要基于两个理由：第一，把东南亚的贸易说成是仅仅由小"商贩"来经营；第二，贸易仅限于一些"奢侈品"，因而数量不大。第一种欧洲中心论观点因奈克霍达斯（nakhodas）的存在否定了，这是一些大规模的相当富有的平底帆船船主，他们大多数是爪哇人和对外贸易的主要承运者。

可以证实的一点是，东南亚货船平均的排水量高达500吨，但由奈克霍达斯装运的最大的货船满载时达到了1000吨（所有这些都超过了欧洲船只的货物装载量）。谈到印度尼西亚的贸易，梅林克-罗洛夫茨（Meilink-Roelofsz）[①]指出：

> 显然……这种大规模的贸易……不能被称为小摊小贩的贸易。相反，它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模式，既有数量庞大的大宗散货，如粮食和纺织品，也间或运载数量较小的……贵重商品或者廉价商品。[40]

接下来我们转向第二个观点。我们所熟悉的认为奢侈品主导着东南亚贸易的欧洲中心论，显然是建立在过分强调香料贸易的基础上，或许因为它是由欧洲人所主导的。但事实上，香料只是东南亚一种贸易量不大的商品。[41] 而大宗散货（包括大米、食盐、腌制的干鱼和棕榈酒），以及廉价的纺织品和金属器皿，“这些都占据了穿梭于巽他群岛浅海平静水域上的货船更大的空间”。[42]

日本东方专制主义和孤立主义的神话：日本是“先发国家”，公元1600—1868年

1868年后经历了工业化（暂且不说二战后的“经济奇迹”）的日本无疑被认为是个例外，甚至连欧洲中心论者也不得不承认。但对许多此类学者来说，日本作为一个例外，验证了欧洲中心论的准则。[43] 日本条款包括了两个重要观点。第一，明治时期的日本只是在1868年后才开始工业化，因为它是1853年在美国舰队司令佩里的强力逼迫下放弃国际孤立政策的。西方的影响被视为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听任其自己发展，落后的日本经济将会因其处于德川时代（1603—1868）的东方专制主义统治下而凋敝不堪。第二，日本验证了欧洲中心论的准则，是因为它在1868年后

①荷兰史学家（1905—1988）。——译者

成功的工业化，被说成是模仿或照搬西方模式（与“后发”战略一致）。的确，把日本的工业化时期设定在1868年之后，对于欧洲为中心论的证据至关重要，因为通过限定这样一个时期，日本就成为一个“后发国家”（假定所有的欧洲国家，包括俄罗斯，在1868年之前就开始了他们的工业化进程）。此外，欧洲中心论者常常把1868年之后日本工业的快速发展，解释为日本吸收西方思想的速度，或者是日本社会结构与英国类似程度（“东方的英国”理论）所起的作用。[44]

通过这些方式，日本案例为西方模式的优越性提供了可信的证据，由此也证实了沃尔特·罗斯托所提出的著名的欧洲中心论假设：只要采纳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所有落后的国家都可以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45] 我在此部分批判性地回顾了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并提出了一种修正的日本是“先发国家”的描述。这就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关于“先发国家”只能在欧洲诞生，而东方没有能力开创自身发展的假设。

这一切在日本是如何开始的？ 德川时代（1603—1868）日本的经济动力

过去，关于明治时代以前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主义证据很少，人们常常简单地认为，由于东方专制主义的作用，日本经济在德川时代是落后和停滞的。甚至一些日本学者也一致认为，德川时代的日本是落后的、封建的农业经济。然而，这里有一个直接的详细的证据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1868年后明治时期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简单地一蹴而就，似乎也难以想象：日本经济在某一刻（1853年之前）还是停滞不前，然后接下来就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之一。近年来的研究（常常进行地非常仔细）提出了一种关于德川时代日本经济动力的新图景，这使人们相信，用埃里克·琼斯的话来说，就是：“明治时代日本经济相对轻松取得的成就，应归功于德川时代赐予的良好开端。”[46]

埃里克·琼斯在其《循环增长》一书中提出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德川时代日本的人均收入增长（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指标）。另外一些学者

认为，日本在德川时代的后半期实现了人均收入增长。[47] 而且，如前所述，有证据表明，日本在1868年之前享有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实际工资和收入都在不断增长。[48] 同样，传统的观点认为，德川时代日本的农业产量增长非常缓慢，但现在很明显，有关日本粮食产出的传统数据，带有保守估计的偏见。最近的研究显示，德川时代即使不是整个时期也是大部分时期，都有着相当高的农业生产增长率。[49] 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应归功于一系列的创新，包括商业性肥料、作物种类的增多（尤其是大米品种），灌溉的广泛使用以及旱地向稻田的改造，越来越多地使用专业化分工（例如不局限于培育非经济性农作物）、种子的选择、复合播种和其他各种农业技术。[50]

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日本旧的封建堡垒——大名（贵族）和武士（军事诸侯）只是在明治时期才被逐渐削弱了。但实际上，这仅仅是肇始于德川统治时期一系列政策的一个端点，这些政策使这一端点成为某种既成事实。大名和武士的权力基础，早在17世纪前半期就开始被削弱，大名被迫居住在都城（江户），统治者意在通过使他们陷入巨额的个人债务而削弱其权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策略效法了欧洲统治者在着手推行国家集权政策时的做法。[51] 这些政策成功削弱了大名的地方自治权，同时也削弱了封建主义。[52] 实际上，到德川时代末期，地方大名负债如此沉重，以至于他们大多数人十分乐意明治政府没收其土地（条件是他们的债务被予以免除）。总之，明治时期的改革只不过是始于德川时代漫长的“理性的”政权改造过程的终结。

德川政权也试图通过强迫武士居住在城堡里来削弱他们的权力。反过来，这些城镇的快速发展有着重要的商业扩张效应，维持这些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生活的需要，从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到19世纪初，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几乎完全消失，市场经济甚至渗透到了最小的乡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武士从小农阶层中分离出来的结果，从而导致了农民家庭单位的充分巩固。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自由直接促进了他们去提高生产，尤其是政府也推动他们这样去做。他们还阅读最新的农业书籍（如1697年印刷的《农业全书》）来增加他们的知识，并开始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生

产。通过扩大灌溉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提高生产力水平，加快了经济的商业化。这一点可以通过事实证明，到1800年时，差不多有22%的日本人口居住在城市——这一数字无疑超过了欧洲。[53] 最后，德川政权发行的国家货币也具有刺激作用，因为它迫使地方大名为了获得新货币而销售他们的商品（在此之前大名是自己铸造货币）。这就为商业化和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形成起到了进一步的促进作用。

总之，国家的集权化趋势，伴随着商业化和生产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日本在1868年前是一个落后的封建社会的传统印象，并不符合实际。最终的结果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官僚政治）权力结构……表明其具有内聚性和灵活性，从而足以确保在第二次与西方撞击（1853）之后，[54] 日本能够迅速实现向新的国家建构战略转变”。此外，这一日益合理化、集权化的官僚机构，推翻了欧洲中心主义关于德川时代日本东方专制主义的描述。尤其是埃里克·琼斯，详细阐述了德川政权实行的各种“合理”的经济政策，他认为与那时西方实施的经济政策同样具有理性。[55] 那么让我们考察一下在德川时代出现的各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吧。

为了扶持日本商业的快速发展，17世纪30年代在大阪出现了信贷机构。17世纪40年代，放款人开始利用这些机构接受存款并发放贷款。到了17世纪70年代，众所周知的是，大阪的十家大金融商被官方授权参与政府的信贷业务，并负责金融市场的运作。而且，这个银行组织具有某种中央银行的特征，保持银行体系的最后储备金，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以及施行某些管理金银市场的职能。如果不首先得到他们的批准，同意遵守他们的规章制度，没有人可以开展银行业务。[56] 这是一个成熟的金融体系，采用了包括存款、预付款项、贴现汇票、支票、透支款项业务、兑换交易、保险和人身保险业务等现代模式。对工业和农业部门都提供贷款。事实上，传统的观点认为，农村地区不会存在银行机构，而唯一存在于那里的贷款者只是不确定的放款人，而不是银行，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最近的研究表明，至少在19世纪30年代，日本就出现了完整的农村金融或银行网络。[57]

德川时代金融制度发达状况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明，还在于期货市场的

出现。[58] 值得注意的是，1730年大阪的堂岛（Dojima）出现了日本的第一次期货交易。相比之下，法兰克福和伦敦的期货交易，在1867年和1877年才分别出现。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德川时代建立的商业法律体系，无论在其适用范围还是在公正性（一种“理性”制度的标志）方面都特别成熟。商业交易的熟悉，合同概念、破产概念以及贷款和股本权益之间的区分，都特别令人瞩目。总之，就像苏珊·汉利和科佐·亚马穆拉（Kozo Yamamura）①所总结的：

> 对这些金融制度的描述……会使读者认为任何拥有这种制度的经济一定是高度商业化和非常富裕的。这里重要的是这些制度在缩小交易成本、扩大贸易方面的贡献。[59]

另外一个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在于工业的发达。尽管更为先进的制造业要等到明治时代才出现，但德川时代已经出现了许多“早期工业化”的特征。这些产业包括捕鱼业、纺织业、造纸业、清酒和酱油酿造业、冶铁和其他金属加工、农产品和水产品加工等。[60] 这些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当明治政府成立时，大部分基础已经打好，因而轻松推动了完全的工业化。

日本孤立主义的神话：1639年后对外贸易的延续

像对1434年后中国的分析一样，欧洲中心论学者们强调在17世纪，随着德川政权实行所谓的“锁国”政策，日本从国际贸易中退出，陷入孤立。这一方面被用来证明日本东方专制主义的存在，另一方面来证明日本经济的落后，这样德川时代的日本经济被说成是几乎完全丧失了活力。到了1639年，只有荷兰人和中国人被允许居住在长崎，他们可以从那里进口外国货物，而这样的进出口数量简直是微乎其微。第一个反驳论点（在德川统治时期日本的经济并没有枯竭）在前一部分已经详细叙述。

①当代日裔美国史学家，著有《近代日本的经济成长》等。——译者

关于欧洲中心论观点的第二个问题是，他们误解了日本的“锁国”政策，对“closed country”一词过于顾名思义。与1434年后的中国一样，日本在1639年之后，既没有与国际贸易隔绝，也没有去关闭国门。德川政权只是试图去管理或者控制对外贸易。重要的是，德川政权实际上是去维持贸易。然而，在欧洲中心论者看来，这种规制主义或垄断主义的方式，带有“消极的重商主义”意味（尽管欧洲中心论者显然把欧洲重商主义看作是构建民族经济的合理选择）。但这种制度的主要方面，并非为了排斥贸易本身，而是为了消除天主教思想的外来影响（这也是信仰清教的荷兰人比信仰天主教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更受欢迎的原因）。[61] 不管怎么说，欧洲中心论学者们坚持德川时期日本的对外贸易急遽枯竭的观点，是不合逻辑的。

事实上，在17世纪大多数时间里（包括1639年后的时期），日本向亚洲出口的白银数量远远超过了英国、荷兰和葡萄牙向亚洲出口白银的总和（参见第7章）。有意义的是，继池田聪（Satoshi Ikeda）[①]之后，弗兰克指出，对于亚洲尤其是中国来说，日本和欧洲的地位是相似的。日本和欧洲都从亚洲进口制造品，而出口白银作为支付。唯一的区别在于，日本在国内自己生产白银，而欧洲从美洲殖民地掠夺白银。[62] 然而，欧洲中心论者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日本人在1668年完全禁止白银的出口。但最近的研究表明，直到18世纪中期日本都一直在出口白银。而且，日本通过对马岛向朝鲜和中国出口的白银和贵金属的数量，超过了早期由荷兰人和中国人从长崎输送出去的数量。同样重要的是，当白银出口在18世纪中期渐趋枯竭的时候，铜的出口取代了白银出口，且数量巨大、持续很久。正如池田聪在总结其最新研究发现时指出的：“日本出口项目的这一循环，[63] 是德川幕府努力保持贸易价值总额的结果。”[64]

更深入的证据表明，1639年日本宣布“锁国”之后，其贸易仍在继续。[65] 人们常常认为，日本实施了一种进口替代的传统重商主义政策，其目的是建立各种国内工业，比如砂糖和丝织业。但事实上，日本一直到18

①日本史学家，擅长经济史研究。——译者

世纪后期还从中国大量进口丝绸，也经过朝鲜大量进口（超过了从长崎入口的数量）。尽管在18世纪生丝被禁止进口，但直到德川时代末年，日本都在从中国和东南亚进口丝绸。同样，尽管19世纪前半期日本国内的砂糖生产很发达，但在那之前，甚至之后，日本都是大量进口。继续从中国进口砂糖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同中国的贸易关系。

人们所熟悉的那种认为只有荷兰和中国被准许与日本进行贸易的欧洲中心论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事实上，日本与暹罗、朝鲜，尤其是琉球之间继续保持着大量的贸易往来（这些贸易事实上得到了德川政权的授权）。这与日本从1557年开始被逐出中国朝贡体系，建立了自己的朝贡体系有关。朝鲜是唯一一个被视为平等的国家，琉球被视为其藩属，荷兰更是如此（参见第7章）。日本商人们进行大规模的民间私人贸易，包括走私——这一局面是1434年后中国发展的重复。而且，像1434年后的中国同行一样，许多日本商人在1639年后移居到东南亚的许多地区，目的是继续开展贸易活动（今天日本跨国公司的海外迁移正是这一进程的结果）。特别是日本与中国两国私商在南中国海港口进行的贸易十分活跃。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日本的“锁国”政策实际上不是为了限制与外部世界的贸易，而只是为了限制与欧洲天主教国家的贸易。就上述两个目的而言，日本的这一政策显然是非常成功的。总之，欧洲中心论通常认为，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在1853年之后打开了封闭的日本国门，将其引入世界贸易，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因为在那之前日本已经向全球商业敞开了国门。

显然，德川时代日本并非实行抑制经济增长的东方专制主义。要指出的关键一点是，1868年后日本取得令人注目的经济增长率，并非1853年后西方的动力和观念突然冲击日本的奇迹般的结果。早在德川时代，日本已经在政府形态、资本主义制度建构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安格斯·麦迪森在此提出了一个讽刺性的论断，他推算出1820年日本的国民收入，足以使其在欧洲的GDP排次表中居于相当乐观的位置。[66]

最后，我不赞同欧洲中心论认为明治时期日本只是因为其模仿西方而获得成功的观点。但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的研究表明，明治时期工业化的

推动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希望抗衡中国商人，而不是欧洲商人在这一地区的优势。[67] 如果这一论断成立，那么就表明，不仅有另外一种动力在推动着明治时期的工业化，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日本可能在没有西方侵入的情况下，已经启动了完整的工业化计划。再者，德川时代日本社会取得的诸多进步，表明其有能力自然地演进到资本主义社会。[68]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信，日本在1853年或1868年之前的发展不仅相当大，而且除了受到“兰学”（rangaku）或“番乐”（bangaku）（从荷兰人那里学来的野蛮人的知识）些许的西方影响外，主要是独立取得的。

第二部分

落后的西方：东方全球化和基督教国家的建立，公元 500—1498 年

第5章

基督教国家的建立和欧洲封建制度的东方起源，约公元500—1000年

对阿拉伯人来说……西欧是一个很少能引起他们兴趣的地方。虽然他们的地理知识在公元700年至1000年间不断提高，但对欧洲的了解却一点没有增加。阿拉伯的地理学家对欧洲不感兴趣，不是因为存在一种敌视的态度，而是因为那时的欧洲没有能够提供任何产生兴趣的地方。

卡罗·奇波拉（Carlo Cipolla）[①]

我的《西方的兴起》一书在方法论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它对世界体系的出现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过多关注于文明的概念，不能对最初出现的跨文明进程给予它应有的同等关注，这是我的失误。

威廉·麦克尼尔

本章将对1500年前东方全球化的存在（如本书第一部分所阐述的那样）进行论证。不仅是因为如果没有各种东方先进的“资源组合”的传播，

①意大利经济史学家（1922—2000），著有《欧洲早期扩张时代的武器与帆船（1400—1700）》及《欧洲经济史》等。——译者

封建欧洲的兴起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这一时期也的确出现了特别剧烈的全球流动浪潮。但欧洲不是一个简单的——而且它也从未把自己曾经作为——全球技术、思想、资源传播中的“被动受益者”。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创造了自身的历史(通过其身份的形成过程)。本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东方的思想和技术的扩散是如何导致了中世纪的农业革命。第二部分考察了形成封建政治和社会等级制度的全球力量(其中最根本的是经济因素)。第三部分考察了欧洲身份形成的全球背景。这很重要，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天主教促进了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巩固和完善。

欧洲封建经济兴起中的全球和东方作用

我打算对中世纪农业革命中的经济技术问题予以简要概述，这样做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等级、政治和道德背景对于封建欧洲的兴起更为重要。第二，公元1000年后西方崛起的发展史，更多强调的是商业和原始资本主义的兴起（我将在第6章中对此进行详述）。

中世纪农业革命中的基本技术因素

大多数经济史学家认为，一系列新的农业技术共同促进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兴起。这些新技术包括水车和风车、重型铧式犁（Mouldboard plough）、新的牲畜挽具以及马蹄铁，[1] 其中重型犁的出现尤其重要。在7世纪以前，欧洲人使用的是地中海浅耕犁（scratch plough）。在南欧干旱的气候条件下，这种犁在粉碎干燥的土壤从而防止水分蒸发方面，是很有效的。但是在西北欧它是没有用的，那里土壤湿润，使用这种犁就意味着排水问题无法解决。因此，这一地区的农业就不发达。而重型铧式犁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因为它可以形成排水的犁沟。

但是，这种新型犁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这些问题在它能够被顺利应用前必须解决。首先，由于木制模板和车轮的功效低，造成了巨大的摩擦力，这就需要一群耕牛（常常是同时需要四头）来拖拉。而耕牛速度慢，效率不高，并且还代价昂贵。所以很多时候农民使用马，马更

强壮些，只需数量较少的马就可以来拉犁。但使用马匹首先有两个障碍：一是马具的问题，二是需要保护马蹄以防（在湿土中）肿胀。传统的耕牛挽具（或“喉—肚带挽具”）被系在牲畜的腹部和颈部，效率特别低，这是因为如果负荷过重它会导致牲畜窒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使用一种新型的马颈轭挽具，它系在马匹的身上而不是颈部。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使得马匹的牵引力增加了四至五倍。但是，如果马蹄得不到保护的话，马是不能在湿土中耕作的，因为湿气会导致马蹄腐烂。只有在使用了钉固的马蹄铁以后，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这样，到了大约10或11世纪，新的马颈轭挽具和钉固的马蹄铁使得重型犁的使用遍及欧洲。最后，完成这一曲折进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则是水车和风车的作用（我将在第6章对其起源进行探讨）。

欧洲封建经济的东方起源

欧洲中心主义认为欧洲完全是自我开拓发展的，与这种基本观点相反，我所要指出的是，一些主要的技术突破是在欧洲之外发生，然后通过东方的全球化进行传播，欧洲所做的就是吸收这些发明创造。这是如何发生的呢？正如前文所述，最重大的突破是重型铧式犁的发明。我们知道，早在公元初年之前，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地区就在普遍使用浅耕犁。但这跟笨重的翻转犁（turn plough）几乎没有任何关系。遗憾的是，没有人能够确定它的起源。这一点在人们浏览有关中世纪农业革命的书籍时就可了解，“这种犁可能首先出现在……”之类的词句随处可见。历史学家们通常只是表示这种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对它的起源地则一笔带过。在某种程度上，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们通常认为是斯拉夫人在公元568年前后首先发明了这种犁。但是，林恩·怀特在这里提供了一条线索：这种犁不是由他们发明的，而是从“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传给斯拉夫人的。[2] 我们所知道的是，斯拉夫人只是在567年阿瓦尔人入侵之后才开始使用这种重型犁的（阿瓦尔人是公元552年至565年之间，在蒙古和阿尔泰山地区形成了突厥联盟之后，逃出西伯利亚大草原的“难民”），这看起来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巧

合。遗憾的是，纵观关于这一问题的大量文献，都没能提供有关这种犁的东方或西方起源的答案。

那么马蹄铁和马颈轭挽具呢？虽然马蹄铁发明的确切时间还不清楚，但有诸多详尽的证据表明，至少在5世纪时匈奴人就曾使用过。[3] 重要的是，罗马人没有使用过。大约是在9世纪晚期从东方（或者西伯利亚）传到了东欧，9世纪末传入拜占廷，之后又从那里传入落后的欧洲。[4] 马颈轭挽具显然是在3世纪由中国人发明的，可能是由最初勒在马胸部的胸挽（或“绳具”）演化而来的，这种马具是公元前100年由中国汉朝发明的。甚至这种“绳具”都比西方的“喉—肚带挽具”要有效的多。故一位学者对此评论道：“与希腊或罗马的马车相比，汉朝的四轮战车堪称是公共汽车了。”[5] 所以

> 当埃及、希腊或罗马马车通常以最小的体积出现，最多仅能容纳两人……而通常由四匹马拉车的时候，中国的马车却常常可以乘坐六人……普遍装有牢固的向上弯拱的车顶……而且通常仅用一匹马来拉车。[6]

很明显，马颈轭挽具是直接从中国传来的。[7]

当我们把风车和水车的东方起源（见第6章）这一点和上述观点加在一起，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欧洲中世纪的农业革命不是“纯粹的西方发明”，而是主要通过各种东方技术的全球传播来帮助完成的。但如果我们就此停留，我们将会以欧洲封建制度夸大了经济技术的重要性这样的一种叙述而告终。然而，另外还有一系列其他更重要的因素，下面我将予以阐述。

封建制度中的军事和阶级因素：东方背景

经济从来不仅仅只是一种经济技术的集合体。欧洲封建经济植根于社会阶级和政治—军事体系中，后者则植根于道德和规范结构中。到8世纪

时，一种新式的战术已经出现（冲击骑兵），这在封建国家和经济制度结构的建立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依赖于先前马镫的发明。[8] 在马镫发明之前，马在战斗中的效率是很低的，因为骑士没有可以使他们安全固定在马上的东西。因此，骑士只能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投掷枪矛。而马镫能使骑马者借助马的力量完成投掷任务。通过这种方式，人的体力被更具优势的动物力量所替代，使得冲击骑兵能够非常容易地向前冲锋，如同一辆公共汽车扫荡步兵方阵。

欧洲中心论者通常把马镫的发明归功于733年的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①，但显然马镫的基本原理——骑士只是将其脚尖置于其中的方法，首先出现在印度（在公元前2世纪末）。到公元100年，在印度北部（那里的天气寒冷，因此骑士们难以光脚骑马），就用钩子来钩住穿靴的双脚，这样特别危险，因为它们会拖拽住坠马的骑士。这里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中国在3世纪时发明的用青铜和铸铁制成的马镫。到477年时，它已经在中国普遍使用。[9] 后来通过丝绸之路从中国传到了中亚，大概在7世纪末传到了波斯。尤其是蠕蠕部落（Juan-Juan）（著名的阿瓦尔人②）在被迫向西迁移到多瑙河和蒂萨河时，这种马镫同时也得到了传播。到694年，在这种发明经过维京海盗和伦巴底人最终向西传播之前，阿拉伯人制成了铁马镫。[10] 因此，通常所持查理·马特733年前后发明非常重要的马镫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然而，有人可能会认为，即使马特没有发明马镫，也确实是新型冲击骑兵的创始者。认为马特是“欧洲”背景下的重要发明者似乎是合理的，但事实上却是波斯人（还有拜占廷人）首先发明了马上冲击骑兵。不久，阿拉伯穆斯林在他们与波斯人的战争中也掌握了这种骑兵战术。而且在约公元640年后的一段时期（大约是马特“发明”之前的一个世纪），这种冲击骑兵成为了伊斯兰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冲击骑兵战术是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之初的某个时候，由亚述人首先使用的（尽管那

①法兰克王国宫相，丕平二世的私生子，查理大帝的祖父（676—741），被认为制止了回教帝国对欧洲的入侵并拯救了欧洲天主教信仰。——译者

②古代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之一，他们约在6世纪时迁徙到欧洲中部和东部。——译者

时的骑兵是射箭的，而且没有马镫）。同样有趣的是，即使不是意义特别重大，与中世纪欧洲相关的许多武器，如长弓、重头棍棒、长矛，都首先出现在中东。[11] 此外，伊斯兰军队很多世纪以来都在使用的优越军事技术，其中许多都被欧洲人照搬或吸收（见第8章）。很明显，马特既没有发明马镫，也没有发明冲击骑兵战术。

那么冲击骑兵是如何导致封建政治制度崛起的呢？以骑兵为基础的新型战术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其高昂的费用，因此就需要建立一种能够从农民身上榨取，或者剥削农业剩余的经济。于是，国王就把附着有农民的土地赐给骑士（或封臣），他们可以任意剥削农民。通过这种方式，产生了一个强大的贵族阶级，并巩固了他们对农民的权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时也巩固了他们对国王的权力。这样，封建制度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就诞生了。但是，所有这些是否是对欧洲内部出现的军事问题的一种反应，抑或存在一种重要的全球因素？

亚洲剧烈的移民浪潮使欧洲面临大量的军事挑战。再者，欧洲内部也存在着多种形式的移民，反过来，这种转移也是各种东方民族的到来造成的结果。首先是在公元370年，为了远离中国，逃避军事战乱，匈奴人逃出了亚洲。他们戏剧性地侵入了欧洲，造成了日耳曼人在整个欧洲以及向欧洲之外的大规模迁徙。东哥特人占领了意大利；西哥特人占领了西班牙（直到711年）；法兰克人占领了高卢；盎格鲁和撒克逊人占领了英格兰。567年，阿瓦尔人侵入了欧洲，并试图掠夺尽可能多的土地，尤其是把匈牙利作为目标，消灭了格皮德（Gepid）部落①，迫使伦巴第人南逃。他们的侵略一直延续到下一个世纪。麦克尼尔谈到：

> 这些侵略引起了两个持久的种族变化：伦巴第人占领了意大利（568年），他们反过来把拜占廷人从半岛上驱逐出去；巴尔干半岛上说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农民，退到了山区和沿海的避难地。斯拉夫人占领了他们的土地，靠一种原始的游牧方式的农业维持生计。[12]

① 日耳曼人部落之一。——译者

9世纪时，神圣罗马帝国（开创于800年，查理大帝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出现分裂。这一分裂发生的时间，恰逢另一次全球移民涌入欧洲的浪潮。来自南方的穆斯林从他们的北非居住地侵入欧洲，随后在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定居下来，甚至在846年时洗劫了罗马。更重要的是（尽管从文化角度来看不是很重要），马扎尔人从东部地区侵入，并占领了现在的匈牙利，给欧洲大部分地区造成了灾难。他们还袭击了今天的荷兰、法国南部和德国。同时，欧洲内部的各种维京海盗（北欧人）的入侵也伴随其中。结果，所有这些移民（大多数是东方人），造成了欧洲的种族构成沿着新的边界重新塑造。

所有这些是如何与封建政治制度的建立联系起来的呢？现在我们知道封建政治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从东方传入的新技术（主要是马镫）的结果，它也是公元370至约1000年之间，从东方横扫整个欧洲的诸多全球军事挑战的结果。但同样重要的是，政治军事制度和封建等级结构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贵族们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统治农民的权力，他们能够榨取农民的剩余用来支付战争费用，而且贵族们不用太费力气来巩固他们对农民和君主的控制。通常被称作“采邑”的社会契约尤为重要。与早期作为贵族和君主之间达成的终身契约“benefice”（圣俸，封地）不同，“采邑”是世袭制，从而一方面保证了贵族的血统，另一方面又赋予了他们巨大的凌驾于君主之上的权力。因此，统治权在封建领地（庄园或村社）的层面上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贵族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权力。[13]

总之，封建制度是由技术、种族、等级、军事、政治力量组成的一种复杂的混合体，而且每个方面都存在一种重要的全球或东方的因素。但是，在我们结束对西欧中世纪农业经济兴起的讨论之前，一个更深层次的因素必须予以探讨。一旦到约1000年时面临的军事挑战开始减弱，中心问题便开始转变为有关经济合法化的需要，因为它是由贵族和农民之间极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构成的。因此，一旦和平重返，贵族以向农民提供军事保护而对其进行剥削的理由便不再合情合理，这种制度就不可避免地丧失其合法性。那么就必须把对农民的剥削变得似乎是“正常的”，这与欧洲身份的塑造或形成的过程密切联系起来。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全球背景下基督教国家身份的构建

制造或发明“伊斯兰威胁”

身份的形成过程既简单又复杂，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它的简单源于“自我”（例如“自我”被定义为“我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欧洲并非一个和谐的整体，而是有着很深的内部矛盾，这种矛盾主要存在于：农民和贵族之间，贵族和君主之间，君主和僧侣之间，君主和教皇之间，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14] 因此没有内在的同质性。构建一种单一身份的唯一方法就是塑造一个外在的“他者”，后者与建立一种“同质”的“自我”相对立。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单一的“自我”，那就比较容易用它不是什么来定义“自我”。必须指出的是，“自我”和“他者”仅仅是一种象征或者诠释，建立在我们如何去区别“我们”和“他们”的基础上。在中世纪的大背景下，“自我”代表所有那些美好和正义的东西，而“他者”则被塑造成邪恶或是令人厌恶的对立物。因此，首要任务就是去发现并塑造一个虚构的“他者”。但是选择谁呢？因为基督教主教们成为构建欧洲身份的关键角色，他们将伊斯兰教作为合适的候选者。但是伊斯兰教必须被塑造成不仅邪恶而且是一种威胁，这样欧洲人才能合力反对它。马可西米·罗迪逊颇有见地指出，“远在其成为一种问题之前，穆斯林就被当作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了”。[15]

那么伊斯兰世界是如何成为一种邪恶的威胁的呢？首先，尽管有些夸张，但伊斯兰教的兴起对于欧洲的神化缔造者来说无疑是一种福音。伊斯兰教立刻被基督教徒指责为一种盲目崇拜的异教（尽管两种宗教有着很多重要的相似之处），并援引诺亚和他三个儿子《创世纪》的故事使这些合法化。重要的是，雅弗（Japheth）被授予注定要得到扩大的“基督教欧洲”；闪（Shem）被赋予了“由异教徒（如不信教者）居住”的亚洲，这些人注定要被雅弗所同化。这对于确保基督教的权力掮客把整个伊斯兰教，尤其是穆罕默德，描述成为异教邪恶的化身特别有利，事实上，教皇英诺森三世就把他描述成“启示录之叛逆”。[16]

在但丁所作《神曲》的《地狱篇》中，对穆罕默德的指责达到了极致。作者在书中描述了地狱的深度(有九层之深)，一个人一生中罪恶越多，被判处的层数就会越深。令人吃惊的是，在地狱的第八层，差不多是在最底层，但丁遇到了穆罕默德。在穆罕默德之下的仅是那些世人皆知的最为奸诈之徒——臭名昭著的犹大和布鲁图（Marcus Junius Brutus）①，他们是但丁到达撒旦居住的地狱底层之前看到的倒数第二批人。另外，正如爱德华·萨义德在书中相关章节中描述的：

> 穆罕默德所受的惩罚，也是他永恒的宿命，特别令人作呕：从颚部到肛门被分成两半，按但丁所言，就像一个桶的桶板被劈开。在这一点上，但丁的诗歌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毫无那些末世论中有关惩罚的逼真的细节：极为精确地来描述穆罕默德的脏器和排泄物。[17]

然而，有趣的是，但丁反对把伊斯兰哲学家们打发到地狱，因为他受他们的作品影响很大，[18] 因而把他们置于地狱的边缘地带。更为普遍的是，正如卡巴尼（Rana Kabbani）②所指出的："伊斯兰教被认为是反基督教的；穆罕默德是个骗子，邪恶的好色之徒，与魔鬼勾结在一起的基督教的敌人。伊斯兰世界被看作是反欧洲的。"[19]

这一虚构的过程需要巨大的创造性去寻找各种理由。首先，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实际上有着很多相同之处。穆斯林和基督徒都相信一个而且是同一个上帝。尽管穆斯林把穆罕默德而不是耶稣作为上帝的主要先知，但他们也承认耶稣是一个重要的先知。而且重要的是，他们容忍基督徒在他们中间的存在。另外，这两个宗教都吸收了犹太—希腊的历史传统："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都属于闪米特语，它们共同来处理和再加工那些对基督教来说极其重要的素材。"[20]再者，两种宗教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

---

①古罗马政治家、元老院议员（前85—前42），组织并参与了对恺撒的谋杀，而后者对他却信任不疑，直至最后一刻。——译者

②英国学者，著有《欧洲东方神话》，他认为，欧洲关于东方的叙事，不断处心积虑地强调所谓不同于西方的性质，从而将东方置于某种万劫不复的"他者"地位。——译者

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两种宗教之间如此众多的相同点，可以成为基督教世界和中东之间创造和谐关系的桥梁。但最终那些欧洲领袖们为了人为地缔造一种同质的欧洲“自我”，宁愿踏上一条镇压穆斯林教徒的道路。

把伊斯兰教描绘成一种内在威胁的第二种方式，就是建立一种伊斯兰“多米诺理论”。这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是因为伊斯兰教坚持普遍的圣战观念（不过这被有意误解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它也是复杂的——需要相当多的技巧——因为如果穆斯林教徒有过这种愿望的话，他们可能已经侵占了落后的欧洲地区。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当然，这种观点与一般的欧洲中心论观点相悖，后者认为如果不是在英雄的查理·马特的带领下，于公元733年（不是732年）在图尔和普瓦提埃（Poitiers）击败了穆斯林的“入侵”，那么欧洲就会惨遭蹂躏了。正如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所言：

> 如果事情是这样发生的，那么或许牛津学派现在所讲授的将是《古兰经》的解释，布道的牧师将会向一个行割礼的人展示穆罕默德的圣洁与真诚，通过一个人的天赋和运气把基督教世界从这些灾难中拯救过来。[21]

但在这一时期的穆斯林历史中，图尔、普瓦提埃战役以及查理·马特这个人物都没有被提及。而更多的重点放在了阿拉伯人在君士坦丁堡之战（718）的失败上。事实上，并不是马特的突击骑兵击败了穆斯林，而是他设法把所谓的侵略者引诱到一个要塞，在那里他的军队用密集的箭矢和投枪对入侵者进行了攻击。而最重要的是，这并非“伊斯兰教徒的入侵”，而是一小队以小规模劫掠为目的袭击者（其目标是富庶的圣·马丁）。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①]解释道：

> 毫无疑问，忽略普瓦提埃（和图尔）之战，而强调君士坦丁堡战

①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生于英国，著名史学家，善治伊斯兰史及中东史。——译者

> 役，说明穆斯林历史学家比后来的西方历史学家从更真实的视角来看待历史事件。普瓦提埃战役的法兰克胜利者，遇到的只是为数不多远离故土数千英里、在遥远的异邦作战的（伊斯兰）入侵者……是阿拉伯军队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失败，而不是小股阿拉伯袭击者在图尔和普瓦提埃的失败，使得东方和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幸存下来。[22]

因此，尽管穆斯林占领了“西欧”许多地区——最突出的就是西班牙和西西里岛——而事实上他们对继续扩张并不感兴趣。原因很简单：西欧十分落后，穆斯林对它们没有什么兴趣。相比之下，拜占廷则更为强大，也更有吸引力。正如马可·布洛克（Marc Bloch）①颇有见地的话，“在西欧所有的敌人中，伊斯兰世界实际上是最不具威胁性的……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高卢和意大利那些贫穷的城市，根本无法与繁华的巴格达或科尔多瓦相比”。[23] 事实上，一波波涌入欧洲的移民浪潮所造成的灾难，远比零星出现的几股伊斯兰侵入者所造成的破坏严重得多。但重要的是，欧洲的那些神话制造者选择了夸大伊斯兰的“世界威胁”，目的是为了巩固一种新的作为“真理捍卫者”（譬如基督教）的欧洲身份。

基督教主教们试图构建一种“伊斯兰多米诺理论”。正如1947年后美国发明的多米诺理论，是与必须加以遏制的“苏联威胁”的发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同样，中世纪的基督教主教们认为，作为一个反对所谓的世界性“伊斯兰威胁”的“遏制堡垒”，欧洲的巩固和加强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伊兰斯主教（909年在特鲁斯里）诸如此类的宣言曾一贯被发表：

> 你们看吧，呈现在你们面前的是上帝在咆哮……四处是城垣坍颓，民众流离失所，修道院被夷为平地，或被付之灰烬，田园荒废……到处是以强凌弱，人们犹如大海里的鱼类肆意自相残杀。[24]

---

①法国著名史学家（1886—1944），专治中世纪法国史，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德国占领期间，因其犹太人血统以及投身法国抵抗运动，遭盖世太保枪杀。——译者

这种遏制战略在1095至1291年间进行的“第一轮”十字军东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确如马可西米·罗迪逊所言：

> 正如一些学者坚持的那样，伊斯兰的形象不仅仅是从十字军东征开始绘制的，而是来自拉丁基督教世界逐渐演化的意识形态统一体。这就产生了一种更加鲜明的敌人的特征和形象，从而使西方把精力都集中在十字军东征上。[25]

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贵族们对教皇乌尔班二世召集“基督骑士”鼓噪的反应，真正激励他们的是，他们知道如果战死，就将成为基督教殉难者，将被慷慨地赐予通往天堂的特许状。[26]

构建基督教世界

这样，虽然把伊斯兰塑造成了“邪恶的威胁”，但仍然需要为落后的欧洲构建一种身份。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实体应该存在于一个定义明确的地理空间，那么就没有欧洲这种说法。欧洲并非什么与生俱来，欧洲一直是一种概念——某种随着时间变迁不断被塑造和再塑造的东西（如我们将要在本书中所看到的那样）。而且它不是作为一种不断变化中的地理环境或疆界的科学、客观的角色来定义和再定义，而是根据一种道德上的定义，不时重新划分构成“欧洲”的诸单元的地理边界，这样一种道德定义建立在“欧洲人”愿意如何想象自己的基础上。那么，欧洲是如何塑造与伊斯兰“他者”相对立的“自我”呢？

这里要指出的第一点是，这种“自我”是在全球大背景下形成的。欧洲逐渐被认同为“基督教世界”，是由于其身份被想象或构建成天主教的信徒，以有别于伊斯兰中东国家。这成为欧洲身份形成过程的第一阶段的标志，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6世纪（尽管直到18世纪，还可以找到与“基督教共和体”的联系）。欧洲即基督教世界的观念只是一种“想象”，这从基督教原初是一种东方宗教这一事实上反映出来。把欧洲描述成基督教信仰代表性的发源地或是“捍卫者”，不可避免地需要一些高明的技

巧，以使欧洲和基督教之间的联系看起来是天衣无缝、自然和谐。这里重新引用诺亚三个儿子“创世纪”的故事很重要，因为伊斯兰教被描绘成异教徒的宗教，而雅弗（欧洲）则是基督徒。而且，正如穆迪姆贝（V. Y. Mudimbe）[①]所指出的，“人们不能忘记，自其诞生以后，（欧洲）基督教就把自己当作真正与上帝沟通的唯一途径，以及上帝和上帝威严的唯一正确的形象”。[27] 罗伯特·霍尔顿谈到：

> 基督教起源于中东而不是欧洲，但随后被西方化和欧洲化了。这是如此成功，它在十字军东征中成为“西方文明”反对伊斯兰教的精神支柱。再一次，非西方的进步被当作新兴西方世界内部强大的因素，被当作其自身独特生活方式的一部分。[28]

这样，欧洲被当作基督教的起源，其使命就是在全世界传播其普世的福音，以使那些“异教徒”皈依就范。同样，把欧洲塑造成基督教国家，是为高度不平等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创立规则和合法性的重要前提条件。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创立规则和合法性

将不公正的封建经济和政治结构合法化的新的基督教道德规范，以“三等级法令”或是乔治·杜比（Georges Duby）[②]所谓的“三种职能”而闻名。[29] 这补充并扩展了马可·布洛克和其他学者曾谈到的“上帝的和平”的观念。[30] 这个法令是在11世纪由一群颇有实力的高级教士草拟的，它声称上帝分配给人类三种不同的任务。按照从高到低依次是：祈祷普救众生（牧师和主教）；为保护众生而战（骑士或贵族）；从事劳作、为维持前两个阶层生活提供必需的资源（农民）。而且农民为贵族效劳十分重要，因为后者受命保护神职人员。上述分工是由如下信念支配的：

---

①当代扎伊尔哲学家。——译者

②法国著名史学家（1919—1996），善治中世纪社会经济史，著有《骑士、妇女与教士：法国封建时代的婚姻》《私人生活史》等。——译者

> 这是造物主在天堂和俗世的意志，高的等级将会永远统治低的等级。各个个体、各个等级应该安于现状，恪守职责，安享属于它的福祉和权利……背叛这一规则是一种深重的罪恶。[31]

简言之，农民为贵族和牧师效劳仅仅是上帝的意志。这样，天主教信仰和基督教国家的建立就载负着两种重要的社会功能：第一，缔造一种富有凝聚力的“自我”反对“他者”（断定是伊斯兰）的意识，以确保欧洲内部保持相对一致和协调。第二，如果没有“三等级的法令”，封建经济制度无疑将会崩溃。

这样，神圣的僧侣统治集团就转变成了封建社会特权阶级。另外，鉴于教会和农民都不能进行自我保护，骑士的军事行动和强制性身份被合法规定下来。这些新的道德准则都是最重要的工具，能够确保贵族阶级维持对农民以及世俗君主的控制。我们前面提到了“采邑制”是如何确保贵族家族的世袭血统，以及巩固贵族阶级对君主的控制权。这里，重要的一点是使“采邑制”合法化的因素之一“三等级法令”，新法令确立了对农民重新征收赋税的封建权力（在各种亚洲移民席卷整个欧洲、社会动荡的几个世纪里，这种赋税已经消失）。这种法令得以实施，是通过向农民施加这样一种观念，即如果他们不遵从“上帝的意志”，等待他们的将是来自地狱的诅咒。

最终，这一切使得天主教会垄断了祈祷或者赎罪的途径，它可以把一个信徒送往天堂，同样，也可以通过把一个信徒逐出教会，把他或她送进地狱之门。到13世纪末，但丁对地狱形象的描述是如此可怕，在一般民众看来，违犯基督教的规则意味着命运将比死更恐怖（例如，永远被诅咒）。此外，在一个还没有正式国家成立的年代里，这被证明是一种确保顺从和相对有序的有效手段。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在教会之外是得不到拯救的（“教会之外无救赎”）。[32]教会进入农民的心灵和思想的主要方式，是牧师定期地举行圣礼。并且，通过“三等级法令”，基督教能够把农民和贵族之间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变得非常“自然”。这种做法是如此成

功，以至于农民们连想象另外一种社会秩序都非常困难（这样做就是对圣灵的亵渎）。这样，欧洲身份在一种全球大熔炉的构建下，对中世纪封建制度的重建和巩固至关重要。

结　论

本章揭示的第二个千年初期构成欧洲封建社会的最重要因素，主要是在东方动力的作用下形成的。此外，欧洲集体身份的塑造是在全球大环境下构建的。事实上，“正是欧洲野蛮人与伟大的东方文明之间（传播以及想象）的碰撞，导致了西方文明的诞生”。[33] 但是，这样传达的印象决不是说，欧洲就是被一种封建的农业“自给自足”经济所主导。对于西方兴起的发展史来说，更重要的是约750年以后商业的复苏。同样重要的是所发生的一系列“原始资本主义”的小变革，这方面的历史常常归功于意大利先驱者的“天才”。但正如第6章所述，意大利人并非欧洲中心主义所认为的富有创造性的资本主义先驱，因为与更为先进的东方相比，意大利的确望尘莫及。

第6章

意大利开创者的神话，公元1000—1492年

威尼斯人、比萨人以及热那亚人都曾光顾过这里，有时作为侵略者……有时作为旅行者，试图用他们携带的货物征服伊斯兰世界……现在他们不再带来货物了，他们带到我们领土上的是作战武器和战争，给予我们的是其制造或继承的精挑细选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和他们建立了联系，缔结了协定）他们的所作所为总是与我们背道而驰。

萨拉丁·阿尤比[①]，1174年

谁成为马六甲的主人，谁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

托姆·皮雷斯[②]

11世纪中国大规模市场经济的兴起，有足够的能力改变世界的平衡，以一种极其重要的方式背离管制，转向市场行为……随着中国技术秘方向国外的传播，旧世界的其他地方展现出新的潜力，以西欧最为突出。

威廉·麦克尼尔

---

①埃及阿尤布王朝的第一位君主，1174—1193年在位，抗击十字军的著名领袖。——译者

② 1517年葡萄牙派到明帝国的第一位特使，亦译为“道咪卑利士”。——译者

欧洲中心论者特别强调“公元1000年后”的商业革命（尽管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见，这场经济复兴实际上是从750年后开始的）、航海革命和金融革命。他们认为所有这些成就的背后，乃是富有开拓精神的意大利开创者的智慧。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直到今天，人们不能找到任何东西——包括所得税在内，在天才的意大利共和国中没有先例。”[1] 同样，欧洲中心论对1000年后世界“大国”的阐述通常是从威尼斯开始的。[2]

本章认为，“意大利开创者”的形象只是一个神话。意大利的经济力量源于它置身于其中的一种先前已经存在的全球经济，这种全球经济是由主要的东方国家开创并保持下来的（参见第2—4章）。并非意大利人发现了世界，然后改变了世界，而是更为先进的东方世界发现了意大利，并促进了它的兴起和发展。我的中心论点是，事实上，推动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重要创新，都源于更先进的东方，尤其是中东和中国，这些技术创新是随着东方的全球化，通过伊斯兰世界这个桥梁向西方传播的。另外，尽管意大利的确在落后的欧洲次大陆居于领先地位，但它在更大的全球舞台上仍然只是一个小角色，相对于更为发达的中东，尤其是北非的伊斯兰国家和商人来说，它一直扮演着二流角色。

中世纪盛期欧洲制度和技术“革命”的第五要素：东方贸易

欧洲中心论历史学家根据自给自足或自主地区的经济或文明的程度，断定欧洲的兴起是在公元1000年后。尤其是认为城市是“独立的”：“中世纪的城市……犹如一块巨大生面团中的酵母，促进了欧洲的兴起”。[3] 在传统的论述中，欧洲的城镇是以近乎魔术般的数量在增长。因为随着370年至1000年间对欧洲造成极大破坏的内部分裂的结束，随之出现的内部秩序的稳定，无疑确保了欧洲城镇和商业的发展。这种观点建立在欧洲人具有内在的经济理性的假设之上，即在适当的条件下（如和平、保守和自由放任的政府），他将必然去从事自己最擅长的事业——比如贸易。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交换、交易和以物易物是人的本性”。[4] 下面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的一个假设：“西方的自由”使资本主义或商业得到发展，这类

似于常见的中世纪习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Stadt Luft Macht Frei）或“西方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Westen Stadt Luft Macht Frei)。

欧洲中心论论述中尤其让人困惑的是大量使用了“远距离贸易”概念：欧洲位于这种贸易网络的一端，而另一端居于何方一直不明晰。通常被忽略的是，东方不仅位于这一贸易网络的另一端，而且在欧洲自身贸易兴起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欧洲贸易只是由于东方商品经过意大利传入欧洲才最终成为可能。其次，各种东方的“资源组合”——思想、制度、技术的流动——主要是沿着全球经济的商业通道，从中东和中国传到意大利和欧洲的（尽管有些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学习到的）。然而，这并不是说，意大利对于欧洲的商业、金融和生产的命运不重要。事实上它非常重要，但这仅仅是因为意大利是东方“资源”（不仅仅是贸易）进入并重塑欧洲的重要渠道之一。

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见，从8世纪晚期开始，意大利就与各个全球经济的次体系联系在一起，联结欧、亚、非三洲。这就赋予意大利独一无二的优势。由于我在第2章中已经对此进行了详细讨论，这里我仅指出一点就是，正是意大利直接进入由亚非主导的利润丰厚的全球经济体系，其命运才能得以确立。正如阿布－卢格霍德所说：

> 直接进入富庶的东方，改变了意大利商业航海城市的角色，变被动为主动。12世纪香巴尼定期商品交易会(Champagne Fairs)的复兴，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在十字军东征刺激下对东方商品的高需求，以及由于意大利近于黎凡特（Levant）[①]海岸地区的战略地位，使他们能够增加其输送的货物供应。[5]

威尼斯最终战胜它的对手热那亚，不是因为它所谓的创造性，而是因为它经埃及和中东打开了通往东方的富庶之路。布罗代尔通过一系列的反问证实了这一点：

---

①指地中海东部诸国及岛屿，即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在内的自希腊至埃及的地区。

> （威尼斯在欧洲的主导地位）能否解释为它更倾向于和东方建立（传统的）联系，而意大利其他城邦则更为关心西方世界，因而发展缓慢？……威尼斯贸易的生命力在于黎凡特（Levant）的中转贸易。这样，如果威尼斯是一个特殊个案，是否因为它从A到Z的全部商业活动都是由黎凡特支配的？[6]

总之，尽管意大利人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商业化的传播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并非欧洲中心论所描绘的伟大的商业先驱。正如第2章中所指出的，直到约1291年他们都一直依赖于由中东穆斯林人、此后由埃及人所设定的条款和条件。但事实上，最后意大利与中东以及后来的埃及之间的贸易联系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这些商业路线成为诸多重要的东方资源组合向西传播、滋润落后的西方的途径之一。这些资源组合使得各种“意大利人”的经济和航海革命成为可能，他们本来没有理由以此而闻名。

金融革命的东方起源

人们普遍认为，是意大利人开创了一系列的金融制度。据称最重要的创新就是合约经营，是意大利人在约11世纪时发明的。[7] 这是一种契约形式的协议，由投资者向商人的航海贸易提供资金。它不仅通过积聚资本和“劳动交换”的形式来支持国际贸易，而且与股票交易有类似的效果，因为它为储蓄提供了一种市场，从而刺激了经济的发展。然而，“合约经营”是中东发明的。尽管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前伊斯兰教时期，[8] 但它是由早期伊斯兰商人进一步发展而来的。[9] 事实上，正如亚伯拉罕·阿多维奇所指出的，“这种契约的伊斯兰形式是商业协议中最早的范例，与很晚以后欧洲众所周知的‘合约经营’的经济和法律制度完全相同”。[10] 由于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一个“合约经营”商人，这应该不会是“神的启示”。鉴于意大利与阿拉伯贸易体系有着直接的联系，意大利采用这种制度也应该不会令人惊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从8世纪开始伊斯兰就开始把“柯拉德”（qirad，意为“互相借贷”）应用于信贷及手工业，而不仅仅

是贸易领域。[11]

意大利也被错误地认为发明了包括汇票、信贷制度、保险和银行等一系列其他的金融制度。事实上，所有这些制度要么起源于伊斯兰中东，要么起源于前伊斯兰时期的中东，因为“许多商业技术在《古兰经》将其系统化之前就已经牢固确立起来了”。[12]尽管是穆斯林将这些早期的技术进而发扬光大，但苏美尔人和萨珊人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已经使用银行、汇票和支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伊斯兰资本家为了避开高利贷禁令的需要。例如，偿款通常会拖延两个月或更久，目的是通过支付较高的补偿来掩盖高利贷（因而需要这样的制度）。[13]伊斯兰银行家通常俨然如国际货币兑换商，为了赚取利润，银行本身也参与缔结“合约经营”协议，提供预付资金或信贷。银行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把资金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银行家们还发行期票——“即期票据”或异地兑换的汇票，以及与现在的支票类似的支付定单。正如阿布－卢格霍德所谈到的，“在左上角是支付数额（以数字表示），左下角是日期和支付人的姓名”。[14]她同时还指出，即期票据实际上起源于波斯，比欧洲早使用了几个世纪。

最后，人们通常认为是意大利人创立了先进的会计制度。但是各种东方的会计记账方法也很发达，特别是在中东、印度和最为突出的中国。[15]事实上，这些会计制度可能与韦伯著名的西方“复式记账法”一样非常有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直到19世纪晚期单一记账法都是最普遍的方法。[16]正如我们在第8章将要看到的，只是当比萨商人列昂纳多·斐波那契（Leonardo Fibonacci）在1202年传播了东方的知识时，意大利商人才开始使用算术取代老式的算盘。总之，这里我们可以引用杰克·古迪的话来做准确贴切的总结：

> 我们在意大利所发现的，实质上是近东已经存在的各种制度的再生、复兴或者再创造……尽管财政收支平衡账户、商业往来账户、从香巴尼定期商品交易会到更加稳健的银行业务的市场金融、诸如“合约经营”和股份公司这样的商业协会等的出现，对于（后来的）工

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非常重要，但这些在世界其他地区已经出现过。[17]

航海革命的东方起源

航海革命依赖于星盘、罗盘、斜挂大三角帆、船尾方向舵和方形船体（还有将在第7章中讲到的三桅装置和新的航海技术）的使用。斜挂大三角帆，呈三角形状，通过一根长帆桁与桅杆呈45°悬挂，能够随着风向移动。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发明，因为与方形帆不同，它能够使航船根据风向抢风航行。欧洲航海贸易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船的尺寸问题，它限制了货物的大量运输。这里重要的技术改进是船尾方向舵的发明（13世纪），因为它安装在一种平底的或方形的船尾，这可以建造更大的船只，从而增加了货物的容量。波多兰航海图（Portolan charts）对航行来说有着诸多限制，尽管对欧洲内部航行来说已足够，但对远洋航行还是远远不够的。测星盘的发明解决了这个问题（是一种根据星体来测定方位的装置）。另外，罗盘的发明也很重要，因为它即使在阴天也能够使用（如当星体被遮盖的时候）。这直接导致一年的航海期从六个月延长至全年，使航行的次数也增加了一倍。这些技术上的突破使得欧洲人开始走向海洋。但是尽管这些发明是在欧洲获得成功的，但事实上它们绝大多数是在东方诞生的，并都是在东方得到改进和完善的。

星盘首先出现在古希腊，但具体细节不详，史据甚少。然而，正是穆斯林开创了这些重大发明，这或许可以追溯到8世纪中叶的阿尔－法扎里（al-Fazari）①〔而不是间或被提及的“Mashaallah”（阿拉的意愿）〕。到9世纪时，测星盘已经定期生产，到10世纪中叶时经由伊斯兰西班牙传入欧洲。[18] 有趣的是，记载有关星盘的最古老的拉丁文献（来自10世纪末的西班牙北部）显然主要参考的是各种伊斯兰文献，包括阿尔－花拉子密关于星盘的叙述。[19] 但是同样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还有各种伊斯兰天文学家进行的诸多创造性改进，从而使后来的欧洲人能够普遍使用星盘（见第8章）。

①公元8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译者

罗盘在欧洲的首次使用是1185年。但是它不可能是意大利人或是其他欧洲人发明的，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是，在1090年左右它显然已经被运用到中国的船只上。[20] 而且，这也仅仅是一系列中国发明的顶点。这些发明可以追溯到公元83年原始的指南针的发明，甚至可以追溯到更遥远的公元前4世纪一种更加原始的“磁石”指南针的发明。意大利人只是借用了指南针，它是从中国经穆斯林传到落后的欧洲的。[21] 我将在第7章中着重讲述航海技术的发展，这里我先从林恩·怀特所提出的斜挂大三角帆起源于欧洲的观点，开始考察新航海技术的起源。

首先，尽管我们不知道是谁先发明了斜挂大三角帆，但林恩·怀特〔借用了莱诺·卡森（Lionel Casson）①的观点〕坚持认为是由罗马人发明的。这一主张的根据源于两幅装有斜挂三角帆的船的图画（一幅绘于一块2世纪的墓碑之上，另一幅则绘于4世纪的镶嵌图案上）。[22] 第二，尽管怀特承认在6世纪之前，欧洲的大型船只没有安装大斜挂三角帆，但是他指出在大型船只上使用斜挂大三角帆需要大量的试验和设计改进，由此来为自己开释。这意味着在约533年之前的4个世纪里，欧洲人一直致力于斜挂三角帆的进一步改进。[23] 接着怀特提出了两个证据来表明6世纪时欧洲的船只上使用了斜挂三角帆。第一个是在阿尔主教传记里的简短记载。第二个则是朱尔斯·索塔斯对普罗柯比（Procopius）描述的解释，据称后者为533年时三艘大型东罗马船只使用了斜挂三角帆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第三，与其他许多人一样，怀特认为接下来就是约880年斜挂三角帆在地中海出现的例证。第四，怀特认为这项发明是以葡萄牙人的轻快多桅杆小帆船为媒介传给了穆斯林（穆斯林只是在16世纪才首次使用）。[24] 下面我将对这些观点逐一进行反驳（我将把对第一点的反驳放在最后）。

第一，阿尔主教（St Caesarus of Arles）传记〔最先由雅尔（Jal）1848年引用〕中的记载证明欧洲人在6世纪就使用了斜挂三角帆的说法，布林德利（H. H. Brindley）已经提出了质疑。[25] 布林德利认为，想当然地将这三艘小麦船贴上“拉丁”标签，就表示它们已经使用了斜挂大三角帆，

①当代美国史学家，著有《古代埃及》和《古代世界的船只与航海技术》等。——译者

这是值得怀疑的。同样值得怀疑的是索塔斯对普罗柯比观点的解释——533年时查士丁尼大帝舰队的三艘战舰上安装了斜挂大三角帆。普罗柯比实际上表述的是，舰队司令“颁布了一道命令，三艘指挥官乘坐的舰只应该将其帆上角的三分之一涂成红色”。正如理查德·鲍恩(Richard Bowen)所指出的，“索塔斯马上从‘angle(角)’一词推断这三艘舰只安装了大三角帆”。[26]除了整个舰队没有以此种方式装备这一明显的反常事实外，鲍恩同时还指出，“三角帆指的是三角桅帆……似乎更符合逻辑，这是公元50年后罗马方形帆船的标准装置”。另外，三角桅帆是水平而不是垂直安装的，其功能也和斜挂大三角帆不同。

第二，怀特关于公元880年欧洲船只上安装了斜挂大三角帆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按照布林德利的说法，这一著名的草图最初是由雅尔在1848年公布于众的，“技术如此精湛，其精确程度几乎让人无法相信，在这方面它不太像是9世纪的工艺”。[27] 更重要但毫不奇怪的是，布林德利证实了这一日期是错误的（因为原物陈列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尽管是属于9世纪，但事实上是指一位古代的国王，而非一艘装有斜挂大三角帆的船）。

第三，怀特关于葡萄牙人最终在15世纪末将斜挂三角帆传给穆斯林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如第2章所述），波斯人从3、4世纪开始就经过波斯湾航行到印度，甚至更远。到7世纪中叶时，穆斯林就在整个印度洋航行。但是对于波斯和阿拉伯船只来说，悬挂方形帆返航是不可能的，因为波斯湾盛行北风。那么，如果没有斜挂大三角帆的话，我们实际上就难以看到定期往返于印度洋上的中东船只。可以肯定的是，那一时期任何时候任何波斯或阿拉伯船只上都没有安装方形帆。

现在我们转而讨论怀特格外信赖的卡森的图画。尼达姆对绘于2世纪一块墓碑上的装有斜挂三角帆的罗马船图画表示质疑，他认为实际上装的应该是方形帆。[28] 而且，卡森仅存的另外一幅画（时间可追溯至4世纪）没有提供任何关于罗马发明的确凿证据。即使是罗马人发明了斜挂三角帆，但值得注意的是，公元50年之后，没有任何关于帆和索具改进或进一步完善的证据。[29] 无疑，卡森和怀特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仅仅

是对此进行了暗示或假设。另外特别重要的是，那两幅据说装有三角帆的罗马船图画只是绘有一种特别小的帆。相比之下，中东人却把三角帆安装在大得多的船只上，关键是他们使用大型的三角主桅帆。同时代的伊本－沙赫里亚（ibn-Shahriya），甚至提到10世纪中叶的一种阿拉伯帆，高达76英尺（这与16世纪早期欧洲最大船只的桅杆相当）。[30] 另外，杰拉尔德·蒂贝茨指出，15世纪的阿拉伯船只——譬如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航海之前的时期——的确与现代的独桅帆船大小相似（这种船长100英尺，有75英尺高的桅杆）。[31] 最重要的是，大型斜挂三角帆的使用，表明了一种明显的“适应能力”。也就是说，要在一艘大型船只上安装一种大型斜挂三角帆，需要很多次的改进和长期的试验（如怀特自己所承认的）。总之，我们不能下结论说，肯定是波斯人或阿拉伯人发明了斜挂大三角帆——同样，排除这种可能性也是错误的。但很可能是穆斯林，而非欧洲人，对它进行了长期的改进，并传给了后者，从而使瓦斯科·达·伽马在1498年的航海得以实现。

至于船尾舵和方形船体，这些无疑是中国人发明的。它们早在公元400年就出现，并在约1180年时通过伊斯兰世界桥梁向西传入欧洲。[32] 最后，有意义的是，尽管15世纪早期威尼斯战舰在欧洲是最先进的，但与同时期的中国战舰相比黯然失色。最大的威尼斯舰只长150英尺，宽20英尺，与长500英尺、宽180英尺的最大的中国船只相比相形见绌。此外，“威尼斯战舰是由弓箭手护卫，而中国的船只则装备了火药武器、铜制和铁制大炮、投射器、火箭和炮弹”。[33]

欧洲“能源革命”和“早期工业革命”的东方起源

关于中世纪的能源革命，卡罗·奇波拉习惯性地宣称水车的发明完全是欧洲的一项革新，它没有在东方出现过。[34] 但是，阿诺德·佩西（Arnold Pacey）①指出：

①当代英国科技史家，著有《世界文明中的千年技术史》。——译者

> 人们常常认为水车是欧洲的一项独特发明。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在巴格达近郊曾经出现过大量的水车，在那一地区水力运用于造纸业比欧洲早了两个或三个世纪。[35]

事实上，佩西对这一情况的描述还比较保守。阿尔·哈桑（Ahmad Y. Al-Hassan）①和唐纳德·希尔（Donald R. Hill）②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更为完整的画卷：

> 显然，穆斯林们十分热衷于开发利用所有可能的水力，作为谷类加工业的潜在动力来源。他们甚至用转动水车的数量来测量河水的流量——这些河流，可以说，就是如此众多的“工场动力”……水车遍布了从西班牙、北非到河中地带（Transoxiana）的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各个省份。[36]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水车和水磨沿着河流遍布整个中东地区，广泛应用于灌溉作物、碾磨谷物、工业生产中的材料粉碎等领域。在叙利亚哈马（Hama）地区的奥龙特斯河（Orontes River）沿岸，也有大量的戽水车（norias）（一种木制的抬水机械，高度超过了60英尺）。重要的是，伊斯兰西班牙也修建有戽水车和水磨。另外，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开始，中东已经提出了各种让人印象深刻的水力管理计划，包括利用地上导水管将水源输送到城镇和乡村，尤其是还有地下管道（伊朗的坎儿井或是摩洛哥的“khattara”）。[37]灌溉体系不能被看作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标志（如同欧洲中心论者可能做出的回应），因为在中东地区这些灌溉系统太过分散，而不符合与水利灌溉紧密相关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的模式。

然而，欧洲中心论者却声称水车起源于更早的罗马帝国时期，实际上

---

①当代叙利亚学者，长于阿拉伯史和科技史。——译者

②工程师和科技史学家（1922—1994）。——译者

绕过了伊斯兰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但水车似乎最先是在古埃及出现，后来传到了罗马帝国——即使这些并不是水车。[38] 最早的水车（决定性的发明）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的中国。这一点有时被避开了，人们认为是罗马水车影响了后来欧洲中世纪的水车，因为与中国不同，罗马人使用了竖式车轮，这种车轮奠定了后来中世纪水车的基础。但是欧洲中世纪的水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杵锤（trip hammer）”的发明，这一事实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影响力，杵锤显然是中国在公元前4世纪发明的。

最后，风车是由欧洲人在13世纪率先发明的吗？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最早的风车出现在644年的波斯。然而，正如尼达姆所指出的，“很有可能，在班努·穆萨（Banu Musa）兄弟[①]的著作中提到了风车（在850年至870年间），而一个世纪后若干值得信赖的学者〔如艾布·伊斯哈格·伊斯泰赫里（Abu Ishaq al-Istakhri）和阿布·阿尔卡西姆·伊本·哈库尔（Abu al-Qasim ibn Hauqal）[②]〕谈到了著名的锡斯坦（Seistan）[③]风车。[39] 波斯风车随后不仅传入欧洲，而且传到了阿富汗和中国。[40] 通常不承认波斯起源的观点认为，中东风车是水平安装的，而相比之下欧洲风车则是垂直安装的。那种实际的设计没有传到欧洲似乎是合理的，但那种没有任何波斯因素输入的观点似乎是不合理的。因为很明显，关于风车的设想的确得到了传播。欧洲的十字军骑士在他们的“东征”中，无疑偶然发现了波斯的风车——尤其是很多人留下并定居在中东——不久之后欧洲就开始使用风车，这绝非巧合。

纺织手工业

我们知道，1000年后欧洲有两项最重要的工业，就是纺织手工业和造纸业，不过铁的生产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显然，一系列的纺织技术由

---

①公元9世纪阿拉伯数学家、天文学家。班努·穆萨是三兄弟的总名，原意是“穆萨的儿子”，指穆罕默德（Muhammad）、艾哈迈德（AhmadibnYusuf）和哈桑（alHasan）三兄弟。——译者

②公元9世纪波斯地理学家。——译者

③西亚一地区，包括伊朗东部和阿富汗西南部。——译者

东方传到了欧洲，最突出的是手纺车、缫丝机、织布机和脚踏板。手纺车起源于中国，在13世纪仍然经由伊斯兰西班牙传入意大利。[41] 13世纪意大利的丝织机与早期中国的模型极其相似绝非偶然。休·欧纳(Hugh Honour)①这样指出：

> 当忽必烈大汗建立的"鞑靼人治下的和平"君临亚洲的时候，大量的丝织品从中国经过被巴尔杜奇·佩戈洛季(Balducci Pegoletti)②称为无论白天或黑夜都非常安全的"沙漠之路"，运送到了中东和欧洲。中国的锦缎和刺绣大量流入，与欧洲相比质量更优，颜色款式更加丰富多样，令欧洲人艳羡不已，促使他们纷纷效法摹仿，这的确不足为奇。[42]

鉴于我们发现在意大利各个城市"缫丝使用的机器和中国非常类似，可以推测，那一时期到东方旅行的某个欧洲商人在他的旅囊里带回了设计图样"。[43] 重要的是，缫丝机（绕线机）是中国在1090年发明的。中国的纺车是由一种带有一个斜板和轧辊装置的踏板摇纱机组成的。意大利的机器和中国的模式非常类似，甚至在诸如连接曲柄的控制杆最小的细节上也很相似。[44] 而且更重要的是，直到18世纪意大利的机器都在或多或少地仿制中国。[45] 最后，纺织机械最终由伊斯兰西班牙传入欧洲也就毫不奇怪了，因为织布机的所有部分在那里已经被完全运用。因此伊斯兰的纺织品能够主宰欧洲市场达数世纪之久，这本身也就不足为奇了。

造纸业

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工业之一就是造纸业。纸是在1150年由伊斯兰西班牙生产，之后传入欧洲的。但纸是在公元105年由中国的蔡伦发明的（见第8章），随后不久就出现了造纸业。[46] 那么它是如何传到欧洲的呢？

---

①当代英国艺术史家，著有《世界艺术史》和《新古典主义》等。——译者

②意大利佛罗伦萨商人、政治家（1310—1347）。——译者

按照托马斯·卡特（Thomas Carter）最早的解释，纸是逐渐向西传播开来的。它在4世纪和6世纪期间传入土耳其斯坦[①]，但只是偶尔使用。尽管在751年怛罗斯战役前在河中地带和波斯曾发现了纸，[47] 但事实上是这次战役之后，中国战俘传去了重要的造纸技术。正如阿尔－卡兹维尼（al-Qazwini）[②]所说：

> 战俘被从中国带回，他们中间有人通晓造纸术，于是便开始制作。随后传播开来，直到它成为撒马尔罕人的一种主要产品，从那里出口到所有国家。[48]

事实上，到794年，造纸技术从撒马尔罕传到了巴格达，于是在大马士革生产的阿拉伯纸——即闻名欧洲的大马士革纸——直到15世纪都是欧洲主要的纸张供应来源。那么我们可以说："阿拉伯人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及其他方面的接触，为阿拉伯人较早地掌握造纸术提供了机会，像阿拉伯词汇中的'纸'（kagaz）以及在《古兰经》中可以找到的相应的词'qirtas'，都起源于汉语。"[49]

然而，尽管造纸技术最初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但阿拉伯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贡献。特别是，阿拉伯人为了使纸能适用于钢笔（而不是中国人使用的毛笔）书写，必须把纸上浆。造纸业随后在1150年传入伊斯兰西班牙，然后在1157年传入法国，1276年（中国发明之后的1000多年）传入意大利。[50] 英语中使用的词汇"ream"（令，纸张的一种计数单位），意大利人使用的词汇"risma"，都说明了伊斯兰的影响。早期的阿拉伯词汇中的"纸"是"rismah"。[51]

欧洲早期的铸铁业

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所了解到的，尽管铸铁生产在公元前就出现了，

---

①一般指里海以东广大中亚地区。——译者

②波斯物理学家、地理学家、天文学家（1203—1283）。——译者

但却是中国人在11世纪“宋朝奇迹”时期率先推进了这一技术。这里我将指出的是，铸铁技术从中国传播到欧洲的时间之滞后的确令人吃惊：11世纪时出现由水力带动的冶铁鼓风机，14世纪时出现活塞式鼓风机。[52] 人们还认为，14世纪欧洲的“Flussofen”取代斯塔利亚[①]或奥地利的“stuckofen”（鼓风炉），是中国技术经过中亚、西伯利亚、土耳其、俄罗斯这个传播过程的最后阶段。[53]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人和穆斯林都是重要的自主生产者。铸铁是伊斯兰一项很重要的产业，甚至在《古兰经》中也赋予其重要的地位：“上帝把铁送至人间，在那里它为人类提供强大的力量和诸多的用途。”（第57章）东方的铸铁技术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伊斯兰世界桥梁传入欧洲的。

欧洲的钟表制造业

欧洲中心论学者戴维·兰德斯公开宣称：“时钟是欧洲中世纪机械发明中最伟大的成就。”[54] 据称，第一座公共时钟是1309年安装在米兰圣欧斯托乔教堂（St. Eustorgio）塔楼上的时钟。而第一个便携式钟表大概是1335年出现在米兰的维斯孔蒂宫（Viscontip palace）。但是很明显，甚至欧洲中心论者也承认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谁发明的。[55] 中国人不过分依赖钟表这一说法是合理的，但说中国人对此不感兴趣，或者没有能力制造机械钟表，则是一种不合理的命题。事实上，11世纪末苏颂（Su Tzu-Jung）[②]就建造了一座复杂的天文钟（附装在水运仪象台里的天衡装置）。1086年，他奉皇帝之命重建早期的环形钟（armillary clock）〔由韩公廉（Han Kung-Lien）[③]发明〕。关于苏颂对其天文钟的描述，尼达姆写道：“在对其细节进行生动描述的同时，这篇文献也涉及中世纪所有文明中一项伟大的技术成就的构造。”[56] 钟表制作中最大的挑战是擒纵机制的发明（一种调整转动轴和针盘，以确保准确计时的装置）。卡德韦尔（D. S. L.

①奥地利一地名。——译者

②宋代政治家、科学家（1020—1101），发明世界第一台天文钟。——译者

③北宋天文仪器制造专家，生活于公元11世纪，生卒年不详，曾在苏颂领导下设计制造水运仪象台和假天仪。——译者

Cardwell)[①]指出："我们对由某位或某些不知名的天才人物发明擒纵机制的过程一无所知……这很可能是自车轮出现以来人类最独一无二的发明了。"[57] 是中国人——很可能是一行和尚在725年——发明了擒纵机制，而且将其传到了西方，明确的事实解开了上述之谜。事实上，这种方法似乎传到了伊斯兰中东地区。然后在1277年（在维斯孔蒂宫便携钟诞生之前约60年）有一篇关于计时器的阿拉伯文献——包括带有水银擒纵装置的重力驱动式钟表（weight-driven clock）的设想——在托莱多[②]被翻译过来。[58]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欧洲钟表所有的技术和装置，包括自动装置、复杂的齿轮系统和齿轮组件，以及重力驱动和发声信号装置，都出现在安达卢西亚人（亦即信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的钟表制造术中。[59] 有趣的是，林恩·怀特认为，六项钟摆装置的发明显然是12世纪的印度人婆什迦罗（Bhaskara）赋予的灵感。[60] 但无论如何，欧洲钟表的许多样式特征与苏颂的天文钟非常相似。[61] 那么，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人（也可能是印度人）通过穆斯林对欧洲的钟表制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里只是反驳了传统的欧洲中心论所重复的论调，即认为中国的技术还没有先进到足以去生产一只钟表。

结　论

在中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意大利对于欧洲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似乎是一个十分合理的命题。但是那种认为是意大利人开拓了所有推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创新的观点，却是一种神话。东方对意大利的影响就如同它的广泛传播那样深远、深刻。最后，当我们想到意大利时，我们常常会想到其独特的食品以及许多文化艺术品，但是匹萨饼[③]的主要成分最先是由古埃及人发明的。阿拉伯人将大米和藏红花的培育技术传

①英国历史学家(1919—1998)。——译者

②西班牙中部城市。——译者

③一种涂有奶酪和番茄酱的意大利式有馅烘饼。——译者

人西西里和西班牙〔这才使平锅菜饭（paella）[①]的制作成为可能〕。咖啡来自埃塞俄比亚（Ethiopia）（源于阿拉伯词汇“kahwa”）。[62] 不过，意大利面食（pasta）或意大利面条（spaghetti）不是来自中国（与马可·波罗的观点相反），而是来自居住在意大利西部的古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s）。

我们知道，意大利智慧和创造性最伟大的标志之一，就是维奇奥桥（Ponte Vecchio）[②]，但正如迈克尔·爱德华兹（Michael Edwardes）[③]所指出的：

> 那些负责建造欧洲最早的拱形桥——如横跨佛罗伦萨亚诺河的维奇奥桥（1345年）的技师，一定深受开创性的中国桥梁建筑技术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工匠的声誉历久不衰（达数世纪）。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在推行国家改革过程中，曾在1675年招募中国技师参与其桥梁修建工程。[63]

实际上，就维奇奥桥而言，尼达姆指出，“相比之下更加先进的桥梁……是在约公元610年由中国杰出的工匠李春修建的”。[64] 另外，在14世纪之前中国类似的桥梁差不多有二十座。许多西方人参观过这些大桥，并为之惊叹（包括马可·波罗），因此很可能是这一技术的传播直接影响了意大利技师。

然而，尽管如此，当我们开始“想象意大利”时，我们通常想到的是文艺复兴，推测是文艺复兴激发了欧洲发展的强大动力，并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巨大飞跃而达到高潮。这里我们常常会想到列奥纳多·达·芬奇，他坚持认为绘画应当以数学为基础——特别是几何学和光学（“先进欧洲”的一个主题）。而达·芬奇以之为基础的几何学和光

---

①一种用藏红花调味的大米与肉、海味、蔬菜烹调而成的西班牙饭食。——译者

②佛罗伦萨的著名地标，建于14世纪，是横跨阿诺河上的最古老的桥梁，人称“老桥”。——译者

③当代历史学家，长于东方历史、特别是印度历史的研究。——译者

学，是由中东和北非的穆斯林发明并传播过来的。事实上，正如第8章中所解释的，在西方文艺复兴的背后，屹立着东方。最后，对欧洲中心论历史的传统假设——全球力量的接力棒随后从意大利传给了伊比利亚人（Iberians）[①]，后者开辟了欧洲的大发现时代——也只是另外一种神话。第7章将对此进行解释。

①伊比利亚半岛居民，指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译者

第7章

瓦斯科·达·伽马时代的神话，公元1498—约1800年

如果与那些志趣悖异者相伴，
那痛苦胜过大海风浪肆虐的磨难。
赐一条船吧，我将乘风破浪，
这要比虚伪的朋友令我神往……
它是神的杰作，我的座驾，我的守护，
噢，慷慨的真主啊！
旅途，乃神之所在……
为了科学，我已呕血毕生，名就功成。
在我垂暮之年，荣耀的增加与知识相伴。
假使我不是如此杰出，国王也不会如此顾眷。

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伊斯兰航海家，约1475年

如果我在本书第一部分的主张正确的话——即直到19世纪亚洲一直领先于欧洲——那么我们将如何面对欧洲中心论所宣称的1500年后欧洲人征服了亚洲？我们又如何处理类似的观点，即1492年后的时期是欧洲大发现时代，从而开创了西方主导的早期全球化？或者，就亚洲而论，我

们又如何解释通常将1498至1800年间的亚洲历史描述为“瓦斯科·达·伽马时代”的欧洲中心论？更确切地说，我们又怎样理解约翰·罗伯茨在《西方的胜利》一书中熟悉而生动的欧洲中心论阐述？

> 一个事实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很容易为人忽视：欧洲人独自完成了探索。更重要的是，航海大发现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是欧洲人在世界范围内的一次大扩张……像后一个世纪的路德一样，亨利（航海者）在无意中开创了现代历史……不久，葡萄牙国王（曼纽尔一世）就把自己称作“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君主”，这只是一种并无夸大的炫耀。对海洋的征服是人类战胜自然力量的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壮举，它将导致西方文明对全球的主宰。[1]

罗伯茨接着谈到：

> 今天，人们开始用一个专门发明的词来概括这一思想状况——“欧洲中心主义”。它意味着“把欧洲置于世界的中心位置”，它通常的含义是那样做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仅就事实而言，讨论发生过什么，而不是讨论我们所赋予它们的价值标准，那么把欧洲置于现代历史的中心位置是非常恰当的。[2]

我的回应是，罗伯茨所凭借的“事实”，仅仅是那些欧洲中心论挑选出来的事实，确切地说，是为了首先“把欧洲置于历史的中心”。当我们仔细考察一系列其他不同的事实时，这种做法就显而易见了。在这里，我将提出六条主要的论点，用以反驳常见的欧洲中心论观点，从总体上描绘出一幅不同的历史画面，同时也是为了论证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提出的观点。

近代欧洲人在亚洲大发现的神话

葡萄牙航海并非开拓性的近代欧洲大发现时代的体现，这是一个以

独有的“理性骚动”或者求知冲动为标志的年代。事实上，他们是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最后喘息（last gasp）”或者是“第二波”——“第一波”发生在1095到1291年间。也就是说，这些航海活动是受到了旧的十字军骑士心理的激励，而不是一系列现代理念的影响。促使航海的直接原因是，奥斯曼帝国在1453年夺取了君士坦丁堡，这在基督教世界引发了一场重大危机。1456年，穆斯林占领了雅典（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们心中的圣地），进一步加剧了基督教身份的危机。于是，“哀叹之声一时四起……神圣的希腊领土遭到了亵渎”。[3]这就产生了一种到达东方基督教王国的渴望（最著名的是虚构的黑人天主教国王，祭司王约翰）①。实际上，

> 在15世纪下半叶，组织并指挥一场规模庞大的十字军东侵，成为罗马教皇宗教改革计划的一部分……极力倡导改革的教皇致力于基督教国家内部的和平，通过号召一场圣战，恢复了宗教的信仰。[4]

伊斯兰教的“威胁”，伴随着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刺激着天主教会发布了大量的教皇敕令。对于教会来说，这关系到宗教的生死存亡：也就是说，基督教世界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正如教皇庇护二世所宣称的：“一场同土耳其不可避免的战争正威胁着我们。除非我们拿起武器，与敌人拼死一战，否则我们所有的一切将同宗教一起结束。”[5]

第一份教皇敕令（Dum Diversas）是1452年由教皇尼古拉五世颁布的，声称“教皇授权葡萄牙国王攻击、征服和镇压撒拉逊人（Saracens，穆斯林）……掳其财产，占其领土，将其子民永世贬为奴隶，把其土地和财产献给葡萄牙国王”。[6]随后，他又在1455年颁布了第二个敕令（罗马努斯教皇），将其贴上“葡萄牙帝国主义宪章”的标签十分恰当。在敕令里，航海者亨利王子作为一位基督战士和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被大加赞

① 12至17世纪盛行于欧洲的传说，内容是传闻于东方充斥穆斯林和异教徒的地域中，存在由一名基督教宗主教及皇帝统治的迷失国度。祭司王约翰很可能是基督徒屡次十字军东征不顺利之后，所流传出的一个寄予希望的人物。——译者

扬，因为他渴望宣扬基督教的声望，并强迫“异教徒”皈依天主教。特别是赞扬他试图绕过好望角，并试图与印度的“天主教”居民（据称他们是由祭司王约翰所统治的）建立联系的功绩。据信这些居民“尊崇基督教”，通过与他们缔结联盟，葡萄牙人就能够抵御撒拉逊人和其他“异教徒”。通过后来发布的一个更加重要的教皇敕令（1456年的Inter Caetera），授予了葡萄牙帝国主义在印度的合法性。这加强了罗马教廷对“现在或将来所有被葡萄牙征服的地区的宗教裁判权，‘从博哈多尔角（Capes Bojador）（非洲西北海岸）和努内（Nun），沿着几内亚向南，一直到印度’”。[7] 特别是他们受命去寻找祭司王约翰，希望葡萄牙能和他结为同盟，打败穆斯林（寻找祭司王约翰，是因为据说他位于伊斯兰帝国的后方）。

罗马教廷骄横地宣称印度洋是“无主地区”（nullius diocesis）（某种程度上是中世纪基督教对后来称为“无主地”的先占原则），这是对主张印度洋海域是“公海”（mare librum）的回应。这使得葡萄牙人从一开始就相信，如果亚洲商船希望在现在被认为是“葡萄牙人的海洋”进行贸易的话，他们都应该携带葡萄牙颁发的许可证，这完全是合理的。[8] 所不同的是，在那以后，基督教并没有被作为葡萄牙帝国主义在印度的一种公正的原则来使用，而是从一开始就从根本上向他们灌输一种信念，即认为这种行动的方式在道义上是合理的。所有这些并非意味经济的动机是不重要的，经济的富庶也是向异教徒开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这里要说的是，1457年里斯本铸币厂发行了一种铸有十字军鲜明标志的金币，同样重要的是，这些黄金来自于几内亚。

葡萄牙大发现年代和西方早期全球化时代的双重神话

葡萄牙人没有发现亚洲和“风暴角”，1497或1498年之后的“探险”也非西方早期全球化的首要标志。他们仅仅是亚非主导的（东方）全球化的一部分。传统的观点认为，是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在1487年至1488年发现了“风暴角”（后来被命名为“好望角”），并且是瓦斯科·达·伽马在十年后成功通过了好望角一直到达印度。但事实上，葡萄牙人是最后发

现好望角的——早在几个世纪之前，不同的东方人已经到过那里，而不是绕过。15世纪中叶，著名的阿拉伯航海家伊本·马吉德向西航行到好望角，然后沿着非洲西海岸，经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了地中海。[9] 而且海岸线"在船员手册中被如此详细地勾画出来，以至于人们无法不相信阿拉伯或波斯水手先前已经环绕非洲航行过"。[10]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约1420年时，一艘印度（或者可能是中国）船经过了好望角，并且继续航行大约2000英里进入了大西洋。[11] 此外，中国的（伊斯兰教徒）航海家郑和在15世纪初到达了非洲东海岸，而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中国的水手可能早在8世纪时就绕过了好望角。[12] 还有证据表明，爪哇人也到过好望角。1645年，迪奥哥·德·科多（Diogo do Couto）①曾这样来描述爪哇人：

> （他们）所有人都富有航海经验，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是最古老的民族……可以肯定，他们从前到过好望角，并与马达加斯加岛保持着联系，那里有很多棕色和爪哇土著，他们认为自己是爪哇人的后裔。[13]

这种迁徙模式实际上开始于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之初。[14] 总之，在航海者亨利王子开始探索其新航路之前，形形色色的东方商人已经抵达了非洲东海岸而非西海岸，并成功到达好望角。

另一个欧洲中心论的神话是，达·伽马抵达印度，象征着与那时仍处于封闭状态的人民的第一次接触。但正如我们在第2至4章所知，在达·伽马开始远航之前，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地区已经在亚非主导的全球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长达数世纪之久。事实上，亚非大发现时代要领先哥伦布和达·伽马约一千年。以下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 当达·伽马在1498年航行抵达非洲东海岸时，他驶进了一个熟悉的世界，那里已经与地中海和欧洲建立了联系。阿拉伯商人已经向

①葡萄牙编年史家，长期居住于葡属印度。——译者

南进入远至索法拉（sofala）（非洲东南海岸）的地区，改变当地的宗教信仰，在那里定居，并和当地人通婚，还将东非北部沿海地区与印度洋的其他部分以及红海、欧洲联系了起来。[15]

还有一个相关的神话是，欧洲中心论认为达·伽马最先接触的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正如在第四章中详细阐述的，印度要比他们的欧洲“发现者”先进得多。达·伽马与印度卡利卡特的“扎莫林”（统治者）初晤时的情景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远非对葡萄牙人的到来感到敬畏或者窘慌，印度“扎莫林”完全是漠然处之。当瓦斯科·达·伽马被慷慨地赐予一次拜谒时，他献出了当时欧洲能够生产的最先进的产品，但印度人对那些物品之低劣几乎忍俊不禁。尼达姆这样指出：

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第一次到访卡利卡特，充分见证了东西方之间在技术上的差距。他呈上了各种商品——衣物、帽子、糖、燃油……国王对它们不屑一顾，建议他应当献上黄金。这时，在场的穆斯林商人向印度人证实，葡萄牙人实质上是海盗，提供不出印度人需要的任何物品。[16]

实际上，感到可笑的是国王的侍臣，国王则对贡品勃然大怒，他认为即使对最穷的商人来说，这也是极不相称的。

事实上，那种认为印度人完全为葡萄牙人所慑服的观点需要颠倒过来。有趣的是，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在1487年就派佩德罗·德·科维良（Pedro de Covilhao）[①]去印度探险。当他返回时这样报告：

在印度港口所见让他万分惊讶：商业一片繁荣……首先是在阿拉伯商人的仓库里，桂皮和肉桂束堆积如山，黑胡椒挂满枝头，田野里种植的香料作物一望无际，犹如欧洲种植的小麦一样。[17]

①葡萄牙航海家（1450—1520）。——译者

数年后，当佩德罗·阿尔瓦维·卡伯雷尔（Pedro Alvares Cabral）[①]从印度返回时，他不仅带回了类似的充满溢美之词的报告，甚至带回了一些印度产品。所有葡萄牙人都为印度人的富庶程度所叹服，犹如他们为宫殿里所展示的奢华而目眩。[18]因此，如果说葡萄牙人显然是受到据称亚洲人所缺乏的强烈好奇心的驱使，那么这只是因为葡萄牙人与亚洲人不同，一方面是他们对世界知之甚少，另一方面是亚洲能够提供更多的商品。

总之，既非绕过好望角，也非葡萄牙人抵达印度的远航构成了欧洲人开创性大发现时代的标志。尽管它对于欧洲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意外的发现，但对于非洲人和亚洲人来说，却已是往昔的历史。所有真正发生的，乃是欧洲人正在直接卷入公元500年后已经确立起来的、由亚非主导的全球经济。简言之，欧洲人并没有“发现”亚洲和非洲，因为后者已经与欧洲保持了很长时间的联系。

葡萄牙航海中欧洲人独创性的神话

葡萄牙人到达亚洲并非欧洲人独创性的标志，它只是在欧洲吸收了亚洲先进的航海技术和科学思想后才成为可能。欧洲在1500年到1800年之间并没有改造亚洲——而是亚洲在500年至1800年之间帮助改造了欧洲。如果没有对东方科学知识以及航海和船舶技术的传播和吸收，瓦斯科·达·伽马甚至到不了好望角，更毋宁说印度了。从12世纪开始，葡萄牙人就借鉴了伊斯兰的科学知识，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王室的推动。葡萄牙君主雇用了许多犹太科学家，通过他们的翻译，直接传授独创性的伊斯兰科学知识（在十字军东征的背景下，与直接和穆斯林进行合作相比，这不啻为一种政治上更加可行的方法）。另外，葡萄牙人从犹太科学家的入境移居中更是受益匪浅，这些犹太科学家是在14世纪末沙俄大屠杀时期逃亡到西班牙的。

---

①葡萄牙探险家（1467—1520）。——译者

远洋航行在船的设计和航海技术两个方面向伊比利亚人提出了新的挑战。但是正如帕特里夏·锡德（Patricia Seed）[①]所指出的，他们转而求助于东方人——尤其是通过犹太人求助于穆斯林——来解决这诸多挑战。[19]第一个挑战是要解决来自非洲西海岸的博哈多尔角南端猛烈的逆风。这个问题在15世纪40年代通过小吨位轻快帆船的建造而解决了，这种帆船有一个船尾方向舵以及三根船桅，其中一根船桅安装了大三角帆。不过，这种轻快小帆船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3世纪，当时葡萄牙人在伊斯兰“加里卜”（qarib）的基础上建造了小渔船。[20] 正如我们在第6章中所见一样，重要的船尾方向舵是中国的发明。我们也注意到，斜挂大三角帆极有可能起源于中东，尽管早在15世纪前它已经成为伊斯兰船只的一个固有特征。可以肯定的是，在它传到欧洲之前，中东人对它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同样要注意的是，只是到了15世纪中期，所有重要的三桅装置（将方形帆和大三角帆结合起来）才被应用到欧洲的航船上。没有这些技术革新，欧洲的“航海大发现”将不可能发生。不过，这一装置长期以来都是中国船只的主要特征，这一技术可能在13世纪时通过某位到过中国的欧洲游历者，或者是通过长期观察航行到非洲或中东的中国船只的欧洲人或穆斯林传播过去的。[21]

接下来，斜挂大三角帆形成了第二个挑战。因为三角帆导致船只航线成Z字形（或三角形）曲线航行，这必然造成航行直线距离的计算更加困难。通过运用几何学和三角学，这个问题解决了。几何学和三角学是由穆斯林数学家开创、并被欧洲人借用的（见第8章）。第三个挑战是博哈多尔角南端强大的潮汐造成的，它能够使船搁浅或轻易将船摧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了解月球运转周期的知识（因为月球运转影响着潮汐升降）。14世纪末，居住在葡萄牙的犹太制图家亚伯拉罕·克雷斯克斯（Jacob ben Abraham Cresques）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第四个挑战是需要比现存的那些航海图（如中世纪的图解航海手册）更加精确的航海地图。解决这个问题要借助伊斯兰的天文学，它能够计算出地球的大小，并利用经纬度来记

①当代美国史学家。——译者

录航行的距离。

星盘也特别重要。正如第6章所述，它也是由穆斯林天文学家改进，并在10世纪中叶经过伊斯兰西班牙传入欧洲的。但是葡萄牙人还需要在白天确定精确的方位。这里他们采纳了西班牙科尔多瓦著名的穆斯林天文学家萨法尔（Ibn as-Saffar）（其论著已被译成拉丁文）的建议。他们同样借鉴了伊斯兰在数学上的创新来计算纬度和经度，采纳了11世纪穆斯林天文学家发明的伊斯兰天文数表。此外，计算纬度也需要掌握太阳年（the solar year）知识（因为太阳偏角是这种计算的关键）。他们再次求助于11世纪已经发明的精确的伊斯兰和犹太太阳历。总体来说，同一时期的佩德罗·努内斯（Pedro Nunes）[①]在1537年吹嘘道："很明显，海岸、岛屿、陆地的发现并不是偶然的。相反，我们的水手启航时已经见识广博，拥有必要的工具设备，通晓天文学和几何学的原理。"[22]他们的确是见多识广，但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由于犹太人，主要是伊斯兰穆斯林的技术创新，所谓的葡萄牙"航海大发现"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

但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并没有就此结束。首先，很可能，尽管不是很确定，在达·伽马启航横穿阿拉伯海之前，他在马林迪（Malindi）[②]从一个古吉拉特穆斯林马尔默·卡纳（Malemo Cana）手中得到了一份非常详细的印度地图。更加肯定的是，达·伽马是在一个不知名的伊斯兰古吉拉特领航员（他是在非洲东海岸的马林迪被救起的）的帮助下才到达印度。有趣的是，人们常常认为这位航海家就是著名的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而杰拉尔德·蒂贝茨严重质疑这一论断，并提出了大量令人心悦诚服的论据。[23] 事实表明，这位伊斯兰航海家的作用的确非常重要，没有他的领航，达·伽马可以返航是极其幸运的。《瓦斯科·达·伽马第一次航海日志》中这样记录道：

由于时而风平浪静、时而狂风大作……我们花了差三天到三个

①葡萄牙数学家（1502—1578）。——译者

②古称"麻林地"，非洲东岸滨临印度洋的肯尼亚港口城市，郑和与迪亚士曾光顾此地。——译者

月的时间才穿过这个海湾(阿拉伯海),我们所有人都患上了牙龈炎,以至于无法进食。他们的双腿开始浮肿,然后身体其他部位也肿了,这些肿块不断蔓延,直到病人死亡……我们三十名海员就这样死掉了……每条船上能够驾驶的只剩下七八个人,尽管这些人的职责本来不是驾驶。我敢保证,如果这种状态再持续两周的话,将不会有任何人来驾驶这些船。[24]

后来,他们被迫毁掉一条船,因为没有足够的水手来驾驶所有的船。尽管如此,在当时欧洲的背景下,这种经历证明并非是不同寻常的。一位曾跟随着麦哲伦航海(在达·伽马航海后约二十年)的意大利年轻冒险家安东尼奥·皮格菲塔(Antonio Pigafetta)告诉我们:

我们只能吃过期的变为粉末的饼干,里面长满了虫子,上面发着老鼠尿的臭味……我们饮用的水混浊而发黄。我们还吃牛皮……还吃老鼠……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有29人死亡……25人或30人患病。[25]

最后,当读到本章开头的引言时,人们完全能够理解,认为这些话很可能出自瓦斯科·达·伽马之口。但这乃是由著名的伊斯兰航海家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创作的。[26] 事实上,波斯和阿拉伯的水手、航海家们要比他们的欧洲同行们先行了约一千年。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达·伽马致力于一种反对穆斯林的"十字军东征"时,首先正是东方——尤其是伊斯兰的资源组合经过伊斯兰世界桥梁的传播,使他的远航得以成行。

欧洲军事优越于亚洲的神话

欧洲中心论的核心就是欧洲优越的军事力量,这种假设无疑是一个神话。谈到瓦斯科·达·伽马,就会联想到中国的航海家郑和,他横跨印度

洋并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尽管与达·伽马的航向刚好相反，但他却比达·伽马早了几十年。将瓦斯科称为“欧洲的郑和”或是将郑和称“为中国的达·伽马”是否合适呢？这样的比较只会让欧洲人尴尬。虽然达·伽马的船只最长可达约85英尺，但郑和船队最大的船约有500英尺长、180英尺宽（每艘可承载大约1000人）。[27] 甚至郑和主舰的舵（36英尺）就相当于哥伦布旗舰“尼娜号”（Nina）船身的一半那么长。而且与郑和最大的船只3100吨的满载排水量相比，“尼娜号”100吨的最大排水量顿然失色。甚至连葡萄牙大帆船军舰中的“巨无霸”,其满载排水量也只有郑和船队最大船只排水量的1/5。不仅如此，与郑和船队装备有多重舱壁和12个防水船舱的九桅或十桅船只相比，葡萄牙的三桅船只更是相差甚远。而且，与郑和在1431/1433年航行时拥有数百艘船只、2.755万人的庞大舰队相比，达·伽马只有4艘船只、170人的船队更是相形见绌。

同样令人吃惊的是，中国这些航海中有时运载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同时期欧洲国家最庞大的陆军规模。而且，直到16世纪末，中国在几次航海中所配置的船只数量，也以10:1的比例远远超过了皇家海军的规模。同样令人吃惊的还有中国海军的规模（在第3章中已经谈到）。即使是在1434年所谓的“退出”之后，明王朝的海军仍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并且很可能超过了西欧的总和。[28] 相比之下，葡萄牙在亚洲的舰队是非常弱小的。整个16世纪，葡萄牙平均每年仅派遣7艘船只到东方，并且每年仅有4艘返航，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荷兰和英国。在1581年至1630年之间，荷兰、葡萄牙、英国派出的船只合起来平均每年也不过是8艘而已。

重要的是，亚洲舰队在军事上足可以与欧洲舰队相抗衡。事实上，“(郑和)舰队与其他联合起来的世界海军之间的战斗，就类似于一群鲨鱼和一群鲱鱼之间的战争”。[29] 即使在1434年之后，中国海军仍然保持着其优越性。1598年，明朝海军打败了日本约500艘舰队的入侵。[30] 它还成功地遏制了葡萄牙、荷兰、英国舰队打开中国门户的企图。例如，当葡萄牙人在1521年和1522年间试图通过武力在中国扩大他们的立足点时，被中国的海防舰队彻底击败。直到1557年时（这一年日本被逐出中国的朝

贡体系），葡萄牙人才被中国官方允许在澳门获得立足点。[①]澳门是个很小的贸易补给站，位于广州湾一个荒凉的小岛上，通过一条很狭窄的地峡与大陆连接起来（如果葡萄牙人显出桀骜不驯的话，其粮食供应很容易被切断）。这一“让步”并非由于葡萄牙军事上的优越性，事实上是由于中国希望减少与日本的贸易往来，而用葡萄牙取而代之的结果。尽管葡萄牙能够获得对中国贸易的一定份额，但必须遵守中国皇帝规定的最严格的条款。无论如何，夸大葡萄牙贸易对中国的影响是错误的，因为每年只允许一艘葡萄牙船前往中国。

西亚的情况略有不同。在波斯湾，葡萄牙人对扼守这一重要航道的奥斯曼人影响甚微。总之，葡萄牙人夺取这一航道的行动受挫，因为他们需要与波斯沙法维王朝（Safavid）（作为日益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的一种平衡力）维持良好的关系。因此，他们没能堵住波斯湾的裂隙（尽管事实上他们已经占领了霍尔木兹海峡），在那里土耳其人进行大量的香料贸易，其数量远远超过了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所带来的贸易量。葡萄牙人也没有成功夺取红海路线，夺取亚丁的失败使其深受打击，因为他们急切渴望改变奥斯曼人控制香料贸易的局面。甚至葡萄牙舰队被派遣到那里去阻止所谓的“非法”贸易收入的行动，证明也是毫无效果的。这样，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在1513年夺取亚丁的失败，意味着红海仍是穆斯林世界的一个内湖。这证明是特别不利的，因为1540年后经由红海和黎凡特的香料贸易开始了。

的确，葡萄牙人并非总是遭到反抗，但似乎每当他们遇到抵抗时，常常会失利。譬如，他们在亚齐（Acheh）遭到抵抗，结果很惨烈。亚齐独立于葡萄牙之外，始终控制着自己到红海的香料贸易路线。因此，葡萄牙人没有能够阻止越来越多的贸易量从他们自己的路线，转向已经长期确立的途径——红海和埃及的贸易路线。不仅红海路线仍然在伊斯兰控制之下，而且整个横贯印度和东南亚的路线都是如此。[31] 此外，“即使在果阿边远要塞的枪炮声中，马拉巴尔（Malabar）的莫普拉人（Moplah）海盗

①原文如此。——译者

也通过周期性地劫掠商船队，给葡萄牙的沿海贸易造成严重的破坏”。[32]而且在其建于马六甲的“据点”，葡萄牙人也常常被迫向爪哇人和亚齐舰队屈服。有趣的是，早在1511年阿尔伯克基攻打马六甲时，那种认为东方军事落后的想象就被迅速颠覆了，他们才发现当地土著非常娴熟地部署和操作重型火炮。[33] 但这不足为奇，因为火药、枪和大炮都是由东南亚的“后方”——中国发明的。

一定程度上，葡萄牙人获得的任何成功，都与扮演挑起其亚洲对手内讧的角色有关。这里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但其中有两个最为突出。第一个是，卡利卡特的统治者与科钦（Cochin）君主之间的不和，使葡萄牙在卡利卡特获得了落脚点。第二个是，锡兰三个邦国之间的争斗，使葡萄牙在那里站稳了脚。葡萄牙人更多地依赖运气和诡计并不奇怪，因为其军事力量弱小。葡萄牙人也特别幸运，因为东方的主要大国通常不会选择与其对抗。这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总体观点，因为正如乔杜里（K. N. Chaudhuri）①所指出的，亚洲大国没有理由来对抗葡萄牙人，因为后者并没有被视为一种军事威胁。[34]

荷兰也经历过同样的情形。虽然荷兰人比其他任何“殖民者”更倚重于武力，但他们多是把武力用在与葡萄牙之间的关系上，而不是用于亚洲人。[35] 另外，他们的成功被轻易夸大了。尽管他们将果阿和澳门留给了葡萄牙人，却从葡萄牙人手中成功夺取了一些重要港口的控制权——巴达维亚、锡兰、马六甲和巴丹——尽管这并非轻而易举。他们对马六甲进行了多次争夺（如1607年），但最终直到1641年才成功夺取。当他们在1622年击沉80艘中国帆船时，中国人拒绝与其进行贸易，直到一个世纪之后的1727年（他们仅在广州允许获得一个落脚点）。在这期间，中国商人继续前往爪哇贸易，但“他们依然将贸易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并规定了自己的条款”。[36] 正如我们后面要看到的，荷兰人在日本出岛（Deshima）②留

①当代印度史学家。——译者

②出岛是1636年日本幕府为禁止葡萄牙人传播基督教，在长崎湾建造的人工岛，用以集中收容西洋人，是日本锁国时期面向欧洲开启的唯一窗口，后来成为日本输入西方近代学问的窗口。——译者

居期间颜面尽失。甚至在巴达维亚——所谓的荷兰“据点”——亚洲商人也能够抵制荷兰的侵入。[37]

总之，确凿的事实是，葡萄牙人（及其欧洲后继者）在1498年后的三个世纪里，并非依靠军事力量耀武扬威地侵入亚洲，并迫使亚洲人屈服。他们的军事力量如此弱小，以至于无法填补整个虚构的帝国不断涌现的缺口。因此，“海军技术很少被（同时代的欧洲人）引用为欧洲优越于非西方民族的标志”，这也就不足为怪了。[38]

欧洲人垄断亚洲贸易的神话

支撑欧洲人主导亚洲贸易体系的欧洲中心论观念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过分夸大1500年后的好望角航线。的确，大多数人认为，到1500年时，随着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的地位被所向无敌的欧洲所取代，世界经济的伊斯兰核心地带已完全黯淡失色。因此，布罗代尔坚持认为“我们不应低估葡萄牙在印度洋的力量对伊斯兰世界的挑战：欧洲优越的航海技术为阻止土耳其怪物闯出波斯湾和红海起了一定的作用”。[39]另外还有一种类似的欧洲必胜主义结论：

> 中亚从16世纪初就被分离出去……从此处于世界历史的边缘。……由于发现了通往东亚的海上航线，丝绸之路渐渐变得多余了。……自从迈进了现代的门槛，中亚的历史就变成了一种外省的历史。这就使我们有理由对以后几个世纪只作一个简要的概述。[40]

在这一欧洲中心论的描绘中，似乎欧洲人绕过好望角所开辟的新路线缔造了一种伊斯兰式的“牛轭湖”（ox-bow lake），随着绕经好望角的葡萄牙支流的汇入成为主流，旧的穆斯林贸易路线渐渐枯竭。

这类欧洲中心论的论述存在着大量疑问，葡萄牙人丝毫没有融入到奥斯曼穆斯林所主导的主流贸易中去。[41] 更确切地说，这里有五个重要原因来解释为什么葡萄牙的好望角航线没能取代伊斯兰的贸易影响力。首

先，新的好望角航线利润并非特别丰厚，因为它没能降低运输成本。第二，事实上，更大规模的贸易是经黎凡特和威尼斯进入欧洲的路线，依次经过了红海、波斯湾，再转陆路商道而抵达。实际上，甚至直到1585年时，经过红海商道和陆路运往欧洲的胡椒和香料数量，仍是经好望角航线的三倍还要多。[42] 另外，仅10%的摩鹿加（Moluccan）①丁香是绕经好望角运入欧洲的。[43] 第三，新近的研究表明，在1650年之前，欧洲经过奥斯曼和波斯帝国出口到东方的金银数量，要远远多于流经好望角的数量。[44] 而且，在1650至1700年之间流经这些帝国的白银数量进一步增多了（也大大超过了流经好望角的数量）。[45] 然而，有人可能会说，葡萄牙人的确主导着白银对南亚的出口。那么令人吃惊的是，在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70年代之间，所有欧洲国家出口到东亚的白银数量通常为2240吨，日本出口的白银数量为6100吨。[46] 即使欧洲的数字被低估了50%，日本的白银出口仍然大大超过了欧洲国家的总和。第四，好望角航线无足轻重的明显证据就是，葡萄牙在东亚贸易利润的80%左右都是通过东亚国家内部贸易来获得的。事实上，葡萄牙大部分的利润都来自于商品套利而不是贸易，葡萄牙贸易垄断的神话被揭露无遗。第五，在16世纪印度洋贸易体系的船运登记总吨位中葡萄牙仅占了6%，这一基本事实表明葡萄牙的垄断地位纯属虚构。[47]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葡萄牙人肯定至少控制了香料贸易。但是，葡萄牙对胡椒贸易的控制状况恰恰证明他们缺少这种掌控能力。譬如在马拉巴尔②，他们千方百计采购和装运了当地胡椒生产总量的10%，而在古吉拉特的胡椒贸易中他们仅控制5%的份额。当葡萄牙人在1535年控制了印度港口第乌时，古吉拉特人很快就开始在孟加拉湾收集了大量的胡椒，从那里销往整个印度洋。同样，当葡萄牙人试图阻止来自卡利卡特的贸易时，就出现了新的贸易路线，来自卡纳拉(马拉巴尔北部)以及孟加拉湾和亚齐的胡椒贸易开始了。据查尔斯·博克瑟（Charles Boxer）③估计，在

①摩鹿加群岛是印度尼西亚东北部马鲁古群岛的旧称。——译者

②印度西南部一沿海地区。——译者

③英国史学家（1904—2000），善治荷兰史及葡萄牙商业和殖民史。——译者

1585年，仅亚齐人出口到吉达港（位于红海）的香料数量，就几乎相当于葡萄牙人经好望角进口到欧洲的香料总量。[48] 如果说葡萄牙人对胡椒贸易的控制不足以称道的话，那么他们对其他香料贸易的控制更是毫无效果。葡萄牙人唯一能够基本垄断的香料是桂皮。对于葡萄牙国王来说很不幸，这证明是一种皮洛士式的胜利①，因为“实际上主要利润都被那些监守自盗或从事桂皮贸易的总督和官员中饱私囊了，尽管在果阿和里斯本都颁布了法律来阻止这类渎职行为”。[49]

有人会指出，葡萄牙人在整个印度洋强制实施的“特许状”制度，可以证明葡萄牙的贸易垄断地位。也就是说，所有非葡萄牙船只必须携带一种“特许状”，这要求船主向葡萄牙人付费或纳税。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许状”制度似乎更多的是葡萄牙人一种无形的让步，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建立，更不用说维护在整个亚洲地区贸易的垄断。传统欧洲中心论观点忽略了“特许状”制度不过是亚洲人达到其自身目的的一种手段罢了。因此，许多亚洲商人悬挂葡萄牙国旗并非一种屈服的标志，而是作为一种在葡萄牙港口利用其低关税的一种手段（因为葡萄牙船只支付的关税率较低，只有3.5%，而其他船只则是6%）。即使对那些没有携带“特许状”的船只，接受葡萄牙人的管理仅仅意味着必须额外缴纳5%左右的关税。这就是葡萄牙人垄断的全部含义，这一相对微不足道的税额很容易通过稍微抬高商品价格来补偿。[50] 而且，许多亚洲船主选择购买“特许状”，是因为这要比武装自己的船只划算得多。亚洲商人面临的问题并非他们不能够与葡萄牙军事力量相抗衡，而是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印度洋贸易体系的航线一直是很平静的。因此，对亚洲人来说，武装船只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非理性的。所以，“当葡萄牙人决定投入武力以敛取保护费时，古吉拉特人决定支付保护费……这样他们便能够继续进行自主贸易”。[51] 无论如何，这都证明是成本更低或者“经济上更加理性”的选择。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谓的1434年“帝国禁令”颁布之后，许多中国私商在航行时携带着在马六甲或澳门买到的证件。因为这可以使船只在官方

①得不偿失、代价过高的胜利。皮洛士乃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译者

认可上葡萄牙化，从而使他们能够成功绕开禁令（而且成本很低）。[52]

因此对许多亚洲商人而言，葡萄牙旗帜实际是一种“方便旗”，而非麻烦。如果葡萄牙人已经主宰了印度洋，排除了其他人（显然不符合事实），那么我们如何解释古吉拉特人，以及其他流散海外的东方商人愿意与葡萄牙人合作，并为其贸易提供大量资金呢？这是因为通过与葡萄牙人形成共生的贸易联盟，亚洲人能够获得重要的贸易利益。[53]

甚至当亚洲人拒绝支付这种费用时，葡萄牙人常常发现他们是无能为力的。例如，当日本的“朱印船”受到葡萄牙人（或其他欧洲大国）的攻击时，他们将此事通报给长崎的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就查封和扣留欧洲的船只，直到得到赔偿金后才将其放行。这就回到了先前讨论的欧洲处于军事劣势的话题。事实上，葡萄牙人征服的美梦很快破灭，他们于是安静下来，成为印度洋诸多贸易群体中的一员。托姆·皮雷斯在其著作《东方概要》中谈到，即使在他们所谓的据点——马六甲——有不少于84种语言，[54] 这表明葡萄牙人只不过是其他众多客商中的一员（而且不是特别重要的一员）。

荷兰人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但构建一种帝国贸易垄断体系被证明只不过是一种幻想。特别是他们垄断贸易和抬高价格的尝试，都常常事与愿违。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荷兰试图建立对丁香的垄断。在17世纪60年代，他们毁掉了控制区之外的丁香树，丁香的价格上涨了两倍。但这很快导致了欧洲市场的动荡。解决的办法是向欧洲引进巴西的“丁香木”。最终，荷兰的垄断企图失败了，从巴西涌入欧洲的廉价丁香供应过剩，结果是大大削减了荷兰人的利润，这原本是其获利最为丰厚的亚洲贸易业务之一。[55] 总之，由于全球竞争的压力，荷兰人没有能够实现其垄断计划。

毫无疑问，尽管竭尽所能，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仍未能在亚洲任何地方建立垄断市场。荷兰人差不多可以垄断的只有一种特别的产品——丁香，但正如前边提到的，这很快就证明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胜利。此外，这一个案只是“反欧洲中心论规则”的一种例外。因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所介入的其他每一种商品市场中，竞争高度激烈的全球市场状况，使得荷兰贸易垄

断的自吹自擂更多的是一种如意算盘，而非事实。这里可举出很多例子，但其中两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关于印度洋西北部的棉布贸易。在这里，荷兰人不得不与古吉拉特商人进行竞争。在这一贸易中，荷兰人试图获得微不足道的10%的市场份额。而且，古吉拉特人获得的利润幅度要比荷兰人更高。这自然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恼火的原因之一，并派人对这一原因进行调查。范·桑滕在报告中指出：

> 卑弱的古吉拉特商人如何能与强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竞争高下？公司职员自己的回答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印度商人进行贸易的成本要低得多……此外，正如荷兰职员所承认的，当印度商人买进或卖出商品时，他常常对市场的运作有着更为全面的了解。[56]

范·桑滕接着指出，“在经历了几十年让人沮丧的财务收益后，东印度公司承认失败，并在17世纪60年代终止了这项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也试图参与穆哈地区[①]的棉布贸易，但面临着同样的问题。17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出口了约7万匹的棉布，但这与1647年古吉拉特人销售的99万匹比起来显然是微不足道的。[57] 因此，荷兰人与其葡萄牙同行一样，发现除了坐下来并与其他诸多东方贸易团体一道，成为亚洲体系中定期往返贸易的组成部分外，几乎别无选择。

欧洲人在政治上主宰亚洲的神话

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出现了：如果军事力量不能确保欧洲的贸易垄断地位，那么欧洲人是如何在亚洲贸易圈内维护他们（虽然不太显著）的地位或落脚点的？欧洲人——先是葡萄牙人，而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除了与更强大的亚洲政权和商人联合、合作以及有时卑躬屈膝外，别无选择。因为尽管葡萄牙人最初吹嘘要“与（伊斯兰）异教徒拼死抗争”，但

①今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西南一港口城市。——译者

当他们到达印度时，“他们也就进入了伊斯兰霸权的势力圈”，并且除了合作外别无选择。[58]

这种相互合作或合伙关系有多种情况。第一种是亚洲君主授予葡萄牙人有限的“治外法权”，这包括在中国澳门、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圣多美和孟加拉的胡格利河的定居点。第二，因为财力不足，葡萄牙人除了依赖当地的资本来源，尤其是印度大商人的资金外别无选择。第三，葡萄牙人和亚洲商人勾结在一起，互惠互利。在一艘葡萄牙船只上，亚洲商人装运的货物通常比葡萄牙商人的货物还多。皮尔森（M. N. Pearson）[①]这样指出：

> 似乎是葡萄牙人向古吉拉特人的船上输送货物，反之亦然，杂乱无序通常是葡萄牙国内私人贸易的典型特点。这是大多数葡萄牙人的兴趣所致，而非政府不切实际地去试图进行垄断。[59]

第四，葡萄牙人除了依靠当地的智力资源外别无选择。如布罗代尔所述：

> 在坎大哈……一名印度商人误认为这些西班牙人是葡萄牙人，提出愿为他效劳。这些印度人解释说：“因为贵国人不会说本地话，如果没有人充当向导，必定会遇到困难。”随着时间的流逝，帮助、合作、勾结、共处乃至相依为命，逐渐成为理所当然。[60]

直到1800年前后，同样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荷兰人和英国人。与葡萄牙人一样，荷兰人和英国人与亚洲人以多种方式进行合作，不只是相互雇用船员，甚至租用整个船队，还借用亚洲的资本。[61] 标志之一就是荷兰人和英国人不久就走上了与葡萄牙人相同的道路，开始卷入盈利丰

---

①当代澳大利亚史学家，长于葡萄牙帝国时期印度及印度洋历史研究，著有《1500—1800年印度洋世界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史研究》等。——译者

厚的亚洲内部的“国内贸易”。事实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在1648年写道：“这种‘国内贸易’及其创造的利润是公司的灵魂，必须悉心经营，因为如果灵魂衰竭了，那么整个身躯就将毁掉。”[62] 正如我们在第4章指出的，荷兰人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于金银贸易。同样，由于长期缺乏对亚洲贸易的商品，英国人也卷入到亚洲国家的国内贸易：

> 由于无法完成仅仅10%的出口定额，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在票据上弄虚作假，以减少出口“总额”，而且它一直不能摆脱为自己从亚洲进口货物寻找资金的压力。因此，它卷入到亚洲内部的“国内贸易”。这种贸易比亚洲—欧洲贸易兴旺得多，也更有利可图。[63]

再一次，荷兰人和英国人很快便发现，他们除了与亚洲商人和统治者合作、偶尔向其屈服外几乎别无选择，并且完全依靠后者的善意。[64] 仅仅是为了分得利润丰厚的亚洲贸易的一小杯羹，欧洲人准备忍受的屈辱程度并不亚于荷兰人在日本的遭遇。荷兰人被限制在长崎港口小小的出岛上（宽82步，长236步）。在两个多世纪里，

> 荷兰人受到他们的日本雇员暗中监视，受到一个由150人组成的庞大官方翻译团的控制，每年只允许一艘船前来，而且其官员通常会“像狗一样遭遇棍棒”。他们每年被允许登岸一次，以表达对幕府将军的敬意。[65]

结　语

总的来说，葡萄牙人（以及荷兰人和英国人）海上“帝国”最大的遗产，不是在多大程度上，而是在多小程度上改变了1500年至1750/1800年间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那么结论就难以避免：“欧洲时代”或是“亚洲的瓦斯科·达·伽马时代”证明只不过是欧洲中心论追忆过往历史的喃喃自语而已。这同时也证明了第4章的论点：至少在约1800年前，

印度、东南亚、日本、中国以及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十分强大，足以抵御欧洲人的入侵。考虑到这些，我们通过对葡萄牙国王曼纽尔一世和奥斯曼帝国皇帝塞利姆一世对帝国的炫耀来进行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在1499年8月28日写给教皇的一封信中，曼纽尔吹嘘自己是“几内亚君主以及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征服地、航海、商业的统治者”。虽然这很可能会给教皇留下深刻印象，但它证明完全是一种虚幻的声明。在这方面，塞利姆一世的夸耀更为接近事实：

> 现在所有的领土，埃及、马拉亚提（Malaytia）[①]、阿勒颇、叙利亚、开罗城、上埃及、埃塞俄比亚、也门，一直到突尼斯、汉志、麦加城、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的广袤土地，上帝增加了其荣耀和尊重，并将其完全赐于奥斯曼帝国。

而且更接近事实的是奥斯曼苏丹苏里曼（欧洲人称之为苏里曼大帝）在1538年宣称：

> 朕乃苏里曼，这一名字在麦加和麦地那的星期五布道中被颂扬。在巴格达，朕乃伊朗王；在拜占庭王国，朕乃凯撒王；在埃及，朕乃苏丹。朕的舰队远征到欧洲、马格里布和印度的海域。[66]

因此，罗伯茨的引文（一开始所引用的）有必要予以修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事实，讨论（1500至1800年之间）发生过什么……那么将欧洲置于（亚洲）历史的中心是极不正确的。”现在看来，极为相似的结论也适用于这些世纪欧洲的发展，我将在以下章节中加以讨论。

---

①在土耳其。——译者

第三部分

作为"后发地区"的西方与后发优势：东方全球化与西欧作为先进西方的重塑，公元1492—1850年

第8章

1492年神话和发现美洲的不可能性：亚非对西方后来居上的贡献，公元1492—约1700年

发明创造对世界的作用、功能和影响绝不可低估，这在印刷术、火药和罗盘（指南针）的发明中表现的最为突出，因为这三种发明彻底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

弗兰西斯·培根，1620年

欧洲扩张的伟大时代，并不是被压抑的（理性）活力的迸发，它发端于衰落文明的动荡边缘……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注意的话，15世纪的欧洲看起来是停滞不前和乐于内省的。欧洲整个经济还在与伊斯兰世界之间持续的贸易逆差中痛苦挣扎，无法保证自己民众的温饱。

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对黑人们来说，平等是不可能和无法企及的。根据这种信条，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一开始就用“伽南的诅咒”来谴责异端的黑人；然后通过“皈依”来剥夺他们自由的希望；最终使其屈从于人类奴役的地位。

杜波依斯

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纪年表中，其中的关键一年就是1492年。正是在这一年，欧洲人被认为发现了世界。因为到那时，只有欧洲人逐渐形成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性骚动”和“统治世界的道德规范”，这些理论一方面促进了现代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征服了世界。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标志，就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相反，东方社会还处于非理性的思维定式和长期的宿命论的压制下，产生了对世界的消极顺从和逃避。因此，他们的命运是沉湎于经济落后，只能等待欧洲人来发现和解放自己。这里我要批判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1492年神话”：欧洲是其自身发展的开创者，并且在十五世纪末达到了世界的顶峰。

事实上，肇始于公元500年后的亚非大发现时代（第2章）不仅早于哥伦布、达·伽马的发现，而且就经济和军事力量来说，直到十九世纪欧洲仍然落后于大多数东方国家（第3章和第4章）。本章认为，在1500—1800年期间，欧洲只是在追赶东方。欧洲不是一个先发地区，而是一个后发地区，拥有“经济落后的优势”。[1] 也就是说，欧洲并非独自开启了自身的发展，而是不断吸收或竭力仿效东方先发国家创造的优越的资源配置，所有这些资源都是通过东方全球化向外传播的（见下文）。此外，欧洲对美洲和非洲资源的掠夺也促进了欧洲赶超的步伐(见下文第一部分)。

发现美洲的不可能性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神话

欧洲中心论者将哥伦布的发现作为欧洲现代智慧的象征来庆祝，依其陈述，这种智慧表现在欧洲先进的船运，高超的航海技术，以及与所谓的西方文艺复兴相联系的现代科学和理性意识的兴起中。在最后一章里，我讨论了“达·伽马神话”。我认为，事实上促成他抵达印度的所有的一切——他的船舶、航海技术及技巧——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于中国或伊斯兰中东地区。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哥伦布，因为没有这么多的东方智慧，哥伦布根本不可能在第一次航行中就穿越了大西洋。

准确地说，将哥伦布作为一系列现代理性主义思想代表的假设只是一个神话，因为从根本上看，他的航行（和达·伽马的航行一样）和最初兴

起于11世纪的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动机紧密相关。由于我将在最后一章详细陈述这些，故而在此不再赘述。必须说明的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达·伽马以及西班牙王室一样，都对反伊斯兰教的圣战理念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他确实要寻找黄金，但这对资助收复圣地却是必要的（相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欧洲更落后）。哥伦布在1492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他“希望找到大量的金子，让西班牙国王能够在三年内做好准备，实现对圣地的征服”。[2] 更重要的是，他在1503年引用了马可·波罗的话，“中国皇帝曾请求智者教他学习基督教教义”。哥伦布会不会把他的使命看作是一个“智慧的国王”回到东方去传扬福音？无疑，他将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去履行一种神圣的使命”。[3] 哥伦布出航那年，西班牙建立了宗教裁判所，同时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了格拉纳达，这些事件并不是巧合。因为哥伦布本人在他的初航中，记录了格拉纳达的收复和他的航行之间的直接联系。[4] 此外，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各个教皇通过一系列的敕令来规定航程。更重要的是，西班牙对美洲、葡萄牙对亚洲的征服都是经过政府批准的，因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对1494年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的裁决，具有宗教上的合法性（当然，后来欧洲新教国家还是拒绝了这种合法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伴随大航海的是一种正在兴起的欧洲身份，这种身份明显刻上了西方优越于“非欧世界”的印记。自相矛盾的是，这与基督教是相伴而存的（种族主义出现的更晚，我将在第10章阐述）。不过，欧洲人显然认为印第安土著（以及后来的非洲黑人）是劣等的，以至于他们被公然地认为“适于剥削”和“适于改造”。贴上“印第安”标签具有深刻的意义，因为它表明哥伦布“发现美洲的不可能性”。他在临死前仍然固执地坚持认为他发现了中国及东印度（这也是美洲土著被叫做印第安人的原因）。事实上，他所提出的各种证明发现了亚洲的地理证据都是假的（这些证据全都在正统基督教的世界地理概念框架之内）。在众多例子当中，有两个是值得注意的：他认为古巴是日本（Cipangu）（马可·波罗所说的日本），尽管一踏上那片土地，他就及时地改变了想法，但后来还是断定那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中国大陆；当那些土著的“印度人”说到“加勒比”（Cariba）（加勒比居民）时，哥伦布听成是“Caniba”(亚洲可汗

的臣民），再一次“证明”了其不可能性！因此，埃德蒙多·奥戈尔曼（Edmundo O'Gorman）[①]颇有见地地指出，哥伦布不是发现了美洲，而是发明了美洲。[5] 哥伦布的思维模式在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②]的话中很容易看出：“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呵！一个多么坚强并理想坚定的人呵！他幻想他每一步中的所见所闻都能得到赞同。”[6] 毫不奇怪，把美洲大陆命名为“哥伦比亚”（Columbia），证明是不可能的。此外，在哥伦布的意识中，“美洲的不可能性”一点也不比他对那里遇到的人们的认知更明确。

哥伦布一踏上美洲大陆，就信奉两种对待土著人的观点，这两种观点都是在他已有的基督教世界观基础上形成的。那些对他友好款待的人们，被视为纯真的“大自然之子”，是基督教的根基；那些敌对的人们——包括那些拒绝“皈依”的人们，他认为必须借武力、奴役或消灭来使其臣服。这样一来，能够接受同化的“高贵的野蛮人”就和那些注定要被奴役和灭绝的“低等的野蛮人”形成了对照，这便是著名的“1550年巴利阿多里德论战”（Valladolid controversy of 1550）[③]的背景。当时，胡安·德·塞普尔维达（Juan Gines De Sepulveda）[④]用“低等的野蛮人”的概念来反驳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高贵的野蛮人”的概念，由于天主教会的支持，拉斯·卡萨斯最后获胜。天主教会必须选择支持，因为如果承认土著居民无法被基督教化，则违背了圣经中的人类同源论。此外，教皇在1537年断定，土著居民不仅有能力接受基督教，而且“他们很乐意接受基督教”。[7] 不过，哥伦布——以及他的西班牙同伴——并没有“发现”美洲，而是通过自己已有的有选择性的世界观，来解释（或“发明”）了美洲。或者正如托多洛夫（Todorov）所言：“他预先就清楚

①墨西哥作家、史学家、哲学家（1906—1995）。——译者

②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1474/1484—1566），曾致力保护西班牙帝国治下的南北美洲印第安人，对虐害他们的西班牙殖民者竭力控诉，其著作《西印度毁灭述略》是揭示西班牙殖民者种种暴行的重要文献。——译者

③发生于1550至1551年，地点是西班牙的城市巴利阿多里德，查理五世组织，论争主题是如何对待新世界的土著居民。——译者

④西班牙哲学家、神学家(1489—1573)。——译者

自己所要寻找的东西，真实的经历就在眼前，展示出一个已经拥有的事实。”[8] 美洲并不是以自身的真实存在而被“发现”，而是仅靠计划或强加的外在基督教的感知理解出来的。因而对哥伦布来说，发现美洲具有双重的不可能性。

尽管拉斯·卡萨斯在思想方面战胜了塞普尔维达，但要是认为教会中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就可以防止部分人受到不平等对待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对待印第安人的两种观点导致产生了帝国理论的早期版本，这个理论主要在18和19世纪的英国发展成熟起来（见第10章）。拉斯·卡萨斯“仁慈”的观点还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一种帝国使命——在这一使命中，土著人将会被“文化改造”；他们的身份和文化习俗将会按照西方基督教的模式进行改造。更关键的是，拉斯·卡萨斯从未挑战西班牙对土著人进行统治的特权，也不认为他们应该获得自决权。这样，用托多洛夫的话来说，辩论总是预先假设土著人是低等的，并以一种与殖民主义或社会同化主义相反的奴役意识形态为基础。[9] 这样，这些表面上相对立的土著意识形态观念，尽管很棘手，但也一样合乎逻辑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那些北方清教徒相比，这些观点看起来还“相对宽容”。清教徒偏执地憎恶那里的土著人，导致了没有对印第安人进行“文化改造”，而是把灭绝作为“首选方案”并进行社会隔离。[10] 而当史诗般的影片《西部开拓史》（How the West was Won）①讲述一个关于富有开拓精神和热爱自由的人们在地球上建立最伟大文明的故事时，却总有一种令人痛苦的沉寂来打断这种称颂。那种关于印第安人只不过是“野蛮的动物”或必须从其“窝”内铲除的“纯种狗”的观念，“到18世纪7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如此被普遍接受的公理，以至于被放大而镌刻在了美国人的出生证上”。[11]

但是，回到叙述之中：天主教会的说教，带有18世纪及之后出现的英国帝国理论的一些特征（尽管并不明显）。毫无疑问，18世纪欧洲关

①美国米高梅公司1962年拍摄的史诗巨片，亦译《平西志》，讲述一家三代在各种时代背景下的艰难曲折，通过这个家庭从19世纪早期到1880年代半个世纪的迁徙历程，描述了白人开发美国西部的历史。——译者

于“文明”是由西方垄断的观念，实际上是一个“庸俗化了的原始的西方基督教命题”：“除非在教堂，无人得以拯救”（或者说“教会之外无救赎”）。[12] 在西方天主教会，就无法得到超度。这一点，西班牙颁发的一本宗教读物开宗明义地认为，这是“对印第安人的最后通牒：要么承认基督教的神圣，要么接受战争”。[13] 读物正文的主要内容引述如下：

> 作为上帝的仆从、信使，我代表上帝……尽最大可能要求你们承认教会就是普世的君主和尊者……（如果你们这样做了）我将以上帝的名义和上帝一起接受你们……如果你们不这样做，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将对你们施以武力，我将随处宣战……我将迫使你们屈服并顺从教会……我将掳走你们的妇孺，使他们变为奴隶……我会将所有的罪恶和灾难施加给你们，就像君主会把罪责和灾难降罚于桀骜不训或不顺从他的臣仆一样。[14]

正是这种思想，致使基督教会毫无疑问地认为它能够简单地分裂或者瓜分欧洲以外的世界，并将战利品赠给两个主要的天主教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托德西利亚斯条约》）。总之，欧洲人的理解意味着，既不可能设身处地为美洲土著着想，也不可能考虑他们的尊严、平等和自由。所有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美洲土著的历史成为空白或盲点，有待西方基督教去记录、填补和利用。

非洲也被引入和贬低到欧洲的“美洲经验”之内。不过，在此寻找一种现成的、完整的思想方式是棘手的，因为对非洲人的贬低是建立在一整套特定的基督教思想之上。无论如何，欧洲人开始相信非洲的奴隶身份是与生俱来的，因为这是神的裁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圣经中对哈姆的诅咒（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迦南的诅咒）。《创世纪》故事中，在第9章的18—26节有这些内容——哈姆见其父诺亚裸身醉酒，便嘲笑了他。为此，上帝不是诅咒哈姆，而是诅咒了其子伽南（因而这被称作“哈姆的诅咒”，好像是中世纪时的阿拉伯人最先把这个诅咒从迦南转到哈姆身上）。[15] 然而，这个咒语却将伽南（及其所有后代）判罚为“给

其弟兄们做奴仆的奴仆”（见第9章25节）。即便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宗教信仰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观点。正如乔治·弗雷德里克森（George Frederickson）[①]指出的，诅咒的作用：

> 在于民间信仰和神话学的层面上，而不是规范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它遭到了博学的权威人士的反驳，他们只是注意到诅咒是明确地降罚于伽南的，而不是给他的兄弟古实的，根据16及17世纪标准的圣经注解，古实才是非洲人种的真正祖先。[16]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种作为一个独特的概念，已不再用于贬低非洲人了。但正如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所说，大约在1440年后，葡萄牙人一直在从事黑奴贸易。因此，他认为，“即使在美洲发现之前，一些伊比利亚基督徒就很可能把黑人看作是上帝注定的‘伐木工和运水工’，而不是把他们看作是具有基督教美德的典范”。[17] 但是，尽管黑人的“卑贱性”已被确立，将奴隶与黑色联系到一起的，却是一种在欧洲人的认知体系中酝酿了几个世纪的思想。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奴隶贸易的结束，才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科学种族主义的兴起。

问题的关键是，正是这些贬损非洲黑人的观念被合法化，或者是被作为工具使用，才导致了悲剧的产生。由于文学作品掩饰了这一点，我就简单地指出这一故事的一些显著特征。我们不能被一些历史学家的辩词所迷惑，他们声称“中间通道”（从非洲开始的海上旅程）的恐怖故事，不过是言过其实的“废奴主义宣传”的产物。对黑奴们来说，危害最大的是由于脱水和痢疾引起的体力衰竭。黑奴们通常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他们坐的那片地方拉屎撒尿。正像当时一名船上的医师描述的那样：“甲板，也就是他们房间的地板，到处都是血迹和尿液，简直像个屠宰场。”[18] 运奴船的恶臭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离海岸还有数英里之遥，美洲当地人就

①美国历史学家（1934—2008），长于种族史研究，著有《白种优势：美国与南非史的比较研究》等。——译者

知道他们快到了。众所周知，船长们经常把生病的黑奴扔到海里。当时的一位观察家这样为我们描述了18世纪后期利物浦奴隶贸易的情形："黑奴们被如此频繁地扔进海里，以至于鲨鱼跟了数英里，它们盯着船只，等待食物。"[19] 当时一个名叫奥兰达·厄奎亚诺（Olaudah Equiano）的黑奴的话表述了运输航程中的真实情况，他向我们讲述了亲身经历：

> 我很快就被扔到了甲板上（运送奴隶的轮船），在那里，我闻到了一股从未闻过的气味：如此令人厌恶的恶臭，夹杂着哭喊声，我感到如此的虚弱，难以下咽。此时此刻，我渴望死亡——这个最后的朋友——来让我解脱。[20]

的确，对于许多黑奴来说，死亡往往意味着解脱。文学作品中有关黑奴贩运数量的记载，较低的估计是1200万，较高的估计约为2000万，但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约有1500万。还有一种共识认为死亡人数的平均比例至少为10%。因此，合理的估计是（如果不是很保守的话），仅仅在"中间通道"就有约150万黑奴死亡。如果这样的死亡率发生在当时年轻的英国人群中，那将是一场灾难性的疫情。[21]

非洲黑人一下船，就被打上烙印，像牲口一样卖给奴隶主。[22] 尽管18、19世纪英国的白种工人阶层也遭受了非人的对待，但他们和黑人在美洲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及文化贬黜程度却不一样。在"强制劳动集中营"里，黑奴的寿命还不到七年。[23] 尤其折磨人的是"调教"制度或"环境适应"制度，这需要三年时间，奴隶主设法"抹除新买来的奴隶们的一切身份，摧毁他们的意志，并切断他们与过去的一切联系"。[24]

关于黑奴在美洲遭受的非人待遇，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①]在其《奴隶制度和社会的消亡》一书中进行了中肯的描述。[25] 正如他指出的那样，非洲黑奴在美洲所经历的遭遇，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所提出的异化观念。这种遭遇包含了一个彻底抹除奴隶身份，

①当代美国社会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译者

而实际上是奴役人性的过程。即便如此，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①]还警告我们，欧洲对待黑人们灭绝人性的办法并非往往都能成功。[26] 同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把非洲人看作是欧洲优势力量下简单的“消极受害者”也是不正确的。正如詹姆斯（C.L.R. James）[②]和杜波依斯最初所指出的，奴隶们采用了从自杀、消极怠工到公开反抗等多种抵制策略。[27] 事实上，奴隶们的反抗是促进废奴运动的因素之一。另外，如果没有非洲土著酋长们的积极帮助，首先在非洲进行猎奴活动，大概就不会有奴隶贸易了。而我们也不要忘记，在欧洲人辩称自己创造了全球经济之前的很长时间里，非洲人已经在缔造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类似地，西班牙也将土著印第安人看作是低劣的——尤其是那些抵制基督教的土著印第安人，从而导致了世界上另一个人类大悲剧。当我们试图估计印第安土著的死亡数量时，我们马上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去估计1492年（在哥伦布到达之前）的人口数量。那时的人口数量应在800万至1.13亿之间。威廉·德内文（William Denevan）[③]提供了一个为多数人接受的数字——即中间值5400万人。这个普遍为人接受的死亡人数，[28] 是1492年前人口总数的90%。如果考虑到1492年后新出生人口因素的话，16世纪欧洲入侵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应在5000万至1亿之间。因此，尽管印第安人在1492年占世界总人口的13%，但到1600年时，已经锐减至1%多一点。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结局。正如简·卡鲁（Jan Carew）[④]在针对大安的列斯群岛上的毁灭性破坏时所说的：

> 对欧洲入侵者来说，这是一个光辉的起点，但对毫不知情、友善的卢卡约人（Lucayos）[⑤]来说，这是末日的开始。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西班牙征服者、殖民者、捕奴者、疾病、饥饿和绝望，就像先

①当代美国历史学家，长于非洲史研究。——译者
②英国历史学家、社会主义理论家（1901—1989）。——译者
③当代美国历史学家，长于拉美史研究。——译者
④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教育家，1920年生于英国殖民地圭亚那。——译者
⑤巴哈马阿拉瓦克人的一支，已灭绝。——译者

知预言一样，将死亡和毁灭倾注到大多数无辜居民的头上。[29]

另一个欧洲中心论神话认为，“征服美洲”是欧洲军事力量优越（所谓的黑色传奇）的一个明显标志。[30] 尽管这是因素之一，但它对解释悲剧延续的原因还不够。最初推动欧洲人征服世界的主要因素，是欧亚大陆病菌和疾病的输入或引进。[31] 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土著人基因低劣，而是他们没有形成足够的免疫系统来抵抗特异的欧亚疾病。正如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①指出的，结果是疾病削弱了土著人的抵抗能力，从而对欧洲人的枪杆束手无策。[32] 布劳特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洲人不是被征服了，他们是被传染了”。[33] 不管是“黑色传奇”，还是根本毫无传奇，我们都不应该抹杀这样的事实：在西班牙统治下，美洲人受到的残暴虐待是人类的末日。

同样重要的是，把印第安人和非洲人贬低为下等人，因而他们“自然”注定要受欧洲人的剥削。“美洲的不可能性”（或者是对印第安人及非洲人平等，或哪怕一点点尊严对待的不可能性）的悖论是，它打开了掠夺美洲资源可能性的大门——包括土地、劳动力和金银等。我们在第3章中已指出，到1500年时，欧洲还不能生产大量让亚洲消费者感兴趣的东西，他们还在忙于购买亚洲商品。的确，在1500年，欧洲落后的最明显标志是它与亚洲长期的贸易逆差，甚至连欧洲中心论学者约翰·罗伯茨也承认，“要是没有来自美洲的财富（主要是白银），就很难与亚洲建立贸易关系，因为欧洲几乎不能够生产亚洲需求的任何东西”。[34]正因为欧洲人不能够生产足够的亚洲人想要的商品，所以他们就不得不用金银（主要是白银）来支付。但是欧洲人的储备不足，因此，掠夺或侵占美洲（及非洲）的金银就成了欧洲人的救命钱，美洲印第安人土著和非洲奴隶的淘金劳动同样也拯救了他们。[35] 事实上，尽管非洲黑奴们与美洲土著人共同参与了白银的开采，但他们主导了淘金业。[36] 正是在这个方面，非洲对西方追赶

①当代美国历史学家，著有《生态帝国主义：900—1900年的欧洲生态扩张》等。——译者

的贡献最初是非常明显的。在1500年后的300年里，世界上85%的白银和70%的黄金都是由美洲生产的。绝大多数的金银被运到了欧洲，然后流向亚洲，从而弥补世界上一度出现的、持续时间最长的洲际贸易逆差。大多数的金银被运到了中国，还有不少被运到了印度。

另外重要的一点（在第3章提到的）是，黄金和白银成了可以买卖的全球化性“商品”，通过买卖，能够从金、银汇率差价中赚取一定的利润（套汇），我把它叫做“全球白银循环过程”。1498年后，欧洲贸易商在亚洲的主要利润来源即在于此。因此，如果没有印第安土著和非洲黑奴的劳动以及西班牙统治下美洲金银的供应（以及中国和印度经济对白银的强劲需求），就不可能出现全球套利体系，欧洲人也不可能清偿对亚洲长期贸易逆差的来源。最后，更最重要的是，在18至19世纪，黑奴制度、奴隶贸易、美国黑奴生产中心及黑奴市场，都为英国的农业和工业技术的“突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见第11章）

最后，对欧洲人来说，美洲另一个主要贡献就是，他们被用于支撑和重塑西方的身份。事实上，将欧洲重新定义为先进西方的关键因素，是欧洲在1492年后将自己的边疆向西扩张到了美洲。这也伴随着“他者”范畴的扩大，现在囊括了非洲人和美洲人。这一帝国计划的成功对于这种观念的塑造——首先从罗马帝国开始——欧洲就代表了先进文明是至关重要的。这样，边疆的向西扩张使得欧洲人的身份发生了转变，即从一种边缘地位上升到更高级的“先进文明”地位。这也加速了东欧和西欧之间的分裂，后者通过对远西地区[①]的扩张，开始发展商业和海军力量，前者囿于内陆，继续保持封建主义制度，成为东方防御伊斯兰的缓冲区。还应注意的是，15世纪后，随着奥斯曼土耳其人和东欧人被想象为野蛮人，“西欧”的概念也开始明确化。[37] 因此，在16和17世纪期间，通过东部近邻“异教徒或蛮夷”和西部、南部近邻“野蛮人”的衬托，西欧的身份越来越明确了。

如果说美洲在促使西欧追赶东方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话，那么

①历史上曾指今美国的中西部，尤指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现指落基山脉至太平洋沿岸之间的地区。——译者

发挥同样作用的还有对更先进的东方思想和技术的吸收，这些思想和技术是通过东方全球化而传播的。这也构成了对1492年神话反驳的第二个要点，我将在本章其余部分予以阐述。

“东方文艺复兴”与西方文艺复兴的三个悖论

许多欧洲中心论学者认为“欧洲动力”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据称它是以必不可少的“科学理性”和“个人主义”为欧洲提供了发展的动力。文艺复兴被认为纯粹是古希腊科学的重新发现，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表述是：

> 欧洲并没有从东方汲取什么创造现代科学所不可或缺的东西；另一方面，其借鉴的价值仅仅是因为它被融入到了欧洲的理性传统之中。当然，这些理性传统是在（古）希腊创建的。[38]

但这模糊了一点，即构成欧洲文艺复兴和后来科学革命（以及启蒙运动——见第9章）的许多重要思想实际上起源于东方，并通过东方全球化，经由伊斯兰的世界桥梁向西方传播的。如迈克尔·爱德华兹所述：

> 整体上，在这一伟大的文化蕴育时期，人们很少或没有关注东方。实际上，文艺复兴带着一种对古老世界的特定幻象，而对东方不屑理睬。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没有敏锐地意识到东方的存在。……尽管文艺复兴是以古典（希腊）的面孔出现，但充斥着东方的影响因素，常常被加以掩饰，其根源几乎从未得到承认。[39]

然而，欧洲中心论者有时也承认文艺复兴的一些思想来自中东。但由于消除了东方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独立作用的可能性（如伊斯兰条款），这些又被否认了。这些条款认为，穆斯林无非是古希腊典籍的持有者或传送器，穆斯林所做的只是将它们奉还给发源地。因此，人们典型的看法是，

“最终，希腊人的衣钵传到了伊斯兰世界，在真主的怀抱里，古希腊的遗产得以保存下来，直到西方的兴趣被重新点燃”。[40] 总之，穆斯林只是被描绘成图书管理员，而非有创见的思想家。尽管故事惟妙惟肖，但却与大量的事实不符，证据表明有很多独创性的东方思想渗透到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之中。正如威廉·麦克尼尔所言：

> 西方人发现穆斯林所拥有的缜密思维和渊博学识，远远超过了从古罗马那里所获得的……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可能没有人能够比他们（欧洲人）更安于窃用这些外族遗产了，除非是希腊人在公元前6世纪就汲取了这些东方（埃及）文明。[41]

诚然，这不足为奇，因为“这一时期西方实际上没有什么‘知识’影响，或许基于这一原因西方能够提供的东西才如此之少”。[42] 不过，虽然中国在11世纪时似乎经历了文艺复兴，[43] 但穆斯林的开创性贡献对于欧洲的知识财富来说更为关键。

在9世纪初期，阿拔斯第七王朝哈里发阿尔－马蒙（al-Mamun）就在巴格达建立了“智慧之馆”。在那里，希腊作品——特别是托勒密、阿基米德和欧几里德的作品被翻译成了阿拉伯文。但是阿拉伯学者也从波斯、印度（以及中国）吸收了大量的医学、数学、哲学、神学、文学和诗歌方面的成就。然后，他们在犹太科学家和翻译家的帮助下，创造了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这不仅仅是对希腊知识的简单篡合，也是对希腊思想的批判继承，同时使它们在新的方向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个过程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巴格达处在全球经济的中心，它不仅接受了新的亚洲思想，而且对其重新改造，然后传播到伊斯兰教的西班牙地区。公元1000年后，欧洲人越来越多地将伊斯兰教的科学成就译成了拉丁文。1085年西班牙托莱多的沦陷意义特别重大，因为在那里，许多欧洲知识分子获得了伊斯兰科技文献。到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世（1252—1284）时，欧洲人向伊斯兰世界的学习过程仍在持续，主要是通过犹太人媒介（像葡萄牙国王们那样）。在诸多例子中，值得注意的是1266年伊本·哈拉夫·穆拉迪（Ibn Khalaf al-

Muradi）的重要作品《思想的奥秘》，被托莱多宫廷翻译出来。这一文献以及其他许多著作向伊比利亚人介绍了大量的伊斯兰世界的发明。最后，意大利人也通过与中东的贸易联系以及在十字军东征期间直接学习到了这些思想。那么，穆斯林学者是如何补充了原始的希腊知识体系的呢？

伊斯兰世界数学的发展

杰克·古迪中肯地指出，“东西方在数学领域的发展是平行的而不是同一的。就几何学来看，早期的发展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古伊拉克）和埃及，后来才被希腊人掌握”。[44] 事实上，古伊拉克的学校就讲授代数学和几何学，他们早在公元前1700年就掌握了后来所谓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了解了圆周率（π）的价值。他们还发明了“六十进位法”，把圆周分成360度，每小时分成60分钟，每分钟分为60秒，每天分为24小时。在古伊拉克之后，通过古埃及和希腊（后者由于接近这些先发地区而受益），穆斯林在约公元800年后启动了下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进一步地推动了这些早期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数学家穆罕默德·阿尔－花拉子密撰写了一部影响广泛的著作《印度数字计算法》（约公元825年）。这本书为印度数字计算方法推广到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做出了巨大贡献。[45] 有趣的是，是中东腓尼基人（尽管他们把自己称做can'ani——或来自迦南的迦南人，位于地中海东岸）首先发明了数字。然而，印度人最大的创新是发明了十进位制中的9个数字和零。这一方法后来在公元760年左右被阿拉伯学者采用。[46] 同样，10世纪的许多伊斯兰学者，包括奥卡里德（al-Uqlidisi）、阿布－瓦法（Abu'l-Wafa al-Buzajani）、阿尔－马哈尼（al-Mahani）、阿尔－肯迪（al-Kindi）（800—873）以及库什雅·伊本·拉巴姆（Kushyar ibn Labban），进一步发展了花拉子密的成就。[47] 到10世纪末，这种方法已经在中东地区广泛推广，并传播到了伊斯兰西班牙，在那里，落后的欧洲得以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特别是通过科尔多瓦，以及1085年托莱多的陷落和1118年阿拉贡人攻陷萨拉戈萨）[①]。

①科尔多瓦，西班牙南部城市；托莱多，西班牙中部城市；萨拉戈萨，西班牙东北部城市。——译者

最初欧洲人并不善于使用这种计算方法，宁愿继续使用旧的珠算方法。但在1202年，居住在突尼斯的比萨商人列昂纳多·斐波那契，被东方的新观念所吸引，写了一本否定旧的珠算方法、赞扬新的印度—阿拉伯计算方法的书。这种新的方法最后才在意大利商人中间开始使用。毋庸置疑，正如查尔斯·辛格（Charles Singer）[①]所言，欧洲对这种东方数字方法的采用“是（西方）科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对16、17世纪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48]

花拉子密在代数学上的成就同样重要，并在1145年被凯顿（Ketton）的英国人罗伯特和克雷莫纳（Cremona）[②]的意大利人杰拉德（Gerard）翻译成了拉丁文。罗伯特将花拉子密的名字翻译成了“Algorithmi”（因此才有“算法”一词）。“algebra”（代数）一词来自于花拉子密的著作《代数学》(Al-Jabr W'almuqalah)(因而Al-Jabr被译为“代数”）的标题。此外，他的书直到16世纪仍然保留着相关这一题目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是通过各种超越了托勒密理论的伊斯兰发明逐步完善的。托勒密使用的“弦”基于一种非常粗糙的理论，阿尔－巴塔尼（Al-Battani）用“正弦”取代了“弦”。另外，通过阿布－瓦法（Abu'L-Wafa Al-Buzajani）的正切理论、阿布·纳撒尔（Abu Nasr）的正弦定理以及伊本·海赛姆（Ibn al-Haytham）(965—1039）的余切定理，球面三角学被大大推进了。[49]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到10世纪初期，穆斯林数学家们已经对六种古典三角函数全部进行定义，并将它们列成表格。[50] 13世纪中后期，纳西尔·艾德丁·图西关于平面三角学的论述，直到1533年欧洲数学家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51]

伊斯兰作为理性施动者的“人”的观念

穆斯林〔尤其是自由派（Mutazilites)〕提出了人是自由和理性的代表的思想——据称是现代欧洲思想的主题之一。这种观念在意味着向“理性的伊斯兰神学”迈进的穆罕默德死后不久就出现了（这样，穆罕默德的遗

①英国科技史学家、医学史学家（1876—1960），著有《技术史》。——译者
②意大利北部城市。——译者

训就不会被后来的政治权威们扭曲)。我们所知道的"ijtihad"(理性思辨),它涉及到独立判断的行使,尤其是上帝只能被独立的和个人主义的人类理性所领悟的观念。这种思想融入到了诸如阿尔－肯迪 (al-kindi)(800—873)、阿尔－拉奇 (al-Razi) (865 － 925)、阿尔－法拉比 (al-Farabi)(873—950)、伊本·西那 (Ibn Sina)(980—1037)、伊本·路西德 (Ibn Rushd)(1126—1198)以及阿尔－扎赫拉维 (al-Zahrawi)(936—1013)等学者的著作中。这些思想也与那些激励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的思想极为相似。阿尔－拉奇的重要观点是,通过理性的思考或推理,依靠个人的理解就能够直接获得所有 (宗教的和科学的)"真理"。相应地,这只有在思维不受非理性的情感影响时才能实现:总之,"客观性" 至关重要。同样,伊本·路西德 (在西方以阿威罗伊而知名) 也认为,科学探究只有打破宗教教条才能实现,并且只有基于合理的根据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

总之,伊斯兰哲学家和数学家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欧洲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世界汲取了他们的思想营养,从而使欧洲思想家们能够越过神权统治下天主教信仰的禁锢,而向个人主义迈进。穆斯林也开始接受客观性和科学实验的过程,这在后来直接影响了欧洲的科学革命。

伊斯兰科学方法:欧洲科学革命的前奏

伊斯兰科学革命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认为古希腊的思想决不是完美的,是可以受到质疑的。因此,

> 虽然穆斯林科学家并没有完全摈弃希腊传统,但是他们通过介绍一种知识应该如何发展的革命性的新观念,对希腊思想重新进行阐述,这种观念直到今天仍然主导着科学的方法。他们认为,更好的工具和更完善的方法将导致更精确的结果。[52]

在这方面希腊人并未完全理解。正是由于希腊科学实验的缺乏,伊斯兰学者才设法进行纠正。此外,伊斯兰学者也开始对众多领域遗留下来的传统提出质疑,如医学、卫生学、光学以及物理学等等。在这种新的科学

思维模式下，埃及的伊本·海赛姆撰写了一本关于光学的书，这在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埃及内科医生纳菲(Ibn al-nafis)(1213—1288)同样重要，其关于人体构造的著作，否定了古希腊医生盖伦的传统观点，比英国人威廉·哈维的很多成果至少领先了整整三个半世纪。

同样重要的还有阿尔－拉奇、阿尔－法拉比和伊本·西那等人的著作。他们在医学和卫生学上的成就对欧洲而言具有革命性的效力。阿尔－拉奇在自己的医院进行实验，为了防止疾病的传播，他把病人分成了两组，这促进了检疫措施的兴起，后来被西方广泛采用。[53] 他也开始传授各种关于疾病的知识，尽管大量的证据表明他是受到了早期中国发明的重要影响。[54] 总之，“在几个世纪里，阿尔－拉奇的医学著作对西方拉丁世界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55]阿尔–拉奇的译著在1498年至1866年间被重印了四十余次，这一事实证明了他对欧洲产生的影响。阿尔－法拉比（在西方被称为阿维纳萨尔）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科学书目》，被克雷莫纳的意大利人杰拉德和塞维利亚①的约翰翻译成了拉丁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伊本·西那（西方称作阿维森纳）的著作《医典》，在12世纪后期被翻译成拉丁文（与其百科全书《治疗论》一样）。此外，其《医典》一书直到16世纪后期都是欧洲医学院的基础课本。总的来说，阿拉伯对1050年后萨勒诺②学派的发展影响是深远的。[56] 非常有意义的是，中国也开创了现代医学的诸多领域，包括免疫学、法医学及医学检查的实施，所有这些都经由伊斯兰世界桥梁传到了西方。[57]

伊斯兰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同样影响深远。生活在14世纪的马拉盖③学派的伊本·沙蒂尔发明了一系列的数学模型，这些几乎与约150年后哥白尼在其日心说理论中的发明完全一样。这些模型如此类似，以至于诺埃尔·斯威德罗（Noel Swerdlow）指出，“这一系列的巧合似乎过于明显，就哥白尼来说难以确定其独立发现的可能性”。[58]其他学者也认为哥白尼借用了伊本·沙蒂尔的模型。[59] 与之相应地，哥白尼也被描述成是

①西班牙西南部港口城市。——译者
②意大利西南部港口城市。——译者
③今伊朗西北部大不里士城南。——译者

“马拉盖学派最著名的追随者”。[60] 此外，日心说理论至少大致在古埃及的“赫尔墨斯著作”（Hermetic texts）中最先发现。[61] 有趣的是，哥白尼在介绍他的著作时，明确提到了古埃及的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今天的任何科学家都不承认特利斯墨吉斯忒斯乃是鼻祖，但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一鲜为人知的埃及著作却享有极高的地位。”[62] 花拉子密早期关于天文学的著作也同样值得重视。他不仅完善了托勒密的著作《地理学》，而且绘制了包括很多行星位置的各种地图。这些地图对于航海和商业贸易非常重要。花拉子密还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误差小于0.04%（他仅仅多算了41米）。阿尔－比鲁尼(al-Biruni)和阿尔-伊德里斯（al-Idrisi）则进一步推进了他的这一成就。

因此，重要的是，早期伊斯兰思想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并推动了欧洲的科学革命。培根关于科学应该基于实验的思想，以及劳动分工能获得最大利益的观点，几乎和早期伊斯兰学者提出的观点完全相同。正如罗伯特·伯瑞弗尔特（Robert Briffault）①指出的：

> 关于谁是实验方法发明者的讨论……乃是欧洲中心论对于欧洲文明起源诸多误解的一部分。在（罗杰）培根时代，阿拉伯人的实验方法在整个欧洲得到了普遍推广和使用。[63]

然而，通过假定另一个伊斯兰条款，很可能会忽视：即使这些新的科学和个人主义思想是伊斯兰开创的，也会由于教会神权试图稳定其统治而遭到摈弃。因此，这只是一次“夭折的伊斯兰革命”。这与当时欧洲的形势正好相反：在欧洲，由于没有宗教的阻碍，从而确保了西方科学的自由发展（这继而又维持了“欧洲的动力”）。伊斯兰条款的主要问题，是它未能转变这一基本观点，即伊斯兰的知识成就对于欧洲的知识进步，尤其是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来说非常重要。虽然欧洲人最终成功地发展了这些东

①法国小说家、历史学家、社会人类学家（1876—1948），著有《人性的构建》《英帝国的衰亡》等。

方思想，[64] 但最初如果没有开创性的东方思想，也就谈不上有什么进一步发展了。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因素应该注意。文艺复兴可能不仅仅要归功于穆斯林、印度人和中国人，也要归功于非洲黑人。[65] 杜波伊斯指出，原始的希腊科学文献不仅传到了中东，而且扩散到了非洲；特别是亚历山大港和开罗（正如我们在第2章所见，直到1517年乃至以后，它们都在经济上支配着意大利商人）。此外，黑苏丹（Black Sudan）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文化和教育中心，它的文化很多又传播回了中世纪的欧洲。然而，虽然埃及人无疑对科学知识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66] 特别是通过建立于1005年的埃及智慧馆（Dar al-Hikmah），但其种族起源并不清楚。比较清楚的是，许多所谓的中东摩尔人，特别是那些居住在西班牙的摩尔人，起源于非洲黑人（因此中世纪的欧洲有“黑摩尔人”的说法）。这些种族的融合也造成了思想的融合。此外，非洲黑人还到西班牙的大学进行访学演讲，而西班牙人常常前往北非学习他们的思想。更深入的研究揭示了一些著名的埃及人，前边已经谈到过几个，都有黑人血统，〔杜尔－努姆（Dhu'l-Num）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然还有更早一点的北非人圣奥古斯汀，是另一个例子〕。有趣的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的雅典学派将阿威罗伊（伊本·路西德）描述为黑人。的确，古代埃及黑人，抑或努比亚人的思想影响了文艺复兴，尤其是通过“赫尔墨斯著作”的引进〔其中许多文献是在1460年后由费其诺（Marsilio Ficino）①在柯西莫·美第奇宫廷翻译出来的〕。[67] 无论如何，杜波伊斯留给了我们一些令人深思的诘问：

> 难道黑非洲地区对文艺复兴没有任何创造性的贡献？没有任何科学是来自黑人的智慧？那一时期欧洲对黑人种族的称颂或赞美，是否仅仅出于好奇或是宽容？或者是否黑人诸多文化贡献的被遗忘或不被承认，更可能是因为黑人的肤色并不重要，或是不为人所知

①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佛罗伦萨柏拉图学院派著名代表（1433—1499）。——译者

> 或忽略了，或是因为对于现代欧洲来说，黑非洲的文明一直是一种矛盾？[68]

最后，重要的是，这整个过程是建立在三个残酷的悖论基础上。首先，在穆斯林向欧洲提供新的和更先进的思想的同时，基督徒却在妖魔化伊斯兰教徒，并通过十字军东征向他们开战。第二，东方向西方的文艺复兴提供了很多思想，但随后发现欧洲人反过来虚伪地宣称他们首先独创了这些思想。而且，欧洲人后来断言西方乃是先进的理性文明的化身，而把东方贬黜为低等的文明，只是一个非理性的知识荒漠。第三，也是最残酷的悖论，即：正是这种西方优越性的建构（主要是通过“科学理性”来界定的），促使了后来西方针对东方的帝国文明使命的兴起。

印刷术的东方起源：约翰·古登堡的神话

毫无疑问，印刷术的出现为欧洲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如果没有书籍的印刷，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影响将会大大削弱。玛丽·博厄斯（Marie Boas）①解释道：

> 印刷业使得科学的发展更加顺利：它使发明的印刷出版越来越普遍，从而确保新的思想不会丧失，也便于为其他人的创造提供基础……出版物极大地便利了知识的传播，人们普遍认为，没有出版的科学著作很少有机会对他人产生影响。[69]

印刷术的另一个影响是它有助于推动民族主义的兴起，[70] 以及官僚政治的巩固和更广泛意义上的欧洲经济发展。[71] 总之，说印刷业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文明的特征，似乎并不为过，但把印刷术的发明归功于约翰·古登堡似乎是不合适的。

---

①美国历史学家（1919—2009），著有《1450—1630年的科学之复兴》等。——译者

正如迈克尔·克拉彭所指出的，试图去探究“印刷术的唯一发明者，以及美因茨[①]的约翰·古登堡与哈勒姆[②]的劳伦斯·科斯特（Laurens Coster）的支持者之间形成的自然竞争，不仅导致了某种虚构，而且对证据的解释更是弄虚作假”。[72] 我们所知道的是，印刷术的起源可以直接追溯到6世纪时的中国和14世纪早期的朝鲜。木版印刷术出现在6世纪时的中国。雕版印刷在9世纪初发明，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出版物出现在868年。在约公元950年后，书的印刷数量逐渐增多。[73] 早在953年，冯道[③]就负责印刷了儒家的经典文献——“这一行为对于中国印刷业的意义，几乎相当于后来古登堡印刷圣经对于欧洲的意义”。[74]但这一点常常被忽略了，人们认为古登堡的印刷机使用了更精密的活字铅字。这掩盖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活字印刷术最早是由中国的毕昇在1040年左右发明的。[75]

尽管如此，欧洲中心论者有时反驳这些事实，认为中国从来没有掌握活字印刷术，而更善于使用雕版印刷。不过，这并非是由于中国缺乏创造性，而是事实上汉字书写体的特征更适宜于使用雕版印刷。正如耶稣会士们指出的，“中国的印刷术比起活字印刷，更适用于数量庞大和复杂的汉字特点”。[7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明显又强化了标准的欧洲中心论观点：最终，古登堡的印刷术更加有效和快捷，因为欧洲的印刷格式仅仅基于字母表中的26个字母。然而，拉奇（Lach）和克雷（Kley）指出，耶稣会士们认为中国的印刷术不仅和欧洲的一样有效，而且与后者相比，有着多种优势。[77] 此外，有意思的是，只是在19世纪时欧洲印刷业才比其亚洲同行速度更快，在那之前它一直使用低效而昂贵的翻印文本形式。[78] 即使如此，戴维·兰德斯仍坚持认为，与欧洲不同，印刷术在中国从没有发生“突破”。[79] 但到15世纪末，中国出版的书籍可能比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80] 甚至早在978年，中国一个图书馆的藏书量就达到了8万册（可是，那时一些大的伊斯兰图书馆的藏书量轻易就超过了这一数

①德国西部城市。——译者
②荷兰西部城市。——译者
③唐代政治家（882—954）。——译者

字)。然而，欧洲中心主义坚持认为，这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是古登堡首先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但事实上，第一台金属活字印刷机是1403年首先在朝鲜发明的（比欧洲整整早了50年)。[81]

那么,这些中国和朝鲜的发明是怎样向西传播的？传播的影响程度如何？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中国的雕版印刷术传到了欧洲，并在13世纪时在德国首先使用〔穿过了蒙古征服下的波兰（1259）和匈牙利（1283)〕。[82]尼达姆颇有意义地指出：

> 罗伯特·柯松（Robert Curzon)(1810—1873）认为，欧洲和中国的雕版印刷书籍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是如此相似，“我们猜想这些书的印刷可能是从古代中国的样本仿制而来,这些样本则是由某些早期的游历者从中国带来，他们的名字没有流传至今”。[83]

但什么是金属活字印刷术呢？

首先要问，这是否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巧合，古登堡碰巧偶然发明了他的印刷机，印刷机的基本形态在11世纪中期就在中国发明出来，而其具体构造比古登堡早50年就已经在朝鲜发明出来。虽然托马斯·卡特没有弄清其直接传播的事实，但他赞成间接传播的说法。首先，造纸术无疑传到了西方（在第6章谈到过)，这是印刷术所必需的一个前提条件。其次，一系列的印刷品传到了欧洲，包括扑克（14世纪后期)、纸币、图画和中国典籍。第三，卡特认为任何旅居中国的欧洲人都有可能记录了真正的印刷术知识。[84] 不管怎么说，赫德森（G.. F. Hudson）①的结论似乎是公平的：

> 在欧洲古登堡的印刷术出现之前，朝鲜的印刷术就经历了如此惊人的发展,并且可能成为远东和德国之间信息传播的通道,举证责任实际上就落在那些声称完全是欧洲独立发明的人身上。[85]

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1903—1974)，著有《欧洲与中国》等。——译者

欧洲军事革命的东方起源

欧洲的军事革命（1550—1660），以火药、枪和大炮取代了刀剑、长矛、钉头锤和弓弩，这在欧洲的发展中无疑是一个关键时刻。[86] 许多人认为，这不仅将欧洲军事力量推到了世界的前列，而且也促使了现代官僚政治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兴起。[87] 但在所有这些当中，有一点被忽视了，即它的技术因素是在约850至1290年之间中国的第一次军事革命中创造的。由于我在第3章已对此进行了详尽阐述，所以在此我将只着眼于东方文明的全球传播过程。

欧洲中心论者常常将火药的发明归功于1267年的欧洲科学家罗杰·培根。但正如第3章所述，火药的配方起源于公元850年时的中国，并且在1044年出版公开。约瑟夫·尼达姆也指出，在培根对火药的公开说明中，他显然对中国的爆竹进行了描述。[88] 此外，培根获得已经公开的中国火药配方是完全可能的。那么，这些知识是怎样从中国传到西方的呢？保罗·克雷赛（Paul Cressey）①和阿诺德·佩西特别指出，（培根的一个私交）卢布瑞克（Rubrick）的威廉在1256年或1257年从中国返回了欧洲。[89] 虽然他很可能带回了火药的配方，但在1245年后有一大批欧洲人（主要是修道士）曾经到中国游历，他们中间任何人都可能传播了这一配方。[90]

如我们在第3章所知，第一支金属枪身的火枪大约在13世纪中期出现在中国——绝对不会晚于1275年——并且中国大约在1288年发明了第一门大炮。这非常重要，因为欧洲第一门大炮可以追溯到1326年的佛罗伦萨和1327年的英国（后者在沃尔特·米勒梅特的手稿中有所说明）。[91] 阿诺德·佩西这样评论道：

> 令人惊奇的是对欧洲大炮最早的介绍……展示的完全是一种中

①美国历史学家。——译者

国类型的筒状物，安装在座架上，发射一种火箭。人们一度认为大炮是欧洲发明的，而中国大炮出现较晚，这种观点已不再可信。[92]

重要的是，大炮发明的前提是要经历一个长时间的前期发展阶段，这在欧洲历史上显然是缺失的。从来没有人从欧洲历史上提出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但这样一种前期的发展线索在中国历史上却非常清晰（可以往回追溯差不多四个世纪）。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大炮可以发射爆炸性的炮弹，这在欧洲直到15世纪才实现。此外，中国大炮有时是用铸铁锻造而成，这要比用熟铁铸造的欧洲大炮更加坚固，威力更大。直到16世纪的后半期，欧洲人才在这方面迎头赶上。

火枪和大炮向欧洲的传播乃是基于翔实的证据。尼达姆和王铃（Wang Ling）认为，这可能是通过居于大不里士（Tabriz）[①]的意大利商人、欧洲修道士，或是通过1260年后受雇于中国军队的各种穆斯林得以完成的。[93] 的确，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联系足以使大炮的要诀可能通过图解说明，或者关于大炮构造的真实资料的形式传到了欧洲。虽然这些说法只是推测，但显然大炮不是简单地无源可寻。那种认为大炮是欧洲独立发明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欧洲最早的大炮，比中国发明的巨型大炮晚了近40年，而是因为，如上所述，从来没有学者提供出1326或1327年欧洲第一门大炮诞生前欧洲所必经的发展过程的任何证据。没有这些，那么中国大炮知识的传播就提供了唯一可能的答案。因此，欧洲中心论者的责任就是来证明是另外一种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中心论者普遍认为，装备大炮的大型舰只的建造乃是欧洲人的独创，但这忽略了一点，更大型的中国舰只上安装大炮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最后，我们应该将伊斯兰的军事发展考虑在内，伊斯兰军事发展对欧洲也有着独立的影响。伊斯兰的军事技术不仅发展迅速，而且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着其对于欧洲的优势。8世纪后，伊斯兰军队就配置有特殊的身着防火服的火攻部队。他们使用了欧洲十字军称为“希腊火”（石油）的东西，

①伊朗西北部城市。——译者

这是一种易燃的物质。关键是，这种“希腊火”是名称的误用，因为它实际上起源于中东。公元673年，一个来自巴勒贝克（Baalbeck）被称为卡里尼科斯（Callinicus）的叙利亚工程师，带着这种新的火的秘方逃到了拜占庭。[94] 显然，拜占庭人并没有称之为“希腊火”，因为他们知道它起源于中东。这种火是通过威力强大的火焰喷射器（flame-throwers）来发射的，被涂在易燃的箭头上，或被制成手榴弹（grenade），可以用手或用机器（投石机）抛掷，或者像火箭一样发射。[95] 实际上，配重投石机（counterweight trebuchet）是伊斯兰独特的发明。到12世纪时，萨拉丁王朝的兴起标志着一个新的、更剧烈的军事技术发展阶段的开始。例如，这种燃烧装置被用于穆斯林的每一次战役中。与此相比，欧洲十字军却束手无策——他们与这些处于优势的穆斯林对抗的命运，注定了1291年阿克里战役的结局（如第2章所述）。

接下来是奥斯曼帝国——霍奇森将它称为著名的“火药帝国”——成为各种军事技术创新的发源地，其中许多发明传到了西欧。尤其是土耳其火枪很快就穿过中亚向东传到了印度，向西传到了欧洲。“这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火枪出口贸易，而且一些枪质地非常优良。”[96] 特别是通过钢制枪管的铸造，奥斯曼对滑膛枪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枪管比欧洲制造的更结实、不易爆裂。毫不奇怪，“欧洲人对土耳其枪管评价很高，欧洲最好的火枪制造商常常使用土耳其枪管作为他们火枪的主要构件”。[97] 此外，欧洲技师们很长时间都为高质量的土耳其滑膛枪管和印度的伍兹钢（见第9章）所困扰。奥斯曼人很可能还发明了扳机〔蛇形环（serpentine）〕，尽管这可能是中国的一项发明。[98]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罗马“原始大炮”（proto-artillery）（如弩炮）以及中世纪欧洲的弩都有一个扳机，但这些都不可能成为后来火绳滑膛枪扳机的基础，因为蛇形环完全是一项独立的发明。

总之，欧洲军事革命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技术因素都来源于东方，并通过一条很长的传播链传到了西方。虽然最终到19世纪时欧洲人的确向前推进了这些军事技术，但事实仍然是：如果没有可以利用的东方先进成就，欧洲就谈不上进一步推进。

第9章

英国工业化的中国起源：英国是擅长模仿的“后发国家”，公元1700—1846年

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权自然之势……

刘安，《淮南子》，公元前120年

希腊和罗马的教条已经太多了。他们
耗尽的智慧宝库已失去了迷人的魔力；
尽管对我们徒劳的挣扎还有些许补救，
但我们的成功在芸芸众生中已经枯萎……
今夜，诗人煽动雄鹰的翅翼乘风而起，
飞向光之源头去找寻异域文明的新奇，
在中华帝国的领地采撷孔夫子的智言，
大胆地从东方带到不列颠子民的耳际。

威廉·怀特黑德（William Whitehead）[①]，1759年

①英国著名诗人、剧作家（1715—1785）。——译者

英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后发国家”的意义

前一章对1492—1700年这段时期进行了阐述，认为欧洲在此期间仅仅开始追赶更先进的东方国家。欧洲帝国在掠夺“非欧洲地区”金银的同时，又吸收了东方的“资源组合”，这使得其赶超东方成为可能。这里我要谈的是它对东方“资源组合”的吸收这一方面。在标准的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崛起的纪年表里，第二个最辉煌的历史时刻就是英国工业革命。事实上，欧洲中心论话题的焦点就是英国历史，因为普遍的观点就是认为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确，随便翻开任何一本有关工业化的传统经济史课本，开篇即为18至19世纪英国的“早期”成就。这一结论甚至经常出现在一些重要论著的标题里：最著名的如菲莉丝·迪恩（Phyllis Deane）①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彼得·马赛厄斯（Peter Mathias）②的《第一个工业化国家》。[1] 或如哈特韦尔简明扼要的自问自答：“是否有一场工业革命？”“有，那是在英国。”[2]

英国工业革命在欧洲中心论者的描述中，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原理：第一，英国开明的自由放任政府（我将在11章论述）所传承下来的进步的社会环境，促成了英国的工业革命。第二，英国工业革命的重大成就是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依靠盎格鲁—撒克逊人特有的创造性和个人主义来完成的。这里很典型的就是沃尔特·罗斯托的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的转变是独一无二的，它显然不是依靠外力的推动，而是通过单一的社会内在动力来实现的”。[3] 或者如佩里·安德森在一部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译作中声称的，英国“工业革命……是生产力的一个自发的、巨大的爆发，其威力前所未有，其影响遍及全球”。[4] 人们普遍认为，英国成功的秘诀在于其独特的个人主义或自助的特性，戴维·兰德斯用典型的亚当·斯密式的口吻赞美了这一特性的重要性，认为它是解决贫

①英国历史学家。——译者
②英国历史学家。——译者

困的万能良方：

> 历史告诉我们，消除贫穷最有效的方法在于自身……包括勤劳、节俭，诚实、忍耐力和坚忍不拔。被不幸和饥饿困扰的人们，可能会更加自私和冷漠。但归根结底，自我潜能是最为有效的潜力。[5]

更确切地说，英国开创性发明者的才智被强调得更多。典型的是，历史学家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英国工业革命纯粹由内部“挑战与反应的结果”所驱动的这个过程上。这就引发了这样一种结果：“制造过程中一个方面的加速发展，将会严重抑制该过程中其他一个或几个方面的生产要素（术语称‘瓶颈’），因而要求创新，以实现均衡。”[6] 正是英国新的开创性发明积累了解决无数“瓶颈”的办法，才使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终极成就达到了顶峰。或者用兰德斯的话说，英国成功的秘诀在于它进行“内生性”变革的能力。[7]

本章的基本观点是，尽管英国人自己也做出了贡献，但显然是“外生性”转变促成了英国的成就。马歇尔·霍奇森曾指出，欧美国家是“中国宋代工业革命不自觉的继承者”。[8] 我同意“不自觉”这个说法，因为正如我在本章所述，英国自觉地获得和吸收了中国的技术——无论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还是特定技术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和其他的“后发国家”或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一样，享受到了“落后的好处”，并且能够吸收和改进“先发国家”所开创的先进技术。这样，在某种意义上，正像许多西方人喜欢描述1868—1913年间（或1945年后）的日本人那样，英国人可以被描绘成：他们有着很强的模仿能力，擅长仿制、吸收和改进外来思想。

尽管本章的目的在于揭开英国工业革命的欧洲中心论面纱，但这显然是一件违背直觉的工作。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认为，研究18世纪的英国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关导致经济发展成功，或称之为“现代化”的全部准则。正如埃里克·琼斯指出的，“假设经济史学家要寻找一种独特的变革，假设我们已经找到了这种变革，那它就是英国的工业革命”。[9] 这种假设都渗透到了西方的思想之中，其影响之大，以至于“每个学童都知道这一

点，因为差不多所有经济史的教学提纲都从这点开始……（特别是）如果他或她看过关于我们西方兴起的电视连续剧的话”。[10] 但是，如果将英国历史置入更广阔的全球历史范畴的话，我们就不能不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即英国的“伟大变革”代表着世界经济史上最有意义的突变。这使得认为英国工业革命只不过是长期积累的全球经济发展史上一个有意义的时刻更富有深意，这种发展史把18世纪的英国和历史久远的宋代中国“伙伴”联系到了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埃里克·琼斯说的没错，他认为，不是中国宋代的“成就”和英国的一样，而是英国的“成就”和中国的一样。[11] 但从另一种意义上看，这种混合比较模糊了两个重要的差别：第一，与中国不同，英国严重依赖于对外来发明的吸收和借鉴，正如本章所述的。第二，与中国奇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工业化极大地依赖于对诸多非欧洲地区资源的帝国主义掠夺，包括土地、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见第11章）。如果没有其他理由的话，这应当可以纠正或至少削弱当前流行的贬低宋朝奇迹、赞美英国“独创”成就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

总之，将英国称作是“后发国家”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它削弱了通常认为英国是“最先”发生工业革命的观点。其次，它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英国模仿和吸收东方“先发国家”（最显著的是中国）更加先进的技术和思想的策略上，以及使这些变为可能的东方全球化的进程上。本章分三部分对这些观点展开论述。第一部分考察了中国思想影响欧洲启蒙运动的方式，并揭示了中国资源组合传播到西方的途径；第二部分论述了中国对英国农业革命的贡献；最后一部分则揭示了中国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贡献。

中国：英国工业化的原型

我的中心论点是：英国人并非天资特别聪慧的发明家，他们的能力更多体现在他们能够吸收、改进早期中国的发明和技术思想。那么，英国人是怎样获得这些中国资源的呢？中国的思想又是如何影响英国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呢？

东方的启蒙运动

欧洲的启蒙时代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裂变时期，尽管它有助于“隐性种族主义”（implicit racism）的兴起（参见第10章），但自相矛盾的是，启蒙思想家们积极支持的许多思想都是从东方直接传播过来的。这里我先考察这些积极的东方影响，下一章将阐述欧洲人后来贬低东方人的方式。

在激发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启蒙运动中，中国的思想格外重要。它对欧洲思想的影响涉及政府管理、道德哲学、艺术风格（如洛可可式[①]）、服饰、装饰、壁画、园艺、政治经济、茶艺及其他许多方面。欧洲启蒙运动和中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最终通过人的理性是万物的中心这一共同信念联结了起来。理性至关重要，因为它导致了“运动规律”的发现，这种规律渗透在社会、政治和“自然”生活的各个方面。1687年，一本关于孔子思想的书（《中国贤哲孔子》）被翻译出版，译者在序言中强调：

> 或许有人会说，这位哲学家的道德体系极其严肃，但同时又简单、明智，取自于最纯粹的自然理性。被剥夺了神圣启示的理性，不可能显得如此完善，也不可能具有如此大的动力。[12]

这本书对欧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的确，通过阅读此书：

> 人们会吃惊地发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孔子的名字已经为大型集市上每个商人津津乐道，他用同样的方式在思考同样的思想，从事同样的论战……因此，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奠基先贤。[13]

书中描述的重要时期是1700年——“文明的（欧洲）世界开始钟情于中国的转折之年”，因为在随后的八十年里，许多欧洲人开始对中国产

① 18世纪初起源于法国、18世纪后半期盛行于欧洲的一种建筑装饰艺术风格，其特点为精巧、繁琐、华丽。——译者

生如此强烈的好奇，以致他们对洛可可式世界产生了发自内心的钟爱。

许多启蒙思想家积极地与中国和中国的思想联系在一起，这些思想家包括蒙田、马勒伯朗士[①]、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沃尔夫[②]、休谟和亚当·斯密。其中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是伏尔泰，他的《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1756）一书，被形容为“那一时代关于远东所有（积极）情感的一种完美概述”。此外，在其《赵氏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1755）和《查第格》（Zadig）（1748）中，伏尔泰吸收了中国的政治、宗教和哲学概念（所有概念都基于理性原则），向欧洲人所偏爱的世袭贵族统治提出了挑战。事实上，许多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对“理性方式”的偏爱皆来自于中国。

在某种程度上，一些欧洲中心论者承认中国对启蒙运动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它只是在法国产生了积极作用（无疑，这一定程度是因为法国政府的专制主义使“专制的中国”似乎更具魅力）。但是，中国的思想同样对英国的文化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英国人十分喜爱中国的文化风格，从茶艺、壁画装饰、中英结合的园艺到政治经济思想。[14] 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观念中，欧洲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学家是苏格兰人亚当·斯密。但是，尽管盎格鲁—撒克逊人偏狭地认为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却又认为斯密背后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魁奈，而关键的是，在魁奈的背后是中国。[15] 第一个批判重商主义思想的欧洲人，是魁奈，而不是亚当·斯密。“重农主义”一词是指“自然法则”，魁奈的思想起源于中国，其重要性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认识到农业乃是财富的根本源泉（这成为英国农业革命的一个重要思想）；第二，也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只有在生产者不受国家专制任意干预的情况下，农业才能获得充分发展，只有这样，市场的“自然规律”才能起作用（中国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克拉克（J.J.Clarke）[③]恰当地指出：

---

①法国哲学家（1638—1715）。——译者

②德国哲学家（1679—1754）。——译者

③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著有《西方人的道：道家思想的西方化》与《东方的启蒙：亚洲与西方思想的碰撞》等。——译者

> 魁奈的革命思想意味着从重商主义的经济说教中解放出来……对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阐述魁奈在现代思想中的地位时，常常忽略的是他对中国思想的继承——和他所处的时代不同的是，他在当时被公认为“欧洲的孔子”。[16]

魁奈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的继承，在很多思想中都可以发现，最重要的就是“无为”思想——译成法语就是“自由放任”。中国的“无为”观念在公元前已经存在（见本章开篇对刘安之引述）。后来到公元300年时，郭象（Kuo Hsiang）[①]将“无为”解释为“让万物随其天性，则性即合”。[17] 魁奈与启蒙运动的具体结合，可以从他强调科学方法核心地位的事实中找到，如他在《经济表》（Tableau Economique）中所表述的那样（尽管有些晦涩），其科学方法原理深受中国思想的影响。[18]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魁奈之后，尼古拉斯·盖布里埃尔·克利克（Nicolas Gabriel Clerc）[②]在其《圣哲孔子》（1765）一书中明确主张，如果欧洲人想取得重大的经济进步，就得仿效中国。同魁奈一样，他也认为，如果消除所有壁垒，商业将会更加活跃（亚当·斯密则晚了约11年）。正如巴兹尔·盖伊（Basil Guy）[③]所指出的：“法律和立法者都必须承认自然秩序的法则，只有这样才能符合中国的‘无为’（自由主义）观念，这种思想曾经灌输到其统治理念之中。”[19]

但这些并不是说欧洲的启蒙运动纯粹是中国思想的产物。显然，一些欧洲启蒙思想家否认中国是欧洲的典范——最有名的要数孟德斯鸠和费奈隆（Francois De Fenelon）[④]。随着欧洲对中国认知的变化，启蒙运动裂变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一开始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是惊奇，但到1780年之后，欧洲对中国的看法就变成了：一个落后的被专制主义窒息的野蛮国

---

①西晋时期哲学家、玄学人士（约252—312），著有《庄子注》。——译者
②法国历史学家(1726—1798)。——译者
③法国历史学家（1882—1956），著有《伏尔泰前后法国的中国映像》等。——译者
④法国天主教大主教、作家、教育家（1651—1715）。——译者

度的“堕落民族”。但是，马丁·伯纳尔提醒我们，“18世纪（1780年之前）时没有一个欧洲人会声称欧洲是由自身创造出来的”。[20] 在17世纪后期至1780年间，欧洲思想家把中国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伏尔泰甚至批评博絮埃（Jacques Benigne Bossuet）①在他写的世界历史书中没有提及中国。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②爵士恰当地描述了当时这种流行的情绪：“中华帝国似乎被巨大的力量笼罩和统治着，具有人文智慧、理性和精巧创新能力。”[21] 但到了约1780年，情况发生逆转：“中国时代”已经结束。典型的是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③提出的新观点：“其他种族（如中国）发明的那些艺术，已经在那里（欧洲）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了。”[22] 或如埃尔金（Elgin）八世伯爵所指出的（回应戈德史密斯以及珀切斯），在中国人手里：

> 发明的火药被制成了爆竹和没有任何威力的烟花，水手的罗盘只配用在沿海贸易的小船板船上。印刷术发展迟缓，一成不变地版印着儒学的卷本，有关中国壮丽和完美的概念，只能靠愤世嫉俗的怪异艺术来表现了。[23]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微妙但错误的疏忽产生了：它制造了一种幻觉——即欧洲人从根本上是完全独立、富于创新并天资聪慧。本章认为这不过是种狂妄自大的说法罢了。但在我对此展开论述之前，重要的是先阐明中国的思想和技术是如何传播到欧洲去的。

从中国到欧洲的传播渠道

中国的知识直接传播到欧洲，可以追溯到1245年后一批圣芳济会修士（Franciscan monks）首次到中国旅居。但之后在13世纪后半期，马可·波罗传回欧洲的关于中国的神奇描述，比这些修道士的叙述更加令人神

①法国天主教大主教（1627—1704）。——译者
②英国政治家（1628—1699）。——译者
③英国作家、诗人（1728—1774）。——译者

往。随后，耶稣会士成为最重要的传播媒介。利玛窦写了一套丛书，并在1610年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证实了“他所见的中国确实与马可·波罗描绘的（神奇的）中国景象是一样的”。[24] 正是通过这些耶稣会士，欧洲人知道了火药、罗盘、造纸和印刷术是由中国发明的（尽管后来这些成就从各类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历史中摒弃或抹去了）。一位当时居住在中国的欧洲人——马加良恩斯神父（Father de Magaillans），对中国运河上“天妃闸”（pound-lock）的操作印象非常深刻。布罗代尔反问道：

> 马加良恩斯神父一面指出这种操作既困难又危险，另一面又推崇中国人习惯于完成“各种机械工程，使用的工具比我们少得多”。难道他的推崇有道理吗？ [25]

到中国居住及访问的欧洲人，他们的记述都清楚地说明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中国拥有一种独特的令世人瞩目的技术文明。整体上，西方人将中国（以及埃及）看作是提供“更高尚、更出色的文明的积极榜样，有目共睹的是这两个国家雄伟壮观的物质成就、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以及无与伦比的文学体系”。[26] 但是有人可能说，耶稣会士们有意夸大了事实，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取悦中国皇帝，给皇帝留下好的印象。但实际上，耶稣会士对中国的记述大部分都是相互一致的，而且他们并没有回避那些他们认为欧洲人更优越的方面。

不管怎么说，耶稣会士是中国经济思想、尤其是技术思想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1685年，路易十四派六位耶稣会士到中国，他们带着一系列的问题（由法国科学院起草），目的是找到从科学、动植物到农业生产所有领域的方法。有趣的是，路易十四是在科尔贝尔[①]的极力主张下着手这件事的，而科尔贝尔反过来受到了莱布尼茨的推动。[27] 莱布尼茨亲自给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团写信，明确要求他们记录

①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海军国务大臣，实行重商主义，发展海军，致力于建立法国经济霸权。——译者

各种信息，包括冶铁、茶叶、造纸、丝绸、纯瓷、印染和玻璃的制造，还包括中国农业、军事及航海技术。莱布尼茨认为，“如果没有这些知识，遣使中国则毫无意义”。[28] 最重要的是，莱布尼茨还要求耶稣会士们将中国的技术、机器、模型以及中国工农业文献带回到欧洲。所幸的是他们都一一照办了。最深入的一项调查是由杜尔哥（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安排的，他于1765年派遣两名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带有一套包罗万象的问题目录。[29] 很多欧洲作家都到过中国，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书。如埃克贝格（Ekeberg）船长的《中国农业概述》就是著名的例子，该书被译成了德语和英语。[30] 另外，巴达维亚的荷兰水手是中国思想和技术传播的另一个重要渠道。

1600年后，通过耶稣会士的信札，有关中国的信息迅速增多，到1650年之后，关于中国的书籍开始广为人知。这些书用多种欧洲语言出版，不仅从总体上介绍了中国（北方中国）的许多卓越成就，还更具体地介绍了中国的技术和经济思想。[31] 除了1610年利玛窦的作品外，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①、曾德昭（Alvarez Semedo）②、卫匡国（Martino Martini）③等也写了一些详细介绍中国各个方面情况的书，包括“土地和物产的丰饶”以及“机械工艺”这些方面。更有意义的是，许多耶稣会士的作品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从学者精英到门外汉，从庶民百姓到欧洲君主。因而，不但中国书籍在欧洲随处可见，而且大量中国的技术、工艺被直接照搬，用于欧洲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一份详尽的总结值得我们注意：

> 17世纪期间，出现了数百本由传教士、商人、医生、水手、士兵及自由旅行家写的关于亚洲的书籍。仅写南亚的至少就有25本，另有15本是写东南亚大陆部分的，约有20本书是关于东南亚群岛部分，还有60本左右是写东亚的。在这些重要的读物中，许多都是传教士的信札、资料摘录、旅行日志……小册子、通信稿等等。这些书几乎

①天主教传教士（1577—1628），著有《利玛窦中国札记》。——译者
②天主教传教士（1586—1658），著有《中华帝国史》。——译者
③天主教传教士（1614—1661），著有《中国上古史》。——译者

> 用全部的欧洲语言出版，不断被翻译、重印，被收录到17世纪出版的多种大型旅游文学汇编中，也经常被后来的作家或出版商抄袭、盗版。……欧洲的知识阶层无不为之折服，如果其影响在当时的欧洲文学、艺术、教育和文化中找不到丝毫印迹，着实令人惊讶。[32]

这样，欧洲人显然能够很容易接触到更先进的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地区的）思想和技术。正如我们很快要看到的，拥有了这些信息和他们自身的若干技术，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为了追上并超过中国，开始对它们进行消化吸收。遗憾的是，西方发明家实际上根本就不承认借用了其他西方思想，更不用说中国思想了。弗朗塞斯卡·布雷（Francesca Bray）一针见血地指出：

> 如果我们想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对这种影响明确承认的内容，将会大失所望：西方学者和发明家不知廉耻地相互剽窃对方的思想……我们可以肯定，他们会毫不顾忌地将这些来自世界另一边的思想化为己有。[33]

不过，要追溯具体的中国思想和技术如何向西方传播却是可能的（尽管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这样，在伏尔泰的影响下，让我们通过揭示被欧洲中心论者极力掩盖的中国贡献，来重新审视英国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

英国农业革命的中国起源

传统观点认为，农业革命即使不是英国工业化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前提条件，至少也是它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它由一系列据称是巧妙和富于创新的英国技术发明组成，包括杰思罗·塔尔(Jethro Tull)的条播机和马拉锄（发明于1700年，但到18世纪30年代才大范围推广）、马拉脱粒机（1780）、罗瑟勒姆犁（Rotherham plough）（1730年获得专利），以及旋转

风扬机的发明。同样需要强调的，还有新的土地使用方法：作物轮作技术、肥料、新的作物培育及品种改良。如果所有这些都是英国的独立发明或首创，那么承认欧洲中心论所宣扬的英国人是聪明和富于创新的观点似乎也就合理了。但有力的证据则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18世纪的铁制铧犁（罗瑟勒姆犁）

多数评论家认为铁制铧犁是一项重要的技术发明，它大大提高了英国的农业生产率（尽管它在广泛投入使用前已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与中世纪笨重的翻转犁（参见第5章）相比，1730年的罗瑟勒姆犁效率更高。非常关键的是，中世纪的这种方形木制模板已被一个挂在犁铧上的曲面铁制模板所取代，这便降低了摩擦（像没有轮子一样）。据说荷兰在17世纪首次发明了这种犁〔称之为荷兰“杂牌”犁（bastard plough）〕，也正是在那时，荷兰的工程师（研究英吉利东部沼泽地的排水技术）将这种犁传到了英国。在融合了“杂牌”犁的几个特征后，就变成了英国罗瑟勒姆犁。但只是这项改进，增加了更轻的模框，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又有了进一步的完善。是否因为荷兰人是最初的发明者，从而就证明了欧洲中心论者所声称的是欧洲的一项独立发明？

1931年，保罗·莱塞（Paul Leser）[①]首次指出现代欧洲的犁起源于中国。如果没有引进中国的犁，欧洲就可能不会有农业革命。[34] 的确，追溯到约两千多年前，荷兰“杂牌”犁的各个特征在中国都能找到。难道这仅是一种巧合吗？最近，弗朗塞斯卡·布雷否定了这种巧合的可能性，因为欧洲的新型犁，与中国早期发明的犁太相近了。事实上，中国的铁制犁铧领先于1784年欧洲人詹姆斯·斯莫尔（James Small）（所谓犁的鼻祖）所发明的那种模型。而且，欧洲新型犁的突然出现，与已经使用了约一千年的犁迥然相异，表明这并不仅仅是个巧合。无论如何，显然是（17世纪居住在东亚的）荷兰人带回了实际的中国犁的模型，并据此创造了荷兰犁或“杂牌”犁，这种犁随后又被改造为英国罗瑟勒姆犁。[35] 正如罗伯

①德国著名农业史学家（1899—1984）。——译者

特·坦普尔所做的结论：

> 在欧洲的农业革命中，没有能比采用中国犁这样更重要的因素了。当我们思考欧洲仅仅利用200年的时间就突然赶超了中国农业时，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假定的西方在粮食生产上的优势是多么浅薄。[36]

旋转风扬机

旋转风扬机（谷物收割后将壳和杆分离开）的发明，不失为一项重要的突破。但中国的旋转风扬机自公元前2世纪发明以来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又不断对它进行改进。[37] 像铁制铧犁一样，它也是直接由中国传入的。18世纪20年代，旋转风扬机由耶稣会士首次传入法国，在法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各种模型也被传入瑞典，被乔纳斯·诺伯格（Jonas Norberg）等瑞典科学家进行了改进。有趣的是，诺伯格打破了欧洲的常规，承认“我从三个不同的中国模型中获得了灵感”。[38] 最后，荷兰水手在1700—1720年间也把旋转风扬机带回到欧洲（最初发现在巴达维亚使用）。[39]

条播机和马耕

在条播机使用之前，种子是通过手工播种的。手工播种速度慢，效率还不高，结果不少庄稼还长不出来，因为一些种子掉进了土层深处，聚集成一团，竞相吸收阳光、水分和营养。这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首次发明的多管播种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用收成来衡量，它的效率要高出三十多倍，但这只是1700年或1800年时的水平。几个世纪里，中国的农业生产率一直领先于西方，如果世界上的两个半球能够看到的话，这种鲜明的对比，与当今“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的对比非常相似。[40]

似乎杰思罗·塔尔一发明条播机（尽管他的工具设计笨拙，只是在几

十年后才开始推广），欧洲就开始缓慢地追赶中国。这种工具把种子按确定的深度一排排的拨撒，锄头部分用来锄草和松土。但不论它引入英国后变得多么灵活和富有创新，它早在两千年前就是由中国发明的事实却无法改变。

追溯中国此项发明的传播过程并不容易，这里我们就遇到有关传播过程的一个难题。假定塔尔的模型在各方面都区别于中国的话，那么，就像风车一样，真正传播的是条播机的思想。这可以通过事实来解释，即中国的条播机局限于北方，而北方地区远离欧洲人经常光顾的南部海港。这就说明，播种机和中国其他发明不同，不可能由欧洲水手直接带回欧洲。但是极有可能，条播机的思想通过关于这种装置的书籍和操作手册的传播传到了欧洲。例如，曾德昭在其《中华帝国史》（1655）一书里这么讲述：

> 我在路过河南时，看到有人正在用三个铁制犁头或犁铧的犁在犁田，每耕一个来回，能挖三个犁沟。由于土壤易于播种（种子在此为菜豆），就把种子放到紧绑在犁顶部的袋子或方形的盘子里。通过这种方法，种子就随漏斗的晃动而震动，被轻轻撒播到了土里。于是，土地也同时被翻耕，来年收获的希望就由此播种下了。[41]

当然，曾德昭所描述的是锄式条播机，记录的时间是1655年。这并不说明这本特殊的书籍提示了欧洲对锄式条播机技术的吸收，但毫无疑问，这样公开探讨中国的首创发明，有利于欧洲人在闲暇时间仔细研读。应特别注意的是塔尔的《马耕农事》（1733）一书，书中概述的条播机基本工作原理，几乎是中国公元前3世纪原版手册中所记录的原理的翻版。[42]实际上，布雷就声称，塔尔的条播机系统酷似“中国北方的农作习惯，以至于有人想假定塔尔是从中国借来了条播机的系统栓锁、原料及盛种子的漏斗”。[43]

如果说所传播的是中国思想的话，那么欧洲人就必须重新进行改造，因而最终模型与中国原版不同就不再让人惊奇了。的确，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最终的式样看起来与中国模型不同，从而易于产生一种乃是英国自

发创造的幻觉。但正如布雷所指出的：

> 有人可能说，欧洲条播机是早期园艺技术——例如（果树）坐果的必然发展。然而，恰恰在中国农业信息自由传播的那一段时期，欧洲发明家一下子就开始生产像中国一样可以直线同时播种几排谷物的机械，这决不可能是偶然的。[44]

此外，似乎杰思罗·塔尔成功地保守了“他的”条播机东方起源的秘密。在这方面他是如此成功，以至于直到1795年英国农业部才获知条播机实际上已在东方使用很久了。农业部就设法请人送来了一台条播机（还有一个犁）。[45]

总之，尽管英国主要的农业技术有着明显的中国渊源，但到英国农民广泛使用这些技术仍花了很长一段时间：19世纪中期用的是锄式条播机；19世纪20年代是罗瑟勒姆犁；大约在1870年才采用了旋转风扬机。因此，英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既不始于也不止于技术发明，不仅仅是因为它出现的相对晚些。虽然这些技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最终造成区别的是引入了生物及生态的革新，包括新型集约用地作物、高热量食品、肥料及作物轮作新技术。事实上，正是后者的“发现”，才使特尼普·汤曾德(Turnip Townshend)一举成名。通常情况下，我们没有被告知的是，正因为中国及美洲（后者的贡献在第11章里详细探讨）的帮助，欧洲才取得了那么多成就。

被英国人称为重大农业突破之一的新型作物轮作方法，完全是由中国人最先发明的。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早在16世纪已完善了多种轮作方法，这些方法都可以在《齐民要术》里面找到。[46] 这些方法不但用途广泛，而且高度精密细致。这也是在几个世纪里中国的农业产量轻易超过英国的原因。此外，18世纪英国采用的一些创新性的轮作作物方法，中国早在12世纪的时候就使用了（如蚕豆、甘薯、粟、大麦和小麦、萝卜）。如果这些知识和方法没有传到欧洲去（见上述讨论），那将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同样重要的是，新大陆向英国提供的许多农作物，对于农业革命

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47] 它们包括：萝卜、马铃薯、玉米、海鸟粪、胡萝卜、卷心菜、荞麦、啤酒花、菜籽、苜蓿以及其他草料植物。萝卜和苜蓿为英国的作物轮作方法提供了基础，海鸟粪是一种重要的肥料，马铃薯大大提高了老百姓的卡路里摄入量。[48] 最后，一般要强调的是，促使马匹高大而强壮的新型饲养马的技术，而通常忽略的一点是，18世纪早期对“东方家畜”的引进，如从奥斯曼帝国引进的阿拉伯母马（达利阿拉伯马，伯雷土耳其马及非洲柏布马），极大地促进了马匹品种的改良。[49]

英国工业革命的中国起源

与棉纺织品一样，钢铁工业也是英国工业化的重要支柱。欧洲中心论的阐述一开篇总是详述一长串开创性的英国技术突破，通常包括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的焦炭冶铁技术（1709），亨利·柯特（Henry Cort）的“搅炼法”（搅拌炉熟铁冶炼法）（1784），尤其是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1776）。一般情况下，欧洲中心论史学家总用“挑战与反应的结果”（见本章引言）对此进行叙述，即英国的先驱发明家们能创造性地解决伴随每次发明的所有瓶颈。例如，在1802年理查德·特雷维西克的高压蒸汽机（他在1804年发明了第一台蒸汽机车）最终研制成功之前，托马斯·纽科门的常压蒸汽机（1705）就是通过以下一系列的发展而不断改进的，包括约翰·威尔金森的专利蒸汽鼓风机（1757）和瓦特的蒸汽机（1776）。这样，紧接着的问题就是，英国人是否和欧洲中心论者所声称的那样富于创新呢？本节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鉴于蒸汽机在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关键角色，那么从蒸汽机开始探讨是很有意义的。

蒸汽机

彭慕兰认为，1800年后最终导致英国和中国之间“大分流”的是，上天赐予了英国深且积水较多的煤矿，而相反中国的煤矿却浅而干燥。这样，英国就必须发明蒸汽机用来抽水。反过来，蒸汽机促进了英国工业化的广泛开展（因为蒸汽机不仅广泛用于采矿业，而且还用于工厂和铁路等

领域)。相反，中国浅且干燥的矿井却导致了中国的落后——因为这种状况不需要发明蒸汽机——因此也就不会有工业化了。[50]

彭慕兰的观点在三个方面是值得商榷的。第一，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21年）开始了深井开采。随后直到宋代年间，中国最深的煤矿平均在300英尺以下（明清时期，好几处煤矿深达3000至4800英尺，其中一个甚至深约8500英尺)。[51] 第二，中国有不少煤矿实际上在水平面以下，因此需要排水（如在江苏北部的低洼地区)。罗伯特·哈特韦尔指出，“11世纪时，那里挖煤的规模扩大了，就可能需要在排水设备上进行大量投资，很可能就有与四川盐矿井里用的相似的水泵”。[52] 彼得·戈拉斯（Peter Golas）①解释道：

> 甚至一点点水都会给采煤带来很多麻烦，但中国这样的问题却很复杂，因为很多煤矿都伴生着含有大量水分的石灰层。由于地层褶皱，含水层经常在采煤时被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排水在中国的煤矿开采业中可能是最大、最普遍的问题。正是因为水太多，而不是太少，所以到目前为止，它都成为中国矿工最头疼的问题。[53]

第三，也是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若不是中国早期的许多创新，特别是中国人为排放矿井积水及其他用途对液压水泵排水设施的改进，根本就不会有关于蒸汽机是否在英国发明的争论。

具有启发意义的是，首先应说明蒸汽机的基本原理最早以汉字印刷形式出现在王祯②的《农书》里（1313)，这些基本原理可以追溯到水力风箱的使用（首次用于公元3世纪)。通常人们认为，瓦特的蒸汽机是威尔金森机器的改进，但威尔金森的发明却或多或少与王祯的一样。尽管不明显，唯一不同的是对机轴的使用（这是欧洲人于500—1700年间四个真正的独立发明之一)。此外，有必要提到中国的箱式风箱，一种双向运动

①当代美国历史学家，著有《宋代的中国农村》。——译者
②元代科学家。——译者

压力抽气泵，每拉一次，活塞的一端就会排出空气，同时活塞的另一端将吸入等量的空气。不但这种风箱和瓦特的蒸汽机“外形近似”，而且在17世纪晚期，中国人还发明了蒸汽涡轮。[54] 有趣的是，彭慕兰根据尼达姆和王铃的论断，作了如下说明：

> 中国人很久以来就知道蒸汽机所用的基本科学原理——大气压力的存在，并且早就掌握了和瓦特的发明很相似的双重运动活塞/汽缸（作为箱式风箱的一部分），还掌握了把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运动的系统，这在20世纪以前与其他任何地方已用的方法同样好。所保留下来的系统是用活塞驱动轮子，而不是反之亦然（在一个风箱里，由活塞运动推动热空气喷出是其目的，而不是为轮子提供动力的一个步骤）。1671年，一名耶稣会传教士在宫廷里演示了包括一台蒸汽轮机驱动的四轮马车和一艘汽船在内的能够运转的小模型，似乎二者的工作原理对中国的模仿与对欧洲的模仿同样多。[55]

此外，罗伯特·坦普尔认为：

> 欧洲人蒸汽机的配置，全部通过诸如奥古斯丁·拉梅里（Agostino Ramelli）（1588）等人，从中国传播演化而来。它是用活塞驱动轮子，不是轮子驱动活塞，而中国的驱动器是两者可以单独使用。正如尼达姆所指出的，用火药驱动活塞的方法在欧洲开始尝试，是基于“把活塞和活塞杆看作连动的炮弹”这一原理。由于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和火枪，内燃机和蒸汽机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样的启发，即火枪中的子弹被精确地安装在枪管里，并能够通过强力发射——这是中国人对这两类发动机起源的又一个贡献。[56]

实际上，火枪和大炮用的都是单缸内燃机，正如林恩·怀特最初指出的，“我们所有现代的发动机都是从单缸内燃机发展而来的”。[57] 事实上，瓦特发明蒸汽机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需要在一个非常精确

的密封汽缸上钻孔。有趣的是，他请求约翰·威尔金森予以帮助；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威尔金森拥有一个专门为大炮生产镗孔的工厂。而关键是，正是中国人发明了火枪和大炮，随后将这两项发明传给了欧洲人（见第3章和第8章）。

这并不是说彭慕兰以及其他人错误地强调了蒸汽机的发明和普及在英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可以说，甚至在诸如达·芬奇等欧洲人还在梦想发明这种装置之前，中国人已经在蒸汽机的许多基本原理上领先了几个世纪。事实上，英国的蒸汽机并非奇迹般地凭空而来。因而，尽管英国的发明家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将中国的贡献大打折扣是不负责任的。

煤和鼓风炉

欧洲中心主义特别强调，（在森林遭急剧滥伐的情况下）英国以煤炭“革命性地”取代了木炭。由此引出了我们所熟悉的话题，即英国的“煤溪谷”（Coalbrookdale）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焦碳冶炼铁矿石的地方。菲莉丝·迪恩指出，“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煤炭把一个以木材和水力为基础的英国，变成了以煤炭和铁为基础的英国”。[58] 但正如我们在第3章所述，这种说法掩盖了中国早在11世纪就用煤炭替代木炭这一事实。此外，公元前2世纪，鼓风炉就出现在中国，到公元5世纪时，中国人又发明了一种将铸铁和锻铁混合到一起炼钢的“合熔”方法。“这实际上就是1863年马丁和西门子使用的炼钢工艺，而它早在1400年前就已经发明出来了。”[59] 然而，甚至到了1850年，因为生产成本较高，英国也只能生产低水平的钢（与铁相比）。1852年贝西默发明的“转炉炼钢法”才改变了这一状况。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 亨利·贝西默的发明在1852年前就被威廉·凯利想到了（尽管凯利并未成名）……1845年时，凯利曾把四名中国炼钢技师带回了肯塔基，他从这些专家那里学习到了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在使用的一些炼钢原理。[60]

钢铁的生产

如第3章所述，即使迟至1788年，英国的钢铁产量仍然低于中国在1078年的水平。只是到了19世纪初前后，英国的钢铁产品价格才降到中国11世纪的水平。正如约瑟夫·尼达姆指出的：

> 这是一个多么离奇的历史悖论……今天，对世界文明影响如此巨大的西方文明，是如此依赖于钢铁的生产，而就铸铁技术来讲，中国则领先于西方1300年。[61]

印度也领先于英国。印度的伍兹钢几百年来都是最好的钢材，一直到19世纪都处于领先地位。这种钢在波斯地区极为珍贵，被称为大马士革钢。甚至到18世纪末期，英国钢铁产品还是不如大马士革钢。[62] 即使到了1842年，印度的钢铁不仅在质量上和英国的一样（如果不说优于的话），而且在价格上比谢菲尔德（英国钢铁产区）生产的要便宜得多。[63] 非常有趣的是，印度这时的鼓风炉数量却是英国的50倍左右（还是英国生产数量最高年份，即1873年的10倍）。最关键的是，西方的生产商仍然为印度和波斯生产的优质钢所困扰。

因此，当英国慢慢地开始对炼钢感兴趣时，便将目光转向中国和印度的技术就不足为奇了。最先的尝试是本杰明·亨兹曼（Benjamin Huntsman）1740年在谢菲尔德试图模仿这一工艺，而其他的尝试在随后的八十年中一直在继续。正如阿诺德·佩西对英国炼钢方法的描述：

> 尽管“坩埚钢”已可拉长，具备生产车床工具所必需的优良性能，但却从来无法得到亚洲刀具那样的式样。亚洲刀具的型式及刀具的优良性能，还在困扰着西方的钢铁生产商。因此，甚至到18世纪90年代，印度的伍兹钢仍是谢菲尔德地区研究的主要内容，被当作该地区生产优质刀具的样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复制。[64]

此外，在18世纪后期，许多欧洲科学家开始研究印度伍兹钢的起源问题，最著名的就是迈克尔·法拉第。[65] 布罗代尔认为，“在19世纪前几十年，许多西方科学家……热衷于研究‘大马士革钢’（或‘伍兹钢’）的秘密。他们的研究成为英国金属结构学的起源”。[66] 同样重要的是，英国生产商在科比钢厂进行实验的目的，就是仿制中国古代的炼钢技术。随着标准钢（uniform steel）的产生，证明了这些实验是成功的。

棉纺织业

棉纺织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另一个（如果不是主要的）支柱。到1830年，纺织品成为主要的出口商品，因此，纺织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龙头。历史学家总是关注英国发明家独创的一系列发明，包括：约翰·凯的飞梭（1733），约翰·怀亚特和刘易斯·保罗的细纱（精纺）机（1738），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詹妮纺纱机（约1765），理查德·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1767），塞缪尔·克朗普顿的“骡机”（1779），埃德蒙·卡特莱特的水力织布机（1787），还有瓦特的蒸汽机（1776）。这些发明再一次被认为是遵循了“挑战与反应的结果”这个内在规律，即英国人的天才发明被不断的应用，随后再对这些技术加以改进。其结果是纺纱效率呈十倍地增长，这只能通过从美洲进口棉花来满足需求（见第11章）。

人们通常以为，正是在英国北部“肮脏”的兰开夏地区，露出了近代纺织业的第一缕晨曦。但是，兰开夏并非纺织工业奇迹的发源地，因为纺织业根本就不是仅仅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它与中国和印度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中国不仅在纺织机器方面一直领先，而且还发明了性能优于阿克莱特纺纱机的“大型精纺机”。此外，中国很早就有了纺织机器，这些机器只是在一个关键结构上与凯的飞梭和哈格里夫斯的詹妮纺纱机不同。[67] 正如狄特·库恩（Dieter Kuhn）①指出的：

> 中国的纺织技师早在13世纪就发明了工业用纺织机（近似于英

①当代德国汉学家，著有《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译者

国的发明）的全部关键部件……事实上，就纺织机的结构来看，即使是詹妮纺纱机（一直不易操作），也赶不上用来纺织苎麻纤维的大型精纺机的质量。[68]

唯一的差别是，中国的纺织机是用来纺织丝绸的，而非棉花。然而，正是中国丝绸纺织技术的传播，才最终为英国的棉纺技术打下了基础。

中国的纺织发明第一次传播到欧洲是在13世纪（这促成了意大利丝织工业的兴起——见第6章）。接着，意大利人可能又把这种思想传播到英国。此处要提到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约翰·洛姆（John Lombe）的丝织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丝织厂为德比①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范例。在此我们发现，洛姆的纺丝机实际上标志着一系列全球性技术传播达到了顶峰，在传播过程中，中国向欧洲，当然还有英国间接进行了信息传递。洛姆的思想来自于已经使用纺丝机的意大利。[69] 但如果把这种机器说成是意大利人的发明，则掩盖了它的中国起源。正如第6章中说明的，这些纺织机的重要特征是使用了绕丝机（或绕线机），而这些都起源于中国，中国早在1090年就开始使用绕丝机。[70] 洛姆的丝机也是以绕丝机为基础，与中国的纺丝机非常相近。此外，我们在第6章中已看到，意大利纺丝机的各个方面几乎都与中国早期的纺丝机一致，也就在那个时候，洛姆到了意大利。[71] 这里的主要观点是：正是德比地区的丝织厂（以意大利的发明为基础，而中国又为意大利提供了最初的原型）为新兴的棉纺工业提供了模型。

英国工业优越的象征抑或是英国人自大狂妄的标志？

人们常常认为，英国工业的优越和创造性的一个典型标志，就是早在1779年出现在英国“煤溪谷”（Coalbrookdale）的第一座铁桥。有一本书代表性地指出，就是在“煤溪谷”：

①英国英格兰中部城市。——译者

> 约翰·威尔金森及其竞争对手们竞相展示他们的才智。老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用铁生产了炊事用具，而威尔金森和什罗普郡的铁匠们此时更加雄心勃勃。与亚伯拉罕·达比三世进行合作，威尔金森在“煤溪谷”附近建造了第一座铁桥。这座桥一直矗立至今，它的建筑构思如此独特，以致现在附近的小镇就叫做铁桥（Ironbridge）。[72]

然而，这却掩盖了中国早在一千年前就有数千座铁悬索桥的事实。事实上，世界上的第一座铁链悬桥早在公元65年就出现在中国（云南的兰津铁索桥），后来在公元580到618年间，金沙江上也出现了铁索悬桥。[73]中国的这些实例不但“启发了西方的工程师”，[74]而且连耶稣会士对中国铁索桥的记述，也为许多像威廉·钱伯斯这样的英国建筑家所津津乐道，甚至还吸引了托马斯·特尔福德（Thomas Telford）①的关注。[75] 人们认为英国工业创造力的另一个标志，就是1798年“首次”出现的煤气路灯装置。这再次掩盖了一点，即在英国的“发明”出现之前，中国就已经使用天然气照明差不多两千年了。[76]

英国的钻头也被视为一个成功的典范，它可以钻到200英尺左右的深度。但跟中国发明的可以钻到3000—4800英尺的深井钻头相比，就相形见绌了。中国人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使用了长钻头，而西方到了19世纪才赶了上来。更重要的是，欧洲的盐矿开采（1834）和石油钻探（1841）用的就是中国的钻井技术。事实上，1859年埃德温·德雷克（Edwin Drake）在宾西法尼亚钻探油井时，就直接用的是中国的绞索技术。坦普尔总结道：

> 在蒸汽动力出现前，美国这种所谓的“换挡”式（kicking her down）石油钻井方法，和中国的绞索式钻井方法一模一样。……甚至现代的旋转钻头似乎在某些方面还保留着中国古代发明的影子。简

①英国著名的道桥工程师（1757—1834）。——译者

言之，西方的深井钻探技术实际是从中国引进的，现代石油业是建立在比西方先进1900年的东方技术的基础之上的。[77]

还有，人们认为英国工业优越的另外一个标志是，带有防水密封舱的轮船的发明。这应归功于塞缪尔·本瑟姆（Samuel Bentham）①爵士的智慧，他在1795年前后为皇家海军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发明。但正如他妻子后来所言（打破了欧洲人的常规），这应归功于中国人的发明。[78]事实上，早在公元2世纪，中国的船只上就用到了防水密封舱。而不可思议的是，直到18世纪末，英国海军才开始直接仿效中国的发明，之所以吃惊是因为早在1295年马可·波罗就第一个把这种救生的发明传到了西方。但令人痛惜的是，如果英国工程师们把这种发明用于泰坦尼克号（据称是西方或英国轮船设计的最高成就）的话，那么就可能挽救在其处女航中丧生的那不少于1502人的生命（尽管大西洋的航速记录仍未找到）。

或许，英国人狂妄自大的基本特征在1851年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可见一斑，它显示了英国工业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博览会在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②的水晶宫举行，据说这幢建筑是以钢铁架为支撑，由玻璃建成。但我们通常不知道的是，“帕克斯顿的水晶宫最长的拱门——跨度为72英尺的交叉拱形结构，是由一层一层的梅梅尔（Memel）冷杉木做成的。在这座表面上看起来由钢铁和玻璃建成的温室里，有205英里长的木制窗框锁闩和34英里长的木制排水槽”。[79]这说明了现在被掩盖的一点，即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大多数东西仍然是以木头而非钢铁为基础的。当然，尽管我们在脑海中有钢铁轮船的画面，但事实上，在“世界博览会”的前夕，英国90%的轮船是由木头制造的。只是到了1852年后，英国生产出足够廉价的钢，用来大批量生产船只。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受到中国技师影响的贝西默“转炉炼钢法”的发明，才使这些成为了现实。

---

①英国著名的机械工程师、造船工程师（1757—1831）。——译者

②英国建筑师（1803—1865）。——译者

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典型标志就是运输工具的革命，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开凿运河，尤其是运河闸门的发明。当然，人们典型的观点是，英国人詹姆斯·布林德利（James Brindley）“是最伟大的运河工程师，他的机械天赋被应用到解决修建运河的问题中，并取得了成功”。[80] 但正如我们第3章所述，带有“天妃闸”的运河构造是宋朝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发明于984年，比西方早近800年。[81] 另外，英国修建于1750至1858年间、全长6000公里的运河，与700年前宋代修建的全长5万公里的运河相比，就显得逊色多了。中国的运河可以容纳更多的船只，这使那些由马拖着、沿狭窄的英国运河缓缓划行的小而古怪的驳船相形见绌。11世纪时，中国的私人船只穿梭于大运河中，可以承载110多吨的重量（超过了哥伦布旗舰“尼娜”号的最大载重量）。到19世纪末期，中国运河内轮船的载重量大约为140吨（约为英国驳船的3倍）。

结　论

这些并不能说英国的工业化仅以中国为基础，但可以说英国的工业化明显地建立在“外生性”变革的过程之上，这种变化可以追溯到比西方早700至2300年中国的许多创造性发明上。比较合理的说法似乎是：英国钢铁工业和棉纺工业的重要意义不仅表现在它们是“后发性”方面，还表现在它们的模仿能力上。因此，英国人的成功不在于他们具有创新能力，而在于他们具有对外来发明进行加工、改进的解决问题的毅力。从这个方面来说，英国很符合标准的新兴工业国家或“后发国家”的说法，它享受到了所有“后发优势”，能够消化和利用外来的技术发明。中肯的说法应该是，英国人后来改进了这些发明，但要贬低中国的作用却完全是不合理的。因为如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会有英国的改进。还有，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贡献，英国很有可能还是一个渺小而落后的国家，游离于一片同样落后的欧洲大陆边缘，而欧洲大陆则从公元500年起就游离于由亚非引导的全球经济的边缘。

总之，我对工业化“全球性、历史性、连续性”的看法是，传统上所强调的英国工业革命乃是“万物之始”（借用罗斯托之语）的观点，现在可以视作一种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的产物。因此，我们最好引用埃里克·琼斯的话来结束本章的话题：

> 以前，似乎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件明确无疑的事情，发展开始于……18世纪末期英国的一场工业革命。现在，我们非常明白，这件事情实际上只是一个过程，微不足道，很少有英国味（同时具有更多的东方味），顺理成章，只是世界历史统一体的一个片段，需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经历。[82]

第10章

塑造欧洲种族主义身份和创造世界，公元1700—1850年：作为一种道德天职的帝国文明使命

土耳其、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终有一天会繁荣强大的。但那里的人们却永远都不会进步……除非他们享受到了人类的权利；只有靠欧洲人的征服，他们才能得到这些权利。

温伍德·里德（Winwood Reade）[1]

据说，仅用我们的文明使命，就可以证明我们占领野蛮人的土地是正确的。我们所有的作品、演说和报道，都在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我们想把非洲人（和东方人）变为文明人的愿望。无庸置疑，有人乐于把物质条件的改善，专业技能的提高，住房、卫生和教育的改进看作是文明的进步，这些很可能是有益的、甚至有必不可少的"价值"。但是，它们就是文明的全部吗？是否文明最重要的就是人性的进步？

普拉西德神父（Father Placide）[2]

①英国历史学家、探险家、哲学家（1838—1875）。——译者
②比利时神父（1906—1977），长期在非洲传教。——译者

本章有三个主要的目的：第一，阐明我的观点，即欧洲人身份的形成在西方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方法是，指出身份的形成是导致帝国主义的重要因素，而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后来的西方崛起（见第11章）。第二，种族主义身份的建立是以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这促使我对一般的欧洲中心论假设进行了反驳，这种观点认为欧洲人进步开明的性格特点是西方崛起的基础。第三，它强化了我的基本观点，即全球背景对西方的崛起至关重要。正如杰拉尔德·德兰蒂（Gerard Delanty）[①]所说的：

> 在帝国主义时代，欧洲思想（或身份）在与东方的冲突中找到了其最为持久的诉求，欧洲的身份正是在与其他文明的碰撞过程中形成的。欧洲身份不是自身演化而来，而是在一系列的全球对立中形成的。在维持这种自我和"他者"的二分法说教中，欧洲和东方成为欧洲所定义的文明价值体系中对立的两极。[1]

如果我们将种族主义和它的"科学"形式糅合在一起时，我们就会发现帝国主义以种族主义说教为基础的观点似乎难以置信，因为种族主义说教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后的欧洲——远远晚于帝国主义。但是，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以及詹姆斯·布劳特）一样，我把"隐性种族主义"和"显性种族主义"区分开来。[2] 首先，隐性的种族主义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形成的。而显性种族主义形成于18世纪初，到1840年后（尤其是在英国）才强势显现。其次，隐性种族主义是通过文化、制度和环境标准而不是遗传学特征来表现"差异"的。尽管如此，它主要体现了包括西方优越性和东方劣等性的种族权力关系。因此，隐性种族主义远比显性种族主义更富欺骗性，因为它更多是一种潜意识的行为——种族主义的一面常被掩盖。正是因为这种隐性种族主义，才使不少欧洲人真诚地相信他们在通过帝国主义帮助东方，而实际上他们正利用

①当代英国社会学家。——译者

各种方法——文化、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手段，给东方造成了大量的压迫、痛苦和不幸。

这两种种族主义思想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不同或含义不同。关键是，“隐性种族主义”假定劣等文明可以通过帝国的“文明使命”进行修正。相反，因为“显性”（或“科学的”）种族主义主要关注生理学或遗传学的特性，故倾向于认为种族的低劣性是恒久的。因而，显性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没有一种逻辑性的关系。许多“科学”种族主义者是“悲观的”，并极力反对帝国主义，或因为这是一项毫无意义的工作（假定东方人根本无法被文明化），或因为实行帝国主义会出现杂种繁殖，从而导致优等种族的退化——如德·戈宾诺（De Gobineau）[①]和罗伯特·诺克斯（Robert Knox）[②]所言。此外，一些人反对帝国主义，是因为气候也会导致优等种族的退化。相反，还有一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科学”种族主义者并不“悲观”，他们认为，因为劣等人种终归要灭绝，所以盎格鲁—撒克逊人有义务来统治世界，并且文明的进步只有在英国人〔如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③]〕的统治下才会安全。

尽管这种种族主义的概念乍一听可能感觉复杂，但实际上从各个方面看都非常简单。假定显性种族主义与隐性种族主义是同卵双生的观点不正确，因为虽然它们之间有明显一致的地方，但也存在根本的差异，这就意味着每一阶段都有相似及不同的特征。有时侯隐性种族主义的历史系谱与显性种族主义的历史系谱差不多是相互分离的。因此，读者应记住我所做的阐述必定是一个概述，而事实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故事。不过，这里有两个观点很重要：第一，尽管显性种族主义很重要，但我还是要着重强调隐性种族主义的出现，因为它对帝国主义的形成至关重要；第二，我对提供这样一个系谱没有兴趣，它需要仔细检查显性与隐性种族主义形成中大量而详细的细枝末节。我所关注的是：种族主义和欧洲身份形成之间的关系。

---

①法国作家、人类学家（1816—1882）。——译者

②英国外科医生、解剖学家、动物学家（1791—1862）。——译者

③英国小说家、历史学家（1819—1875）。——译者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如下文所述，隐性种族主义最终诞生在“进步／启蒙”时代是矛盾的。但正如蒂埃里·亨奇（Thierry Hentsch）[①]所指出的，把启蒙运动看作是启蒙思想家开始公开塑造隐性种族主义世界观的时代，则过于简单了。[3] 它首先是一个潜意识的过程。此外，启蒙运动是“裂变性”的，因为其最大的矛盾之处在于，尽管它借鉴并吸收了东方的（主要是中国）思想——见第9章，这些思想随后却被精心构建成一种知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东方被假想成未开化地区，从而导致了帝国文明化的使命和对东方的压迫。

欧洲身份的重塑：种族主义、帝国论和世界的建立

隐性种族主义恰恰出现在启蒙运动期间。首先，启蒙运动是欧洲身份重新确立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实际上，它是建立在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问题基础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导致了世界的系统化、等级化以及世界的建立，其结果就是要相信：西方是，并且一直都是人类在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内文明进步的唯一承载者。正如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②]指出的，这种重新想象的过程“创造了一个永恒（发展的）西方，从其（虚构的）创始之初就是独一无二的”。[4] 这种理论就缔造了（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的）一种文化上的种族隔离制度，通过一种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代的虚构的界线，把西方与东方完全分离开来。尽管，经常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东方与西方早就存在着联系，并且在18世纪之前东方是经济发展的开拓者，但是，到了19世纪，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这样，欧洲人忽视或淡漠了东方对于西方崛起所做的积极贡献。基于此，新的世界理论断言，西方的崛起过程纯属自创：它完全是欧洲人的成就。通过这种方式，欧洲人将他们自己描绘成世界历史中过去和现在都是进步的主体，而东方人则被视为被动消极的客体。林达·

①加拿大哲学家（1944—2005）。——译者

②当代埃及著名经济学家，依附理论的重要代表。——译者

史密斯（Linda Tuhiwai Smith）[①]这样指出：

> 所谓原始人的特征之一，就是我们缺乏思想或智慧，我们不能发明，不能创造制度或历史，我们不能想象，不能创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利用土地和自然界的其他资源，不能运用文明的“技能”。由于缺少这些优点，从文明和人性本身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是不合格的。换言之，我们不是“完整的人”，一些人甚至连部分的人都算不上。[5]

正是这种思想，导致了亚洲人是“没有历史的人”观念的产生。通过把东方民族视为没有能力获得发展的人，而只有西方人才能够通过帝国主义向东方传输文明的福祉就成了公理。

我对帝国主义的思考，始于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继爱德华·萨义德之后）的观点。他将帝国主义看作是某种“超越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军事现象的东西，也是一种有着广泛的文化、知识和技术诉求的复杂的意识形态”。[6] 尽管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集团无疑是通过帝国主义而获益，但是假定帝国主义理论仅仅是针对他们，或在他们的要求下而产生，则是错误的。同样，把帝国主义贬低为任何一种特定的利益团体（如唯物主义理论常常假设的），也是不正确的。此外，尽管资本家从帝国主义受益颇丰，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实际上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形成贡献甚少。事实上，它的缔造者主要是学者、知识分子、教师、科学家、旅行家、小说家、新闻记者、基督教传教士、政治家和官员。

如果存在一种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话，那么它就是对欧洲人作为“人类主人”的颂扬和欧洲人自我优越感的强化。[7] 因此，这就构成了此类传输媒介：资本家将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福祉；传教士将传播基督教拯救使命的福音；科学家将为全人类推动科学知识的进一步发展；教师将传播欧洲的知识；官吏们将普及理性的官僚政治；而政治家们则输送民主。但正

①当代新西兰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译者

如下文所述（第11章），由于压迫和经济剥削成了英国使命的鲜明特征，帝国主义的“实践”与“承诺”相互矛盾。还有最后一点值得注意，在此我主要集中于英国帝国理论的形成，因为尽管它和其他欧洲帝国理论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但也在很多方面和它们存在着差异。下面我将指出其中的若干不同。

通过创造一种假想的社会“文明等级表”，英国人成功地对世界进行了虚构。如表10.1所示，英国人将自己置于“英超联赛”（the Premier League）的地位；欧洲大陆则被归为“甲组”（或“第一世界”）；“黄种人”被定为“乙组”（或“第二世界”）；“黑种人”被划入“丙组”（或“第三世界”）；那些摇摆于贬逐降级边缘的则被归入第四组（“猿人世界”[①]）。等级分类的标准乃是源于各种观念性的因素，包括：

东方专制主义理论；

东方之彼得·潘理论；

根据气候和气质的分类；

新教福音派教义的诞生；

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科学种族主义的出现。

表10.1　英国帝国主义理论：文明等级表和种族主义世界的建立

文明等级	“文明的”（“英超联赛”和“甲组”）第一世界	“未开化的”（“乙组”）第二世界	“野蛮的”（“丙组”）第三世界
相应国家	居于“英超”地位的英国；“甲组”的西欧	如奥斯曼帝国、中国、暹罗和日本	如非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种族肤色	白色	黄色	黑色
性格	恪律守纪、勤劳	抑郁、呆板僵化	迟钝、怠惰
气候特性	寒冷、潮湿	干燥、酷热	严重干旱、贫瘠
人的特性	基督徒	异教徒	无信仰或异教徒

①猿人世界（Planet of the Apes），2001年美国电影，说的是人类在2029年到达一个猿人星球的经历。——译者

（续表）

文明等级	"文明的"（"英超联赛"和"甲组"）第一世界	"未开化的"（"乙组"）第二世界	"野蛮的"（"丙组"）第三世界
东方专制主义理论	开明、民主、自由、个人主义、理性	专制、奴役、中央集权主义、非理性	专制或缺乏管理、集权主义、非理性
彼得·潘理论	父亲般的、阳刚、独立、创新、理性	不成熟、阴柔、易于模仿、易受迷惑和非理性	幼稚、阴柔、不独立、旁观主义、非理性
社会合法准则	英国人是上帝的选民或优等民族	堕落的民族	自然状态下的未开化者
政治合法准则	（居住空间界定的）主权国家	非主权国家或间接帝国统治（居住空间未界定）	无主地或直接殖民统治（未被占领的荒漠之地）
综合文明特性	符合标准	不正常	不正常

东方专制主义理论

东西方分裂的重要理论之一，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渗透在到过亚洲的欧洲旅行者，包括从博丹、马基雅弗利，尤其是孟德斯鸠，到米勒、马克思和韦伯等学者的作品中。它宣称欧洲是民主的发源地，是经济和政治进步的承载者，而亚洲则被视为专制主义的原产地，是经济停滞的牺牲者。我在本书中详细考察了这一理论，因而毋需完全重复这种观点。尽管东方专制主义观念出现于17世纪和18世纪，但到19世纪时，它已经完全渗透到整个社会。《爱丁堡评论》杂志的陈述代表了当时流行的观点：

> 东方制度就其本质而言，对于思想的强力扩张是不利的。亚洲在任何时候都被剥夺了自由之曙光，由此导致了高品质工业和精神文化成果的绝对贫乏。[8]

后来寇松勋爵［印度总督（1898—1905）］同样持这种观点，他对中

国的描述可以扩展到所有亚洲社会：

> 对私人企业的不信任，植根于养成相信政府无所不能，而个人一无是处的思维……在官方的抑制下，所有的私人企业被扼杀了……整个统治阶级……沉溺于维持现状……（所有的阶层）在经济的停滞中找到了平等的愉悦。[9]

或者正如穆勒①对中国和埃及的描述：他们的民族，“在精神自由和个性的需求上永远停滞不前，……因为（专制）制度没有被破坏，其他制度失去了生存空间，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停止了”。[10]

这一理论对于欧洲身份的形成至关重要，因为它使欧洲人将自己想象成显而易见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仅仅由于他们不是“专制的东方”。这很重要，因为正如我们将在12章所述——12世纪前欧洲没有一个国家是民主或自由的。因此，这种对东方“可怕的极权主义的描绘”，转移了人们对欧洲国家缺乏民主问题的注意力。[11] 此外，欧洲中心论者不仅捏造了欧洲是民主国家，而且还通过历史性的追溯，提出这样一个概念来表明欧洲是民主的发源地。我们在第5章谈到，身份的形成过程既简单又复杂。这里涉及的是其“复杂的”一面，因为其复杂性源于为了塑造一种特定身份所必须完成的许多智力技巧——这样，作为永久落后、专制或倒退的东方的对立面，就是一个完美的、先进的永恒民主或进步的欧洲。所有这些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欧洲历史是一种进步的线性发展史，而东方却是退化与停滞的历史循环。

这里，重要的智力技巧是关于对希腊的重新想象。在相当短的时域内（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思想家们迅速将古希腊提升为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根据是其所谓的民主制度和科学理性。[12] 由于希腊在关键的文艺复兴中的作用（据称缔造了“欧洲的动力”），将希腊置于欧洲内部同样重要。但是，这一纯粹的欧洲希腊的观点决非希腊人对自己的看

①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1806—1873）。——译者

法。他们将希腊看作是固定不变的“古希腊的西方”。欧洲一直是一种与地理“现实”相反的概念，这反映在事实上“欧罗巴”（Europa）自身是希腊神话中位于黎巴嫩海岸的推罗（Tyre）王阿革诺耳（Agenor）之女。[13]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特洛伊实际上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东部。事实上，“希腊在精神上和文化上与东方有着密切的联系，试图摈弃或否认这种东方传统的意图，常常意味着对希腊精神和文化的贬低和粗糙化”。[14]马丁·伯纳尔将这种观点冠以（反欧洲中心论的）“古典模式”，坚称希腊受到了古埃及的极大影响。

但是，我们要面对的迫切问题是：要么承认古希腊是东方的一部分，或者承认文艺复兴是在东方（主要是伊斯兰教）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要么承认古希腊并非特别的民主政体。因为这将削弱新出现的认为欧洲具有独一无二的进步和创造性的观点的基础，它打断了欧洲中心论学者现在发明或强加的欧洲线性发展道路。因此，欧洲的知识精英和思想家试图清除希腊的东方因素，夸大其欧洲特征及其科学和民主制度。这十分重要，因为希腊的民主很不成熟，至少可以说，只有希腊男性能够参与政治活动——妇女被排除在外，并且奴隶制是古希腊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奴隶们当然也被排除在外）。此外，古希腊的科学大多应归功于古埃及。因此，用伯纳尔的话说，希腊的“古典模式”现在被“雅利安模式”所取代（希腊纯粹是欧洲的近代欧洲中心论构想）。[15]正如伯纳尔和阿里·马兹鲁伊（Ali Mazrui）①所指出的，对古希腊历史的编造虚构，对于构建民主或科学的欧洲永远优于专制或前科学的东方的欧洲中心论至关重要。[16]

总之，东方专制主义理论非常重要，它不仅“阐释”了亚洲落后的原因，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巩固了欧洲的身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先进的、民主的文明发源地。通过这种方式，这一理论将欧洲人提高到永恒进步的主体或施动者的地位，而同时将东方民族贬抑成世界历史上永远落后的、消极的客体。

①当代肯尼亚学者，研究非洲和伊斯兰问题。——译者

东方之彼得·潘理论

对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形成补充的理论，被称为“东方之彼得·潘理论”。启蒙运动时期所形成的“发现”或知识很大程度上在该理论中发展到了顶峰。这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创造出了理性的西方和非理性的东方，不同的是，彼得·潘理论把“他者”虚构成为一种浪漫的形象：冷酷，易受诱惑，淫荡，轻佻，但更多的是无助。这实际上是把东方想象成永远长不大的稚嫩孩童。这就再次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欧洲是沿一条时间直线向前进步的，东方则打上了消极停滞的烙印。

该理论引发了许多臆想中的用来区分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分类法。这样，西方就被想象成富有独创性，积极进取，讲求科学，严谨自律，心智健全，明智达理，注重实效，善于思考，独立自主，尤其是具备父亲般的意志。这其实只是一种虚构，因为我们已在前面的章节中了解到，西方明显吸收了东方500—1800年间优秀的技术和思想。而相反，东方却被想象成次于西方的对立面：喜好模仿，消极被动，迷信，懒惰，容易冲动，愚蠢，感情用事，轻佻，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惯于依赖，尤其是稚嫩如孩童。同样的道理，这也不过是一种虚构。重要的是，如第1章所述，这种关于东方和西方的说教与父权理论非常相似。因此，我们可以用“男性”和“女性”这两个词语来代替西方和东方，结果都是恰好相同的二元对立论。

东方之彼得·潘理论是“人类精神统一性”原则的同义词。布劳特认为，该理论与“唯理性”密切相关。[17] 启蒙运动的实质是它使人们保持了思想意识的连续性。西方人是完全理性、成熟明智的，而东方人则很幼稚、心智不全，即他的思想（心智）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关键在于：

> 按照人类精神统一性的（假设），非欧洲人理所当然可以在经历过一段学习体验后（即西方帝国主义）长大成人，可以变得富有理智，变得富有现代意识（“殖民保护”一词就是人类精神统一性原则的标志，并且这个概念出现在当时许多历史地理课本中）。[18]

事实上，在把西方描绘成理性、独立、具有父亲般意志的“男性”的同时，又将东方人描绘成一个非理性、不独立、无助的孩童或妇女，这种同步描述对帝国文明使命即为道义职责这一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因为众所周知，只有父亲般的西方才能够并应当把孩童般的东方解放和救赎出来，这更多如同一个父亲把抚养孩子视为自身的义务。此外，把东方刻画成为一个富有魅力、性感轻佻的“女性”，就进一步推动了父亲般的西方去完成帝国主义的征服、入侵、统治和救助。

进一步证明上述描绘纯属虚构的是，彼得·潘理论的观点和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观点都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在把东方想象成为一个专制威胁（残暴和极权势力的习惯用语）的同时，又把它假想成一个所谓无助而孩童般的（稚嫩脆弱的习惯用语）没有丝毫威胁的实体。这样，东方就被同时涂上了的善恶二分色彩：“恶魔的形象”和“浪漫的稚童形象”。尽管从表面看这些无法比较，但欧洲中心论者成功地把这些与帝国主义论调嫁接成浑然一体、丝丝相扣的能力，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对于帝国论调来说，把东方描绘成一种专制威胁，如同视东方为稚嫩、迷惑，首先是消极的和无助的思想一样重要，因为后者常常让帝国主义看起来像一种“道义上的天职”（即：解放东方睡美人是西方王子的义务）。关于彼得·潘理论、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没有什么比鲁迪亚德·吉卜林在其1899年的名诗《白人的负担》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正是在那首诗里，他把东方人描述成“半是孩童半是魔”。这种负担构成了一种“救赎”东方堕落、贫穷的道义上的责任。不过，这的确也是一种负担，因为帝国主义者不应期待他们因服务人类而得到回馈。相反，吉卜林告诫说，这种回馈只不过是：

你努力改善其生活的那些人对你的责备，
你尽力保护其生命的那些人对你的怨恨。

根据气候和气质的等级划分

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认为气候、气质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具

有重要意义。虽然孟德斯鸠、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①]和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lconer)[②]位居蒙田、皮埃尔·沙朗[③]、让·博丹等人之后，但他们对此做出了突出贡献。生活在气候干旱或炎热地区的人被看作“道德水平低下”，而生活在气候温和地区的人则是“大脑活动能力发达”。[19] 当然，欧洲人的勤劳努力似乎与大自然相得益彰，因为他们生活在湿冷的气候条件下，而非洲人却因极度干燥的生存环境而变得迟钝或懒惰了。正如菲利普·柯廷所说，“结论是.....(根据）福柯纳的观点，人类最佳性格特质的形成地点位于气候温和的北方边缘地域——简单地说——就是在英国”。[20]

气候、气质与文明的程度密切相关。正如在前一章中指出的，黄种人（尤其是中国人）在18世纪80年代被视为堕落的民族，因受气候恶化及东方专制主义的严重影响，而沦落到道德败坏和愚昧落后的地步。[21] 这无疑是一种极不恰当的表述，该表述既无法说明欧洲人以前曾仰慕过中国是先进文明的典范，也与中国北方地区和欧洲同样气候“温和”的事实毫不相符。但不管怎么说，政治制度和气候条件到18世纪末的突然改变都无法解释中国“没落”的原因。正如迈克尔·爱德华兹所阐明的，这可能是“对（原先）不加批判地崇拜中国的行为所做出的一种自然反应，不过也是一个完全无知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过分奉承与彻底蔑视之外就别无选择了”。[22] 因此，中国早期所树立的高贵、明智的孔夫子形象，在1780年后已经彻底被一种阴险邪恶的“傅满洲”（Fu Manchu）[④]形象所取代了。同时中国人的气质被视为忧郁沮丧的一类，因为一度高大的中国人现在不得不承认他们所具有的“弱点”。

实际上，黑肤色的“野蛮人”被想象成了与猿猴仅一步之差的“自然

①英国启蒙运动思想家（1723—1816）。——译者

②美国著名小说家（1897—1962），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著有《喧哗与骚动》等。——译者

③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哲学家（1541—1603）。——译者

④英国小说家萨克斯·洛莫（SaxRohmer）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中的虚构人物。1875年在《福尔摩斯遭遇傅满州博士》一书中首次出现，瘦高，秃头，竖眉，面目阴险，其实是对黄种人的妖魔化描述。——译者

状态下的自然人”。在这里，英国探险家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的描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17世纪末期到达澳大利亚时，对当地土著居民的“天生畸形”感到非常吃惊：这些人长着“我所见过的最丑陋的容貌和体态，尽管我曾见过了形形色色的野人”。[23] 一百年之后，欧洲科学家把澳洲土著人归入仅与猿猴有一步之差的部类，便是对丹皮尔傲慢心态的重现。彼得·坎宁安（Peter Cunningham）①曾质疑，是否应将土著人归到“最低等的文明中，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与猿猴之间的过渡人种？——因为确实有些女人似乎只是需要一条尾巴来表明其性别”。[24]

正是在这里，显性（科学）种族主义和隐性种族主义源头之间的联系才有了清楚的解释。这里大生物链的发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该词出自卡尔·林奈的《自然体系》（1735）一书。通过后来几次修订，他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等级构架。最初他用四种人种来划分等级结构：白人、黄种人、红种人和黑人（白种人处于最高层）。后来在1758年，他又把人属划分为两类：第二类包括猩猩和没有语言、没有感情的某些未开化的野人。由于黑人仅比“没有尾巴”的猩猩高一个等级，并且等级之间的差距不大，因此可以断定黑人就处于人类文明的最底层，仅比猩猩高级了一点点。

至此，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就提出了一系列特别的“理论”和“分类学”，并在1840年后科学种族主义在英国兴起时达到鼎盛。18世纪末期，皮特·坎珀（Pieter Camper）②着手测量人脑剖面结构，结果是欧洲人被赋予了最高的智力水平和完美程度，而黑人则等级最低，仅仅高于复杂的动物。继坎珀之后，还有一大批研究人类颅骨形状和大小的思想家——包括居维叶、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③和莱修斯（Anders Adoif Retzius）④，他们的结论都惊人地相似：欧洲人最聪明，黑人最愚蠢。孔德·德·布丰认为，正是霍屯督人（Hottentot）（属南非科伊桑语系）填补了人类与类人猿之间纽带的空白。布丰的观点与爱德华·朗

①英国外科医生（1789—1864）。——译者
②荷兰物理学家、解剖学家（1722—1789）。——译者
③德国物理学家、生理学家、人类学家（1752—1840）。——译者
④瑞典解剖学家、人类学家（1796—1860）。——译者

(Edward Long)[①]如出一辙，后者声称："这种看法是有些滑稽，但我仍然认为一个大猩猩丈夫完全配得上一个霍屯督女人。"[25]尽管我们很多人现在从他的上半句话中找不到毛病，但是和他同时代的人主要认同的却是他的下半句话。

另外一个流行的"科学的"荒诞说法是由梅特林克提出来的。他是把人脑中控制直觉、迷信和潜意识的"东半叶"（eastern lobe）与产生理性、科学和自觉的"西半叶"做了"对比"。[26] 还有詹姆斯·亨特博士，他认为"黑人智力发展受抑制的原因是'低等人类'头骨骨缝闭合过早"。[27]有趣的是，这种荒诞的说法却为习惯戴遮阳帽的英国人所积极拥护，从而促使英国殖民统治者根据他们极易于中暑这一情况，逐渐形成了一种迷信思想：自己的头骨较薄，因此自己的脑体较大。正如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②]所说的："头骨薄是人种优越的标志，遮阳帽是帝国的一种象征。"[28]

非基督教的多源说思想支持了科学的种族主义，该思想认为不同的人种有不同的起源，否定了基督教的单一血统起源论（认为所有人都是潜在平等的，因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基督徒），为黑人以及黄种人的永久低劣性理论铺平了道路。不过，这种理论只在法国非常盛行，在英国却因新教的复兴而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29] 事实上，在19世纪40年代时，科学种族主义才在英国完全出现。

新教的复兴

英国新教教义复兴最大的矛盾之处是，尽管它因更倾向于人类同源论而非多源论，从而适时地阻碍了科学种族主义的兴起，但它却对隐性种族主义和文明使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重新援引诺亚三个儿子的创世纪故事非常重要，因为该故事证明了文明使命的合理性。创世纪故事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因为它宣扬——或被阐释为——雅弗（即欧洲人）的职责就是同

①英国殖民官员、历史学家（1734—1813）。——译者

②英国左翼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1903—1950），早年在英属印度做警察，反对殖民主义和极权主义，曾参加西班牙内战。著有《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等。——译者

化闪（亚洲人），以及对哈姆或迦南（非洲黑人）进行奴役和殖民化。《创世纪》第9章第27节写道："神将使雅弗强大，住进闪的帐篷，让迦南做他的奴仆。"新教的复兴激发了基督教传教士走向世界，向所有的非基督教徒传播福音的渴望。正如克里斯托弗（A.J. Christopher）[①]所说：

> 传教士们，可能比其他殖民分支机构的成员，更致力于土著社会的根本转型……不管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他们因此而试图破坏前殖民社会，并用欧洲人所想象的新的社会形态取而代之。[30]

基督教传教士形成了宣扬文明使命最有效、最具影响力的声音之一。事实上，正如戴维·阿伯内西（David Abernethy）[②]指出的，基督教徒一旦进入帝国的各个区域，就"强烈要求政府进行干预，以促进文明使命的实现"。[31]

新教复兴更重要的一方面在于，它使英国人不仅将自己与黑种人和黄种人区别开来，而且还与其它众多欧洲民族区别开来。英国人将自己置于人种等级的最高层（"英超"地位），其次是德国人（处在"甲组"的顶端）。他们在"甲组"内部也进行了等级排序，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人被置于德国人之后，游移于"甲组"底部、面临贬黜危险的是信仰天主教的葡萄牙人。帕麦斯顿（Palmerston）指出，"道理很简单，葡萄牙人是整个欧洲民族（爱尔兰人除外）中道德层面上最为劣等的人种"。[32] 同样重要的是，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被排除在"甲组"之外，划到了"丙组"。英国的讽刺性杂志《潘趣》（Punch）这样描述道：爱尔兰人是"大猩猩与黑人之间的过渡动物"。[33] 英国人或英国上层阶级一致认为，爱尔兰人是一种特别"不开化的野蛮种族"〔如塞缪尔·马斯登（Samuel Marsden）所声称的〕。[34] 对爱尔兰人的不信任和憎恨，是英国上层阶级制定政策把他们流放到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样阐述是非

①当代南非政治地理学家，著有《变迁中的南非地图》等。——译者
②美国人权活动领袖（1926—1990）。——译者

常重要的，因为这说明了肤色只是划分人种等级的必要标准，但明显不是充分标准。归根结底最要紧的是，其他文明如何与已在英国日臻完善的、虚构的“文明标准”密切吻合。

林达·科利（Linda Colley）[①]的辩论很有说服力：英国人对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人（未提及爱尔兰人），几乎和所有的东方人一样仇视。[35] 他们认为，与天主教义相比，新教教义才是文明的代表。法国的天主教徒被看作是挣扎在法国专制主义统治下的准奴隶（而爱尔兰人则不过是野蛮的无赖）。在新教气氛浓厚的18和19世纪的英国，不列颠人开始认为自己受到上帝的特别眷顾——他们是真正的“上帝选民”。这集中体现在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②]的著名诗歌里，教导英国人要永不停息，直至“在英国苍翠的乐土上建成耶路撒冷圣地”。林达·科利解释道，英国新教教徒明白：

> 他们有义务习惯性地接受极端罪恶和磨难时期的考验，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斗争——特别是与那些非新教徒的斗争，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但他们也相信，在上帝的眷顾下，他们将获得拯救，获得荣耀。总之，他们相信，他们中许多人的国土并不次于他处以及富足的以色列。[36]

因此，从英国人即为“上帝选民”这一观点来看，将帝国主义和世界的英国化看作是英国的“天定命运”，只不过是小小的一步。

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科学（或显性）种族主义

直到19世纪40年代以后，显性（或科学）种族主义才在英国迅猛兴起。在这种特有的理论（其中不少在此前已提及）形成过程中，一些学术学说也得到了发展。其中一项重要的成果，就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

①当代英国历史学家，著有《英国人：铸造国家（1707—1837）》。——译者
②英国诗人、画家、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1757—1827）。——译者

书的出版，并很快就被运用到社会科学理论方面。不过，书中的一些观点早在达尔文之前已经出现过，最有名的就是出现在赫伯特·斯宾塞的作品中。在使西方人成为合法的优等白种人方面，“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后者最初为赫伯特·斯宾塞所创立）的思想变得更加重要。把达尔文主义引入到社会科学理论中去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似乎更加强调把人种分为先进和落后，或欧洲—雅利安人（对）东方—非洲人”的“科学”合法性。随着显性（科学）种族主义理论的兴起，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就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37] 这一理论被法国的阿瑟·德·戈比诺（Arthur de Gobineau）爵士、英国的罗伯特·诺克斯（Robert Knox）和查尔斯·金斯利、美国的诺特（Nott）和格里顿（Gliddon），及德国的一些作家，如卡尔·福格特（Karl Vogt）、德籍英人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进一步发展了。这些理论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但直到1850年之后才传播开来（虽然可追溯至18世纪）。[38] 在英语语系内，科学种族主义的特征被本杰明·迪斯雷利①的小说《唐克列德》（Tancred）（1847）中的一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他告诉我们，英国的历史性成功是一件

> 种族方面的大事。受所处海岛环境的庇佑，撒克逊民族的性格一个世纪以来被深深打上了努力勤劳、富有条理的印记。由于具备卓越的工作和秩序观念，高等人种的发展会推动国家的进步……所有的一切皆归因于人种。[39]

因而，把永久性的人种特征假定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石（即所说的“一切皆归因于人种”），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首次。特别强调了——把肤色和基因特征作为决定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性，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诸如罗伯特·诺克斯的《人类的种族特征》、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的《社会的演进》或戈比诺伯爵的《种族的不平等》等书籍，便设计出一

①英国保守党领袖、首相、小说家（1804—1881）。——译者

种基于肤色的三种种族分类法——白种人、黄种人和黑人（与创世纪故事相一致）。至此，该分类方法已被想象成为一种永久性的人种等级制度，同时，对一些（尽管并非全部）科学种族主义者来说，该方法可以证明“自我”（欧洲人）对“他者”（黄种人和黑人）的征服是正当合理的。科学种族主义以其极端的方式，来证明其对劣等民族实行灭绝和种族隔离政策的合理性。这种种族主义的思想迅速渗透到了风靡一时的帝国论调里，这些论调出现在帝国官员及英国政客们所签发的一系列没完没了的宣言中。典型的代表是约瑟夫·张伯伦[①]，他说：

> 我相信这个种族，这个世人见证过的最伟大的、处于统治地位的种族；我相信这个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如此之光荣，如此之顽强、自信和果敢，这个种族不会因气候的变迁和环境的变化而退化，这个种族必将成为未来历史和全球文明的主导力量。[40]

此外，寇松贴切地阐释了作为文明使命的帝国主义的含义：“在帝国的领土上，我们不仅能够找到通向荣耀与财富的钥匙，而且还唤醒了我们的责任感，找到服务于人类的途径。”[41]

重要的是，这种种族主义理论与国际法相契合。如詹姆斯·洛里默（James Lorrimer）[②]就将人类分为三个地带：白种文明人、黄种野蛮人、黑色原始人。[42] 林德利（M.F. Lindley）[③]强调，“落后地区是指那些居住着与非洲中部地区文明程度同样低下的土著人的地区”。[43] 约翰·韦斯特莱克(John Westlake)[④]在《国际法要论》（1894）中指出：“地球上的未开化地区，须由发达的西方国家吞并或占领。”[44] 事实上，欧洲的国际法积极规定了对东方实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使其成为合法行为。[45] 通过自行划

①英国政治家（1836—1914），曾出任殖民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和内维尔·张伯伦之父。——译者

②英国政治哲学家、律师（1818—1890）。——译者

③英国国际法学家（1881—1959）。——译者

④英国国际法学家（1828—1913）。——译者

分或从政治上设定世界各国的等级地位，欧洲国际法使帝国主义变为可能。结果，从思想上造成了对东方民族的“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sation)。何以如此呢?

“丙组”国家被深深打上了“无主地”(terra nullius)观念的烙印。从根本上说，“野蛮人”的土地仅仅被想象成为不毛之地或荒凉之地。典型的如1874年卡纳封勋爵所认为的:“英格兰的使命”唤起了“一种要占领不毛之地的冒险精神”，[46] 不过，爱德华·萨义德一针见血地指出，“地图上由土著人居住的不毛之地，并未给英国人带来麻烦”。[47] 当然，土著人的确没有给他们带来麻烦，这是因为土著人被想象成为野蛮人或者牲畜，因而就无权享有独立的空间。这种“思想上的去疆域化”，意味着全面的殖民统治是完全正当的。与黑种野蛮人的待遇和“无主地”的观念形成对比，处于“乙组”国家的“黄种人”被想象成是“堕落的民族”，他们的土地也被想象成“没有疆域的地带”。这样，由于这些人所谓的道德退化，唯一正确的就是让欧洲人入侵，并按西方的文明标准对其实行改造。不过，鉴于他们的土地未被判为“无主地”，但明显缺乏主权，欧洲人就通过非正式的帝国而非赤裸裸的殖民统治来予以矫正。相反，欧洲人却享有完全的自主权，这使他们从英国的文明使命中脱离出来，因为只有欧洲拥有文明的人类，尽管在英国人看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他欧洲人更文明。

帝国文明使命的道德悖论

一旦帝国主义论调通过欧洲身份的重塑和种族主义世界的建立而演进成型，那么，行使“文明使命”便成为一种道义上的职责了。唯物主义者认为，由于英国的物质发展已经达到顶峰，因此开始施行帝国主义是因为“它有能力”，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它忽视了一点：正是有了新的英帝国身份，才让英国人能够借助道德职责来行使“强权”。也就是说，促使英国人推行帝国主义的是其新的英帝国身份，这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有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应该（即“白人的负担”）去推行。正如爱

德华·萨义德最初指出的，东方人根本没有任何地位，只不过是必须解决的一堆问题——最好是对其实行殖民统治。实际上，“‘东方人’只是某种东西的代号……这样的称谓包含有须采取某种措施的含义。一旦我们把东方主义看作是西方要实施的一项工程或将要统治东方的决心的话，我们就不会感到惊奇了”。[48] 但是，正如我在第13章中解释的，这些都不能说明物质力量和物质因素无足轻重。毋庸置疑，物质力量是英国推行帝国主义的首要先决条件。但关键的一点是，依靠让人质疑的特殊的施动者身份，强权被引向了特定的方向。那么，种族主义身份是如何给英国（或西方）强权注入道德意志，从而导致帝国主义的呢？

“文明等级表”和世界的种族主义发明的结果，就是认为西方是常态的、先进的，而东方则是不正常的——落后的、野蛮或未开化的（见图10.1）。最重要的是，西方身份是在东方不能容忍其被想象为异态的情况下构建的。欧洲人开始把帝国主义视为一种“文明使命”，而西方人的“道德天职”就是把文明赠予给东方。将帝国主义标榜为一种文明使命有着多种原因：首先，通过抹除东方的身份和文化，并代之以优越的西方文明特性，帝国主义就被设想成用来教化和解救东方。其次，这种说法非常有用，因为尽管帝国主义未必如其实际发挥的作用那样有利于世界，但英帝国主义者真诚地相信，他们的确是在教化、解放或拯救东方。这种观念并未颇具讽刺意味地公开夸耀，诚如唯物主义者所指出的，是为了维护他们的行为。正像查尔斯·狄更斯作品中朴兹奈（Podsnap）先生的著名论断：其他国家只是一种“错误”。在其种族主义成见中，注定要英国来“纠正这种错误”。在这一点上英国人认为并无不妥，因为还有什么比帮助“他者”享有只有西方能够创造、并且只有英国能够传播的近代化和文明的果实更加崇高的呢？东方民族过于愚昧，过于固执，以致认识不到或者并不感激大英帝国的仁慈帮助。

那么，如何对待和治理东方民族的“异化”（即他们怎样才能成为“文明人”）呢？根据西方所判断的每个东方国家或东方民族所处的文明等级，将会选择相应的“文明策略”。这样，被评判的国家或民族的文明程度越低，所必需的惩戒性措施就越严厉，从而治愈其异常的痼疾。那些处于

“丙组”的国家（黑肤色的野蛮人），几乎不能算作人类，将通过殖民主义，甚至是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的极端形式来对待。那些归于“乙组”的国家（野蛮的黄种人），比黑种人文明程度高，但远比处于“甲组”的欧洲人低劣，将用“非正式帝国”的方式来处理。

然而，英国的文明使命乃是基于一种根本悖论之上。一方面它是推行“文化改造”的手段，试图“将东方民族提升到”英国的文明程度。这就要求东方的制度、文化、经济和政治活动按照英国的方式进行转变。另一方面，“文化改造”和“遏制”战略密切相关，而“遏制”战略试图抑制东方民族及其经济。换言之，矛盾之所在体现于既想提升其文明程度（文化改造），又想对其进行抑制（遏制）的双重愿望。但这一悖论在种族主义的帝国论调中是合乎逻辑的。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文明使命将使东方沿着西方的道路进行转变，消除由东方造成的身份威胁，从而使西方展现出其优越性。但为了保持这种“优越性”，对东方的经济进行遏制从而防止他们挑战西方的经济霸权，也是至关重要的。第二，“文化改造”和遏制都意味着对东方的镇压。文化改造体现了隐性种族主义的本质，即目标群的身份和文化将被消除，并被“优越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所取代。事实上，“文化改造”和皮埃尔·克拉斯特（Pierre Clastres）[①]“种族文化灭绝”的说法如出一辙。这与遏制政策背后的思想相吻合：东方民族充其量算是劣等人或近似人类，因此他们“天生”应该被剥削、压迫和驱使，以满足“母国”的各种需要。

这些探讨的结论就是，如果种族主义并不存在，如果西方把东方民族视为平等的人类，帝国主义将永远不会产生。或者，诚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言，“倘若没有重要的哲学和想象过程在（文艺）作品中起作用，以及对（思想）空间的攫取、征服和殖民，就没有帝国本身”。[49] 我们现在仍然需要探究帝国文明使命的道德悖论是怎样破产的（将在第11章探讨）。

①法国人类学家（1934—1977）。——译者

第11章

英国工业化的黑暗面和放任主义的神话：战争、种族帝国主义与工业化的亚非起源

科尔贝尔似乎……并非贸易保护主义制度的发明者，……因为早在他之前，英国人就将保护贸易阐释得淋漓尽致。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一直是个厚颜无耻的谎言，是一种滑稽虚伪的怪胎。

约翰·A．霍布森

唯一的教训是东西方不再是名字不同。……愿意为此付出的人会带着尊严去做某事。那种把道德作为一个特殊使命者已不复存在。

圣雄甘地

（大英帝国）是一个以美洲商业为支柱的宏大的上层建筑，是一个建立在非洲基础上的海军强国。

马拉奇·波斯尔思韦特（Malachy Postlethwayt）[①]

①英国经济学家、国际法学家（1707—1767）。——译者

我们在第9章指出，英国工业化在欧洲中心论世界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我们还注意到，英国的“巨大飞跃”关键在于其个人主义的自立的文化，这种文化造就了各种开拓性的独创发明。同样，这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政府采取最低纲领派的“自由放任”（不干预主义）政策立场的作用，而这反过来又支持了欧洲中心论的基本观点，即英国工业化是一种纯粹的基于自生变革的内部事物。

在本章中，我通过两个基本论点来挑战这种观点：第一，英国更宜于被理解为一个专制的、干预主义的国家，并在推动工业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一、二部分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它主要涉及国内的政策活动。第二，与内在的导致“自生”变革（“内在逻辑”）的欧洲中心论相反，我认为对东方资源的种族主义帝国掠夺是英国工业化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在第三部分进行了探讨。在第9章我着重论述了对中国“资源组合”的吸收，这里我将重点考察西方崛起过程中对东方资源的帝国主义掠夺，我所指的是英国工业化的亚非起源。总之，把英国列为专制的、种族主义的后发国家，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必然将我们的主要目光转移到英国在工业化期间，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所实施的干预主义的、掠夺性和压迫性的政策。

战争与英国放任主义的神话

翻开任何一本关于英国工业化的普通经济史课本，都会告诉我们熟悉的话题：是“自主的个人主义”的神圣美德，而非“至高无上的集权专制”确保了英国的“成功”。一般认为，经济竞争看不见的手比干预主义政府看得见的手更有利于经济的调节，或者如杜格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①]对亚当·斯密观点进行的总结：“把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愚昧状态带到最富裕的程度，几乎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只需要和平、宽松的税收以及良好的司法程序，然而所有的一切就会自然发生了。”[1] 实际上，人们认为英国政府为和平征服自然和“传统”，同时限制对经济的直接干

①英国哲学家（1757—1828）。——译者

预（即自由放任）创造了合适的背景条件，因而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令人注目的是，这种假定在许多理论和关于英国工业化的论述中得到了广泛支持。

构成自由放任概念基础的重要词汇就是“自发性”。彼得·马赛厄斯详细阐述了这种看法：

> 英国的工业化……通常被当作自主发展的经典案例，它是对市场力量和潜在的社会、制度模式的根本反应，而不是政府为了推动工业增长而自觉组织的结果。就英国政府而言，也非常重要，其主要角色就是使这些潜在的社会和经济动力制度化，为市场和经济力量在国内外的自主运行提供保证。（政府）的目标不是向工业增长过程提供一种支配性的动力，不是去规范和指导发展……它更关心的是发展的环境而不是发展的过程，是调整发展的外部条件，而不是去创造有效的内部动力。[2]

避开“过程”（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而更为关心“环境”（自由放任政策和只是提供必要的环境条件），这就意味着国家要确保实行低税收、预算平衡、自由贸易与和平的外交政策。至少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关于英国历史发展的情景。但本章揭示了这乃是世界史上主要的神话之一，因为英国的国家干预主义极为引人注目。

英国的军事工业化

我们对英国工业化的传统认识是，战争较少，从而确保了富有开创精神的英国资本家们能够全力以赴，获得成功。然而，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在1688至1815年这一重要时期，英国至少有52%的时间是处于战争状态。更令人吃惊的是其用于战争的庞大开支。图表11.1提供的数据，显示出了英国政府实际的军事费用负担，这一费用是根据国防支出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计算出来的（剔除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造成的非正常影响因素）。

图表 11.1　英国政府的实际支出（费用以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表示）

		1715—1815 =100		1715—1815 =100		1715—1815 =100
	CGE	CGE	D1	D1	D2	D2
1715—1815	20	100	11	100	18	100
1760—1815	23	114	13	116	21	113
1815—1850	14	71	5	40	12	65
1715—1850	17	84	7	64	14	79
1850—1913	9	43	3	29	5	26
1914—1980	33	165	8	71	12	67

注：CGE= 中央政权的所有公共性支出；D1= 正常或额外的军事费用；D2= 正常或额外的军事费用加上军事贷款的利息支付

资料来源：林达·维斯和约翰·M. 霍布森著《国家和经济发展》（剑桥，1995 年）第 130 页。

1715 至 1815 年之间的国防费用（D1）几乎是 1850 至 1913 年期间的 300%，甚至超过了 1914 至 1980 年期间的费用总额（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最显著的是，1715 至 1815 年之间的费用（D2）是 1850 至 1913 年期间所有公共支出的两倍，大大超过了 D2 所示 1914 至 1980 年期间的费用。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图表 11.2 揭示了英国在整个工业化重要阶段的实际军事负担，远远超过了其他主要欧洲国家在各自工业化阶段的负担。总之，是英国，而非专制的俄国或独裁的德国，最符合“军事工业化”。

世界上最庞大的国债

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开明的英国政府所做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确保了预算平衡。这种观点是一个神话，因为在 1688 年至 1815 年之间，英国累计的公共债务高达国民收入的 180%。[3] 把英国国债数量与其他传统上认

图表11.2　欧洲主要国家在其工业化时期的（实际）国防费用负担比较[a]

	英国	法国	德国[b]	意大利	奥地利	俄国
	1715—1850	1840—1913	1850—1913	1860—1913	1870—1913	1860—1913
D1	7	3.7	3.8	3.4	3.1	4.7
D2	14	约4.5	3.8	约4.0	约3.5	约6.5

注：a 这里所提供的数据只是大概数。

b 1850—1871年之间是普鲁士的数据。德国D1和D2的数据相同，因为利息支付没有被分开，而D1略有夸大。

资料来源：根据约翰·M. 霍布森所著《国家财富》（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290页）资料计算所得。

为是高负债的国家相比较，其数额庞大就显而易见了。1914年沙俄的国债占其国民收入的47%，1913年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占到了9%。另外一个重要的对比是，1990年时美国的国债水平占其国民收入的59%。[4]

高额且不公平的税收

英国政府据认为是既保持着较低的税收（以利于资本家进行储蓄、投资和资本积累），又保持着税收的公平，以避免不利于大众。这非常重要，因为人们认为，后发的干预主义专制国家倾向于征收高额的累退税（即间接税），这对于低收入群体很不公平，目的是榨取剩余价值，以确保工业投资。

因此，令人吃惊的是，1715至1815年期间累退税（即间接税负担）占到了英国国民收入的将近10%，超过了俄国工业化时期（8%）和中国的明清时期（见第3章）。在1715至1850年期间，英国间接税占到中央政府税收的比例高达66%，而直接税仅占到18%。同样重要的是，在英国，对低收入群体的税收增长超过了他们的收入，而在沙俄专制统治下农民收入的增长则超过了税收负担的增长。[5] 此外，间接税与英国的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英国的国家保护主义制度：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和累退税

我们对工业化时期英国的传统印象，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世界性的或者开明的、自由贸易的国家。毫无疑问，正是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才造就了英国的这一形象。但现在重要的是年代学问题：自由贸易只是工业化阶段末期才开始的。由此推断，将工业化期间的英国政府赋以自由放任的色彩有着年代上的错误。图表11.3阐明了原因，从两方面揭示了英国高额的关税：一是其关税水平非常高，二是超过了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在各自工业化时期的关税额。实际上，在工业化高峰时期（1800—1845年）英国的关税税率，比据称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德国在其工业化时期高约6倍，是俄国（常常被认为是欧洲首要的贸易保护主义工业化国家）的1.5倍。

图表11.3　部分欧洲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平均关税税率[a]

英国	英国	法国	德国[b]	奥匈帝国	意大利	俄国
1700—1799	1800—1845	1840—1913	1850—1913	1860—1913	1860—1913	1870—1913
27	40	10	7	12	11	26

注：a 所有数据都是全部进口商品（而非仅是应纳关税商品）的平均关税率，并按关税收入所占全部进口商品的比例计算得出。

b 1850—1871年是普鲁士的数据。

资料来源：英国：维斯与霍布森著《国家与经济发展》，第124页；德国和俄国：霍布森著《国家财富》，第284—290页；法国：J. V. 奈著《自由贸易英国和堡垒法国之谜——19世纪的关税和贸易》，《经济史杂志》51卷第1期（1991年），第26页；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布里安·R.米彻尔著《欧洲国际史统计（1750—1993）》（伦敦：麦克米兰，1998年）。

18世纪90年代后，英国的关税率逐步上升，特别是1815年后急剧提高，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这一时期英国的经济不仅不断增长，而且实现了“腾飞”（参见下一部分）；第二，它使得传统的认为英国在1800年后引导了关税自由化，以至于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是不可避免的观点“问题化”。然而，1815年后关税的提高，“负担和影响变得如此沉重……以致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新的制度”。[6] 这样，在1800至1809

年间，平均关税增长高达36%；1810至1819年间则增长到了44%；1820至1829年间达到了顶峰55%。即使晚至1830至1839年之间，平均关税率仍然高达38%。后面这一数据很有意义，因为其他欧洲国家在其工业化时期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征收过如此高的关税率。而且，到1840年时征税种类多达1146项。

值得注意的是，在典型的“专制”形态下，依靠一种强大的财政军事理论来支撑关税政策，从而使政府能够对整体经济、特别是庶民大众进行榨取，抽取间接税来为英国军国主义提供资金支持。在1715至1790年间，关税收入占据了国民收入的2.6%和国防费用的（D1）37%。1790至1815年间，为了支撑拿破仑战争的需要，英国关税进一步提高，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8%和国防费用的（D1）25%。1815年后，为了偿付过去120年里为维持军国主义的正常运转而累积的巨额国债利息，关税再次被大幅提高。1815至1850年间，关税收入占到了国民收入的4.6%和年均利息支付的70%（利息支付占到了中央政府支出的50%以上）。此外，即使到了1850至1913年之间，累退税收入仍然占到国民收入的2%，占到国防费用的约60%。

在向英国军国主义提供资金支持的过程中，所有原材料中约有60%被征收了关税，其中大多成为英国工业的重要资本投入。这反过来增加了英国最后出口产品的价格，从而导致在国外缺乏竞争力。为了抚慰那些由于对制造业成本征收关税而受到直接伤害的工业主，英国政府出台了一套复杂的规章制度，包括补贴、退税和折扣等。最后，保护主义的规章体系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补充。还有一个深层次的规定，以《航海条例》的形式被补充到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规章中。总之，很明显，是规章制度而非自由放任政策，成为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一种秩序。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1846年并不标志着英国向自由贸易的转变。1846至1860年之间，英国关税保持在20%的高额水平，1860至1879年间仍然保持在高达10%的水平，只是在1880至1913年期间才降到适度的6%。的确，在1846年以后，大多数征收特别进口关税的产品不在英国生产（因此它们就不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基础）。但关键是，它们对殖民地生产者

（见下文）和英国工人阶级消费层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另外，在1911年以后，来自财产累进税和收入税的税收稳定地超过了关税收入。有趣的是，我的曾祖父约翰·A.霍布森在其经典著作《帝国主义》中指出，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是靠间接税和关税保护主义而成长壮大起来。[7] 他非常不同意的是这一结论直到1911年才适用于英国，而此前则远非如此。实际上，在工业化的重要时期（及之后），那些没有赋予政治权利的大众，承受着英国军国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强加的繁重的纳税负担。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英国政府或者“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推动欧洲大陆采取了自由贸易，这种假设也需要修正。要不是英国的冷漠，它在推动欧洲大陆自由贸易的立场是引人注目的。首先，19世纪中期欧洲的自由贸易实际上难以实现。事实上，在1875年时（“贸易自由时代”的顶峰），欧洲工业制造品的平均关税率保持在10%，如果再加上美国（参见第12章），则达到了14%。最合适的说法或许是，这是一个“更自由贸易”的时代（或者更合理的适度贸易保护主义的时代）。其次，欧洲只是到了1860年的《科布登－舍瓦利耶条约》（Cobden-Chevalier Treaty），才开始向“更自由贸易”时代迈进。实际上，法国在推动这一转变上起到了特别显著的作用。[8] 重要的是，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①最初拒绝了舍瓦利耶（Chevalier）提出的建议。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科布登

> 仍然持这种观点，即所有的国家都应根据自身利益来调整其财政（商业）政策，不应受与其他国家所签订协定之羁绊，特别是已采取自由贸易的英国，应避免与另外一个国家签订任何的关税协定。[9]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廉·格拉斯顿在1872年没有阻止与法国中止这一条约。洛莱昂斯勋爵（Lord Lyons）描述了格拉斯顿的立场，“他告诉德·布罗伊（Duc de Broglie），英国已经有足够多的商业条约，他认为只要能够保证英国贸易的安全，一个国家可以自由设立本国的关税条

①英国政治家（1804—1865），力主自由贸易，反对重商主义。——译者

款”。[10] 如果那样意味着低关税，固然是有利的，如果不是，那将非常糟糕。另外，在谈到格拉斯顿时，路易斯·马利特（Louis Mallet）爵士评论说，“他从未在如此反感、甚至‘很大程度上敌视自由贸易政策’的政府中供职过，并抱怨它完全破坏了他在‘贸易局’所做的全部努力”。[11]

认为英国对推动欧洲自由贸易持冷漠态度（即使不是敌视）的证据有两点：第一，在1877年或1879年后，英国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阻止欧洲回到贸易保护主义。无论如何，英国单边的贸易立场阻碍了其抑制欧洲大陆贸易保护主义的能力，同样也是由于所谓的英国国际贸易体制脆弱的制度本质。第二，事实上，在所谓的贸易自由时代，英国政府仅仅与其他欧洲大国谈判缔结了为数极少的条约。而在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共缔结了24个这样的条约，比利时和法国各19个，德国18个，奥匈帝国14个，而大英帝国则只有8个。

总之，关于英国工业化是基于放任主义的传统描述，虽然广为人知，但只是一种神话。英国的税收、关税、预算赤字、国债和军费支出等因其数额之高而引人注目。现在的问题是：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巧合吗？或者在如此高程度的国家干预和工业化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偶然的关系？下文将证明这是一种偶然关系。

战争、“后发”与干预主义专制政府

军国主义、干预主义政府和金融资本的积极创造

金融资本的发展基本上是依靠英国政府的积极政策，主要是向英国军国主义提供资金支持。随着1688年后军费开支的攀升，政府被迫依靠贷款。为了增加必需的贷款，英国政府发起了“金融革命”。[12] 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其主要目的就是在伦敦资本市场上筹备政府的战时贷款。在整个漫长的18世纪（主要是1688至1815年间），政府债券为伦敦这座金融中心提供了强大的市场。此外，城市广泛的资本服务和无形收益，为英国的工业化提供了便利，也确保了国际收支的平衡。的确，这些无形收益非常重要，因为在1796至1931年期间英国每年的贸易余额

都是赤字。[13]这种状况不仅与中国历史上的贸易顺差有着鲜明的对比，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在19世纪期间从来没能赶得上中国在1750至1830年之间所占世界制造业生产的份额，或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例。[14]

英国政府干预也是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资本市场，很大程度上同样是基于财政军事目的。[15]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建立了伦敦股票交易所，目的是为了使政府债券的出售更合理化。这同时也刺激了地区银行的增长。总的来说，毫无疑问，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期，英国国债乃是公共和私人金融资本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没有什么比这种绝对的"强制性储蓄"政策更能清楚地证明这一点了。

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和强制性储蓄

这里我将探讨英国的"强制性储蓄"政策（传统上认为是与专制的或斯大林主义政权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政策要求国家对低收入群体征收高额税费，目的是榨取足够的税收投资于工业化。英国的计划与斯大林主义计划之间明显的区别在于，苏联是直接用于投资的税收，而英国的税收是间接用于投资。从本质上说，英国政府把来自于贫穷消费阶层的资金，再分配给那些大金融投资商，后者把这些资金投入到经济中。

前面我们注意到，英国政府通过伦敦资本市场所筹备的贷款为其军事支出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实际上，英国政府利用间接累退税来向大金融投资商支付利息，而这些间接税主要来自于低收入阶层，因此贫穷消费层的收入再分配给了富裕的（储蓄者和投资商）。据我估计，从伦敦资本市场上筹措的贷款约占到总额的80%（还有20%的贷款是从阿姆斯特丹资本市场上借贷的）。[16] 这就意味着，英国政府所支付的利息款约有80%直接给了伦敦的金融投资商。由于是通过累退税，我推断由低收入阶层支付的利息款约在50%至60%之间。在此基础上，我推算在1715至1850年期间，大约5%的国民收入是从贫穷的工人阶层或中低消费阶层转移到了富裕的金融投资商身上。这些数字十分惊人（几乎相当于1850至1913年期间英国国防费用支出的2倍）。此外，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种再分配的资金总额几乎占到国民收入的9%（根据一位专家的

研究，这导致了私人投资率成倍增长）。[17] 这毫不奇怪，英国在18世纪正是通过对消费者的榨取，才造成了储蓄和投资的大规模增长，从而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18]

因此，似乎很明显，英国政府实际上实行了一种非常成功的强制性储蓄政策。这就使传统的假设站不住脚，并与彼得·马赛厄斯关于“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地，英国政府都很少真正去推动投资，或者调动资本进行生产性投资”的观点相矛盾。[19] 再分配的资本数额令人吃惊，中央政府税收总额的近40%从穷人那里再分配给了富人（这可以与战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再分配的数额相比）。

关税保护主义与“后发”

英国的保护主义政策与其“后发”过程密切相关。一般的假设是，英国是一个“先发国家”并占据了“先发优势”，即英国没有面临激烈的外国经济竞争，因而没有必要去采取国家干预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但英国确实面临着外国的竞争，特别是在关键的棉纺织业和钢铁工业领域。事实上，从17世纪开始英国就充斥着品质极佳、价格低廉的印度纺织品。

英国的棉纺织业正是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以及通过奴隶制——见下文第三部分）这种典型的“后发”模式发展起来的。[20] 在1701年和1721年，印花布曾两度被禁止进口。此外，以一种典型的“后发”模式，英国人照搬和改进了印度的技术和工艺，目的是削减成本，从而提高竞争力。[21] 或如布罗代尔恰如其分地描述，在面对印度纺织品的猛烈冲击时：

> 英国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在18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禁止印度的纺织品入境……然后，它又竭力占领这个如此丰腴的市场——全亏高度节约劳力，它才达到这个目的。机器革命发端于棉纺织工业并非偶然。[22]

特别是印度巨大的竞争优势，刺激了瓦特和保罗的纺纱机（1738）、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1767）以及克朗普顿的骡机（1779）的发明，从

而确保了英国棉纱的生产能够赶上印度产品。[23] 印度的产品和技术，尤其是纺织品染色的工艺也直接传播到英国，并被刻意模仿。[24] 即便如此，英国也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具有像印度班丹纳花绸巾（即丝绸手帕）上发现的那种印染技术。英国的另外一种重要产业——钢铁工业，也有类似的特点。如前章所述，直到19世纪英国的钢铁生产仍然落后于印度的钢铁生产。但是通过提高进口印度钢铁的关税，之后是在印度国内实行自由贸易这两项政策，英国得以占据领先地位（参见下文）。[25] 因此，面对东方巨大的竞争，如果英国想拥有任何发展机会，保护这两个关键产业是最基本的。

这里同样重要的是，英国政府制定了一种“战略性的贸易政策”（此政策通常与1945年后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如韩国、日本和台湾联系在一起）。[26] 这项政策要求国家对出口产品的生产商给予财政补贴。1721年以后，英国政府向出口制造品的生产商进口原材料提供部分退款，意在促进出口。此外，还取消了出口税，并代之以出口补助，从而使英国的纺织品的出口更具全球竞争力。有趣的是，1750年以后英国工业产品向国外出口所占的份额，与韩国在其实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时期所占的出口份额很相似。[27] 然而，宣称1721年改革标志着英国开始实行一种纯理性的经济政策是不正确的，主要是因为关税仍被作为英国政府“政策武库”中的一项财政手段。

因此，我们看到，与所有的主流论述相反，英国政府采用了一种高度的干预主义和压制性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在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基础上来推动工业化的（这就是英国工业化黑暗面的国内因素）。现在我要在全球背景下揭示这种黑暗面。在揭示其黑暗面的同时，也宣告欧洲中心论的普遍观点，即英国工业化是一种基于自生变革的内在发展过程是不成立的。

种族主义、工业化和英国帝国文明使命的道德矛盾

第9章阐述了在英国工业化兴起过程中对中国“资源组合”的吸收，

本节内容着重于探讨对东方资源的种族帝国主义掠夺，使英国有了新的突破。费尔南多·布罗代尔通过一个有趣的反问，谈到了英国工业化的外部根源，特别是帝国根源：

> 如果让小小的欧洲大陆陷到亚洲的大陆和海洋中去，它就会惨遭灭顶之灾……英国现在正从全世界吸取它的一大部分养料和力量。这些外在的补充使得英国在前进道路上能够胜任超过自己能力的各项任务。没有这个一贯的助力，对于其命运至关重要的英国工业革命能在18世纪末发生吗？无论历史学家们做出怎样的回答，问题却始终得不到解决。[28]

在此，我可以肯定地回答布罗代尔的问题。我还要强调的是，帝国主义是在18至19世纪期间构建的“隐性帝国主义”英国身份的产物（参见第10章）。另外，我认为，帝国主义对东方社会的文化影响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常常比经济影响更为重要（当然，这不是在降低经济的不利影响）。然而，本节内容，像前述两节内容一样，旨在从根本上反驳自由主义的经济史，后者试图完全忽视这种促进英国工业化的外部因素。这里有趣的是，帕特里克·奥布赖恩（Patrick O'Brien）[①]在回应布罗代尔的论断时再次肯定了欧洲中心主义：

> 布罗代尔对他提出的问题倍感得意，但世界经济和工业革命的联系还不足以严重削弱目前的“欧洲中心论共识”，即我们只能在欧洲大陆内部，而不是大陆之外找到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对于欧洲（甚至英国）工业化的历史来说，“用欧洲的视角”看世界比“用世界的视角”来看欧洲显得更加重要。[29]

本节提供了详细的证据来揭示英国工业化的亚非起源，由此来重申布

①英国历史小说家（1914—2000）。——译者

罗代尔的“世界视角”。

帝国自由贸易的矛盾：遏制与文化改造

在第10章我们注意到，帝国的“文明使命”中存在着一种基本矛盾：文化改造旨在使“东方民族”的文明程度提高到英国文明的水平（帝国使命的文明部分），而遏制政策又需要抑制东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我们还注意到，这一矛盾从逻辑上说，乃是源于英国人构建的种族主义帝国说教，两者相辅相成，成为英国文明光辉灿烂的重要手段。这样，文化改造（种族灭绝或者抹掉东方的身份或文化）就服务于这一目的，因为它意味着世界的西方化或英国化。遏制政策则确保了英国经济的世界主导地位不受挑战。这正是我们要探讨的中心内容。

就文明使命的道德矛盾而言，大概没有什么比自由贸易政策更明显了。有理论声称，自由贸易是一种文明力量。根据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理论，自由贸易有很多好处，因为它建立在国家“自助”“专业化”和“比较优势”等观念的基础上。这是一个文明化的过程，因为自由贸易迫使东方民族通过个人自立和“勤奋劳作”——先进文明的主题，来大力发展他们的经济。这里有意义的是个人主义的自立和新教之间的联系，因为正如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①所言，“上帝将帮助那些自助者”。自由贸易的观念迅速在英国社会广泛传播。譬如，理查德·科布登把商业自由的思想称为“伟大的万全之策，犹如一项惠泽人类的医学发明，将向全世界所有民族的文明灌输财富和储蓄的风尚”。[30] 或者如他在给杜富尔（Dufour）的信中写到的，“自由贸易是上帝的外交方式，没有什么其他方法能使人们和平共处并凝结在一起”。[31] 当然，还有约翰·鲍林（John Bowring）②的名句，“耶稣基督就是贸易自由，自由贸易就是耶稣基督”。[32] 简言之，自由贸易就是把西方文明的甘露撒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样也是把东方的产物传到西方的重要手段。这一理论与英国人

①英国作家（1812—1904）。——译者

②英国经济学家（1792—1872）。——译者

按照西方路线对东方进行文化改造的设想相一致。然而，鉴于假定的东方统治者的目光短浅，具有远见卓识的英国人当然就有责任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传播自由贸易，的确，这就是他们的“道德责任”。但这一理论却与更隐蔽的帝国主义“遏制”理论发生了冲突，而后者又是建立在一系列种族主义的双重标准基础上。

通过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对东方进行文化改造和遏制，可以在许多方面找到证据。首先表现在施加的不平等条约，英国通过这种手段，得以“传播文明的福祉”。这些被“赐予”了诸如巴西（1810）、中国（1842—1858）、日本（1858）、暹罗（1824—1855）、波斯（1836、1857）以及奥斯曼帝国（1838、1861）等许多“非欧洲”国家。这些条约剥夺了这些国家的关税自主权，关税往往被限制在最高5%。这里就揭示了第一个种族主义的双重标准，事实上，在19世纪中期所谓的自由贸易时期，欧洲国家实行的“互惠条约”是“缔约国双方”之间自由协商缔结的。这显然不同于强加给东方国家的“门户开放”条约（主要是“乙组”国家）。而且，英国并不关心在欧洲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这完全与其以武力在“非欧洲”世界推行自由贸易的行为相反。更普遍的是，1815年后英国对欧洲大陆采取消极的军事政策，而截然不同的是，英国不断地对东方诉诸暴力。[33] 这里第二个种族主义双重标准是，欧洲经济体通过关税保护主义而实现了工业化——的确，1700至1850年之间英国的平均关税不低于32%，而东方国家却被迫直接面对自由贸易，或者是近似自由贸易。这抑制了东方的经济发展，因为自由贸易使东方失去了建立自己幼稚工业的机会。

这里尤其要指出的是，这种强加给东方的不平等条约并不是基于纯粹的经济原理，而是基于一种更普遍的英国人试图施加文化改造的方式。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害往往比经济遏制更加严重。无疑，不平等条约最大的危害在于侵犯了东方国家的主权和文化自主。以中国为例，鸦片战争以及接踵而至强制施行的条约打开了中国国门，造成英国文化对其身份的侵犯。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原因有三：第一，中国并不愿意接受这些条约，但最终屈服于英国和西方列强的武力之下；第二，条约条款只有利

于西方国家，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文化自决；第三，这些条约象征着中国的耻辱和遭受的侵害。

英国帝国主义对中国消极的文化和政治影响，有以下三个基本方面。第一，通过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受到了枪口的威胁——“治外法权”的严重损害。“治外法权”这一概念，是指所有外国人，不仅仅是外交人员，来中国居住，但只受其本国法律的约束。基于这个目的，建立了大量的租界（即为外国人划定的受英国法律约束的土地区域）。这些通过西方的国际法被证明是合法的，因为中国被认为是未开化的，因而注定不能自治的国家。事实上，英国坚决地拒绝平等对待中国，正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①]所宣称的那样：

> 讨论我们以规范欧洲国际关系相同的规则来与中国人订约，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将我们自己受缚于一个野蛮民族的法规，将是极度愚蠢的行为，他们对法律一无所知，即使知道也不会遵从。[34]

这里还要注意的是，“治外法权”还强行施加给了奥斯曼帝国、泰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理由是这些国家太不成熟而不能通过“文明测试”。

第二，不平等条约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英国强迫中国在诸如邮政、海关以及税务（如盐税）等重要政府机构中接受外国的管理。1853年，英国接管了中国海关，英国驻上海领事决定征收关税。之后在1863年，赫德出任海关总税务司，从此英国完全控制了中国海关。显然，中国政府没有能力制定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自治权。

第三，不平等条约侵犯了中国的文化自主权，这表现在英国人坚决主张废除中国的磕头礼仪。虽然这并没有经济意义，但在英国所提出的要求中，这是最有羞辱性的事情了，它摧毁了中国封建政权和社会赖以建立的整个社会道德标准结构。如我们在第3章所述，19世纪以前中国已经建立了自己以磕头礼仪为基础的“文明标准”，向皇帝叩首被看作是正式承认

①英国政治家（1823—1900）。——译者

中国是至尊的中央王国。但我们还注意到，这也是在面对外族入侵和“蛮族”掌权时，旨在保持中国制度内在合法性的一种“防御结构”。然而，16世纪以后，这种模式越来越难以抵御欧洲的文化挑战。欧洲的挑战开始于1645年的礼仪之争，之后在1793年的马戛尔尼事件（他拒绝行叩拜礼）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最后到1873年废除磕头礼仪达到了高潮。这是中国最大的耻辱，因为其整个国际体系，连同国内的合法体系，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毁。此外，文化羞辱表现在各个方面，大概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英国人在上海的游乐场（现在的黄浦公园）外竖起牌子，写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人们可以想象，假若中国人占据了圣詹姆斯公园（恰好沿着通往白金汉宫的路），竖起写着“英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英国人将做何感想。

现在回到整体的讨论：第二个帝国遏制战略是与文化改造联系在一起的，它涉及到把强迫接受自由贸易作为限制殖民地工业化的一种手段。这里我们转向第三个种族主义双重标准：尽管自由贸易政策被宣称是帮助或开化殖民地，但其结果是，以东方国家为代价促进英国经济的发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印度经济基础的破坏，或曰对印度去工业化。例如，在17世纪一直依赖于印度棉纺织业的英国政府，在18世纪初（如前文所述）开始对印度棉纺织品的进口征收重税。之后在19世纪，英国又使印度市场处于不受关税保护状态（即通过强迫印度接受自由贸易）。在兰开夏郡的要求下，1882至1894年之间印度棉纺织品进口的关税被取消（在1859至1882年之间关税已降至5%）。在棉纺织品方面的双重标准以及对印度的伪善，显而易见。英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征收高额关税来抑制印度的棉纺业体系，另一方面要确保英国制造品自由进入印度市场。这是英国人授予自己的最不公正的“任意球”之一。这就让我们理解了张夏准——继李斯特之后——提出的“踢开梯子”战略。[35] 正如李斯特最初所述：

> 自由贸易符合英国的利益，成为确保其工业优势的手段……一种很常见的聪明手法是，当某人爬到了成功的顶端，他踢开自己爬过的梯子，目的是让后来者失去向上爬的工具。这就是亚当·斯密世界

主义学说以及英国政府的秘密。[36]

但是与李斯特的观点不同，这一战略没有被用于维持英国对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主导地位，因为之后连续几届英国政府很少去促进或维护欧洲的自由贸易。它只是被用来维持英国对东方国家的主导地位，因为只有在欧洲之外，英国才实行自由贸易。

因此，尽管在17世纪英国还是印度纺织品的净进口国，1815年时英国出口的棉布约达2.5亿码，价值约4000万英镑，而到1874年时，英国出口的棉布则达到了35亿码，价值约1.9亿英镑。[37] 到1873年，英国棉纺织品的40%至45%出口到了印度。[38] 这样，曾经向英国出口棉纺织品的印度，到19世纪中期已经变成了兰开夏郡工厂的棉花原材料供应者，后者反过来将制成品又出口到印度。总之，英国棉纺织业发展的社会成本就是印度工业的去工业化。[39] 一位19世纪的英国学者评论道：

> 如果没有这种限制性的关税和条文存在，佩斯利（Paisley）和曼彻斯特的工厂就会关闭……他们是以牺牲印度工业为代价发展起来的……外国生产商采用不公平的政治手段，抑制其发展，最终扼杀了不能在同等条件下展开竞争的竞争者。[40]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钢铁工业（19世纪期间），印度经济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钢铁生产者之一。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曾谈到在英帝国占领之前，印度工业的发展居于优势地位，他用辛辣的语调写道：

> 这在历史上的确少有发生，印度工业的瓦解（去工业化）与英国统治或霸权的建立十分巧合……印度经济潜在的竞争力被窒息殆尽。在世界资源平衡的转移问题上，没有哪件事情比英国控制下的这种变化更具决定意义了。[41]

正如李斯特所指出的，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这种“自由”贸易关系最终

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因为它使后者处于依赖农业或原材料生产的阶段，从而破坏了其经济发展的前景。[42]

因此，总的来看，英国的帝国主义贸易政策概括了文化改造和遏制之间的道德矛盾，这显然有利于英国，而损害了东方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尊严。而且，当英国人试图动员东方民族和经济向全世界“传播文明的福祉”时，同样的问题产生了。

种族主义和东方的商品化：英国工业化的亚非起源

英国人对其自身的种族优越深信不疑，认为对东方进行瓜分和改造，以满足其工业需求完全是正当的。这不仅仅是军事或经济物质力量优越的作用，而且从根本上也源自一种对于黑种人和黄种人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态度。在英国的思维中，他们理所当然不应得到平等对待。作为一个科学种族主义者，查尔斯·金斯利以一种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口吻写道：

> 任何民族都有一种道德责任，其产生的能量远超过了自身的需要，其自身的盈余能够用来满足其他民族的需求。……人类有权利要求，……各个民族应该要么开发他们自己国家的潜能，要么为将要开发他们的人提供空间。[43]

或如皮埃尔·克拉斯特所解释的那样：

> 这就是为什么曾沉溺于原本平静生产的东方社会没能得以延续。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人眼里，浩瀚的未开发的资源所呈现的浪费是不能容忍的。这些社会被置于两难选择之中：要么屈服于生产，要么被消灭；要么是文化灭绝（即文化改造），要么是种族灭绝。[44]

因此，自相矛盾的是，“传播文明的福祉”就必须使东方的土地、劳动力、市场和资源商品化。因为如果殖民地居民不能致力于开化自己，那么英国人就理所当然地对他们加以推动。这里我们就转向了攫取主义

(appropriationist) 历史的核心内容。

英国隐性种族主义立场的最终诉求,在于黑人劳动力通过奴隶制而商品化。在更广泛意义上,黑奴和非洲至少在七个方面推动了英国的工业化:第一个贡献来自于奴隶贸易积累起来的利润。斯坦利·恩格尔曼 (Stanley Engerman) 和罗格·安斯蒂 (Roger Anstey)[①]忽视了这一点,认为奴隶贸易的利润从其所占投资或国民收入的比例来看,非常之小 (即著名的"小比率"论)。[45] 然而,巴巴拉·斯洛 (Barbara Slow) 对恩格尔曼的数据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在1770年"奴隶贸易的利润……几乎占到总投资的8%,商业和工业投资的39%。这些比率不是小,而是非常大"。[46] 通过对比,她进一步指出,1980年美国国内的利润总额与私人投资的比率约为40%。而且,没有任何单个的美国产业能占到总投资的8%之高。正如威廉·达里蒂 (William Darity) 所指出的,1784至1786年之间,来自奴隶贸易的利润占英国总投资的比例,是约两百年后美国汽车工业所占美国总投资数目的三倍以上。[47]

尽管如此,罗格·安斯蒂对奴隶贸易利润的估计还是比恩格尔曼更为保守。他的数据显示,奴隶贸易的利润仅仅占到国民收入的0.11%,"这十分滑稽,足以推翻奴隶贸易在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资金支持方面极其重要的神话"。[48] 关键是,这些数字模糊了一点,即"小比率"观点仍然适用于棉纺织业和钢铁工业 (这两大产业是英国工业化的推动力) 的资本投资水平。事实上,这两大产业内部的投资水平 (与安斯蒂为弱化对比而夸大了对国民收入的估计相一致),在1780至1800年期间分别约占国民收入的0.22%。利物浦是兰开夏郡棉纺工业的门阶,为一部分资本积累提供了现成的出路。令人奇怪的是,通过假定一个占国民收入7%的储蓄率,他得出了奴隶贸易利润增加到不合理的总投资额0.11%的结论。但是,这一数字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投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其比率应该比这个数字高得多。如果我们假设有50%的利润投入到棉纺织业,那么这就将占到该产业投资总额的25%至30%之间——这个数字就强调了

①当代英国经济史学家。——译者

“大比率”理论。

然而，无论如何，这场论争的关键问题在于，它仅仅是通过奴隶贸易的利润来评估黑奴对于英国工业化的影响。因此，有人认为，如果奴隶贸易的利润对于英国工业化是无关紧要的，那么奴隶本身事实上也无关紧要。这就忽略了黑奴劳工生产所做的诸多贡献，从中所获得的利润和收益至少在其他六个方面对英国工业化起着显著的作用。总之，这就需要用一种“大比率”的观点来取代欧洲中心论的“小比率”论。

非洲的第二个贡献，在于由英国大种植园主在美洲对黑人劳动力的剥削而产生的再投资利润。1750年后，许多黑人奴隶种植园都属于那些非本土的英国大地主。这就意味着来自于殖民地贸易出口的大量利润找到了一个投入英国工业的途径。重要的是，到18世纪后期，来自于殖民地地产的收益约相当于英国总投资的50%。[49] 鉴于这些收益大多数被再投入到英国的工业，这就为英国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本。而且，在1770年，仅仅来自于西印度群岛的出口贸易利润就占到英国私人投资总额的38%，或者是国民收入的2.5%。[50] 这就意味着，英国只是从这一总额中拿出了15%用于整个英国棉纺织产业的投资（即“大比率”理论）。

非洲第三个贡献是基于以下事实，譬如在1801年，英国出口的净收入可以养活英格兰和威尔士约一半的非农业劳动力。[51] 那么，这一贸易约60%在美洲黑人聚居地区和非洲进行，这就意味着黑人消费者和黑奴养活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约1/3的非农业劳动力。仅此一项就是一个巨大的贡献。而且，如果黑人养活的这些英格兰和威尔士工人将其收入的8%（普通的国内私人储蓄率）进行再投资，单这一项就能占到棉纺织产业总投资的将近一半，这是“大比率”理论的另一个标志。

第四，黑人奴隶对英国工业化的特殊贡献，还在于大西洋沿岸殖民地的原材料供应。非常重要的是，到18世纪晚期，美洲黑人生产的商品或原材料所占的比例高达83%（到1850年仍然占到69%）。这里最为突出的是，美洲所供应的原棉几乎全部是由非洲黑奴生产的。[52] 然而，恩格尔曼却认为，奴隶贸易总值仅占英国国民收入微不足道的小部分（“小比率”论）。但是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黑人奴隶生产的原棉，英国的棉纺织业就

不可能在工业化过程中起到如此关键作用。彭慕兰颇有意义地指出，当1861至1862年之间（内战期间）美国黑奴生产的棉花出口数量衰减时，英国的棉花消费以55%的惊人降幅骤减，价格翻了一番。仅仅一年时间，兰开夏郡工厂的工人就削减了一半，很多公司破产倒闭。[53]有趣的是，英国人对此的反应是，转向了埃及的原棉供给（另外还从印度进口原棉），从而继续依赖非洲黑人的劳动。

第五，奴隶贸易和黑奴生产的产品，极大地刺激了英国金融业的发展。巴克莱银行和劳埃德银行都是依靠其中的部分利润发展壮大的（其他的小银行也是如此）。[54]在英国奴隶主和奴隶种植园主庞大的信贷（以及保险）需求刺激下，英国的金融机构得到了迅猛发展。根据约瑟夫·伊尼科里（Joseph Inikori）①的研究，奴隶贸易和西印度群岛贸易所需的保险费，占到英国海上保险市场总额的63%。[55]我们前面提到，在工业化时期，伦敦资本市场把大量资金投入到政府公债中。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正是这些雄厚的无形收入，保证了英国在18、19世纪期间保持了国际收支盈余。重要的是，在工业化的主要阶段，大部分的无形收入都来自于大西洋商业体系。很明显，伊尼科里无疑强调了“大比率”理论：

> 这些无形收入与战争期间政府（通过伦敦资本市场）的借贷数额同样庞大。按照平均水平，这一时期（1700至1850年期间）伦敦每年以商业证券形式（汇票和公司债券）进行的交易，比其以政府债券形式的交易数额更大……在各郡的贸易和制造业中心以及伦敦，汇票以及公司债券大量流通，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源自于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以及与黑奴生产的美洲产品相关的贸易。[56]

非洲人对英国工业化所做的第六个贡献，体现在英国对帝国出口贸易带来的全部利润。例如，在1784至1786年期间，这些利润占到英国投资

①当代英国历史学家，著有《一个大陆的被囚：奴隶出口需求与1450—1870年的撒哈拉南部非洲史》。——译者

总额的55%，或私人投资总额的64%（与非洲和美洲的贸易约占这一数额的80%）。[57] 而英国投资于棉纺织业的资本只占到其总投资的4%，可见这些利润的数额之大。这样，三角贸易中所获得利润的9%左右被用于棉纺织业的总投资中。很显然，9%这个数字是低估了可能用于英国工业投资的资本总额。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帝国贸易的利润总额可能占到了英国总投资的55%以上，这是因为很多出口到欧洲的商品，实质上是从殖民地进口商品（主要来自于黑人奴隶殖民地）的再出口。因此，这就意味着三角贸易中所得利润的不足9%被用于投资英国棉纺业（可能仅是6%）。而且，与上文的第二点联系起来：19世纪末，来自国外殖民地财产的利润总额和来自对殖民地贸易的利润，足以为英国国内的总投资提供全部资金。这再次强化了我的“大比率”论。

最后，非洲人的第七个贡献在于，三角贸易体系不但带来了巨额的利润，而且为英国的出口提供了巨大需求，没有这些，英国的工业化将受到严重局限。这些市场对于英国整个工业体系都非常重要，也是至关重要的钢铁工业和棉纺织业兴起的基本保障。[58] 在这里，《航海条例》非常关键，这些由种族主义政府强制实施的法令，缔造了一个高度保护的垄断体系，以东方民族为代价来维护英国商人的特权。值得称道的是，亚当·斯密把这些法令称为“奴隶制的傲慢象征”。特别是，《航海条例》根植于英国的殖民地贸易体系中，其中三角贸易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当英国国内的需求水平正在萎缩时（即国内的总需求减少时），《航海条例》和殖民体系保障了英国对出口市场的垄断。因此，在1700至1770年之间，英国的工业出口增长了150%以上，而国内市场需求只增加了14%。此外，欧洲贸易市场也开始衰减，英国制造品对欧洲的贸易份额从84%（1700）降至45%（1773），再降到29%（1855）。与此相反，英国对美洲和非洲殖民地的贸易份额却从12%（1700）上升至45%（1773）。如果我们把所有殖民地计算在内的话，英国制造品的出口份额则从1700年的14%上升到1773年的55%，再升到1855年71%。[59] 事实上，即使是一些欧洲中心论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英国出口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殖民地（特别是美洲和西印度群岛）需求的增加。[60] 这里重要的一点是，

在关键的18世纪，这些市场吸收了英国工业生产兴起中大部分的增量（大概70%）。[61]

然而，帕特里克·奥布赖恩在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中，重申了欧洲中心主义，他否认了殖民贸易体系在欧洲工业化兴起中的作用。他指出，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与“边缘”地区的贸易是微不足道的，仅占到欧洲国民收入的1—2%。[62] 那么这样一来，这种欧洲中心论观点就抹杀了或隐瞒了欧洲工业化的阴暗面。但就英国来看，他的观点是值得质疑的，虽然他承认这一数字低估了英国的情况，但他仍然认为来自与“边缘”地区贸易的收入还是很微小的。[63] 但是，据我仅仅对1750至1800年这一时期的计算，估计英国与“边缘”地区的贸易收入占到了国民收入的15%。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到19世纪这一数字仍在增大，到1855年，已经上升到国民收入的34%（超过了1850至1913年期间英国国防费用的900%）。此外，在1750至1800年期间，仅仅通过三角贸易体系这一数字已经达到英国国民收入的约12%。

自相矛盾的是，帕特里克·奥布赖恩和斯坦利·恩格尔曼都支持这一论断。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中，他们指出：

> 英吉利船主操纵着从非洲到新世界的奴隶贸易，如果没有这种强迫的廉价的非洲劳动力，1660至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期间跨国贸易的增长速度就将大大降低……我们很难想象有另外一条发展路径能使国际贸易和英国贸易达到19世纪初的水平。[64]

此外，在反对标准的李嘉图学派与事实相悖的观点同时，他们进一步指出，帝国贸易是刺激英国工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总体来说，人们不必完全赞同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①]在其经典著作《资本主义和奴隶制》中所阐述的观点，去声称非洲消费者或生产者以及黑人奴隶在英国工业化中起到了积极的、

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任总理、历史学家（1911—1981）。——译者

强大的作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其他东方民族的商品化，同样是通过契约劳工的形式，与黑人奴隶一道满足了英国的工业需求。华人，特别是印度契约劳工尤其重要，后者被运到了世界各地的殖民生产地，特别是毛里求斯，他们在那里生产蔗糖，以使英国人现在习惯饮用的印度茶更为甜润可口。罗纳德·海厄姆（Ronald Hyam）①对契约劳工制度进行了概括：

> 这是一项包括大量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数量上与大西洋贩运的奴隶相当，再现了黑奴贩运的许多特点。在运往西印度的漫长航程中，死亡率骇人听闻，种植园的恶劣条件令人震惊。但是，英国人坚持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制度，辩解说这种制度非常必要，不像奴隶制那么野蛮。结果，正是印度劳工通过开发热带地区的原材料，创造了帝国大部分的海外财富。[65]

很多东方国家的经济同样也被商品化和改造，为了满足英国工业化的需求而去生产初级产品和原材料，这也被想象为一种文明化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极其渴望改变与中国长期存在的贸易赤字，改变大量黄金和白银不断流出英国的局面。其中一个出路就是找到新的茶叶供应来源。基于这一目的，印度的部分地区种上了茶树。尽管在1850年时，英国茶叶进口全部来自中国，但在50年之内其从印度进口的茶叶就达到了85%。但是，彻底改变英国贸易逆差最重要的武器是向中国出口鸦片。18世纪后期，英国就开始依赖于土耳其的鸦片，后来改造了印度的部分地区，使其成为一个鸦片供应的来源。这非常有效，因为中国吸食者更喜欢印度鸦片而不是土耳其鸦片。到1828年，印度鸦片已经占到英国向中国出口鸦片的55%（虽然当时中国政府已经下令禁止吸食鸦片）。在1839年林则徐试图削减鸦片贸易时，英国人以此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利用这种卑劣的手段，英国人改变了其对中国历史性的贸易赤字。正是通过向中国倾销

①英国历史学家，著有《不列颠帝国一世纪（1815—1914）》。——译者

鸦片（在英国军事力量的支持下）以及在印度种茶，才使得英国扭转了对华贸易逆差。

同样，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也被变成了英国经济的原材料生产中心。首先，美洲殖民地被加以改造，向英国提供“节地型”（land-saving）进口商品。埃里克·琼斯指出，“大边疆（亦即美洲）的全面扩张，可以被看作一种欧洲‘鬼田’（ghost acreage）的扩张”。[66]“鬼田”一词是指英国为生产同等数量的产品而需要在本土开拓的土地面积。根据对新世界的糖、棉花和木材出口的详细计算，彭慕兰认为这需要2500万到3000万英亩的土地。[67] 这就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没有这些“节地型”作物的进口，英国可能需要三倍面积的土地来生产同等数量的产品。因此，如果没有这些殖民地的贡献，英国可能将被迫把用于工业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鉴于这种“鬼田”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将大受影响。

此外，西非的农业被改造用来生产棕榈油、可可粉、黄金和橡胶，以满足英国经济的需要。澳大利亚也非常重要，被改造成向英国大量供给羊毛。1824年，英国羊毛进口的2%来自澳大利亚，而到186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40%，到1886年上升到67%。[68] 其它许多国家也都被改造了。杰文斯（W. S. Jevons）①在其《煤的问题》（1865）一书中，就英国利益所造成的最终结果辛辣地指出：

> 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成为我们的谷田；芝加哥和奥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地区是我们的木材林；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②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是我们的养牛场；秘鲁为我们输送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教徒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糖和香料种植园遍布印度各地……我们过去一直位于美国南部的棉花产区，现在已扩展到了地球

①英国经济学家（1835—1882）。——译者

②一个不明确的地理名词，一般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南太平洋诸岛，有时也泛指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屿。——译者

温带的所有地区……世界上一多半的地区都是我们驯服的附属地。[69]

但就殖民地而言，所有这些的实际结果，并非是将其经济成功地改造提升到英国文明的程度，而是对其予以遏制。埃里克·哈格里夫斯（Alec Hargreaves）①对欧洲殖民地的阐述恰到好处，他指出，尽管有文化改造的理论基础（“文明使命”）：

然而，殖民地并没有复制出欧洲的工业经济。相反，它们仍然以农业为主，只是通过提供粮食和原材料以及工业品市场，来维系欧洲工业体系，而不能与其竞争。[70]

这再次使我们转向李斯特的观点。正是这种不对称关系导致了“不平等交换”问题，因为这使得殖民地的生产停留在农业或初级产品、原材料的生产阶段，从而阻止了殖民地向工业化的转变。

最后，需要重申的是：尽管帝国主义向帝国强加了消极的经济影响，而文化影响常常更具破坏性。在第8章我提到了非洲黑奴所受的非人待遇，上文中我也简单论述了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消极文化影响。但是澳大利亚的例子尤其让人辛酸，从1788年白人开始在澳大利亚定居后，当地土著居民就面临着文化和生存的威胁。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在英国人定居一百年后，至少有两万土著居民死于边界暴行。[71]还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塔斯马尼亚岛实施了“最终解决”的方案。[72]毫不奇怪，土著居民决不会把詹姆斯·库克1788年在澳大利亚登陆，当作光荣的定居或开拓性的发现在每年的“澳大利亚国庆日”进行庆祝，而是将其视为纯粹的侵略。然而，更多人的死是因为欧洲疾疫的影响。令人震惊的是，在白人定居一百年后，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死亡率约处在80%到90%之间，这一数字堪与西班牙人定居一百年后美洲土著的死亡率相比。一些澳大利亚学者用“大屠杀”一词来描述土著居民的经历。[73] 即

①当代美国历史学家，以研究法国殖民史见长。——译者

使如此，在英国人的种族主义观念里，这完全是自然的、合理的。用范迪门斯地岛公司（Van Diemen's Land company）[①]主管爱德华·库拉（Edward Curr）的话来说，“随着文明的推进，野蛮民族肯定要灭绝，这是自然法则”。[74]

第二，在暴力的背后还有另一种情形，很多澳大利亚学者将其形容为“和平的”种族灭绝。这就是试图毁灭土著居民的文化、传统和身份。[75]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被偷走的数代人”（Stolen Generations）的故事，那些原住民的孩子被强迫从家庭迁移出来，置于白人的“监护”之下，目的是隔绝其原来的社会传统。这一迁移行动开始于殖民化早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76] 当然，这一度被认为是一种文明职责，为这些孩子提供更好的未来。但这不过是一种与原住民的传统断裂的白人的未来。最后，同样重要的是，通过被安置在处于白人城镇边缘“定居点”的这种社会种族隔离，澳大利亚原住民被隔离起来。“这些居住地的条件可以和监狱或精神病院的条件相提并论，白人监管控制着这些土著居民每天的生活。”[77] 很多原住民的证词将其形容为“集中营”。因此，在这些记载澳大利亚被改造成母国一个羊毛出口地的抽象的数据背后，有着一段阴暗的历史——它指出了对于这些居于“世界底层”的偏僻殖民地的“笨拙的”原住民来说，文明使命可能意味着什么。

结论：英国的国家干预主义和帝国主义起作用吗？

这并不是说，这种对内实行高度的国家干预主义，对外通过掠夺东方资源的帝国干预主义，就是英国工业化的唯一原因。但可以说，所有这一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史学家否认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国防支出或殖民费用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只是影响到英国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从而导致“非最优”的结果。因此，自由主义者或李嘉图学派提出了与事实相悖的观点，指出如果没有这些，英国国内经

①创立于1824年，主要在塔斯马尼亚岛经营羊毛贸易。——译者

济的增长水平可能会更高。[78] 这种观点严重抹杀或隐瞒了阴暗面，有意或无意地，保留了一幅道德纯粹的英国工业化的画面，这正是很多欧洲中心论者，特别是自由主义学者所悉心勾绘的。下面我们分别从国家干预主义和殖民地主义两个方面来评析这一观点。

第一点要指出的是，这种有悖事实的观点，只是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国家干预主义，可能会发生什么，而不是说明的确发生了什么。事实上，英国经济的“腾飞”发生的时间，正值其军费、国债、税收和关税达到了令人惊愕的高水平。因此，即使没有国家干预，经济增长仍然可能达到更高的水平，这也不能削弱这种高度干预与英国经济的腾飞密切相关的事实。即使如此，自由主义信条中的一个漏洞是值得注意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承认，在国内总需求较低的条件下，国家干预主义能够发挥积极的经济作用。在没有办法消化国内较高的生产能力时，国家干预主义是富有成效的。这个漏洞值得注意，因为在18世纪呈现“凯恩斯经济萧条”的情况下，英国国内总需求的确极为疲软。[79] 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干预主义的“真实”机会成本可能使其发展道路变得更缓慢、更漫长、甚至是英国经济的非工业化。

自由主义者还提出两个重要的与事实相悖的观点，以忽视帝国主义在英国工业化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第一，无论给英国带来了什么样的经济利益，都被高昂的帝国防御代价所超过。因此，他们强调，如果没有帝国，英国经济将具有更加强大的生产力，因为这会进一步提高其储蓄率（或者是根据约翰·霍布森的说法，会推动国内的总需求）。兰斯·戴维斯和罗伯特·哈登贝克声称，1860至1912年之间，在欧洲，英国纳税人的负担最为沉重，人均1.14英镑用于国防支出（相比之下，法国为0.86英镑，德国为0.75英镑）。[80] 他们还指出，英国的国防费用分为两部分：“国内防御”和“帝国防御”。他们认为，如果英国放弃其殖民地，那么国内纳税人的负担将会减轻约30%，结果就将大大加强国内的储蓄率和投资率。

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以一种货币来衡量国防支出不能揭示真实的税负，从而不能告诉我们实际的偿付能力。为此，需要对国防支出所占国民

收入的比例进行估算。根据我的计算，1870至1913年之间，主要大国实际的平均国防费用如下：英国3.2%，德国3.8%，法国4.0%，俄国5.1%，日本8.2%。[81] 要知道，即使占国民收入1%的差别也是很庞大的数字。显然，英国的税负还是很有利的，课税较低而不是课税高。最重要的是，如果帝国的成本是军费总额的30%，那么最后英国实际的帝国军事费用将仅占国民收入的1%。这一数字相当于过去半个世纪冰岛用于国防的费用，数额微不足道。甚至连保罗·肯尼迪也不得不承认，“1815年后‘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低廉成本”。[82] 总之，考虑到在任何情况下英国纳税人都相对于欧洲大陆纳税人税负低，很难理解在1850年后的时期帝国怎么能够构成一种任何意义上的财政负担。艾夫纳·奥弗(Avner Offer)①也推断道，很难想象如此之小的帝国主义成本，是如何被帝国所产生的巨大的经济利益所抵消的。[83]

这里一种很明显的反驳就是，在1815年后的时期，英国的实际国防成本极高（如我在第一部分所述）。因此，可以这样来作出回答，在早期，极其高昂的帝国成本已经超过了帝国的经济收益。我可以给出两种答案。第一，在1715至1815年之间，英国至少卷入了12次战争。根据一位专家的研究，这些战争中至少有一半是为争夺帝国而战，甚至此时殖民地还并非战争的主要因素。[84] 第二，如上所述，尽管在1715至1815年之间战争成本（无论是否为争夺帝国）的确非常之高，但这些很大程度上都刺激了工业化的发展，因为这一时期英国的经济正处于总需求低迷的状态。

第二种自由主义者与事实不符的观点宣称，对殖民地市场的保障只能拖累英国工业的落后，其机会成本就是放弃发展新的更重要的工业。但由于这类学者常常把棉纺织工业包括进来，这就很难解释保护主义和殖民地市场是如何促使其首先兴起的。即使如此，托马斯和麦克洛斯基回应道：“首先，似乎奇怪的是，认为如果没有国外殖民地为棉纺织品提供市场，……英国将能够在国内占到市场。”当然，他们也承认国内需求不足

①当代英国经济史学家。——译者

以达到消化英国棉纺织生产能力的水平。但他们认为，“从长期来看，……用于生产过剩棉纺织品的劳动力和资本，可以转移到生产啤酒、修路、建筑和其他国内行业中”。[85] 仅是可能，但是他们不是。无论如何，很难想象啤酒生产、道路修建或者住房建筑，将如何保证一种比英国棉纺织品出口实际获得的更好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这并不能抹杀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帝国的收益和国家干预主义积极推动了英国的经济，即使所有这些，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钟爱的词语来说，是“次优的”。多么棒的次优性！

第四部分

结语：东方化的西方与西方的欧洲中心神话

第12章

理性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和东西方大分裂的双重神话，公元1500—1900年

了解自身与他人者，
深知东西方之不可分。

——歌德

如本书所述，欧洲中心主义在东西方之间设定了一条严格的分界线。这意味着东西方之间不仅是分离的，而且有质上的不同（从发展的意义上讲）。更重要的是，如第1章中所指出的，在欧洲中心论的说教中，这种区分隐含了一种智力上的种族隔离制度，在这种制度里，优越的西方与低等的东方被隔离起来。据称东方充斥着专制和非理性的制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种观点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或者是马克斯·韦伯称作的“世袭专制主义”）。相反，自由和理性的欧洲国家确保了只有西方才能够取得经济发展。本书第一部分指出，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是虚构的，它一方面掩盖了相对理性的东方国家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掩盖了东方巨大的经济进步。但现在的任务仍是考察西方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如欧洲中心主义所假定的那么理性。为了评价这种观点，我将集中探讨“理性国家”的三个方面：

1．一种“理性—法制的”集权制官僚机器，是依据客观的（而不是专制的）标准运行的，并且以公共和私人领域相分离为前提。

2．在经济领域采取“最低纲领主义”（minimalist）或自由放任的政策（即国家不干预自由市场的正常运行）。同时也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经济只有在其运行时没有受到政治干预和扭曲的状况下才是理性的。

3．赋予公民政治权利的民主倾向，就是授予个人权利。

本章依次对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并得出结论：西方国家远非像通常所假定的那样（在整个1500至1900年的转折时期）是理性的。并且，如果东方国家远比欧洲中心主义所假定的更有理性（如第2—4章所述），那么结论一定是：欧洲中心主义所强加的东西方之间存在着理性或文明的大分裂是不成立的。[1]这个结论意味着用以解释西方崛起的欧洲中心论框架濒于破产。这就为我在最后一章提出的反欧洲中心论的框架提供了平台。

西方国家集权和理性的神话，1500—1900年

法国通常被认为是欧洲最集权和理性的国家之一，路易十四的名言（尽管是自欺欺人）“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普遍被奉为神话。这的确是一个神话，因为不是在20世纪就是在19世纪之前，法国的公共领域完全没有从私人领域中分离出来。在法国，只有脆弱的中央财政官僚系统，由于基础结构受限而触及到了公民社会。甚至到1800年前后，官僚与民众的比率也仅为1:4100，显得微不足道。[2] 法国大部分的国库收入是集体税而非个人税，这说明了其基础结构的薄弱。农民被置于集体公社的环境中，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税收的目的。如果一个集体成员没有交纳其税额，将会受到其他成员为数不菲的惩罚。[3] 换言之，收缴税赋的管理工作最终是由公社成员国家来负责。此外，国家严重依赖于租税（土地税）而非商业税。总的说来，法国的税收手段是专制的、不公平的，并且法国的税收记录很大程度上对公众是不公开的。这就强化了这样一种基本看法：法国政府是不公平的，并且以牺牲公共利益来服务于私人利益。[4]

国家依赖于贪污腐化的事实，即以一次性支付的方式，将公职出售给

富有的个体，不再明确地表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融合。问题在于这些富人以世袭的方式，利用他们的公共职位来提高他们的私人收益（抽取了高达50%的政府收入）。重要的是，这种毫无效率的税收体制导致了财政危机，反过来又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5] 鲜为人知的是，由于对法国还债能力缺乏信心，国际债券市场提高了法国政府贷款的价格（通过提高利率），而这又恶化了法国的财政危机。[6] 简而言之，不是在20世纪就是在19世纪之前任何时候，法国绝不是欧洲中心主义者所假定的拥有理性的制度。

虽然普鲁士也常常被誉为欧洲最有理性的国家之一，但其非理性程度也是惊人的。“伟大的普鲁士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威廉（Frederick William）(1640—1688) 曾宣称（虽然没有路易十四有名）：“我摧毁容克贵族的权力，筑起我统治的铜墙铁壁。”但这只是缔造的另外一个神话。事实上，容克——充斥管理机构的普鲁士地主阶级——继续使用其公职来支持其私权。国家众多的政策议程，从税收政策到贸易政策、外交政策和其他各种政策的形成，都是直接以牺牲公众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这一阶层私人利益的。这种政治制度是为了容克地主阶级的利益而被严重扭曲，一直持续到1918年革命。例如，尽管德国在19世纪的确存在着普选，但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度确保了容克地主阶级政治利益的胜出（这一点我在下文还要阐述）。

令人吃惊的是，法国官僚占人口的比率微不足道（1:4100），但与普鲁士1:38,000的比率相比却让人注目。[7] 官僚体制无效率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在19世纪末，普鲁士政府甚至不知道它有多少官员。正如迈克尔·曼所指出的，“如果一个国家计算不出自己官员的数量，那么它远非官僚政治”。由此他总结道：“像许多历史学家一样，把普鲁士看作官僚政治是荒谬的。”[8] 此外，尽管在1806年后先后经历了施泰因和沙恩霍斯特改革，但直到1918年容克地主的力量仍然没有削弱（如前文所述）。极具讽刺性的是，这一观点最有力的支持者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斯·韦伯，他强调说，1900至1918年之间德国外交政策失败的直接原因就是，官僚体制既没有足够的理性，也不是集权制的，更缺乏一种强大的公民社会的监

督。问题就在于官僚政治被容克地主阶级非理性的私人利益所控制。正因为如此，国家利益在1914年成为容克军国主义祭坛上的牺牲品。[9]

总之，即使迟至19世纪末，最出色的西方统治者都未能达到“理性的文明标准”。很大程度上，主要国家都依赖于私人以及地方世袭的官员，这些官员把他们的公职看作是祖传的私产。这就得出有力的结论，西方的官僚政治是以专制的世袭或传统为标准，而不是以理性合法的现代官僚体制为标志的。

西方国家自由主义的“最低限度干预”神话，1500—1900年

马克斯·韦伯，尤其是亚当·斯密指出，理性的或文明的国家奉行一种自由主义的或“最低限度干预”的政策，避免对经济进行干预（即自由放任政策）。[10]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使经济能够依据自身的供求规律自动调节，使商品和服务得以合理配置，从而达到最优效果。这一观点内容广泛。为了对此进行评价，我将重点探讨欧洲的贸易政策。问题就是：欧洲国家在其工业化时期是如何进行自由贸易的？

欧洲的贸易政策令人吃惊，因为贸易保护主义比自由贸易更占据优势。这一政策从17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下半叶。重要的是，英国政府在1700至1846年之间征收的平均关税至少是32%。而且，欧洲工业的平均关税在1820年时是19%，1875年为10%，1913年又达到了19%。[11] 同样重要的是，19世纪中期的“自由贸易时代”，实际上是贸易保护主义原则的一个例外（如第11章所述）。我们知道，1860至1877/1879年期间的主要特征是温和的贸易保护主义，而不是自由贸易。而且，如果我们把1846至1877/1879年之间作为欧洲自由贸易时代的代表的话（与许多历史学家一样），那么平均关税将会接近20%。通过对比我们发现，这个数字与1930年美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规定相同，后者常常被描述成有史以来最具保护主义色彩的法案之一。有意思的是，在1600年至1900年期间，欧洲实行“自由贸易”的时间仅为6%。同样有趣的是，整个这一时期，欧洲从没有达到过奥斯曼帝国在17、18世纪时的低关税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大国，尤其是英国，通过关税保护主义来干预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战争目的而征税。[12] 这一先例在重商主义时代就已确立起来。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尔贝尔恰当地总结了欧洲普遍的观念："贸易是国家财政之源，财政则是战争的重要命脉。"[13] 关键是，财政军事税收对经济的榨取必然会破坏所谓的供求规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下半叶，这表明主要的欧洲国家在各方面都符合韦伯的"非理性的父权制专制国家"。

与上下文内容联系起来，很有意义的是，利用关税保护主义的一个原因就是欧洲国家太弱小，不能依靠累进所得税。也就是说，他们的中央集权不够充分，其官僚体制还没有能力扩展到整个社会去征取所得税，官僚政治效率很低。因此，他们主要依靠累退间接税，特别是关税——这种税在一些特定的港口很容易征收，而且因为公众没有政治发言权（见下文），征税并无大碍。[14] 事实上，甚至直到20世纪初，欧洲的税制仍以其递减特征而引人注目。[15] 1900年时，所得税占整个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在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和瑞典是0%，意大利是12%，英国是13%，丹麦是15%，荷兰是20%，挪威是39%，瑞士是55%。在西欧国家中，1900年平均所得税收入所占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仅为14%。即使是这些数据，也夸大了真实的累进税制。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所得税并不是非常进步的，因为税率对低收入者来说太高，而高收入者又能够利用各种办法使他们的税负最小化。

同样让人吃惊的是，一直晚至20世纪60年代，西方——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转向真正的自由贸易（尽管又花了20年才得以实现）。不过，也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才有充分的民主和集权，使得政府能够放弃他们到那时为止所依赖的递减贸易税制（即保护主义的关税），而采取了所得税制。[16] 总之，在整个"重大突破"时期对递减贸易税的依赖，是国家官僚体制脆弱和缺乏民主（"非理性的前现代"父权制专制国家的主要特征）的表现。这里做一点补充，国家以牺牲公众的利益来保护各种私人（工业和金融阶级）的利益，其手段就是提高关税，政治经济学家把这个过程称为"寻租"。"寻租"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世袭国家的一个重要

特征，因为它意味着国家赋予私人利益有超过公共利益的特权。

因此，很明显，欧洲贸易政策中的国家干预主义水平之高令人吃惊。更重要的是，这种干预主义扩展到了其他许多经济领域。[17] 在第11章中，我对英国工业化进行了更为广泛地探讨，在此不再赘述。由于英国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在其工业化时期最有成效的自由放任国家，那么转向欧洲大陆，就难以揭示出马克斯·韦伯或亚当·斯密所说的理性的“国家最低限度干预”的存在。简言之，在整个1500至1900年期间，理性的自由主义国家在欧洲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因为它的稀缺。

西方国家民主的神话，1500—1900年

欧洲中心主义者声称，与东方专制主义相反，西方民主国家赋予个人以权力和自由。因此，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被认为是西方独有的东西（这形成了只有西方率先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如第10章所述，很具代表性的是，欧洲中心主义通过各种办法将近代的政治民主观念追溯至古希腊，然后再追溯至英国的《自由大宪章》（1215）、英国的光荣革命（1688/1689）、美国宪法（1787/1789）以及法国大革命（1789），从而虚构了一幅永恒的西方民主画面。通过这种方式，欧洲和西方在其漫长的力量崛起过程中都以民主自居。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在20世纪前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是民主的。詹姆斯·布劳特指出，欧洲中心论的史学家们想“将欧洲社会的许多积极因素向前追溯到中世纪，而这些因素出现在欧洲崛起之后，出现在欧洲开始经济现代化之后”。[18] 也就是说，欧洲中心论史学家们试图把一个之前并没有真正应用的20世纪的观念向前“推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西方突破性的发展就不是自由民主国家作用的结果。而且也表明，它并非由于强大的文明社会的作用。

仔细观察图表12.1就会发现，大多数西方国家直到20世纪初才给予男性公民政治权利，并且很多国家直到20世纪中叶才有普选权。我们看到，表中的国家按照自上而下的顺序，挪威是第一个实现普选权的国家，美国、葡萄牙以及瑞士则排在最后。这组数字让人吃惊，因为直到20世

纪之交，低水平的选举权才得以实现。在1900年，整个奥地利只有14%（20岁以上）的人拥有选举权，德国在1912年达到了39%。令人惊奇的是，与德国相比，大多数欧洲自由国家的状况更加糟糕。1900年或稍晚些时候，获得选举权的成年人口的比例，1900年比利时是4%，1909年意大利是15%，1908年瑞典是16%，1910年英国是29%，1913年丹麦是30%，1906年挪威是35%，瑞士晚至1967年只是38%，法国到1940年才仅为40%。[19] 唯一超过德国的自由国家是荷兰，在1901年时它已有52%的人口获得选举权。此外，在列举的14个国家中，只有7个国家在19世纪时给予男性选举权，没有一个国家实现普选权。

但是，即使这些低水平的选举权的数字，也夸大了公民政治权力的真实水平。在普鲁士（它主导着德国的政治体制），选举体制有利于最富有的阶层。普鲁士的“三级选举”体制划分得很不平等。第一阶层占3.5%，是最富的人；第二阶层占13%；最穷的第三阶层占83.5%。但障碍在于，每个阶层都拥有同等的选举权：也就是说，居于最高端3.5%的人和底层83.5%的人口拥有同等的权利。因此，16.5%的富人的票数明显多于83.5%的穷人。而且，再加上德国的议会只有有限的权力，并从属于帝国首相，

图表12.1　西方主要国家政治公民权的起始年份

国家	成年男子普选	全民普选	国家	成年男子普选	全民普选
挪威	1898	1913	法国	1848	1946
丹麦	1848	1915	德国	1849	1946
奥地利	1907	1918	意大利	1919	1946
瑞典	1918	1918	比利时	1919	1948
荷兰	1917	1919	美国	1965（1870）	1965
英国	1918	1928	葡萄牙	不详	1970
西班牙	不详	1931	瑞士	1879	1971

资料来源：张夏准，《踢开梯子》（伦敦：安特姆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而首相又要对德国皇帝负责，那么公民政治权力的概念在德国显然是不真实的了。

更为普遍的是，西方所有国家在19世纪都有男性选举权，但是诸多的扭曲或阻碍使得民主只是一种虚幻。这些包括公开投票——这导致了贿选以及普遍的选举欺诈（到20世纪时才开始秘密投票）。尽管英国在1883年颁布了《腐败与非法行为法案》，但这对阻止选举腐败影响甚微（选举腐败在20世纪仍是一个不小的问题）。美国的状况更加令人沮丧。正如张夏准博士所指出的，尽管“第15条修正案”在1870年给予了黑人选举权，但在1890年又被南部各州废除。而且，美国国内仍然存在的大量障碍，实际上也阻碍了修正案的实施。[20] 这些包括各种正式的障碍以及非正式障碍，正式的障碍如要求文化程度以及果断的“品性”要求，非正式障碍最突出的就是反对黑人享有选举权的暴力威胁。直到1965年《选举权法》通过后，这些障碍才被消除。同样重要的是，巨额的选举费用导致了进一步的扭曲，使得民主在实践中被削弱了。张夏准指出：

> 由于竞选“耗资巨大”，官员当选后出现腐败就不足为奇了。19世纪末，美国立法机构，尤其是各州议会腐败之极，后来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感叹道，纽约州那些向游说团体公开兜售选票的议员们“对待公职生涯和行政事务的态度就如同兀鹫对待死羊一般”。[21]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是西方国家中拥有政治民主最晚的国家之一。因此，很明显，即使晚至1900年，真正的政治民主在西方仍然是一种幻想。帕特里夏·斯普林伯格（Patricia Springborg）[①]的总结很有说服力：

> 在国家立法理论的历史中，田园式的、静止的、相对不发达的西方，将多元的、互动的、富于创新的东方视为“专制的”，这是一个

①当代澳大利亚政治哲学家，著有《西方共和政体与东方王国》等。——译者

莫大的讽刺，认为民主与议会密切相关的西方，直到我们所在的20世纪才实现了普选权。[22]

结　论

第2至4章的中心论点之一就是，东方国家要比欧洲中心论所认为的东方专制主义更加理性、更有增长活力。本章指出，西方国家在其取得重大突破时期，远非欧洲中心论所认为的那么理性和民主。因此，东西方之间由于文明的大分裂而分离的观点无疑是虚构的。反过来，这个结论必然使欧洲中心主义对西方崛起的解释不能成立。因此，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找出一个更加合适的问题来开始我们对西方崛起的分析，这同样也需要寻找一个更加适当的答案。这就是最后一章的任务。

第13章

东方化西方的兴起：身份／动力、全球结构与偶然性

如果说推翻欧洲中心主义，而代之以反欧洲中心主义的主张正确的话，那么，不仅重新思考西方文明的基础是必要的，而且去认识历史编纂或历史编撰哲学中渗透的种族主义和欧洲沙文主义也是必要的。

马丁·伯纳尔

历史是以将东方与欧亚大陆西部分离的虚构界线的不断变化为标志的。

希罗多德

知识和西方文化的全球化一直强调西方的观点，即西方是正统知识的中心，是知识认知的仲裁者和“文明”智慧的源泉。按非西方学者所言，这种全球知识的形式一般是指“普世的”知识，所有人都可获得，并不“专属”于某一个人。西方学者的观念一旦形成，历史就（再次）被修改，以至于文明的历史仍然是西方史。基于这个原因，地中海世界、阿拉伯文化区和东方的君士坦丁堡都被认为是西方文明、西方哲学和西方知识的一部分。

林达·史密斯

我们在前一章总结指出，根据欧洲中心主义所假设的推动西方崛起的重要因素——理性与民主——在1500至1900年的欧洲突破时期并不存在。因此，我们需要形成一种反欧洲中心论的理论阐释。本章共分四个层次来进行解释。第一部分认为，在我们能够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或西方的崛起之前，需要重新限定欧洲中心论所提出的核心机制问题。第二至四部分论述我的反欧洲中心论的框架，强调了全球结构和东方资源组合传播的重要性，这些随后被西方吸收，并把注意力集中在1492年后欧洲身份的作用和对东方资源的帝国掠夺方面，为后来西方的崛起打下了基础。最后，我强调了偶发事件的重要性，为了提供一种不同的世界历史轮廓，我将反欧洲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进行比较并从中得出结论。我的结论是，东方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欧洲的崛起，我们需要用东方化西方的观点来取代纯粹西方的欧洲中心论观点。

在错误的地方寻找答案——新问题的形成

欧洲中心主义错在一开始就提出了错误的问题。所有欧洲中心论者（明确或不明确）在开始时都会提出这样两个相关的问题："是什么使西方率先进入资本主义近代化？"以及"是什么阻止了东方实现这一重大突破？"的确，这些问题影响了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并且一直是欧洲中心论的中心。不过，正如我们在第1章所述，许多学者并没有试图明确地或有意识地去捍卫所谓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但不管是否有意，这些标准问题的提出不可避免会导致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假设。

这些问题并没有明确地反对东方。首先，它们导致了学者们（常常无意识地）认为西方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学者们在开始时将现代西方当前的主导地位作为一个事实，然后追溯过去，寻找所有使这些成为事实的独特的西方因素。相反，他们将目前东方的附属地位或落后作为一个事实，同样追溯过去，寻找所有阻止东方进入现代社会的因素。这样，他们的探索就以现在东方的"萎靡"不可避免而告结束。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只需要用西方人的标准对东方的成就进行评估——也

就是它是否取得最终突破。因为东方很明显没有取得最终的突破，因此东方所取得的任何经济成就必定被视为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个过程中，东方被剥夺了经济发展的能力，从而证明了经济发展一直被西方所垄断。

总之，这些标准问题带来三种相互联系的结果：首先，对“西方发展的铁的规律”和“东方不发展的铁规律”的归因；第二，对世界历史上与“被动的东方客体”相对立的“主动的欧洲主体”的假设；第三，通过一种内在的逻辑来理解西方的崛起，即它只能根据欧洲严格的内生性因素来解释。所有这些的最终结果是，西方处于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崛起的发展历程中，而东方则被排除在外。并且，不管有意与否，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是认为西方的崛起是成功的、神奇的、纯粹的——这正是欧洲中心论神话中纯粹西方的本质。

这个结论可能会被质疑，因为只有回顾历史，找出促使西方崛起和东方“未崛起”的因素才是明智的。那么我们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呢？但提出这些问题必定会妨碍研究者发现这一点，即东方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而且反过来这又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的崛起。简言之，一方面，研究者把西方的崛起和东方的悲剧作为两个独立的问题，并不能从逻辑上得出上述不同的观点；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观点又把分析的注意力指向只存在于西方的积极因素。

为了阐明我的观点，即欧洲中心主义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是错误的，做一个简单的推理实验是非常有用的。假设我们生活在公元900年，如第二章所述，那时伊斯兰中东或北非是文明的摇篮，它不仅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全球经济的中心，而且其经济增长迅速，甚至人均收入也急剧增加——这被说成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见第2—4章）。如果那时我们建立一所大学，对伊斯兰经济发展的原因进行调查，我们可能会得出如下结论：中东／北非之所以先进，是因为它有一套独特的先进的理性制度。首先，它是一个和平地区，城市大量涌现，资本家们从事远距离的全球贸易。第二，伊斯兰商人不仅是贸易者，而且是理性的投资者，他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全球资本活动中进行贸易、投资和投机。第三，建立了一套十分合理的制度，包括结算体系、提供现金交易、进行存

款和有息贷款业务的银行、一种特别的复式簿记制度、合伙制度和合同法，所有这些都以高度的信用为前提。第四，科学思想在约公元800年后快速发展。第五，伊斯兰对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当然，就不会有人去写题为《基督教信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书，这本书因“抑制增长”而将伊斯兰排除在外。人们更可能会写一本叫做《伊斯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书，它将明确阐释为什么只有伊斯兰世界能够取得重大的经济发展，以及为什么基督教欧洲将永远陷入农业停滞的困境。或者，我们可能会同意同时代的萨义德·阿尔－安达卢西（Said al-Andalusi）〔后来由伊本·卡尔敦（Ibn Khaldun）所继承〕的观点：欧洲处于寒带地区，意味着那里的人们是无知的、缺乏科学进取心的，并将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或者，假设我们回到了1100年。如果我们建立一所大学，并设有社会科学系，我们可能会试图去回答当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即当欧洲还处于落后的平均地权论和相对脆弱的重商主义泥沼时，宋朝中国是如何实现了工业生产以及集约型（人均）经济增长的突破呢？我们可能会给出以下解释：中国具有西方所没有的特性和制度，中国拥有强大的政权，有着稳定与和平的环境，并具备积极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条件。相反，欧洲分裂成许多国家，并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强大到可以形成一个足够和平的国内环境来确保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当中国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已经解决了它的内部问题，此后就处于和平状态时，欧洲实际上还是一个战争纷乱的地区。此外，在中国独特的理性的儒家信仰中，包含了一套严格的勤劳的道德准则。而欧洲则受制于天主教教义，它特别强调了对权威的尊重以及长期的宿命论，这阻止了节约、勤劳和理性骚动的出现。也许我们可以写本题为《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书，它将明确阐释为什么天主教教义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为什么只有儒家学说才包含了一套正确的美德，从而使经济取得重大进步。

这里显著的问题是，在解释伊斯兰或中国的成功以及欧洲的失败时，我们最终必定会以不变的原因来解释易变的情况。同样地，如果我们生活在1900年并探讨西方崛起成为主导力量的原因，如果我们还用先前伊斯

兰或中国的优越性理论来解释就很成问题。但那种情况的确是发生了。因此，我们发现在所有西方人对西方崛起的主流解释中，倾向于西方具有永恒的特性，这使得西方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突破是不可避免的（即欧洲中心论的“内在逻辑”），而同时预先假设一个落后的东方是永远没有能力发展的。但是，鉴于公元500年后东方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开创性进展，并且直到1800年，东方一直比西方发达，因此这种分析显然是毫无效果的。并且我们应该清楚，到目前为止，这种无结果的分析必定来源于欧洲中心主义一开始所提出的问题。

诸如“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或“为什么是西方而不是东方”？此类问题的实质在于，这些问题是绝对的问题，需要绝对的答案，即答案是西方具有永恒的积极性，而东方具有永恒的消极性。正是这导致了东方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边缘化。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暂时的相对的问题，它必须避免把永恒的特性归于某一区域的做法。这非常重要，因为认为西方具有独特的、永恒的特性，不可避免地忽视了本书试图揭示的另类的东方史。简言之，一个暂时的相对的问题将可以使东方脱离边缘化地带或欧洲中心世界史的黑暗地带。

那么什么是一个另类的、相对的问题呢？根据杰克·古迪在其开拓性著作《西方中的东方》中的分析，我们可能会问：在公元500至1800年间，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在东西方之间发生转移，从而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正如我们在这本书中所看到的，在公元500至1800年间，东方一直是全球集约型和粗放型经济的主导力量，直到19世纪最终被西方所取代。

迈克尔·曼或许对此做出了相应的回答。他承认，至少在公元1500年之前，中国粗放型经济水平要高于欧洲，不过他认为在“集约型经济方面的成就，尤其是在农业上，欧洲在公元1000年时就已经遥遥领先了”。[1] 这成了他反对他所称的历史修正主义者的“欧洲人自我贬低”倾向的基础。但是根据本书的观点，有三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种主张对于欧洲来说是不成立的。首先，促使欧洲中世纪农业改革的许多重要的技术都来自于东方。第二，中国农业在19世纪前一直领先于欧洲（甚至许多

欧洲中心论者也承认）。第三，中国之所以长期处于主导地位，是由于中国的农业技术确保了更高水平的集约型经济。有事实为证，中国早就发明了曲辕铁铧犁，远远优越于中世纪欧洲笨拙的方型木铧犁。并且直到18世纪欧洲才开始赶上中国，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吸收了中国的曲辕铁铧犁（以及中国许多其他的农业和工业技术——见下文）。曼还把尖端拱门作为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欧洲优越的集约型经济。[2] 但这一发明来自于中东伊斯兰，并通过阿玛菲（Amalfi）①传到欧洲。总之，如我所说，问题不是“欧洲人自我贬低”，而是在世界历史学家中间普遍存在的“欧洲人自我提升”的倾向。

根据这些论述，我们显然不能把一套永恒的、独特的特性赋予某一个地区。正如古迪所言：

> 很明显，西方的卓越成就不能被看作是西方文化所具有的永恒的或者持久的特征，而是钟摆往复摆动的结果之一……一种理论最起码的原则应该从接纳异见开始。[3]

下面三个部分概述了我的答案，分别从多个角度详细分析了全球结果、身份／动力和偶然性的作用。下文将依次进行阐述。

全球结构和东方动力：东方化西方崛起过程中通过东方全球化对东方资源的传播和吸收

本书第一部分勾画了在公元500年后出现的由亚非主导的全球经济的轮廓（主要但并非完全是由中东波斯人和北非人以及后来的穆斯林所开创的）。正如第2章所述，欧洲中心论的史学家否定了西方崛起的全球根源，因为1500年前后欧洲与“边缘地区”的贸易是微不足道的。即使这是真实的（其实不是），但重要的是，全球经济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

①意大利撒勒诺省一城镇。——译者

现成的交流渠道，将全球大部分地区联系起来，同时它还是公元500至1800年间东方主要的资源组合传播到落后西方的一个渠道。尤其重要的是，许多这样的资源组合是通过伊斯兰世界的桥梁从东方传到西方的。

这里基本的观点是，在欧洲发展的每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对优越的东方思想、制度和技术的吸收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与林恩·怀特的结论正好相反："我的基本观点是，西方文化在技术上的统治地位不单单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它开始于中世纪的早期，在中世纪晚期已经很明显了。"[4] 但是重要的技术——马镫、马轭挽具、水车和风车，也许还有铁制马掌和中世纪的犁——都来自于东方，从而确保了欧洲中世纪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此外，在公元370年后，全球性的一波波的东方移民浪潮冲击了欧洲，促进了欧洲封建政治结构的形成。欧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各种"原始资本主义革命"——商业、生产、金融和航海——据称这些是公元1000年后由意大利人率先发起的。但是第6章揭示了意大利金融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东方。因为在那里（主要中东）首先发明了合伙制和合同、支票、汇票、银行业、货币交换、对贸易和投资的有息贷款、合同法以及合理的会计制度，所有这些都传到了意大利并被其吸收。所有促进中世纪航海革命的重大技术——指南针、地图、船尾舵、方形船体、多桅杆体系和斜挂三角帆——都是中国人或伊斯兰中东发明并完善的。而且，印度、中国、非洲特别是伊斯兰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进步以及阿拉伯罗盘的改良，都确保了航海技术的发展，这些技术随后又传播到欧洲，从而促成了所谓的欧洲航海大发现。最后，中世纪欧洲的纺织业、造纸业、炼糖和钢铁生产（或许还有钟表制造业）都有赖于东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值得注意的是，当很多东方技术通过全球经济得以传播时，十字军东征也是东方资源传到欧洲的一个重要渠道。

第8章揭示了东方主要的发明革新的传播，使得欧洲在15世纪后开始了"追赶"时期。东方人（尤其是伊斯兰以及犹太人、印度人、或许还有非洲黑人）的思想在西方的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中是至关重要的。火药、火枪和大炮奠定了所谓的欧洲军事革命（1550—1660）的基础——它们都是850至1290年间在中国的军事革命中所发明的（伊斯兰中东也做出

了很多贡献）。此外，印刷术的起源也不能归功于古登堡，因为最早金属活字印刷是朝鲜在1403年发明的，并且中国早期的许多印刷技术或思想的传播后来也确保了欧洲的“重大突破”。

西方崛起的下一个重要阶段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这尤为欧洲中心主义所称道。但是第9章揭示了一些启蒙运动思想是如何直接从东方——尤其是从中国借用的。此外，英国农业和工业革命所依赖的大多数重大的科学技术都是中国发明的，并通过全球许多商业路线进行传播。这些技术包括播种机、马拉锄、曲辕铁铧犁、旋转风扬机、作物轮种法、煤和鼓风机、钢铁生产技术、棉纺技术、运河及水闸、蒸汽机以及更多的技术思想等。

总之，没有全球经济和东方全球化，很多非常先进的东方资源组合就不会传到西方。而且，没有这些资源组合，欧洲人可能还处于亚非主导的全球经济的落后边缘地带。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必写这本关于西方崛起的书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科学家们将会争论为什么东方如此先进，而欧洲仍是一个落后停滞的社会，在更加先进的亚洲体系的边缘徘徊。不容置疑，重要的“西化主义”著作将变成《亚非和无历史之人》，从而是对埃里克·沃尔夫的书《欧洲和无历史之人》进行改述。毫无疑问，可能有人现在就会写一本书，通过展示西方如何对东方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来弥补西方主义，或许题目就是《东方文明的西方起源》或《西方化的东方》。

不过，事实上，是欧洲而不是东方实现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突破（当然，这正是欧洲中心论者所迫切要指出的）。但是，如果这不是西方优越的理性、智慧和自由民主的结果的话（在12章以及第2至4章所指出的），另一个不同的观点就是西方的崛起是由于其强大的适应能力。重要的是，一些欧洲中心论者实际上对此持同样的看法，就是：

> 西方之所以与众不同，不是它具有发明创造的能力，而是乐于学习、模仿别人，善于利用世界上其他地方发明的工具或技术，并将它们加以改进，使其效率更高，更好地应用于不同的目的。[5]

因为欧洲人的确成功地吸收了东方的资源组合(尽管西方人花了很长时间才取得了领先地位),所以这种适应论是站得住脚的。不过,虽然这种适应能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它并不是西方崛起的充分条件。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西方的崛起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机遇性(我将在下文说明)。其次,如果我们采用严格的结构唯物主义的方法,这种适应论只适用于中心阶段。但正如我在下一部分所强调的,欧洲的动力和身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此处我指的是欧洲人的掠夺性和日渐增长的种族主义身份,这些随后产生和培育了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又促进了后一阶段的西方的崛起。换句话说,同化或吸收东方的资源组合,仅仅是西方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

但总结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得出:"同化论"有两个主要的后果,一方面它反驳了东西方之间本不同的欧洲中心论假设;另一方面反驳了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东方的边缘化。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从公元500年开始,东方和西方就不是独立的实体,而一直都是"交错"相连的(借用迈克尔·曼的话)。[6] 尤其是不能将东方描述成是西方列强的一个被动受害者或承受者,这不仅是因为在公元500年以后东方人缔造了全球经济,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领先于欧洲。正如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指出的:

> 根本不存在从"印度洋世界经济"中分离出来的"欧洲世界经济"。如果要说有的话,也是前者包括后者,反过来则不成立……唯一的解释就是:很长时间以来,欧洲和亚洲就是同一个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正是它们对这一世界经济的共同参与,决定了他们的不同命运。[7]

最重要的是,我们并不能说资本主义近代化以及全球化都起源于具有开拓性和独立性的西方。但我们可以说它们起源于漫长的历史性的全球积累过程(或"全球融合"过程),[8] 在这个过程中,东方通过开始于

500年的东方全球化与欧洲联系起来，并且在西方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尽管如此，同样地，将西方看作是一个被动地接受东方慷慨赠与的受益者也是错误的（如西方主义），这是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欧洲人也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因此欧洲能动性的观点构成了我整个论述的第二个方面。

欧洲的能动性／身份与东方化西方在崛起过程中对东方资源的攫取

东方促进东方化西方崛起的第二个方式就是欧洲帝国对东方资源的掠夺。这里强调欧洲的能动性或身份对我的论点至关重要。回顾一下，欧洲中心论者特别强调了欧洲的动因，特别是欧洲道德上的进步（尤其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以及“理性骚动”，所有这些都使得西方自发和不可避免地崛起。因此，也许并不奇怪，主要的反欧洲中心论者都认为欧洲的能动性或身份无关紧要。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可以提出一种不夸大西方的独特性的理论。因此，这就使他们提出了在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理论。阿布－卢格霍德指出：

> 我的观点是，发展的各种环境——地理、政治以及人口，都远比任何内在的心理或制度因素更重要、更有决定意义。欧洲走在了世界的前头，是因为东方暂时处在混乱状态。西方在16世纪时引领了世界，而早期东方的制度已经衰败，这一事实并不能使人信服，事实上仅仅是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取得了胜利。[9]

通过有力地引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前提，埃里克·沃尔夫坚持其唯物主义立场：“与那些相信思维有自己独立发展过程的人相反，我认为意识形态的形成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从而使得人类能够更好地利用自然。”[10] 但是对唯心主义反驳最激烈的还是詹姆斯·布劳特，他坚持认为就欧洲人来说，独特的“文化贪婪”不能解释欧洲的帝国主义。他指出：

> 如果认为可以解释的话，就不得不承认在欧洲文化中存在着一些根本法则，使得欧洲人和其他人不同。这就承认了欧洲中心论的一部分观点，即欧洲人是独特的。这仅仅是推翻了这样的一种主张：欧洲人的独特性不在于它的进步性，而在于它的侵略、残暴和贪婪。[11]

在同一页中他继续写到："在东半球的许多地方以及三大洲，嗜杀成性的原始资本主义社会争相占领、掠夺和奴役所有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地区。"

当我们构建一种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时，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否定欧洲的能动性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我们有滑向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①]的危险，认为欧洲只是全球和东方力量或影响的一个被动受益者。这种观点可能会出现在题为《亚非和无历史之人》的书中（前面已提到过）。但是这只不过是传播理论和与之伴随而来的形而上学论的翻版（尽管他们给予了东方而不是西方以特权）。第二，不要将外部或全球结构具体化也是很重要的。这里并不是要罗列所有反驳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观点。这里需要指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反对全球结构论的实用主义逻辑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不想重温关于"施动者—结构论争"，它已经成为社会学中一个经久不息的争论。但正如汤普森（E.P.Thompson）[②]在他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评论中所说的，施动者不能看作是载体——也就是结构的被动承受者。[12] 第三，与弗兰克、彭慕兰及其他学者的观点相反，[13] 个体之所以不是"结构的被动承受者"，原因之一就是"结构"（不论是国内的或全球的）并不是独立于我们的理解或感知之外而存在的。与身份相关的施动者的认知在引导和影响施动者的兴趣和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就是说，

---

①西方主义是指非西方人对西方世界（欧洲、美国、澳大利亚，有时包括现代日本）的偏见以及去人性化的理解。《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一书使西方主义开始普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论及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偏见，西方主义则是它的反向论述。——译者

②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1924—1993），著有《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译者

在相同的结构环境中，施动者的行为和反应随着他们的身份而改变。简单地说，施动者思考世界的方式也影响着他们行为的方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不完全是这样），结构是施动者所缔造的结构。我们对此将作进一步的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背景下，虽然中国在第二个千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主导力量，但其身份使得它选择放弃了帝国主义（如第3章所述）。它的身份是等级制的，与其他被看作是野蛮人的异族相比，中国被想象成“文明的中央王国”。尽管在表面上很相似，但中国的国际朝贡体系与西方的帝国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正如第3章中所详细论述的，朝贡体系更多的是自愿，而非强迫性，而且实际上中国政府丝毫没有对其所谓的藩属进行文化改造或者剥削。[14]朝贡制度的设计更多的是吸引藩属投靠中国，尤其是通过它们提供真正丰厚的经济利润。最后，中国的身份更多的是防御性的结构，其目的是为了在面对潜在的野蛮的侵略者时（例如蒙古人）维持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以及重塑它在国民眼中的合法性。因此，尽管中国在第二个千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世界上的主导力量，但中国还是选择了放弃帝国主义。

中国人的姿态与欧洲人截然相反。欧洲人的身份从1453年后就开始逐渐用帝国主义的词汇来界定，在18和19世纪达到高潮。到了19世纪，欧洲人已经造成了东西方之间的大分裂。将东方定义为低等的、不能实现自我发展，而同时却将西方定义为独立的、积极主动的和父权制的，自然而然就会将帝国主义看作是一种道德天职（即文明使命）。显然，到1800年前后，西方已经成功取得了军事力量方面的领先地位。这在东方的殖民化过程中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欧洲人选择在世界范围内承担帝国角色并非不可避免，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与中国身份的构建有关。最终，欧洲人没有仅仅因为他们“能够”而试图重塑这个世界（如唯物主义所解释的）。他们试图改造世界是因为他们相信应该这样做，即他们的行为明显受到了他们身份的引导，他们把帝国主义视为一种合乎道德的政策（在第10章中解释的）。总之，在帝国主义和优越的军事力量之间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因为和中国相比，最终导致欧洲走向帝国

主义的是它特定的身份。

然而，这并非是说物质力量或物质因素不重要，它们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物质资源从东方到西方的传播（和被掠夺）是我整个论点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重申的是，物质力量是英国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但关键是，普通的物质力量和特别的物质力量依据特定的施动者身份被引向不同的方向。现在我们来看欧洲身份的系谱，以及它是如何影响和引导欧洲人的行为，而这随后又是怎样促使东方化西方崛起的。我将依次对图表13.1中的内容进行探讨。

图表13.1　西方身份的塑造及影响

身份阶段	自我	他者	西方在世界上的攫取战略
(1)500—1453年	欧洲被塑造为基督教世界。	伊斯兰中东和穆斯林被塑造成敌对者和邪恶的威胁。	通过"第一波"十字军东征进攻伊斯兰，非攫取主义（尽管十字军东征促进了对各种中东资源的吸收）。
(2)1453—约1780年	欧洲日益被想象成先进的西方。	伊斯兰（主要是奥斯曼土耳其）被基督教世界塑造成敌对者和野蛮的威胁；非洲人和美洲土著被塑造成"异教徒"或"未开化者"，因而适于剥削和压迫。	通过由哥伦布和达·伽马发起的"第二波"十字军东征攻击伊斯兰；掠夺美洲的金银来弥补欧洲对亚洲的贸易赤字，从而通过全球白银的循环过程来获取套利利润；通过奴隶贸易以及对非洲和美洲劳动力的商品化和剥削来攫取"非欧洲世界"的资源，这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尤其是英国）的工业化。
(3)约1780—1900年	欧洲人被想象成优胜者和先进文明的载体。	整个"非欧洲世界"被想象成居住着劣等的未开化者或野蛮人，因而适于剥削或压迫并按照西方模式进行文化改造。	奴隶贸易（1807年在英国正式中止）和奴隶生产（1833年在英国、1865年在美国、1888年在巴西正式中止）促进了西方尤其是英国的工业化；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帝国主义对亚洲和非洲的土地、劳动力和市场的攫取，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工业化。

在中世纪早期，欧洲人塑造了他们的身份以消极对抗伊斯兰中东。伊斯兰被选定为“他者”，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于欧洲来说，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内在东西去塑造一种单一的身份。这种消极的身份意识导致了基督教国家的建立，它们随后在巩固和重建欧洲的封建制度以及推动十字军的“第一波东征”（1095—1291）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第5章所述，没有这些基督教的思想，欧洲封建主义的高度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将不能获得合法性，它可能会自行瓦解。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欧洲可能会倒退到黑暗时代（尽管通过东方贸易或资源组合——主要通过意大利和西班牙经由伊斯兰世界传播的强劲影响——欧洲人摆脱这种命运也是很可能的）。

1453年后，天主教欧洲尤其感受到所谓“土耳其威胁”的威胁。正如我们在第7章和第8章中所看到的，这推动了1492/1498年后的十字军的“第二波东征”（分别由哥伦布和达·伽马发起的）。随后的“美洲和非洲经验”对于促进欧洲身份的重塑至关重要。这里关键的是，欧洲基督教国家完全转变为先进的西方（见第8章）。虽然在封建制度下，欧洲人为了反对伊斯兰而消极地界定了自己，但是这种身份是建立在不安全感的基础上的。15世纪后，欧洲人自公元500年后第一次开始把自身想象成优越于非洲黑人和美洲土著，而后者被想象成野蛮的异教徒。欧洲中心主义现在开始诞生（尽管它依靠的是各种不同的基督教观念）。正是这种态度为欧洲人提供了自我评判的道德标准，为的是对美洲资源进行帝国主义掠夺以及对美洲土著，尤其是非洲黑人的超额剥削。最初，主要的经济利益来自于对金银的掠夺，这使得欧洲人能够为他们与亚洲的贸易赤字提供资金并从事全球套利交易。同时，当西欧开始明确作为先进文明的化身时，东欧人以及奥斯曼土耳其人被想象成了“野蛮人”。

1500至1750/1780年的“美洲经验”代表了这样一个转变期，即从“基督教欧洲中心主义”的出现，到西欧优越于整个世界的观念的完全成熟。重要的是，1700年后，欧洲身份开始根据隐性种族主义立场（直到约1840年）和显性种族主义标准来进行重塑。这种重塑的结果是把帝国主义看作是一种道德天职（见第10章）。自相矛盾的是，把东方民族想象成完全是劣等的观点使得对其资源（土地、劳动力和市场）的剥削和掠夺似乎是完

全自然或合法的。这随后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的工业化。正如第11章所述，首先，这包括对来自美洲的土地节省型农产品的剥夺，以及由于黑奴的种植园劳作而得到保证的棉花供应。第二，由黑奴劳动力商品化所产生的利润极大地促进了英国在经济领域的投资（我称之为“大比率理论”）。第三，黑奴对英国的金融资本也起到了巨大的刺激作用。第四，《航海条例》以及帝国内部自由贸易的实施使得英国的出口增加，这随后又促进了英国工业的发展。第五，英国将东方变成工业原材料的供应中心，通过对其进行掠夺和剥削来满足英国的工业需求。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东方国家的经济由于受到“遏制”而发展缓慢，从而使英国的经济保持了领先地位。最后，帝国主义也试图对东方进行“文化改造”（即种族文化灭绝），因为西方感受到了所谓的“东方文化变异”的威胁。而且，欧洲人甚至还采取了极端的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制度。

总的来看，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是欧洲的种族主义骚动而不是“理性骚动”，促使了西方能够在最后的阶段崛起。第二，我所强调的全球结构和身份之间的明显联系，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之上的，即身份一直是在全球环境中构建的。或者就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言，“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5] 第三，欧洲中心论所假设的欧洲内在的铁的逻辑使得西方的崛起不可避免，这很值得怀疑，因为没有对东方资源——土地、劳动力和市场的掠夺和剥削，欧洲就不可能实现工业现代化。而且，欧洲极其幸运地实现了“突破”的事实，也逐渐削弱了欧洲中心论的内在逻辑。正如迈克尔·曼在回应偶发事件的重要性时所指出的：“世界历史的发展的确会如此发生，但并非‘必然’，它是‘世界精神’目的论的结果，是‘人类的命运’、‘西方的胜利’……或任何其他的东西。”[16] 那么偶发事件是如何促使东方化西方崛起的呢？

偶然性在东方化西方崛起中的作用

两个著名的反欧洲中心论学者——彭慕兰和詹姆斯·布劳特强调了偶然性（或偶然事件）是西方崛起的关键因素。[17] 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的

崛起几乎完全可以用偶然性来解释。因为欧洲国家需要大量的运气，这是由于他们既没有足够的理性、自由民主，也没有独立开拓发展的独创性。首先，可能最幸运的是，东方运用创造力使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为欧洲人提供了许多不同的资源组合，从而为西方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第二，假使亚洲人也没有创造一种全球经济，那么在没有东方全球化的条件下，他们的许多更加先进的创新就不可能传到欧洲。

第三个幸运是，更强大的东方社会并没有试图对欧洲进行殖民、并把它纳入自己的文化圈（就像后来欧洲人对他们所做的一样）。我们在第2章看到，蒙古人在征服欧洲的中心地带时止步了，而把矛头指向了中国。自相矛盾的是，欧洲国家的幸运是蒙古帝国所给予的。因为它通过全球经济的北方路线（“蒙古人统治下的和平”）给西方带来了商品和东方的资源组合。在第5章我们也注意到，穆斯林对征服中世纪的西欧没有兴趣，尽管他们对这块大陆进行了多次“肆意的”掠夺。此外，正如在第3章中所解释的那样，最终，欧洲受到中国自制力的庇佑，因为中国没有选择通过帝国主义来普及自己的“文明标准”。可悲的是，中国的仁慈和宽容在400多年后因欧洲帝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以及对中国身份的攻击而受到了伤害（见第11章）。

第四个幸运是，正如布劳特所强调的，西班牙人偶然发现了金银蕴藏丰富的美洲（见第8章）。这极其幸运，首先是因为哥伦布应该到达中国，但他误走乱撞，假若他没有误撞，他将以向中国皇帝行施叩头跪拜礼仪而结束，这与在美洲的情况完全不同。或者如费尔南多-阿梅斯托恰当的描述：“哥伦布如果能够到达日本，他将被看作是一个外来的怪人而受到欢迎，将会因为用手抓东西吃而受到嘲笑；在中国，他将被看作是举止滑稽的土著纳贡者。”[18] 而且，如果他在中国登陆，那么美洲的金银资源将不会被开采。由于这些资源在推动公元1500年后西方的“追赶阶段”尤其重要，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力。此外，就像詹姆斯·阿克斯特尔（James Axtell）[①]所提出的：

---

①当代美国历史学家，以研究美洲印第安人历史见长。——译者

> 如果没有从印第安人那里直接掠夺的金银，西班牙将（可能）会因哥伦布的疯狂行为而在一次航行后解雇他，并紧跟在葡萄牙人之后将经济力量向东转移到非洲、印度和东印度群岛有保证的财富上。[19]

不过，阿克斯特尔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错误的。因为没有对美洲金银的掠夺，欧洲人甚至不能维持1500至1800年期间他们在亚洲的一般水平（因为正是这些金银为他们在亚洲的贸易提供了资金支撑——参见第7章）。相应地，他们也就“不能将其经济力量转向非洲、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可悲的是，欧洲人也是幸运的，因为美洲土著没有足够的免疫系统来抵御从欧亚大陆传来的疾疫，这大大便利了欧洲人的殖民过程。同样，欧洲人也非常幸运地获得了大量的非洲黑奴劳动力，尤其是他们还有足够的免疫力来抵抗欧亚大陆的疾病。

第五个幸运可以用这样的标题来概括，即“欧洲人经常在正确的地方和正确的时间里出现”。我们脑海里马上浮现出美洲这个例子。另一个相关的例子是当莫卧儿王朝开始分裂成各种相互竞争的派系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正好在印度出现了。事实上，英国首先并不是通过他们“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打败印度的。罗伯特·克莱武所谓的1757年普拉西战役的巨大胜利就是一个幸运的结果。击溃印度军队的不是英国优越的军事力量，而是一系列内部纷争，这导致了印度军队在一场武装政变的斗争中溃败了。[20] 而且，1757年后英国成功地建立了帝国统治仅仅是通过在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操纵平衡。欧洲只是在后来才利用武装力量成功地巩固了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但是，假使莫卧儿王朝首先控制了印度，那么大英帝国的皇冠上就决不会嵌上印度的宝石；而且，如果没有从17世纪开始印度对东印度公司的慷慨和自愿接纳，英国人就不可能在印度存在，并且一旦莫卧儿王朝开始自动瓦解，他们也不能扩大他们的势力范围。其他的一切也就不会成为历史。

总结后三部分，我们现在可以看出，东方化西方崛起的历史不能和欧洲社会结构的内在性相联系。直到约1800年，全球的主导力量毫无疑问存在于东方的不同地区。在大约公元500至1000年之间，全球的主导力

量在中东。到1100年时开始向东转移，中国成了全球集约型经济的主导力量，到15世纪时成了全球粗放型经济的主导力量。约公元1500年后，当欧洲开始实行帝国主义，并且同时加强他们与东方的联系时，全球的主导力量开始逐渐向西转移。但是，英国仅仅到进入工业化时期时才成为全球集约型和粗放型经济的主导力量。不幸的是，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西方的帝国主义，东方最终能否实现近代的工业化。因为西方的经济遏制战略抑制了诸多东方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不过日本是一个例外，它适用于反欧洲中心论的原则，因为它在没有欧洲殖民的情况下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尽管如此，对理解西方最终突破性发展最合适的分析是400米接力赛。因为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事实上如果没有东方在计时开始时已经跑完了前三棒，英国将不可能首先穿越终点线。或如杰克·古迪所言：

> 近代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地区发展则是跳跃式进行的。没有一个国家被赋予永恒独特的（发明创造）特征，从而使他们能够独自发明或采用诸如农业（或工业）革命那样的重大技术变革。[21]

结　论

现在我对过去1500年里世界历史的一些重要转折点——我认为那些时刻应当成为我们分析的焦点——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同时我用表格的形式列出本书的一些中心论点，并将它们与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相对照（见表13.2）。

图表13.2　重大世界历史事件的两种观点，约公元500—1900年

	欧洲中心论		反欧洲中心论
733年	查理·马特在图尔和普瓦提埃战役中战胜阿拉伯人。	751/1453年	阿拉伯人在怛罗斯战役的胜利确立了伊斯兰在中亚西部的优势；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1453）。

（续表）

	欧洲中心论		反欧洲中心论
600—1000年	欧洲开创了中世纪的农业革命。	公元前400—公元500年	中国开创了诸多技术发明，促进了欧洲18、19世纪的农业革命。
约1000年	意大利人开创了远距离贸易及早期资本主义，意大利成为全球主导力量。	约800年	意大利人加入了亚非主导的全球经济。东方全球化导致了东方"资源组合"的传播，从而促进了落后西方的发展。
1095年后	欧洲十字军宣称控制了伊斯兰中东。	1095—1517年	意大利仍然依赖伊斯兰中东和埃及。
约1400—1650年	意大利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	800—约1400年	东方或伊斯兰文艺复兴（后来促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
1434年	中国从世界退出留下的真空很快被优越的西方填补。	1434—1800/1839年	中国保持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和生产国的优越地位，能够抵御西方的侵入以及支配欧洲商人。
1455年	古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	1040/1403年	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1040)；朝鲜人首先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1403）。
1487/1488年	迪亚士首次到达好望角。	约200—1421年	阿拉伯人绕过好望角（约1450年）并到达欧洲；中国人（约9世纪）、波利尼西亚人（约3世纪）以及印度人航行到了好望角和非洲东海岸。
1492年后	欧洲的"大发现时代"和早期西方全球化的出现。	约500—1500/1800年	亚非的"大发现时代"：东方缔造并维持全球经济（以及主导了东方全球化），中国选择不实行帝国主义。
1492年后	西班牙掠夺美洲的金银。	约1450年	中国流通白银并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生产国和贸易国，为欧洲从美洲掠夺的白银提供了强大的需求。

（续表）

	欧洲中心论		反欧洲中心论
1498年	达·伽马与原始和封闭的印度人第一次发生联系。	约800年后	印度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保持着贸易联系；印度在经济上优越于其葡萄牙“发现者”。中国人、印度人、非洲黑人以及伊斯兰世界的科学和技术为葡萄牙的造船和航海提供了基础。
1498—约1800年	欧洲人击败亚洲人并垄断了世界贸易。	1498—约1800年	欧洲人没有击败亚洲人，仍然依赖于亚洲来获取小部分有利可图的东方贸易：亚非时代的继续。
1550—1660年	欧洲的“军事革命”。	约850—1290年	中国的“军事革命”——其技术要素加强了欧洲军事革命的基础。
1700—1850年	第一次工业奇迹在英国发生。	公元前600—公元1100年	中国的工业奇迹，对中国技术和思想的吸收促进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1700—1850年	英国工业化是内部的或自生变革的成功。	1700—1850年	“非欧洲世界”（特别是非洲）为英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后者对其诸多资源的攫取和剥削。
1853年	海军准将佩里“打开”了封闭的德川幕府日本的国门：明治时期的日本是模仿西方的“后发”工业化。	1603—1868年	德川统治时期日本与全球经济保持着密切联系。德川时代日本的自主发展为后来明治时期的工业化提供了平台（日本是“先发国家”）。
19世纪20年代	英国扭转了对中国的贸易赤字。	19世纪20年代	英国只是通过向中国推销鸦片才扭转了贸易赤字。
1839—1858年	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以武力打开并挽救了中国落后的经济。	约850—1911年	中国保持对世界贸易的开放，并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与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不同，诸如罗伯茨和兰德斯这样明确的欧洲中心论者认为，他们仅仅诉诸于一种“经验主义的事实”。罗伯茨声称，“如果我们仅仅谈论事实……而不谈基于事实之上的价值，那么把欧洲放在近代（即1500年后）历史的中心就是相当正确的了”。[22]毫无疑问，戴维·兰德斯将会对我不同的世界历史观不屑一顾，犹如他对贡德·弗兰克观点的评价那样，是“糟糕的历史”或“恐欧症”，[23]或者甚至是“西方主义者”。在这一特定背景下，杜波依斯的看法颇为辛辣：“我们必须弄清楚那些完全漠视我们的希望、渴望和信念的事实，我们所了解的应该是世界上实际发生的事情。”[24]因为正如我在本书中所指出的——有意或无意地——欧洲中心主义不是依据“科学的客观事实”来挑选相关的事实，而是仅仅挑选世界历史中那些选择西方而排除东方发展史的事实。

因此，只有当我们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我们才能够勾勒一幅包罗广泛、感情移入、更加全面的世界历史画卷。移情不应该被视为是“痴心妄想”（戴维·兰德斯可能会反驳）。移情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它使我们能够跨越欧洲中心主义歪曲和有选择性的偏见，这些偏见错误地将我们引向忽视东方或将东方边缘化。因此，移情作用的历史研究使我们能够纠正乔治·詹姆斯所称的东方“偷来的遗产”，[25]从而恢复东方人的开拓性和积极的施动者的地位。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希望这样，而是因为正如本书所阐明的事实，即东方国家无疑是众多“有历史的民族”，他们为促进现代资本主义的实现，在很多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和牺牲。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了这些，我们才能够为东方化西方的崛起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鉴于所有这些观点，对亨利·雷诺兹（一个著名的呼吁原住民族和解的澳大利亚代言人）在其《黑人先驱者》一书中的话进行释读非常有意义：

> 也许写一本关于亚非先驱者的书最强烈的理由是，他们对西方的发展实际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却从来没有得到公正的或完全的认同。似乎西方开拓者的神话……已经成了（西方身份和关于西方崛

> 起的西方理论）发展的核心，以致没有为东方先驱者留下任何空间。如果把他们包括在内，就会使故事变得复杂化，会削弱白人的英雄主义，使其荣耀失去光泽。如果“非白种民族”展示出与白种人同样的或甚至更为优越的技能和品质，那么将会有损西方先驱者的声誉，甚至会对其卓越的才智提出质疑。进一步的探究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主要应归功于无名的“黑孩子”，后者引导并向西方展示了发展的绝妙之处。[26]

事实上，本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进行这样的“进一步探究”，探究的结果表明：那些至今默默无闻的东方民族，在公元500年后开创了全球资本主义，同时推动了西方的发展。

最后，将已故的爱德华·萨义德2003年在其《东方主义》再版序言中的一些话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

> 我们无需关注人为的文明冲突，而需关注不同文化间的慢慢融合。这些文化是重叠的、交融的和共存的。……但是这种远见需要时间、耐心和带着疑问的探索，这种探索的背后是彼此间的信任，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这使得人们很难保持这种信任。[27]

本书只是试图提供这样一种分析。而且我完全支持萨义德呼吁进一步展开移情分析的倡议，反对那种常常依据种族主义政治而塑造的东西方两极分裂，这是全球人类最起码的需求。重新审视全球共同的历史，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参考书目

Notes to ch. 1

[1]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I(London: Vintage, 1991).

[2] Ibid.; Samir Amin, *Eurocentrism*(London: Zed Books, 1989); 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James M. Blaut, *The Colonlzer's Model of the World*(London: Guilford Press, 1993); Bryan S. Turner, *Orientalism, Postmodernism and Globalism*(London: Routledge, 1993); Jack Goody, *The East in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Andre Gunder Frank , *ReOri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Clive Pouting, *World History*(London: Chatto & Windus, 2000). See also the earlier works of Marshall G.S.Hodgson, *The Venture of Islam*, 3 vol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4); Eric R.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3] Davi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London: Little, Brown, 1998).

[4] John M. Roberts, *The Triumph of the west* (London: BBC Books, 1985).

[5]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Millennium* (London: Black Swan, 1996), p. 8.

[6] W. E. B. Du Bois, *Afric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1946]), p. vii.

[7] Marshall. S. Hodgson, *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3.

[8] Edward W.Said,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1991[1978]); Victor G.Kiernan, *The Lords of Manki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1969]); Hdgson, *Venture*, I; Bryan S. Turner, *Marx and the End of Oriental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78).

[9] Wolf, *EuroPe*, p. 5.

[10] E. g. Joseph R. Strayer and Hans W. Gatzke, *The Malnstream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lch, 1979); David S.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11] Ruth Benedict, *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 (New York: Modern Age Books, 1940), pp. 25–26.

[12] Du Bois, *Africa*, p. 148.

[13] See especially James M. Blaut, *Eight Eurocentric Historians* (London: Guilford Press, 2000).

[14] Karl Marx in Shlomo Avineri, *Karl Marx o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zation* (New York: Anchor, 1969), pp. 184, 343; see also BrendanO'Leary,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1989), p. 69.

[15] Karl Marx, 'Chinese Affairs' (1862), in Avineri, *Marx*, pp. 442–444.

[16] E.g. Karl Marx, '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1853), in Avineri, *Marx* pp. 132–133; Karl Marx, *Surveys from Exile* (London: Pelican, 1973), p. 320.

[17]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5), p. 84.

[18] Karl Marx, *CaPital*, Ⅲ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9), pp. 791, 333–334; Marx, *Capital*, I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4),pp. 140, 316, 337–339.

[19] Marx, *Capital*, I, p. 338, my emphasis.

[20] Karl Marx, *Capital*, Ⅲ, p. 726.

[21] Karl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22] Karl Marx, *Grundrisse* (New York: Vintage, 1973), p. 110.

[23] Karl Marx, *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65).

[24] Georg W. F.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6).

[25] Teshale Tibebu, 'On the Question of Feudalism, Absolutism, and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Review* 13 (l) (1990), 83–85.

[26] Randall Collins, *Weberian Sociolog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3, my emphasis.

[27] See especially Weber's *The Religion of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1); *The Religion of India* (New York: Don Martindale, 1958);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Transaction Books, 1981);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8).

[28] E. g.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1985).

[29] E. g.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4); Giovanni Arrighi, 'The World according to Andre Gunder Frank', *Review* 22(3)(1999), 348–353;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London: Vintage, 1998).

[30]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Ⅱ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 1192–1193.

[31] Blaut, *Colonizer's Model*, ch. 2.

[32] Ibid., p. 5.

[33] Landes, *Wealth*, ch. 29.

[34] Ibid., p. xxi.

[35] Lynn White cited in Blaut, *Eight Eurocentric Historians*, p. 39(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36] Blaut, *Colonizer's Model*, pp. 115–119.

[37] Immanuel Wallerstein, 'Frank Proves the European Miracle', *Review* 22(3)(1999), 356–357.

Notes to ch. 2

[1]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I(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6–10.

[2] 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Verso, 1979), pp. 548–549.

[3] E. g.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Cambridge: Polity, 1999).

[4] 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8.

[5] Charles Tilly, *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4), p. 62.

[6] Jane Schneider, 'Was there a Pre-Capitalist World-System?', *Peasant Studies* 6(1977), 20–29.

[7] Abu-Lughod, *Hegemony*, p. 32.

[8] Robert J. Holt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London: Macmillan, 1998), p. 28, my emphases.

[9] 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460.

[10] 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after Twenty-Five Years', in Stephen K. Sanderson (ed.), *Civilizations and Worlid Systems* (London: Altamira Press, 1995), p. 314.

[11] Jerry H. Bentley *Old World Encount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esp. chs. 1 and 3.

[12] Philip D. Curtin, *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05.

[13] Jack Goody *The East in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86; Nigel Harris, *The Return of Cosmopolitan* Capital(London: I. B. Tauris, 2003), pp. 15–24; Andréwink, *Al-Hind: the Making of the Indo-Isvamic World*, I (Leidenf E. J. Brill, 1990), ch. 2.

[14] McNeill, '*Rise of the West* after TWenty-Five Years', p. 316.

[15] Wink, *Al-Hind*, pp. 35–36.

[16] George F. Hourani,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 (Beirut. Khayats, 1963), pp. 36–38; Wink, *Al-Hind*, pp. 48–55.

[17] This and the next two references are from Maxime Rodinson, *Islam and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Lane, 1974), pp. 14, 16–17, 29 respec-tively.

[18] S. D. Goitein, *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and Institutions* (Leiden: E. J. Brill, 1968), pp. 228–229.

[19] Marshall G. S. Hodgson, *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11–116, 141.

[20] Ibid., p. 133.

[21] Rodinson, *Islam*, p. 56.

[22] Rita R. Di Meglio, 'Arab Trade with Indonesia and the Malay Peninsula from the 8th to the 16th Century', in D. S. Richards (ed.), *Islam and the Trade of Asia* (Oxford: Bruno Cassirer, 1970), p. 126.

[23] Hourani, *Arab Seafaring*, p. 62; Abu-Lughod, *Hegemony*, p. 199; W. E.B. Du Bois, *Afric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 [1946]), pp. 174, 192; Neville Chittick, 'East African Trade with the Orient', in Richards, *Islam*, p. 98.

[24] AI-Mans ū ur and al-Ya'qūbi cited in Hourani, *Arab Seafaring*, p. 64.

[25] Marco Polo citedin Jonathan Bloom and Sheila Blair, *Islam: Empire of Faith* (London: BBC Worldwide, 2001), p. 164; cf. Ibn Battūta, *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 1325–1354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3), p. 101.

[26] Wink, *Al-Hind*, pp. 28, 47.

[27] Abu-Lughod, *Hegemony*, p. 36.

[28] Philip D. Curtin, 'Africa and the Wider Monetary World, 1250–1850', in J. F. Richards (ed.), *Precious Metals in the Later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s* (Durham: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83), pp. 231–238.

[29] Ibn Battūta cited in Du Bois, *Africa*, p. 191.

[30] John Middleton, *The World of the Swahili*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1] Du Bois, *Africa*, ch. 10; Eric R.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p. 37–44.

[32] K. P. Moseley, 'Caravel and Caravan: West Africa and the World-Economies, ca. 900–1900 AD', *Review* 15(3)(1992) 527; E. W Bovill, *Caravans of the Old Sahar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esp. chs. 5–6.

[33] Du Bois, *Africa*, ch. 7; Roland Oliver, *The African Expenierce* (London: Phoenix, 1999), chs. 6, 11.

[34] Wink, *Al-Hind*, p. 61.

[35] Jerry H. Bentley,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1 (3)(1996), 764.

[36] O. W. Wolters, *Early Indonesian Commer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37] Wink, *Al-Hind*, pp. 351–355.

[38] Ibid., pp. 86–104.

[39] See S. D. Goitein, *Jews and Arab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4).

[40] Eric L. Jones, *Growth Recurri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ch. 3.

[41] Fernand Braudel,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London: Penguin, 1995), p.71.

[42] Bloom and Blair, *Islam*, pp.110–111.

[43] S.D.Goitein, 'The Main Industries of the Mediterranean Area as Reflected in the Records of the Cairo Geniza',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4(2)(1961), 168–197.

[44] Jones, *Growth Recurring*, p.67.

[45] Felipe Fernandez-Armesto, *Civilizations* (London: Pan Books, 2001), pp.120–131.

[46] Abu-Lughod, *Hegemony*, p.159.

[47] Matthew Paris cited in Michael Edwardes, *East-West Passage* (New York: Taplinger, 1971), p.70.

[48] J.B.Friedmann, *The Monstrous Races in Medieval Art and Though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49] Abu-Lughod, *Hegemony*, p.149.

Notes to ch.3

[1] Tsun Ko, 'The Development of Metal Technology in Ancient China', in Cheng-Yih Chen (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ese Civilisation*(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1987), pp.229–238.

[2] Robert Hartwell, 'Markets, Technolog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Chinese Iron and Steel Indus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6(1966), 29–58.

[3] Donald Wagner, *Iron and Steel in Ancient China* (Leiden: E.J.Brill, 1993), p.407 and pp. 69–71.

[4] Jacques Gerne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69.

[5] Joseph Needham, Wang Ling and Lu Gwei-Dje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Ⅳ(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300–306, 344–365.

[6] Peter J.Golas,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13)(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90–197.

[7] Robert Temple, *The Genius of China* (London: Prion Books, 1999), pp.119–120.

[8] Ibid., p.119.

[9] William H.McNeill, *The Pursuit of Power* (Oxford: Blackwell, 1982), p.29.

[10] Ibid, p.30.

[11] Eric L.Jones, *Growth Recurri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pp.77, 81.

[12] R.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90.

[13] Albert Feuerwerker,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13(1984), 300.

[14] Yoshinobu Shiba, 'Urb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s in the Lower Yangtze Valley', in John W.Haeger(ed.),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 (Tusc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5), p.43.

[15] Donald F. Lach and Edwin J. Van Kley,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Ⅲ(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606–1607.

[16] Shiba, 'Urbanization', pp.20–23.

[17] Francesca Bray,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Ⅵ(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565.

[18] Temple, *Genius*, p.20.

[19] 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aris: OECD, 1998) p.31.

[20] Brap,*Science*, VI(2), pp.286–288.

[21] Ibid., p.600.

[22] Cited in Lach and Kley, *Asia*, p.1614.

[23] Gang Deng, *Chinese Mantime Activitie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c.2100 BC–1900 A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7), pp.68–69.

[24] Temple, *Genius*, p.186.

[25] Gernet, *Histoty*, p.311; Joseph Needham, Ho Ping Yü, Lu Gwei-Djen and Wang Ling,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7)(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ty Press, 1986), pp. 111–117.

[26] Needham *et al., Science*, V(7), pp.161–210.

[27] Ibid., pp.486–495.

[28] Temple, *Genius*, p.240; Needham *et al., Science*, V(7), pp.495–505.

[29] L.Carrington Goodrich and Fêng Chia-Shêng,'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Firearms in China', in Nathan Siv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East Asia* (New York: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 1977), pp.128–139; Wang Ling, 'On the Invention and Use of Gunpowder and Firearms in Chlna', in Sivin, *Science*, pp.140–158.

[30] Needham *et al., Science*, V(7), p.264.

[31] Deng, *Chinese Martime Activities*, p.70.

[32] Needham *et al, Science*, IV(3), pp.689–695.

[33] Temple, *Genius*, p.248.

[34] Frederic C.Lane,'The Economic Meaning of the Invention of the Compas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w 68*(1963), 151–152.

[35] Irfan Habib,'The Technology and Economy of Mughal Indla',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17(1)(1980), 26–28;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I(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p.243.

[36] See especially 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Verso, 1979), pp. 541–546; Alan K.Smith, *Creating a World Economy* (Boulde: Westview Press, 1991), pp. 27–29; David S.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London: Little, Brown, 1998), pp.55–59.

[37] Takeshi Hamashita,'The Tribute Trade System and Modern Asia', in A.J.H.Latham and Heita Kawakatsu(eds.),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Asian Economy*(London: Routledge, 1994); Dennis O.Flynn and Arturo Giraldez,'China and the Manila Galleons', in Latham and Kawakatsu,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pp.71–90;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111–117.

[38] Landes, *Wealth*, p.96.

[39] Ibid., p.98.

[40] Witold Rodzinski, *A History of China*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79), p.197.

[41] Hamashita,'Tribute', p.92.

[42] See especially Gang Deng, 'The Foreign Staple Trade of China in the Pre-Modern Era', *l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9(2)(1997), p.256.

[43]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I(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5.

[44] Frank, *ReOrient*, p.114.

[45] Philip D.Curtin, *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lversity Press, 1984), p.169.

[46] Peter W.Klein, 'The China Seas and the World Economy between the Six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the Changing Structures of Trade', in Carl-Ludwig Holtfrerich(ed.), *Iuteractions in the World Economy*(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71, 73–86.

[47] Lach and Kley, *Asia*, p.1618.

[48] E.g.Jakob C.Van Leur,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The Hague: W.van Hoeve, 1955)

[49] Deng, *Chinese Maritime Activities*, p.108.

[50] P.J.Marshal, 'Private British Trade in the Indian Ocean Before 1800', in Ashin Das Gupta and M.N.Pearson(eds.), *India and the Indian Ocean 1500–1800*(Calcutt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97.

[51] Han-sheng Chuan, 'The Inflow of American silver into China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mid-Ch'ing Period',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a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1969), 61–75.

[52]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65), p.238.

[53] Clive Ponting, *World Histor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2000), p.520.

[54] 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Frank, *ReOrient*, ch.3.

[55] Flynn and Giraldez, 'China', p.75.

[56]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73.

[57] Gernet, *History* p. 420.

[58] Yongjin Zhang, 'System, 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ichael CoX, Ken Booth and Tim Dunne (eds.), *Empires, Systems and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43–63.

[59] Joseph Fletcher, 'China and Central Asia, 1368–1884',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08–209.

[60]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p. 89.

[61] Louise E.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London: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p. 20.

[62] Felipe Fernandez-Armesto, *Millennium* (London: Black Swan, 1996),pp. 129, 134.

[63]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I(London: Collins, 1981), p. 377.

[64] Wang Shixin, 'Commodity Circulation and Merchant Capital', in Xu Dixin and Wu Chengming (eds.), *Chinese Capitalism*, 1522–1840(London. Macmillan, 2000), pp. 46–64.

[65] 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 pp. 62–63.

[66] Fang Xing, 'The Role of Embryonic Capitalism in China', in Dixin and Chengming, *Chinese Capitalism*, p. 418.

[67] Golas, *Science*, V (13), pp. 169–170.

[68] Wang Shixin, 'The Iron Industry of Foshan, Guangdong', in Dixin and Chengming (eds.), *Chinese Capitalism*, pp. 93–110.

[69] Robert Marks, *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70] E.g. Susan Naquin and Evelyn Rawski,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71] Gernet, *History*, pp. 483–489.

[72] Gang Deng, *Development versus Stagnation*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3), pp. 156, 171–172.

[73] Jones, *Growth Recurring*, chs. 3–4.

[74]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esp. chs. 11–12.

[75] See the summary discussion in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Notes to ch. 4

[1] Paul A. Bairoch, 'The Main Trends in Nat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P A. Bairoch and M. L vyLeboyer (eds.), *Dispar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1), p. 7.

[2] Angus Maddison,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Paris: OECD, 1995), pp. 30, 182–190.

[3] Angus Maddison, 'A Comparison of Levels of GDP per capita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1700–198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3 (1)(1983), 29–30; Maddison, *Monitoring*, pp. 23–24; David S.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4.

[4] Bairoch, 'Main Trends', pp. 7, 12, 14.

[5] Maddison, 'Comparison', 29.

[6] Ibid., 32.

[7] Paul A. Bairoch, *Economics and World Histor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05–106.

[8] Paul A. Bairoch,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j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1 (2) (1982), 269–333.

[9]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Princeto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6–41.

[10] Süleyman Özmucur and Sevket Pamuk, 'Real Wag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in the Ottoman Empire, 1489–191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2 (2)(2002), 293–321.

[11] James Z. Lee and Wang Feng, *One Quarter of Humanity*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 3.

[12] Susan B. Hanley, 'A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in Nineteenth Century Japan: Fact or Fantas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3 (1)(1983),183–192.

[13]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 127.

[14] Om Prakash,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in the Trade of the Indian Ocean', in Ashin Das Gupta and M. N. Pearson (eds.), *India and the Indian Ocean 1500–1800* (Calcutt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86–187.

[15] E.g. Charles P. Kindleberger, 'Spenders and Hoarders', in C. P Kindleberger (ed.), *Historical Econo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35–85.

[16] Najaf Haider, 'Precious Metal Flows and Currency Circulation in the Mughal Empir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39 (3)(1996), 298–367; Frank, ReOrient, pp. 151–164.

[17] E.g. W H. Moreland, *From Akbar to Aurangzeb* (London: Macmillan, 1923); Tapan Raychaudhuri, 'The Mughal Empire', in Tapan Raychaudhuri and Irfan Habib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72–173.

[18] H. Fukazawa, 'Maharashtra and the Deccan: A Note', in Raychaudhuri and Habib,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p. 202.

[19] B. R. Grover, 'An Integrated Pattern of Commercial Life in Rural Society of North India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in S. Subrahmanyam (ed.), *Money and the Market in India* 1100–1700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38–239.

[20] Muzafar Alam, 'Trade, State Policy and Regional Change: Aspects of Mughal-Uzbeck Commercial Relations, c. 1550–1750',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j the Orient* 37(3) (1994), 215–218, 225–226.

[21] H. W. Van Santen, 'Trade between Mughal India and the Middle East, and Mughal Monetary Policy c. 1600–1660', in Karl R. Haellquist(ed.), *Asian Trade Routes* (London: Curzon Press, 1991), pp. 94–95.

[22] Ashin Das Gupta, *The World of the Indian Ocean Merchant*, 1500–1800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24.

[23] Irfan Habib, 'Banking in Mughal India', in Tapan Raychaudhuri (ed.), *Contributions to Indian Economic History*, I (Calcutta: Firma K. L. Mukhopadhyay, 1960), esp. pp. 10–12.

[24] Van Santen, 'Trade', p. 92.

[25] Das Gupta, *World*, p. 73.

[26] Moreland, *From Akbar*.

[27] E.g. Jakob Van Leur,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The Hague: W. van Hoeve, 1955).

[28] Das Gupta, *World*, pp. 66, 92.

[29] Ibid., ch. 3.

[30] Irfan Habib, 'Merchant Communities in Pre-Colonial India', in James D. Tracy (ed.),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84.

[31] Jack Goody, *The East in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28.

[32] Das Gupta, *World*, pp. 122–133.

[33] Frank, *ReOrient*, pp. 84–92.

[34] Grover, 'Integrated Pattern', pp. 219–255.

[35] Habib, 'Merchant Communities', pp. 376–377.

[36]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II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509.

[37] Arnold Pacey, *The Maze of Ingenuity* (London: Allen Lane, 1974), pp. 187–188.

[38] Arun Das Gupta, 'The Maritime Trade of Indonesia: 1500–1800', in Om Prakash (ed.), *European Commercial Expansion in Early Modern Asia* (Aldershot: Variorum, 1997), pp. 240–250.

[39]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I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2, 15.

[40] M. A. P Meilink-Roelofsz, 'Trade and Islam in the Malay-Indonesian Archipelago Prior to the Arrival of the Europeans', in D. S. Richards (ed.), *Islam and the Trade of Asia* (Oxford: Bruno Cassirer, 1970), p. 153.

[41] K. N.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s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86–187.

[42]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II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

[43] E.g. John M. Roberts, *The Triumph of the West* (London: BBC Books, 1985), ch. 1.

[44] R. N. Bellah, Tokugawa Relig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David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London: Little, Brown,1998), ch. 23.

[45] Walt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46] Eric L. Jones,Growth Recurring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 p. 153;Christopher Howe, *The Origins of Japanese Trade Supremacy* (Bathurst,New South Wales: Crawford House Publishing,1996), p.49.

[47] J.I.Nakamura and M. Miyamoto, 'Social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Chang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kugawa Japan and Ch'ing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0(2)(1982), 263–265.

[48] Susan Hanley and Kozo Yamamura,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hange in Pre-Industrial Japan*,1600–186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chs. 5–7.

[49] Hanley and Yamamura,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hange*, pp. 69–78.

[50] Thomas C.Smith, *The Agraria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ch. 7.

[51] Norbert Elias, *The Court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1983).

[52] Shinzaburō Ōishi, 'The Bakuhan System',in Chie Nakane and Shinzaburō Ōishi(eds.), *Tokugawa Japan* (Tokyo: Tokyo University Press, 1990),pp. 11–36.

[53] 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 p.35.

[54] Johann P. Arnason, *Social Theory and Japanese Experience* (London: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7), p.257.

[55] Jones, Growth Recurring, pp.152–167.

[56] E.S.Crawcour, 'The Development of a Credit System in Seventeenth-Century Japa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3)(1961), 347, 353–354.

[57] Ronald P. Toby, 'Both a Borrower and a Lender Be: from Village Moneylender to Rural Banker in the Tempō Era', in Michael Smitka (ed.), *The Japanese Economy in the Tokugawa Era 1600-1868* (New York: Garland, 1998), pp. 325–354.

[58] Ulrike Schaede, 'Forwards and Futures in Tokugawa-Period Japan: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Dōjima Rice Maket',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3(1989), 487–513.

[59] Hanley and Yamamura,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hange*, p. 80.

[60] David L. Howell, 'Proto-Industrial Origins of Japanese Capitalism',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2)(1992), 269–286.

[61] Oishi, 'Bakuhan System', pp. 26–28.

[62] Frank, *ReOrient*, p. 106.

[63] Dennis O. Flynn, 'Comparing the Tokugawa Shogunate with Hapsburg Spain: Two Silver-based Empires in a Global Setting', in James D. Tracy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hant Empi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54.

[64] Satoshi Ikeda, 'The History of the Capitalist World-System vs. the History of East-Southeast Asia', *Review* 19(1)(1996), 55, my emphasis.

[65] Ikeda, 'History', 55–57.

[66] Maddison, *Monitoring*, pp 182–190.

[67] Ikeda, 'History', 61.

[68] Norman Jacobs,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and Eastern Asia*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58), ch. 10.

Notes to ch.5

[1] Carlo Cipolla,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Routledge,1993), p.138.

[2] Lynn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62), p. 52.

[3] Haudricourt cited in Joseph Needham and Wang Ling,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IV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 p. 317.

[4] James Burke, *Connec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78), p.63; Hugh Thomas, *An Unfinished History of the World* (London: Papermac, 1995),p. 90; Clive Ponting, *World Histor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2000),p. 371.

[5] Joseph Needham in Mansel Davies, *A Selection from the Writings of Joseph Needham* (Lewes, Sussex: The Book Guild,1990), p. 148.

[6] Needham and Ling, *Science*, IV(2), p. 313.

[7] Ibid., pp.319–328.

[8]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ch.1; Marc Bloch, *Feudal Society*, I(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53.

[9] Joseph Needham, Ho Ping-Yü, Lu Gwei-Djen and Wang Ling,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p.17.

[10] E. M. Jope, 'Vehicles and Harness', in Charles Singer, E. J. Holmyard, A. R. Hall and T. I. Williams (eds.),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6), pp.556–557;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pp. 14–20.

[11] Ahmad Y. al-Hassan and Donald R. Hill, *Islamic Tech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95–120.

[12] 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Chicage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485.

[13] 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Verso, 1979).

[14]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Blackwell,1994); Hendrik Spruyt, *The Sovereign State and its Competito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15] Maxime Rodinson, 'The Western Image and Western Studies of Islam', in Joseph Schacht and C. E. Bosworth (eds.), *The Legacy of Isla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9.

[16] See especially R. W. Southern, *Western Views on Islam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Rana Kabbani, *Europe 's Myth of the Orie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6), ch.1.

[17]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1991 [1978]), p.68.

[18] Philip K. Hitti, *History of the Arabs* (London:Macmillan,1937),pp.114,459,586,613.

[19] Kabbani,*Europe 's Myth*,p.5.

[20] Said, *Orientalism*, p.74.

[21]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I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31), p.801.

[22] Bernard Lewis, *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London: Phoenix, 1994), pp.19–20; also McNeill, Rise, p.469.

[23] Bloch, *Feudal Society*, I, p.3.

[24] Ibid.

[25] Maxime Rodinson, *Europe and the Mystique of Islam* (London: I. B. Tauris,1987),p.7.

[26] Jonathan Riley-Smith, *The First Crusade and the Idea of Crusading* (London: Athlone Press, 1986),especially ch.1.

[27] V. Y. Mudimbe,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p.57.

[28] Robert J. Holt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London: Macmillan,1998),p.32.

[29] Georges Duby, *The Three Orders: Feudal Society Imagined*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30] Marc Bloch, *Feudal Society*, II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1),pp.412–420.

[31] Gerd Tellenbach,Church, *State and Christian Society at the Time of the Investiture Conflict* (Oxford: Blackwell, 1959), p.39.

[32]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I(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81ff.

[33] Thomas H. Greer and Gavin Lewis, *A Brief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2), p. 45; cf. Gerard Delanty,Inventing Europe(London: Macmillan, 1995), p. 26.

Notes to ch.6

[1] Armando Sapori cited in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Ⅲ(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91.

[2] E. g. Charles Kindleberger, *World Economic Primacy*, 1500–1990(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3] Braudel, *Civilization*, Ⅲ,p.94.

[4] Adam Smith, *TI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1937[1776]), p. 13.

[5] 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08; André Wink, *Al-Hind: the Making of the Indo-Islamic World*, I (Leiden: E. J. Brill, 1995), PP. 35–38.

[6] Braudel, *Civilization*, Ⅲ, pp. 128, 132.

[7] Ibid., pp. 129–130; Douglass North and Robert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53.

[8] M. J. Kister,'Mecca and Tamim',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8 (1965), 117ff.

[9] Jack Goody *The East in the Wh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8.

[10] Abraham L. Udovitch,'Commercial Techniques in Early Medieval Islamic Trade', in D. S. Richards (ed.), *Islam and the Trade of Asia* (Oxford; Bruno Cassirer, 1970), p. 48.

[11] Abraham L. Udovitch, *Partnership and Profit in Medieval Isla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78; S. D. 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PP. 362–367.

[12] Abu-Lughod, *Hegemony*, p. 216.

[13] Goitein, *Mediterranean Society*, I, pp. 197–199; Udovitch,'Commercial Techniques', pp. 61–62.

[14] Abu-Lughod, *Hegemony*, p. 223.

[15] Goody, *East*, p. 79; Abu-Lughod, *Hegemony*, p. 224.

[16]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68–169; Goody, *East*, p. 75.

[17] Goody, *East*, pp. 68, 72.

[18] Emile Savage-Smith,'Celestial Mapping', in J. Brian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eds.), *History of Cartography*, Ⅱ (1)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2–70; Paul Kunitzsch, *The Arabs and the Stars* (Northampton; Variorum, 1989), chs. 8, 10.

[19] Kunitzsch, *Arabs*, ch. 9.

[20] Joseph Needham, Wang Ling and Lu Gwei-Dje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Ⅳ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pp. 554–584; Hans Breuer, *Columbus was Chinese*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2), pp. 83–102.

[21] George F. Hourani,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 (Beirut: Khayats, 1963), pp. 108–109.

[22] Lionel Casson, *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43–245 and figs. 181, 182.

[23] Jules Sottas, 'An Early Lateen Sail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Mariner's Mirror 25* (1939), 229–230.

[24] The ensuing discussion is from Lynn White, *Medieval Religion and Techn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 255–260.

[25] H. H. Brindley 'Early Pictures of Lateen Sails', *The Mariner's Mirror* 12 (1) (1926), 9–10.

[26] Richard LeBaron Bowen, *Arab Dhows of Eastern Arabia* (Rehoboth,Mass.: privately published, 1949), p. 7, n. 9.

[27] Brindley, 'Early Pictures', 9.

[28] Needham *et al., Science*, IV (3), p. 609, n. g.

[29] Cecil Torr, *Ancient Ship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5), pp. 86–91.

[30] Ibn-Shahriy in Hourani, *Arab Seajaring*, p.100.

[31] Gerald R. Tibbetts, *Arab Navig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Portuguese*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71), p. 49.

[32] Needham *et al., Science*, IV (3), pp. 635–654.

[33] Gavin Menzies, *1421* (London: Bantam Press, 2002), p. 43.

[34] Carlo Cipolla,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1993), p. 210.

[35] Arnold Pacey, *Technology in World Civilization* (Cambridge, Mass.:MIT Press, 1991), p. 43.

[36] Ahmad Y. al-Hassan and Donald R. Hill, *Islamic Tech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53.

[37] Jonathan Bloom and Sheila Blair, *Islam: Empire of Faith* (London: BBC Worldwide, 2001), pp. 104–105.

[38] Hugh Thomas, *An Unfinished History of the World* (London: Paper-mac, 1995), pp. 92–93.

[39] Joseph Needham and Wang Ling,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IV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556–557.

[40] R. J. Forbes, 'Power', in Charles Singer, E. J. Holmyard, A. R. Hall and T. I. Williams (eds.),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6), pp. 614–617.

[41] Dieter Kuh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 (9)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419–433.

[42] Hugh Honour, *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 (London. John Mur-ray, 1961), p. 35.

[43] Robert Temple, *The Genius of China* (London: Prion Books, 1999), P.120.

[44] Pacey, *Technology*, pp. 103–107; Temple, *Genius*, pp. 120–121.

[45] Kuhn, *Science*, V (9), pp. 428–433.

[46] Thomas F.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55), ch. 13.

[47] Jacques Gerne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88.

[48] Al-Qazwini cited in al-Hassan and Hill, *Islamic Technology*, p. 191.

[49] Tsien Tsuen-Hsui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97.

[50] Carter, *Invention*, ch. l3; Tsuen-Hsuin, *Science*, V (1), pp. 296–299.

[51] Al-Hassan and Hill, *Islamic Technology*, p. 192.

[52]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I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240.

[53] Braudel, *Civilization*, I, p. 376.

[54] Davi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London: Little, Brown, 1998), p. 49.

[55] Ibid., p. 48.

[56] Needham and Ling, *Science*, IV (2), p. 464, and pp. 446–463; cf. Gernet, *History*, P.341.

[57] D. S. L. Cardwell, *Technology, Science and History* (London:Heine-mann, 1972), p. 14.

[58] Clive Ponting, *World Histor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2000), p. 371.

[59] Donald R. Hill, *Studies in Medieval Technology* (Aldershot:Ashgate,1998), ch. 13, p. 15.

[60] White, *Medieval Religion*, pp. 52–54.

[61] Needham and Ling, *Science*, IV (2), pp. 543–544.

[62] Bloom and Blair, *Islam*, pp. 106–107.

[63] Michael Edwardes, *East-West Passage* (New York: Taplinger, 1971),p. 85.

[64] Needham *et al., Science,* IV (3), p. 177.

Notes to ch. 7

[1] J.M. Roberts, *The Triumph of the West* (London: BBC, 1985), pp.175,184, 186, 188, 194.

[2] Ibid., p. 201.

[3] Michael Edwardes, *East-West Passage* (New York: Taplinger, 1971),p. 135.

[4] Brandon H. Beck, *From the Rising of the Sun* (New York:Peter Lang, 1987), P. 17.

[5] Pope Pius II cited in Robert Schwoebel, *The Shadow of the Crescent* (Nieuwkoop: B. De Graaf, 1967), P. 71.

[6] Charles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London: Hutchinson, 1969), p. 21

[7] Ibid., pp. 22–23.

[8] M. N. Pearso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8.

[9] See the discussion in Gerald R. Tibbetts, *Arab Navig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Portuguese*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71), pp. 206–208.

[10] 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9; and pp. 209, 258, 363.

[11] Joseph Needham, Wang Ling and Lu Gwei-Dje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IV(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501–502; cf. Gavin Menzies, 1421 (London: Bantam, 2002), esp. ch. 4.

[12] Colin Ronan(ed), *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Il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 3.

[13] Diogo do Couto cited in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I(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6.

[14] André Wink, Al-Hind: *the Making of the Indo-Islamic World*, I(Leiden: E. J. Brill, 1995), pp. 27–28.

[15] Pearson, *New Cambridge History*,p.11.

[16] Joseph Needham in Mansel Davies, *A Selection from the Writings of Joseph Needham* (Lewes, Sussex: The Book Guild, 1990), P. 176.

[17] Joseph Desomogyi, *A Short History of Oriental Trade* (Hildesheim: Georg Olms Verlagsbuchhandlung, 1968), p. 83.

[18] Michael Adas, *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41–45; Jack Goody,*The East in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11.

[19] This and the next two paragraphs draw from Patricia Seed, *Ceremonies of Possession in Europe's Conquest of the New World, 1492–164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07–128.

[20] Martin Elbl, 'The Caravel', in Robert Gardiner(ed.), *Cogs, Caravels and Galleons* (London: Brasseys, 1994), p. 91.

[21] G. S. L. Clowes, 'Ships of Early Explorers', *Geographical Journal 69*(1927), 216; Needham et al., Science, IV(3), pt. 29.

[22] Pedro Nunes cited in Seed, *Ceremonies*, p. 126.

[23] Tibbetts, *Arab Navigation*, pp. 9–11.

[24] Cited in E. G. Ravenstein(ed.),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1499* (London: Bedford Press, 1899), p. 87.

[25] Antonio Pigafetta cited in Miriam Estensen, *Discovery* (St Leonards, New South Wales: Allen and Unwin, 1998), pp. 15–16.

[26] Ahmad ibn-Majid cited in Tibbetts, *Arab Navigation*, p. 195.

[27] Ravenstein, *Journal*, p. 163; Needham et al., *Science*, IV (3), pp. 480–482; Menzies, *1421*, p. 38.

[28] Goody, *East*, p. 92.

[29] Menzies, *1421*, p. 43.

[30] Gang Deng, *Chinese Maritime Activitie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c. 2100 BC–1900 AD* (London:Greenwood Press, 1997),pp. 70–71.

[31] Reid, *Southeast Asia*, I, pp. 20–21.

[32] Boxer, *Portuguese*, p. 58.

[33] Jakob Van Leur,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The Hague: W.van Hoeve, 1955), p. 159.

[34] K. N.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s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79.

[35]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II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212–213.

[36] Clive Ponting, *World Histor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2000),p. 525.

[37] M. A. P Meilink-Roelofsz, *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 (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 1962).

[38] Adas, *Machines*, p. 48.

[39] Braudel, *Civilization*, III, p. 468, his emphasis.

[40] P.M. Holt, Ann K. S. Lambton and Bernard Lewis, cited in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P. 118.

[41] Marshall G. S. Hodgson, *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97, 129.

[42] Frederic C. Lane, 'Venetian Shipping during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8 (2) (1933), 228; Niels Steens-gaard, *The 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55–169.

[43] Pearson, *New Cambridge History*, p. 44.

[44] Najaf Haider, 'Precious Metal Flows and Currency Circulation in the Mughal Empir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39(3)(1996),298–367.

[45] Sanjay Subrahmanyam, 'Precious Metal Flows and Prices in Western and Southern Asia, 1500–1750: some Comparative and Conjunctural Aspects', in S. Subrahmanyam(ed.), *Money and the Market in India 1100–1700*(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p. 201, also pp. 197–201.

[46] Calculated from Reid, *Southeast Asia*, I, table 3, p. 27.

[47] Van Leur, *Indonesian Trade*, p. 212, cf. p. 235.

[48] Boxer, *Portuguese*, pp. 59, 61.

[49] Ibid., p. 62.

[50] Pearson, *New Cambridge History*, p. 54.

[51] Philip D. Curtin, *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45.

[52] Ibid., pp. 144–148; see also pp. 159–167 and ch. 8.

[53] Pearson, *New Cambridge History*, p. 55.

[54] Tome Pires, *Suma Oriental* (Glasgow: The University Press, 1944), pp.268–269.

[55] Reid, *Southeast Asia*, I, p. 23.

[56] H. W. Van Santen, 'Trade between Mughal India and the Middle East, and Mughal Monetary Policy,c. 1600–1660', in Karl R. Haellquist(ed.), *Asian Trade Routes* (London: Curzon Press, 1991), p. 89.

[57] Van Santen, 'Trade', p. 90.

[58] Eric R.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p. 234.

[59] M. N. Pearson, 'India and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Ashin Das Gupta and M. N. Pearson(eds.), *India and the Indian Ocean 1500–1800* (Calcutt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78.

[60] Braudel, *Civilization*, Ill, p. 489.

[61] R. J. Marshall, 'Private British Trade in the Indian Ocean before 1800', in Das Gupta and Pearson, *India*, pp. 280, 283, 287, 292–293.

[62] Om Prakash,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in the Trade of the Indian Ocean',in J. F. Richards(ed.), *Precious Metals in the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s* (Durham: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83), pp. 189–190.

[63] Frank, *ReOrient*, pp. 74–75.

[64] Wolf, *Europe*, p. 240.

[65] Ponting, *World History*, p. 525.

[66] Suleyman cited in Jonathan Bloom and Sheila Blair, *Islam: Empire of Faith* (London:BBC Books, 2001), p. 158.

Notes to ch. 8

[1] See also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318–319, 334.

[2] Columbus cited in Marc Ferro, *Colonization: A Global History* (London:Routledge, 1997), p. 5.

[3] Tzvetan Todorov,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4), p. 10, and pp. 11–13.

[4] See David Abernethy, *The 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84.

[5] Edmundo O'Gorman, *The Invention of Ame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1), esp. pt 3; also Todorov, *Conquest*, pp. 14–33.

[6] Las Casas cited in O'Gorman, *Invention*, p. 79.

[7] Cited in Alfred W.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Westport:Greenwood, 1972), p. 11.

[8] Todorov, *Conquest*, p. 17.

[9] Ibid., pp. 46–47.

[10] Richard Slotkin, *Regeneration Through Violence* (Middleton:Weslyan University Press, 1973); Michael Kammen, *People of Paradox* (New York:Alfred A. Knopf, 1972); Reginald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acial Anglo-Saxonism*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1] Richard Drinnon, *Facing West: the Metaphysics of Indian-Hating and Empire-Buildin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0),p. 99.

[12] 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II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11, n. 2.

[13] Patricia Seed, *Ceremonies of Possession in Europe 's Conquest of the New World, 1492–16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70.

[14] Cited in ibid., p. 69.

[15] Jan Nederveen Pieterse, *White on Black*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44.

[16] George M. Frederickson, *Racism: a Short History* (Melbourne: Scribe Publications, 2002), p. 45.

[17] Ibid., p. 29.

[18] Alexander Falconbridge cited in James Walvin, *Black Ivory* (Washing-ton, D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9–50, and pp. 38–58.

[19] 'Dicky Sam', *Liverpool and Slavery* (Liverpool: Scouse Press, 1984 [1884]), P. 34.

[20] Cited in 'Transatlantic Slavery: Against Human Dignity', National Museums and Galleries on Merseyside (Liverpool, 2002), p. 12.

[21] Herbert S. Klein,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50.

[22] Walvin, *Black Ivory* , pp. 250–251.

[23] Peter Fryer, *Black People in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Pluto Press, 1988), pp. 10–11.

[24] 'Transatlantic Slavery', p. 8.

[25] Orlando Patterson, *Slavery and Social Deat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26] John Thornton, *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 14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7] C. L. R.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London: Allison and Busby, 1989[1938]); W.E.B.Du Bois, *Afric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1946]), pp. 60–66.

[28] William Denevan, *The Native Populations of the Americas in 1492*(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2).

[29] Jan Carew, 'Columbus and the Origins of Racism in the Americas: Part One', *Race and Class* 29 (4)(1988), 3.

[30] Davi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London:Little,Brown, 1998), pp. 99–112.

[31] See the special issue of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2 (3) (1992).

[32] Crosby, *Columbian Exchange*, ch. 2.

[33] James M. Blaut, *The Colonizer 's Model of the World* (London: Guilford Press, 1993), pp. 184, and 186.

[34] J. M. Roberts, *The Penguin History of the World* (London. Penguin,1995), P. 641.

[35] Blaut, *Colonizer 's Model*, ch. 4; Frank, *ReOrient*, ch. 2.

[36] Joseph E. Inikori, *African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83–185.

[37] Thierry Hentsch, *Imagining the Middle East* (Montreal, Quebec:Black Rose Books, 1992); Iver Neumann, *Uses of the Oth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38] A. Rupert Hall,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Marie Boas,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1450–1630* (London: Collins, 1962), p. 6. For a good review of the Eurocentric position see Frank, *ReOrient*, pp. 185–193.

[39] Michael Edwardes, *East-West Passage* (New York: Taplinger, 1971),p. 94.

[40] Margaret Wertheim, *Pythagoras ' Trousers* (London: Time Books, 1996), p. 35.

[41] 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602, 609.

[42] Bernard Lewis, *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London: Phoenix,1994), p. 221.

[43] Jacques Gerne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98, 337–347.

[44] Jack Goody, *The East in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34.

[45] Jonathan Bloom and Sheila Blair, *Islam: Empire of Faith* (London: BBC Worldwide, 2001), p. 125.

[46] Wazir Hasan Abdi, 'Glimpses of Mathematics in Medieval India', in A. Rahman (ed.), *History of Ind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D 1000–1800* (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50–94.

[47] Seyyed Nas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Islam*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ch. 5.

[48] Charles Singer, 'Epilogue:East and West in Retrospect', in Charles Singer,E. J. Holmyard, A. R. Hall and T. I. Williams (eds.),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Ⅲ(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6), p.767.

[49] Juan Vernet, 'Mathematics, Astronomy, Optics', in Joseph Schacht and C.E.Bosworth (eds.), *The Legacy of Islam* (Oxford: Clarendon, 1974), p.477.

[50] E. S. Kennedy, *Studies in the Islamic Exact Sciences* (Beirut: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1983), p.41.

[51] Joseph Needham and Wang Ling,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Ⅲ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109.

[52] Bloom and Blair, *Islam*, p. 131.

[53] Lewis, *Muslim Discovery*, pp. 128–130.

[54] Joseph Needham, Lu Gwei-Djen and Nathan Sivi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Ⅵ (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24–125.

[55] Philip K.Hitti, *History of the Arabs* (London: Macmillan, 1937), p.367.

[56] Luis Garcia Ballester, M. R. McVaugh and A.Rubio-Vela, *Practical Medicine from Salerno to the Black Dea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3–29.

[57] Needham *et al., Science*, Ⅵ(6).

[58] Swerdlow cited in George Saliba, *A History of Arabic Astronomy*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4), p. 64.

[59] Kennedy, *Studies*, pp. 50–83; Saliba, *History*, pp. 245–305.

[60] N.Swerdlow and O. Neugebauer, *Mathematical Astronomy in Copernicus' De Revolutionibus* (Berlin:Springer, 1984), p. 295.

[61]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I (London: Vintage, 1991), pp. 155–156;Frances Yates,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4), esp. p. 154.

[62] Wertheim, *Pythagoras' Trousers*, p. 81. and pp. 81–91.

[63] Robert Briffault cited in Ziauddin Ahmad, 'Muslim Contribution to Scientific Progress', in Mohammad R. Mirza and Muhammad I. Siddiqi (eds.), *Muslim Contribution to Science* (Lahore: Kazi, 1986), p. 117.

[64] H. Floris Cohe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 8.

[65] Du Bois, *Africa*, ch. 10.

[66] Hitti, *History*, pp. 628–631.

[67] Cheik Anta Diop, *The African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Westport: L. Hill,1974); Bernal, *Black Athena*, pp. 24, 151–155, 434–437.

[68] Du Bois, *Africa*, p. 223.

[69] Boas, *Scientific Renaissance*, pp. 29–30.

[70]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1983).

[71]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I (Cambridg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1985).

[72] Michael Clapham, 'Printing', in Charles Singer, E. J. Holmyard, A. R. Hall and T. I. Williams (eds.),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6), p. 377.

[73] Gernet, *History*, pp. 332–333; Tsien Tsuen-Hsui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46–169; Thomas F.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55), p. 41.

[74] Carter, *Invention*, p. 239.

[75] Tsuen-Hsuin, *Science*, V (1), p. 145.

[76] Donald F. Lach and Edwin J. Van Kley,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III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598.

[77] Ibid., p. 1595.

[78] Gernet, *History*, p. 336.

[79] Landes, *Wealth*, p. 51.

[80] Lach and Kley, *Asia*, p. 1595, n. 209.

[81] Carter, *Invention*, pp. 239–240; Sang-woon Je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Korea* (Cambridge, Mass.: MIT,1974), pp. 173–184; Tsuen-Hsuin, *Science*, V (1), pp. 319–331.

[82] Tsuen-Hsuin, *Science*, V (1), pp. 132–172, 303–313.

[83] Robert Curzon cited in Tsuen-Hsuin, *Science*, V (1), p. 313.

[84] Carter, *Invention*, p. 242.

[85] 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Boston: Beacon Press, 1961), p. 168;also, Clapham, 'printing', pp. 378, 380.

[86] J. M. Roberts, *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7).

[87]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Oxford: Blackwell, 1990); Giddens, *Nation-State*, pp. 103–116, 222–254; Mann, *Sources*, I, chs. 12–15.

[88] Joseph Needham, Ho Ping-Yü, Lu Gwei-Djen and Wang Ling,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p. 49.

[89] Paul Cressey, 'Chinese Traits in European Civilization: a Study in Diffus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0 (5) (1945), 598; Arnold Pacey, *Technology in World Civiliz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1), p. 45.

[90] Needham *et al.*, *Science*, V (7), pp. 47–50, 570–572.

[91] O. F. G. Hogg, *English Artillery 1326–1716* (London: Royal Artillery Institution, 1963), pp. 6–9, 46; William H. McNeill, *The Pursuit of Power* (Oxford: Blackwell, 1982), pp. 81, 84. Pacey, *Technology*, p. 47.

[92] Needham *et al.*, *Science*, V (7), pp. 572–579.

[93] As even Lynn White concedes in his *Medieval Religion and Technology* (Berkeley:

[9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285; see also Ahmad Y. al-Hassan and Donald R. Hill, *Islamic Technolog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06–107; Needham et al., Science,V(7), p. 77.

[95] Al-Hassan and Hill, *Islamic Technology*, p. 108.

[96] Pacey, *Technology*, p. 74.

[97] Ibid., p. 80.

[98] Cf. Needham *et al.*, *Science*, V(7), pp. 455–465; Pacey, *Technology*, p.75.

Notes to ch.9

[1] Phyllis Deane,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eter 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London:Methuen,1983).

[2] R.M.Hartwell,'Was there an Industrial Revolution?',*Social Science History* 14 (1990),575, my emphases.

[3] Walt W.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p.157,my emphases.

[4] 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Verso,1979),pp.419–420.

[5] David S.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London:Little,Brown,1998), p.523.

[6] David S.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p.84;Charles P. Kindleberger,*World Economic Primac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32.

[7] Landes, *Unbound Prometheus*, p.39.

[8] Marshall G.S.Hodgson, *The Venture of Islam*, Ⅲ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74) p.197.

[9] Eric L.Jones, *Growth Recurring*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p.13.

[10] Ibid.,p.28.

[11] Ibid.,p.80.

[12] Cited in Arnold H.Rowbotham,'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4 (1) (1944),227.

[13] This and the next two references are from Adolf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 (Taipei: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1967),pp.77,78 and 79 respectively.

[14] William W.Appleton, *A Cycle of Catha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1),ch. 6;Reichwein,China,pp.113–126;Hugh Honour,*Chinoiserie:the Vision of Cathay* (London: John Murray,1961),pp.44–52,125–174.

[15] Lewis A.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I (San Antonio,Texas:Paul Anderson, 1946),pp.111–123;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I (New York:Vintage,1991),p.172;Francesca

Bray,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I (2)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p.569.

[16] J.J.Clarke, *Oriental Enlightenment* (London:Routledge,1997),p.49.

[17] Kuo Hsiang cited in Colin A.Ronan, *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97.

[18] Reichwein,*China*,pp.101–109.

[19] Basil Guy cited in Clarke, *Oriental Enlightenment*, p.50.

[20] Bernal, *Black Athena*, p.198.

[21] Sir William Temple cited in Michael Edwardes, *East-West Passage* (New York:Taplinger, 1971),p.107.

[22] Oliver Goldsmith cited in Bernal, *Black Athena*, p.198.

[23] The eighth earl of Elgin cited in Ronald Hyam,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London:Batsford,1976),p.37.

[24] Jonathan Spence, *To Change China* (Boston:Little,Brown,1969),p.6.

[25]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15th–18th Century*,I (London:Collins,1981), pp.338–339.

[26] Bernal, *Black Athena*, p.172.

[27] Maverick,*China*, pp.13–14.

[28] Leibniz cited in Bray, *Science*,VI(2), p.569.

[29] Maverick, *China*, pp. 41–59; Bernal, *Black Athena*, p.199.

[30] Bray, *Science*,VI (2), p. 570.

[31] Maverick, *China*; Wolfgang Franke, *China and the West* (Oxford:Blackwell,1967),ch.4.

[32] Donald F. Lach and Edwin J. Van Kley,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III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3),p.1890;see also Clarke,*Oriental Enlightenment*, p. 40.

[33] Bray, *Science* VI(2),p.571.

[34] See ibid.,pp.553–555, 558–559.

[35] Ibid.,pp.581–583.

[36] Robert Temple, *The Genius of China* (London:Prion Books,1999),p.20.

[37] Bray, *Science*, VI(2), pp. 366–375; Joseph Needham and Wang Ling,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IV(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154.

[38] Cited in Bray, *Science*,VI(2), p. 377.

[39] Temple, *Genius*, pp. 23–25.

[40] Ibid.,p.27.

[41] Alvarez Semedo cited in Lach and Kley, *Asia*,p.1595.

[42] Tull's principles and the Chinese formula are reproduced in Bray,*Science*,VI(2),pp.559, 560.

[43] Bray,*Science*,VI(2),p.571.

[44] Ibid.,p.582.

[45] Arnold Pacey, *The Maze of Ingenuity* (London:Allen Lane,1974),p.191.

[46] Bray, *Science*.VI(2),pp.429–433.

[47] Alfred W.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Westport:Greenwood,1972),ch.5; Braudel, Civilization,I,pp.158–171.

[48]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 57–58.

[49] Stuart Piggott, *Ruins in a Land Scape*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76),pp. 115,124.

[50] 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 pp.59–68.

[51] Peter J.Golas,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 (1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85–287.

[52] Robert Hartwell. 'Markets,Technology,and th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venth-Century Chinese Lron and Steel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6 (I)(1996),48.

[53] Golas,*Science*, V (13),pp.186,336.

[54] Needham and Ling, *Science*,IV(2),pp.135–136,225–228,369–370,387,407–408,411.

[55] 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 pp.61–62.

[56] Temple, *Genius*, pp. 65–66; Joseph Needham, Ho Ping-Yü, Lu Gwei-Djen and Wang Ling,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 (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544–568.

[57] Lynn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p. 100.

[58] Deane, *First Industlial Revolution*, p. 129.

[59] Temple, *Genius*, p. 68.

[60] Ibid., p. 49.

[61] Needham in Mansel Davies, *A Selection from the writings of joseph Needbam* (Lewes, Sussex: The Book Guild, 1990), p. 144.

[62] Ahmad Y. al-Hassan and Donald R. Hill, *Islamic Tecb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56–257.

[63] Dharampal, *Ind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Delhi: Impex, 1971), pp. 220–263.

[64] Arnold Pacey, *Technology in World Civiliz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1), p. 81.

[65] Arun Kumar Biswas, 'Mineral and Metals in Medieval India', in A. Rahman (ed.), *History oj Ind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D 1000–1800*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22, nn.78–83.

[66] Braudel, *Civilization*, I, p. 377.

[67] Joel Mokyr, *The Lever of Rich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21.

[68] Dieter Kuh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 (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24.

[69] A. P. Wadsworth and J. Mann, *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 1600–178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31), P. 106.

[70] Pacey, *Technology*, pp. 103–107; Temple, *Genius*, pp. 120–121.

[71] Kuhn, *Science*, V (9), pp. 428–433.

[72] Denis Richards and Anthony Quick, *Britain 1714–1851* (Londont: Longmans, 1961), pp. 132–133.

[73] Davies, *Selection*, p. 151.

[74] Jones, *Growth Recurring*, p. 36.

[75] Pacey, *Maze*, p. 190.

[76] Braudel, *Civilization*, I, pp. 368, 370.

[77] Temple, *Genius*, p. 54.

[78] Joseph Needham, Wang Ling and Lu Gwei-Dje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IV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420–422.

[79] F. T. Evans summarised in Jones, *Growth Recurring*, pp. 18–19.

[80] Richards and Quick, *Britain*, pp. 149–150.

[81] Needham *et al.*, *Science*, IV (3), pp. 300-6, 359; Pacey, *Technology*, p. 6.

[82] Jones, *Growth Recurring*, pp. 26, 27.

Notes to ch. 10

[1] Gerard Delanty, *Inventing Europe* (London: Macmillan, 1995), p. 84.

[2] George M. Frederickson, *Racism: a Short History* (Melbourne: Scribe Publications, 2002); James M. Blaut,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London: Guilford Press, 1993), p. 65.

[3] Thierry Hentsch, *Imagining the Mddle East* (Montreal, Quebec: Black Rose Books, 1992), pp. 112–113.

[4] Samir Amin, *Eurocentrism* (London: Zed Books, 1989), p. 89.

[5] Linda Tuhiwai Smith, *Decolonizing Methodologes* (London: Zed Books, 1999), p. 25.

[6] John R. Mackenzie cited in Smith, *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p. 22.

[7] See Victor G. Kiernan, *Thse Lords of Manki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1969]).

[8] The Edinburgh Review cited in C. Northcote Parkinson, *East and West* (London: John Murray, 1963), p. 196.

[9] Lord Curzon cited in Parkinson, *East*, pp. 221–222.

[10] John Stuart Mill cited in Ronald Hyam, *Britain's Impelial Century*, 1815-1914 (London: Batsford, 1976), p. 55.

[11] Hentsch, *Imagining*, pp. 107ff.

[12]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I (London: Vintage, 1991).

[13] Denys Hay, *Europe: the Emergence of an Ide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1.

[14] John Campbell and Philip Sherrard, 'The Greeks and the West', in Raghavan Iyer (ed.), *The Glass Curtain Between Asia and Europ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71.

[15] Bernal, *Black Athena*, chs. 4–8.

[16] Ali Mazrui, *World Culture and the Black Experienc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4), esp. pp. 38–81.

[17] Blaut, *Colonizer's Model*, pp. 95–102.

[18] Ibid., p. 96.

[19] D. N. Livingstone, 'Climate's Moral Economy: Science, Race and Place in Post-Darwinian British and American Geography', in A. Godlewski and N. Smith (eds.), *Geoglaphy and Empire* (Oxford: Blackwell, 1994).

[20] Philip D. Curtin, *The Image o Afrc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4), pp. 65–66.

[21] Hyam,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p. 37.

[22] Michael Edwardes, *East-West Passage* (New York: Taplinger, 1971), p. 109.

[23] William Dampier cited in Richard White, *Inventing Australia*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81), p. 3; see also Robert Hughes, *The Fatal Shore* (London: Harvill, 1996), p. 48.

[24] Peter Cunningham cited in White, *Inventing*, p. 8.

[25] Edward Long, *History of Jamaica*, cited in Homi K. Bhab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91.

[26] Raghavan Iyer, 'The Glass Curtain Between Asia and Europe', in R. Iyer (ed.), *The Glass Curtain Between Asia and Europ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20.

[27] Dr James Hunt cited in Hyam, *Britain's Impelial Century*, p. 81.

[28] George Orwell cited in Hyam,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p. 158.

[29] Frederickson, *Racism*, ch. 2.

[30] A. J. Christopher, *Colonial Africa* (Totowa: Barnes and Noble, 1984), P. 83.

[31] David B. Abernethy, *The 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22.

[32] Lord Palmerston cited in Hyam,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p. 39.

[33] Punch (1849) cited in Richard Ned Lebow, *White Britain and Black Ireland* (Philadelphiat: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1976), p. 40.

[34] Marsden cited in Hughes, *Fatal Shore*, p. 188.

[35] Linda Colley, Britons: *For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6] Colley, *Britons*, pp. 29–30.

[37]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1991[1978]), p. 206, also p. 227.

[38] See the summary discussion in: Curtin, *Image of Africa*; Ivan Hannaford, *R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the Wes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Michael Banton, *The Idea of Race* (London: Tavistock, 1977); Frederickson, *Racism*.

[39] Benjamin Disraeli cited in Banton, *Idea of Race*, p. 25.

[40] Joseph Chamberlain cited in White, *Inventing*, p. 71.

[41] Lord Curzon cited in A.P.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6), p. 72.

[42] James Lorrimer, *Institutes of the Law of Nations*, I (Edinburgh: Blackwood and Sons, 1883), pp. 10–12.

[43] M. F. Lindley, *The Acquisition and Government of Backward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26), p. v.

[44] John Westlake summarised in Said, *Orientalism*, pp. 206–207.

[45] Mohammed Bedjaoui, 'Poverty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Richard Falk, Friedrich Kratochwil and Saul Mendlovitz (eds.), International Law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p. 153.

[46] Lord Carnarvon cited in Hyam,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p. 105.

[47] Said, *Orientalism*, p. 216.

[48] Ibid., pp. 207, 95.

[49] Edward W. Said, 'Representing the Colonized: Anthropology's Interlocutors', *Critical Inquiry* 15 (1989), 216.

Notes to ch. 11

[1] Dugald Stewart cited in Friedrich List,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Longmans, Green, 1885), p. 120.

[2] Peter 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London: Methuen, 1983), p. 31.

[3] Linda Weiss and John M. Hobson,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Polity, 1995), p. 115.

[4]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367.

[5] J. V Beckett and Michael Turner, 'Tax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3 (3) (1990), 377–403; Paul Gregory, *Russian National Income*, 1885–191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30–132, 193.

[6] Albert H. Imlah, *Economic Elements in the Pax Britann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115.

[7] John A. Hobson, *Imperialis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8[1902]), pp. 98–109.

[8] J. V. Nye, 'The Myth of Free Trade Britain and Fortress France: Tariffs and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1 (1) (1991), 23–46.

[9] D. C. M. Platt, *Finance, Trade, and Politics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15–191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8), p. 87.

[10] Platt, *Finance*, p. 89.

[11] Sir Louis Mallet cited in Platt, *Finance*, p. 89.

[12] P. G. M. Dickson,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67).

[13] Imlah, *Economic Elements*, pp. 70–75; Phyllis Deane and W. A.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37.

[14] Paul A. Bairoch,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ly* 11 (2) (1982), 296; Angus Maddison,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Paris: OECD, 1995), pp. 30, 182–190.

[15] Weiss and Hobson, *States*, pp. 118–119; P. K. O'Brien, 'The Impact of the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Wars, 1793–1815, on the Long-Run Growth of the British Economy', *Review* 12 (3) (1989), 349–350.

[16] Calculated from Stefan Oppers, 'The Interest Rate Effect of Dutch Money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3 (1) (1993), 25–43.

[17] O'Brien, 'Impact', 346 and 345–357.

[18] N. F. R. Crafts,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 pp. 62–63; Weiss and Hobson, *States*, pp. 120–121.

[19] Mathias,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pp. 32–33.

[20] Joseph Inikori, 'Slavery and the Revolution in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in England', in J. E. Inikori and S. Engerman (eds.),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 6.

[21]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y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53.

[22]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II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522.

[23] K. N. Chaudhuri, *Ths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73ff.; Braudel, *Civilization*, III, pp. 566–567, 572.

[24] A. P Wadsworth and J. Mann, *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 1600–178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31), pp. 124–128.

[25] Arnold Pacey, *The Maze of Ingenuity* (London: Allen Lane, 1974), pp. 278–282.

[26] Ha-Joon 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London: Anthem, 2002), p. 22.

[27] Joseph E. Inikori, *Ajlicans and the Industl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51–155.

[28] Braudel, *Civilization*, III, pp. 386–387.

[29] P. K. O'Brien, 'The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Industri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4 (3) (1991), 305, 311.

[30] Richard Cobden cited in Ronald Hyam,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London: Batsford,1976), p. 56.

[31] Cobden cited in Platt, *Finance*, p. 88.

[32] Bowring cited in Eric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Londont:Andre Deutsch,1944), p. 136.

[33] John M. Hobson, 'Two Hegemonies or One? A Historical-Sociological Critique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 P.K. O'Brien and A. Clesse (eds.), *Two Hegemonies* (Aldershot: Ashgate, 2002), esp.pp. 307–314.

[34] Duke of Argyll cited in Hyam,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p. 66.

[35] 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36] Friedrich List, *National System*, pp. 189, 368.

[37] Hyam,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p. 25.

[38] Werner Schlote, *British Overseas Trade from 1700 to the 1930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52), pp. 172–173.

[39] R. P.Dutt, *The Problem of India* (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43).

[40] Horace Wilson (1845), *cited in Peter Fryer, Black People in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Pluto Press, 1988), p. 12.

[41]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Millennium* (London. Black Swan, 1996),pp. 361, 367. List, *National System*, chs. 8, 13.

[42] Charles Kingsley cited in Hyam, *Britain 's Imperial Century*, p. 106.

[43] Pierre Clastres, 'On Ethnocide', *Art and Text* 28 (1988), 57.

[44] Stanley Engerman, 'The Slave Trade and British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Eighteenth

[45] Century: a Comment on the Williams Thesis',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46 (1972), 430–443; Roger Anstey 'The Volume and Profitability of the British Slave Trade, 1761–1807', in Stanley Engerman and Eugene Genovese (eds.), *Race and Slavery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pp. 3–31.

[46] Barbara Solow , 'Caribbean Slavery and British Growth:the Eric Williams Hypothesi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7 (1985),105.

[47] William Darity, 'British Industry and the West Indies Plantations', in Inikori and Engerman, *Atlantic Slave Trade*, p. 256.

[48] Anstey, 'Volume', p. 24. Note that he reckons slave trade profits at £ 200,000 pa and national income at £ 180 million.

[49] Calculated from Deane and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p. 34.

[50] Calculated from Ronald Bailey, 'Africa,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History: a Bibliographic Review* 2 (1986), 32.

[51] P K. O'Brien and S. L. Engerman, 'Exports and the Growth of the British Economy from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to the Peace of Amiens', in Barbara Solow (ed.), *Slavery and 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89.

[52] Wadsworth and Mann, *Cotton Trade*, pp. 183-92; Inikori, Africans,pp. 372, 482.

[53] 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 p. 278.

[54] Williams, *Capitalism*, pp. 98–102; Darity, 'British Industry', p. 257.

[55] Inikori, *Africans*, p. 356.

[56] Ibid., p. 361.

[57] Darity, '*British Industry*', p. 255.

[58] Inikori, *Africans*, pp. 427–472.

[59] Crafts,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p. 145.

[60] R. P.Thomas and D. N. McCloskey, 'Overseas Trade and Empire 1700–1860', in Roderick Floud and Donald McCloske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I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92.

[61] O'Brien and Engerman, 'Exports', p. 189.

[62] P K. O'Brien, 'Euro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Periphe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35* (1982), 1–18; O'Brien, 'Foundations', 303–306.

[63] O'Brien, 'Foundations', 310–311.

[64] O'Brien and Engerman, 'Exports', pp. 181–182.

[65] Hyam,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p. 209.

[66] Eric L.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83.

[67] 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 pp. 274–278.

[68] Calculated from Hyam, *Britaink's Imperial Century*, p. 322.

[69] W.S.Jevons cited in Hyam,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pp. 47–48, my emphases.

[70] Alec Hargreaves, 'European Identity and the Colonial Frontier',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12(1982), 167.

[71] Richard Broome, *Aborginal Australians* (St Leonards, New South Wales: Allen and Unwin, 1982), p. 51; Henry Reynolds, *The Other side of the Frontier* (Ringwood, Victoria: Penguin, 1982), pp. 122–123.

[72] Henry Reynolds, *An Indelible Stain*?(Harmondsworth: Penguin, 2001), ch. 4.

[73] See T. Barta, 'After the Holocaust: Consciousness of Genocide in Australia',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31(1)(1984), 154–161.

[74] E. Deas Thomson (1842) cited in Robert Hughes, *The Fatal Shore* (London: Harvill, 1996), p. 278.

[75] Barta, 'After the Holocaust'; Colin Tatz, *Genocide in Australia*(Canberra: Aboriginal Studies Press, 1999); Reynolds, *Indelible Stain*?

[76] Reynolds, *Indelible Stain*?, pp. 155–179.

[77] Anne-Marie Willis, *Illusions of Identity* (Sydney, New South Wales: Hale and Iremonger, 1993), pp. 96–97.

[78] Jeffrey G. Williamson, 'Why was British Growth so Slow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1984), 687–712.

[79] Weiss and Hobson, *States*, pp. 119–123; O'Brien and Enperman, 'Exports', pp. 193–209.

[80] Lance Davis and Robert Huttenback, *Mammon and the Pursuit of Empi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81] John M. Hobson, 'The Military Extraction Gap and the Wary Titan: The Fiscal Sociology of British Defence Policy,1870–1913',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22(3) (1993), 463–473, 478–493. See also Niall Ferguson, 'Public Fina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Domestic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Revisited', *Past and Present* 142(1994), 148–153.

[82] Paul M. Kennedy,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London: Fontana, 1989), p. 32, his emphasis.

[83] Avner Offer, 'The British Empire, 1870–1914: a Waste of Mone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6(2)(1993), 215–238.

[84] K. J. Holsti, *Peace an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 5.

[85] Thomas and McCloskey, 'Overseas Trade', p. 100.

Notes to ch. 12

[1] Cf. Graeme Gill, *The 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172–191.

[2] Linda Weiss and John M. Hobson,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eopment*(Cambridge: Polity, 1995), p. 45.

[3] Margaret Levi, *Of Rule and Revenue*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 12, 115.

[4] John D.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pp. 129–132.

[5] C. B. A. Behrens, *The Ancien R é gim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7), pp. 138–143.

[6] J. C. Riley,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Finance and the Amsterdam Capital Market 1740–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7] Weiss and Hobson, *States*, p. 45.

[8]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90, also pp. 450–452.

[9] Max Weber, *Gessa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T ü bingen: J. C. B. Mohr,1988), pp. 126–127, 180–181, 230, 282, 377, 410. See also John M. Hobson and Leonard Seabrooke, 'Reimagining Weber: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social balance of power',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2)(2001) , 239–274.

[10]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1937[1776]).

[11] Paul A. Bairoch, *Economics and World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 40.

[12] Weiss and Hobson, *States*, ch. 4.

[13] Colbert cited in E. H. Carr, *Nationalism and After* (London: Macmillan, 1945), p. 5.

[14] John M. Hobson, *The Wealth of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cf. John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8[1902]), pp. 94–109.

[15] Peter Flora, *State, Economy,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1815–1975*, I(London: Macmillan, 1983), pp. 281–339. I have corrected his figures for Germany.

[16] Hobson, *Whalth*, esp. pp. 19–20, 210–211.

[17] E. g. Clive Trebilcock,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Powers 1870–1914* (Londo: Longman, 1981);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8] James M. Blaut, *Eight Eurocentric Historians* (London: Guilford Press, 2000), p. 144.

[19] Flora, *State*, pp. 96–151.

[20] Ha-Joon 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London: Anthem, 2002), pp. 74–75.
Ibid, pp. 75–76.

[21] Patricia Springborg, *Western Republicanism and the Oriental Prince*(Austin: University of

[22] Texas Press, 1992), p. 19.

Notes to ch. 13

[1]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I(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78.

[2] Ibid, p. 404.
[3] Jack Good,*The East in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8.
[4] Lynn White, *Medieval Religion and Techn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80.
[5] F. Oakley cited in Goody, *East*, p.8.
[6] Mann, *Sources*, I, ch. 1.
[7]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335–336.
[8] The phrase that Nathan Sivin attributes to the framework deployed by Joseph Needham; see Sivin,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Joseph Needham and Lu Gwei-Dje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I(6)(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3–14. Pacey's term 'global dialogue' is also useful; Arnold Pacey, *Technology in World Civilization*(Cambridge, Mass,:MIT Press, 1991);cf. Jerry H. Bentley, *Old World Encount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9] 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8, 354.
[10] Eric R.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 388, and pp. 385–391.
[11] James M. Blaut,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London: Guilford Press, 1993),p. 208, n. 2.
[12] 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Press,1978).
[13] Frank, *ReOrient*, pp. xvi, xxvi;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Marshall G. S. Hodgson, *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4] Cf. David Aernethy, *The 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esp. ch. 10.
[15] Edward W.Said,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1991[1978]), p. 2, his emphasis.
[16] Mann, *Sources*, I, p. 531.
[17] 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 Blaut, *Colonizer's Model*.
[18]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Millennium* (London: Black Swan, 1996), p. 345
[19] James Axtell, 'Colonial America without the Indians: Counterfactual Reflection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3(4)(1987), 984.
[20] Fernández-Armesto, *Millennium*, pp. 365–367.
[21] Goody,*East*, p. 7.
[22] John M. Roberts, *The Triumph of the West* (London: BBC Books, 1985), P. 201.
[23] Davi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London: Little,Brown, 1998), p. 514.
[24] W.E. B. Du 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35), p. 722.
[25] George G. M. James, *Stolen Legacy*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4).
[26] Henry Reynolds, *Black Pioneers* (London: Penguin, 2000)pp. 9–10.
[27] Edward W.Said, Preface(2003), *in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1978]2003), p. xxii.

译后记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为我们重新认识和思考西方文明的发展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和宏大视野。作者旁征博引，引用文献浩繁，以翔实丰富的史实、犀利而精辟的文笔，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批评和多维度剖析，对西方文明演进中融入的东方元素进行了深入而独到的分析，提出了“东方化的西方”这一令人为之一震的概念。在我们对西方发展模式的“普世性”提出质疑的大背景下，本书中的许多观点无疑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

本书涉猎的知识范围非常广泛，作为一部世界史或全球文明史方面的力作，它不仅跨越了宏大的历史时段与空间，而且是跨学科的学术探讨，它涉及经济史、科技史以及政治、文化、宗教、地理、军事等领域，相信读者会从阅读本书中能够获得诸多收益。在近两年的翻译过程中，我一直徜徉在那古老文明跨越时空的撞击与交融的历史长河中，并从中学到了许多知识，但另一方面也使我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常常硬着头皮去查阅大量的资料，认真推敲、核对作者引用的一些文献的出处和原意以及数量庞杂的人名、地名等，唯恐因自己的懈怠而无法准确理解和表达作者的本意。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贾春莲女士为第9、10章的翻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研究生代春霞等为译稿的整理和核对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郑州大学于向东教授、王琛教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为本书进行了认真校注，纠正了译稿中的不少纰漏，对很多

专有名词做了详细的注释。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这个译本一定还存在很多缺憾和不足，但无论如何，所有的错误和纰漏都由我一人承担，并诚恳欢迎读者朋友予以批评、指正。

孙建党

2009 年 10 月于福州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１章　反驳纯粹西方的欧洲中心论神话：发现东方化的西方
第一部分　作为“先发地区”的东方：东方通过东方全球化发现并主导世界，公元５００—１８００年第２章　伊斯兰和非洲开创者：在亚非大发现年代构建世界和全球经济的桥梁，公元５００—１５００年
第３章　中国开创者：第一次工业奇迹和中国孤立主义的神话，约公元１０００—１８００年
第４章　东方保持优势：东方专制主义与印度、东南亚和日本孤立主义的双重神话，公元１４００—１８００年
第二部分　落后的西方：东方全球化和基督教国家的建立，公元５００—１４９８年第５章　基督教国家的建立和欧洲封建制度的东方起源，约公元５００—１０００年
第６章　意大利开创者的神话，公元１０００—１４９２年
第７章　瓦斯科·达·伽马时代的神话，公元１４９８—约１８００年
第三部分　作为“后发地区”的西方与后发优势：东方全球化与西欧作为先进西方的重塑，公元１４９２—１８５０年第８章　１４９２年神话和发现美洲的不可能性：亚非对西方后来居上的贡献，公元１４９２—约１７００年
第９章　英国工业化的中国起源：英国是擅长模仿的“后发国家”，公元１７００—１８４６年
第１０章　塑造欧洲种族主义身份和创造世界，公元１７００—１８５０年：作为一种道德天职的帝国文明使命
第１１章　英国工业化的黑暗面和放任主义的神话：战争、种族帝国主义与工业化的亚非起源
第四部分　结语：东方化的西方与西方的欧洲中心神话第１２章　理性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和东西方大分裂的双重神话，公元１５００—１９００年
第１３章　东方化西方的兴起：身份／动力、全球结构与偶然性
参考书目
译后记
１．１　“西方与东方”的东方主义和父权制诠释

１．２　马克斯·韦伯关于“东方”和“西方”的东方主义观：理性大分裂
１０．１　英国帝国主义理论：文明等级表和种族主义世界的建立
１１．１　英国政府的实际支出（费用以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表示）
１１．２　欧洲主要国家在其工业化时期的（实际）国防费用负担比较
１１．３　部分欧洲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平均关税税率
１２．１　西方主要国家政治公民权的起始年份
１３．１　西方身份的塑造及影响
１３．２　重大世界历史事件的两种观点，约公元５００—１９００年